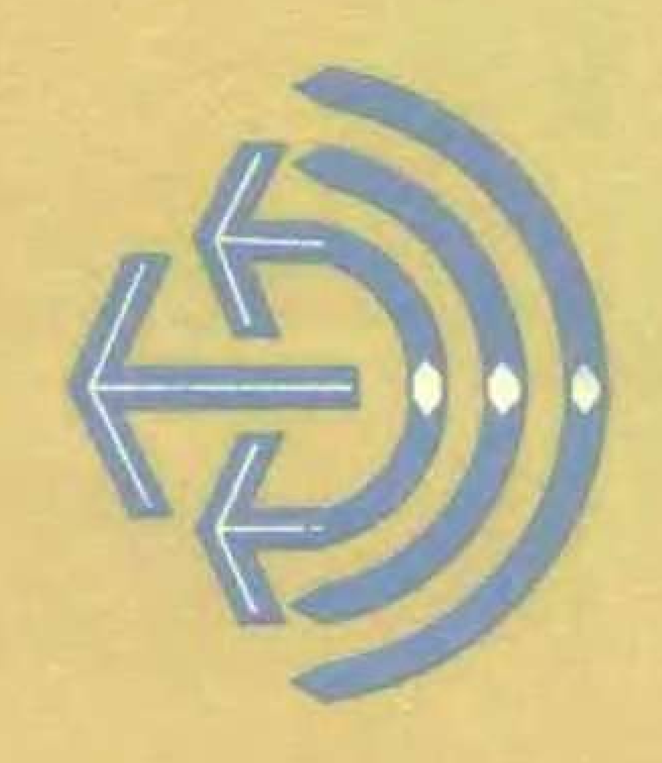
新史学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J·勒高夫／P·诺拉
R·夏蒂埃／J·勒韦尔 主编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

新观点

新史学

主 编/〔法〕J·勒高夫
P·诺 拉
R·夏蒂埃
J·勒韦尔

编译者/姚 蒙

上海译文出版社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FAIRE DE L'HISTOIRE
Editions Gallimard 1974

de Jacques le Goff et R. Chartier J.Revel
NOUVELLE HISTOIRE
Retz C.E.P.L.1978

根据加利马尔出版社1974年版《研究历史》
和雷斯出版社1978年版《新史学》编译

新 史 学

〔法〕J·勒高夫 P·诺 拉 R·夏蒂埃 J·勒韦尔 主编

姚 蒙 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72,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7-5327-0491-2/k·023

定价：4.95元

编译者的话

编译这么一本书是很早就有的愿望。记得刚到法国时，我在波尔多大学图书馆拿到手的第一本书就是《新史学》。由此书入门，我对法国历史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

本书是根据J·勒高夫、P·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Faire de l'Histoire)和J·勒高夫、R·夏蒂埃、J·勒韦尔主编的《新史学》两书编译而成。这两部书是法国史学在70年代对自身发展所作阶段性总结的产物。原著篇幅巨大：《研究历史》共3卷760多页，共有33位学者、专家参与写作。此书按史学更新的三个层次来划分：第1卷：新问题；第2卷：新途径；第3卷：新对象。《新史学》的编著比《研究历史》晚4年，是一本570多页的辞典式著作，有35位学者参与写作。如果说《研究历史》是以重点探讨的形式使人们对法国史学的一些主要进展有所了解的话，《新史学》则旨在使读者对法国当代史学主流有既深入又全面的认识：10篇长文探讨了史学的10个基本方面，100多个词条则分析了人物、概念、方法、研究题材等一系列史学的基本主题。这两部书相互补充，勾勒了法国当代史学的大致图景。

《研究历史》和《新史学》两书出版后引起了史学

界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西方国家一些重要书刊相继发表书评。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都将这两本书视为重要的参考文献。有几方面原因使人们看重这两部作品：首先，法国史学自本世纪初以来经历了整体范型的更新，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史学新潮流推动、影响着整个西方史学形势的演化。法国当代史学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界、学术界占据着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但法国史学却很少对自己进行有系统的总结。其次，自60、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史学都面临着新的分化和选择。在法国，新史学潮流业已全面渗入史学研究各领域、各流派，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与此同时以年鉴学派为集中代表的史学方向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程度不一的挑战，因此，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就成为法国史学家的迫切任务。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J·勒高夫与P·诺拉在《研究历史》一书编者前言中写道："在今天仍梦想有一个昨天的光荣和明日的荣耀这一点，并不是此书的基点，而是要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作为把握过去的科学和对时间的意识，史学还应当被定义为变化的科学、转换的科学。这也就是为何这部著作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对现时史学形势的一种总结、一种分析，它还希望指出史学在未来将走的

和应当走的道路。这本著作不仅是对人们现时研究历史方式的反映，它还是有启示未来史学的雄心。”第三，这两本书都是有关史学家和专家协作写成的，从而既有论述的广度，又有分析的深度，具有颇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因而此书对于专业人员、历史学爱好者、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者们来说都有吸引力。时隔十几年后的今天，法国还出版简装本的《研究历史》一书，而《新史学》虽然是精装本，大部头，但销路始终很旺。

这两部作品的编辑、安排主要是由J·勒高夫负责的。他本人被视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而其他编者如P·诺拉、R·夏蒂埃、J·勒韦尔也都是第三、四代年鉴学派的重要成员。由他们来主编这两部综合性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年鉴学派史学对法国当代史学的影响。J·勒高夫、A·比尔吉埃尔等人曾多次强调：年鉴学派是一个创新的运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个学派，因此，人们可以将年鉴学派看作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主要代表。年鉴学派学派性的形成是与传统史学范型发生冲突的产物，随着史学的新范型在战后的全面确立，这一学派性也就日趋消失。也正是基于这一点，J·勒高夫等第三代年鉴学派才逐步倾向于以“新史学”一词来

称呼年鉴学派以及在年鉴学派影响下的史学新潮流。但在这两部作品中人们也可注意到：不论是年鉴学派还是新史学，在其内部都既有着历时性的变化，又有着同时性的差异。共同的史学研究倾向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千人一面的史学研究结果、途径和层次。法国当代史学不管是年鉴学派还是新史学，其理论探讨的重点始终是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未强求史学家工作倾向、解释机制和史观的一致性。J·勒高夫在《新史学》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如果说新史学认定理论思考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它并不拥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框框，相反新史学确认多元化研究途径的丰富成果，确认解释系统的多样性。通过这些研究途径与解释系统，我们达到了问题的统一整体。"这是新史学开放性的一个特点。但是史观、意识形态与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关系究竟何在呢？这是两书作者未能作出回答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两部作品都呈现出很强的实证倾向。可能也正是这一历史解释与途径的多元化，使读者难以把握这两部书的背景结构。这也是原著集体编写形式的缺憾之一。

我编译《研究历史》和《新史学》两书，是希望向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和一般的读者提供资料，使人们

对法国乃至西方史学的实际进展有所了解。多年来我国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分析较偏重于历史哲学一端，从西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史学学科本身的演进状况。本译本试图弥补这一点。鉴于原著篇幅巨大，无法全部译出，故采用择要编译的方式。在编译时，笔者既注意一般的史学理论（如“史学研究活动”、“概念化史学”）、史学方法（如“历史学中的计量”），又选取了一些重要史学领域的宏观分析文章（如“历史人类学”、“想象史学”、“即时史学”等），这样能使读者了解法国和西方史学时有一个具体的视角。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志们给我这一编译本以问世的机会，感谢王晴佳同志对我的编译计划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此书的编译可以说是与妻子李幽兰共同完成的，从初译、修改到润色、校对，她都花了大量心血。J·勒高夫本人听说我们在编译这两部作品时，显得很高兴，主动提出要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他衷心祝愿此书能促进中法两国在学术上的进一步交流。

这本书是集体劳动的产物。但愿它能促进中国史学、中国学术的进一步繁荣。

姚　蒙

1987年10月于巴黎

中译本序

我十分高兴能向中国读者介绍这本论文选集。中国是个大国，它的历史丰富、漫长、悲壮、光荣。中国既有古老的史学传统，又有新的历史学，而这一史学也正是我们希望能通过今日与明天中法友好关系的发展更好地加以了解的。我要向中国的史学家、研究人员和历史业余爱好者致敬。我同样要感谢姚蒙先生对论文集文章所作的明智选择，从而使中国同行和朋友们能对之更感兴趣，也感谢他为编译此集子所付出的劳动。

你们将要读到的这12篇文章是在过去15年中写成的。这些文章选自两本旨在让法国与外国了解人们已经进行了的和正在推进中的史学研究新方向的著作：《研究历史》（Faire de l'histoire）和《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这两本著作主要(但并非绝对的)是在两位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研究方向指导下完成的。这两位史学家从1929年起就已通过他们的著作与他们所创建的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对史学研究、史学思想的更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杂志现名《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我也荣幸地担任着这一杂志的主编之一。

1974年，我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一起出版了第一

本文集《研究历史》。这本集子既注意到了史学家在叙述总体史时所遇到的不断增长的困难，也注意到了史学实践的这样一种趋势：这种趋势试图从史学一部分领域出发来寻求重建历史研究科学学科。这一研究实践概念体系的理论在米歇尔·德·塞尔多(于1986年故世)所写文章《论史学研究活动》中得到了表述。我们可以在这篇文章中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看到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的基本观念：历史事实并不是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证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是“被给定”的，而是史学家根据历史的新问题、新途径和新对象来构建的。

我们在这本编译本中可读到4篇有关史学新问题的文章：1.米歇尔·德·塞尔多在《论史学研究活动》一文中，解释了史学家的工作是如何与一个社会环境和科学实践的组合相联系的。2.保罗·韦纳的《概念化史学》一文探讨了史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为“科学的”，探讨了这种史学科学性的特殊本质。对于作者来说，这一科学性是由一种概念化的工作组成的。保罗·韦纳试图给年鉴学派的非事件性史学提供一个认识论的基础。3.在《历史学中的计量》一文中，弗朗索瓦·菲雷指出了系列史的进展特征，这些进展是人们由于使用了计算机而盼望从系列史中得到的。但他同时又指出了一种盲目的计量史学的局限，这种计量史学追随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滥用信息方法的时髦和种种幻觉。4.纳唐·瓦黎代勒在《文化适应》一文中表明将一个由人类学家所创立的概念引入史学中所能带来的丰富成果，他也同时指出了史学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应采取的预防措施。“文化适应”这一概念能使史学家研究“一系列产生于两种文化接触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现象”，在从远古以来的历史中，这类现象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中国历史和远东历史就是例子。此外，编译本还收入了《语言学和历史学》一

文，让·克洛德·谢瓦利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语言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除了上述5篇选自《研究历史》一书的文章外，这个编译本的另外7篇文章选自《新史学》一书：这是一本由我和 罗杰·夏蒂埃、雅克·勒韦尔在1978年主编并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 7 篇文章是从这本著作的由大量短条目相衬托的10篇有份量的专题长文中选出的。在《历史学和长时段》一文中，米歇尔·伏维尔分析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58年提出的“长时段”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描述了历史中时间节奏的多重性并优先重视了最为缓慢的节奏——即结构的时间节奏。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则研究了这些历史中的结构，他指出了所有现时史学应归功于结构主义及与结构主义相区别的方面。近来史学与人种学(也译作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的关系促使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写出了《历史人类学》一文，这篇文章确切地说是为了表述对历史中的结构层次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心态领域中获得了特别巨大的进展。这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既涉及了如摄食方式、性、疾病、信仰、家庭等方面，又涉及到原来意义上的心态——即一个社会在特定时代中所具有的共同的“群体无意识”的显现。这一心态概念是菲利普·阿里埃斯(于1985年故世)的《心态史学》这篇文章的主题。而文芙琳娜·帕特拉让则在《想象史学》一文中指出了表象、形象在历史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艺术史、文学史同样也研究想象，但在文字、形象生产的最深刻层面中，想象并不是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在历史的深层生存、演进着。梦幻史对于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的历史来说也是重要的。

史学又在历史的加速发展压力下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有着飞机、电视、火箭与卫星的世界上，这一历史的加速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与信息交流、通讯发达的进步紧密相联

的。当涉及到对现时进行解释时，史学家作为研究过去的专家常常感到不甚习惯。正是一位法国著名记者让·拉库蒂尔（他在国外也享有盛名）才向我们展示了“即时史学”的问题及其种种特征。

我自己在《新史学》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深刻更新着史学的运动整体。我们给予了这个运动以“新史学”这一也许并不那么谦虚的标签。然而我已在此文中指出，我也希望在此再次指出的是：这一“新史学”如果不是追根溯源到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话，起码可上溯至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一些大史学家。人们可以接受或批评这些史学新方向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但其基本的一点是人们坚信历史研究应当伴随着理论思考的工作和各种方法的创建工作。应当“思考”历史学并使历史学适应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渴望——这是一种在世界、社会的演进、变化中理解世界、社会的渴望。所有好的史学都是新的，因为它意识到历史在变化着，意识到历史科学也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雅克·勒高夫

1987年9月末于巴黎

目次

1 新史学

雅克·勒高夫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随即通过会考而获得历史教师资格证书。曾先后在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牛津大学和罗马大学进修、学习。1954—1959年任里尔人文科学学院助教，1959—1960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助教，随后从1962年起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P.H.E.)的讲师、研究主任(教授级)。这一学院从1974年起扩充改名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勒高夫曾任该院院长(1972—1977年)。这一学院是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重要基地，而勒高夫通过其著作及活动也被认为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他长期担任《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的编辑、主编，还一直是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法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

勒高夫的重要著作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57年)、《中世纪文明》(1964年)、《为了另一个中世纪》(1977年)、《"炼狱"

观念的产生》(1981年)、《中世纪的想象》(1986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他与P·诺拉(Nora)联合主编的《研究历史》3卷本以及与R·夏蒂埃(Chartier)、J·勒韦尔(Revel)联合主编的《新史学》两书是本编译本的基础与来源。勒高夫的专长是中世纪领域，他的研究注重于长时段的经济、社会、心态史研究，并逐步向历史人类学的方向靠拢。他的研究取向较集中地代表了年鉴学派新发展的潮流。——编译者

20多年来，我们看到科学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大多数科学展示着这一历史的加速——这一点本身已是不容置疑的了，而且知识的分类也在迅速演进。认识论思考正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认识论”这一名词变得时髦这本身也意味深长。对一系列新被确认为科学实体的学科说来，这一变革的影响尤其突出，而承认这些学科是科学的实体，这已是一个重大的革新。我这里想说的便是人文科学，或按1957年法国大学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人的科学(按英美国家的习惯说法，是社会科学)。有三个现象标志着这一知识的新领域的出现。

1.一些科学学科的确立。这些学科或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或出现已有几十年，但都已超越了大学普及的范围，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正取代着人种学)、动物生态学、生态学、符号学、未来学等；

2.传统学科的更新。这一更新要么表现在对问题的研究上，要么表现在教学上或两方面兼而有之。一般说来，这些变动往往通过添加“新”或“现代”等修饰词来表示，如现代语言学、新经济史等。现代数学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但它本身并不属于

人文科学的范围；

3.一些混合学科的产生显示了跨学科性。这些学科或以一个名词加一个形容词联合了两个科学学科，如社会历史学、历史人口学、历史人类学；或以合成新名词来表示，如心理语言学、人种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甚至超越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或生命科学)的界限而产生了诸如社会数学、心理生理学、人种精神病学、社会生物学等。

1.1 历史学的独特地位

在这一知识新领域内，有一门科学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这就是历史学。今天存在着一种新史学，新史学这一用语本身在1930年就已为它的创始人之一亨利·贝尔所使用[①]。历史学的上述独特地位归因于这样两个基本特点：史学的全面革新，史学的革新扎根于古老而坚实的传统之中。许多科学学科的现代化只限于该学科领域的一方面，而未涉及整个学科范围。例如由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地理学便成为以这样的方式取得革新的最早的人文科学之一。继维达尔·德·拉布拉什（1845—1918年)之后，让·勃吕纳(1869—1930年)、阿尔贝·德芒戎(1872—1940年)和儒勒·西戎(1879—1940年)都成为把地理学列入人的科学的推动者，正如新史学从一开始就自称为人(复数的人)的科学一样。应当指出，这些地理学家对新史学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1947年，他在高

① 见H·贝尔的文章，载《历史综合杂志》，第50卷，第19页。在此文中，"新"这一修饰词参照了1912年在美国所发动的新史学运动(New History)，特别是参照了H·E·巴恩斯发表于1919年的文章《心理学和历史学》。

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所领导的研究课题，名为“地理历史学”）有过很大影响。吕西安·费弗尔不止一次指出了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这种结合。例如，在他悼念儒勒·西戎和阿尔贝·德芒戎的文章中①，费弗尔在回忆儒勒·西戎的言论时说，后者要求地理学家“懂得历史学家的专业”，并强调“必须既作为地理学家又作为历史学家来考虑问题”。在纪念马克·布洛赫的文章中，费弗尔说：“……如同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的是他的同辈，有的是他的长辈——一样，马克·布洛赫深受这一地理学的重大影响，这一地理学在才智横溢的领袖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推动下成为硕果累累的学科之一。”② 就是吕西安·费弗尔本人，也在其《地球和人类演进——历史学引进地理学》③一书中开创了新史学对空间、时间进行同时研究的先例。正是在这一方向下，莫里斯·隆巴尔研究了穆斯林世界的历史。④

正是在这方面，地图绘制对新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大量绘制和使用各种地图，但这些地图已不再是简单地标明地理方位以及作插图之用，而是试图用空间的长时段演进、量化研究（由其具体地域所体现）和各种解释性假设来进行研究和解释。这是历史学向一个撇开了一切决定论的地理学所作的一次请教。马克·布洛赫在其《法国乡村史的基本特性》⑤一书中指出，历史是在乡村具体环境及文化系统中形成的。在法国西部，由树林围隔的耕田或草地并非是土地本身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

---

① L·费弗尔："两位地理学家朋友"，载《社会史年鉴》1941年第3卷，收入《为史学而战》，巴黎1953年版。

② L·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斯特拉斯堡"，载《为史学而战》，巴黎1953年版。

③ L·费弗尔：《地球和人类演进——历史学引进地理学》，巴黎1922年版。

④ M·隆巴尔：《首次辉煌时期中的伊斯兰（8—11世纪）》，巴黎1971年版。

⑤ M·布洛赫：《法国乡村史的基本特性》，巴黎1931年版。

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历史

历史学并不满足于在这里或那里开辟一些新的视野和新的领域。的确，皮埃尔·古贝尔通过对一个地区100年间有关家庭和个人的全部教区记录所进行的剖析，从人的出生研究到人的死亡，[①] 为新史学开发了历史人口学领域。的确，纳唐·瓦絮代勒以其成为新史学范本的名著《战败者的观念》[②] 一书，使史学扩展到范围极其广阔的人种历史学领域。然而，新史学并未满足于这些进展。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此外，新史学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古贝尔的《博韦人》及瓦絮代勒的《战败者的观念》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些都是总体史研究的著作，在这些书中所研究和显示的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在这一方面，历史人类学的杰作：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1294—1324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③] 一书便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任何形式的新史学（包括那些装出新样子的史学）及那些表面标有局部研究字样的著作，如保罗·韦纳的社会历史学[④] 或阿兰·贝桑松的心理分析历史学[⑤] 等，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是对诸如古希腊、古罗马社会或19甚至20世纪俄国社会进行解释的总体假设。

在谈到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这一题目时，吕

① P·古贝尔：《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巴黎1960年版。

② N·瓦絮代勒：《战败者的观念》，巴黎1971年版。

③ E·勒鲁瓦·拉迪里：《1294—1324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巴黎1975年版。

④ P·韦纳：《面包和杂技场——一种多元政治的历史社会学》，巴黎1976年版。

⑤ A·贝桑松：《被屠杀的沙皇子嗣》，巴黎1967年版。

西安·费弗尔指出"经济"、"社会"这两个修饰词，尤其是"社会"一词，是由于马克·布洛赫和他考虑到它能包括历史的整体而被选定的。他说："我们完全知道，在目前，'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而最终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正因为该词含义'模糊'，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①]

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

新史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有长期的坚实的传统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新史学产生于反对19世纪实证史学的斗争中——1900年左右的一些历史方法论著作曾对这一实证史学作过说明。[②]然而在史学中，实证史学方法的一部分技术经验仍然是有效的。正是马克·布洛赫自己在谈到考证史学之父唐·马比荣——这一考证史学在19世纪随着巴黎文献学院而取得了成功，该学院在20世纪曾长期是传统史学的堡垒——时不无夸张地说："《论外交》发表于1681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从那一年起，文献考证终于奠定了基础。"[③]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它使史学不再限于朗格卢瓦和塞诺博斯所主要依据的书面文献中，而代之以一种多元史料的基础，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愿物，对于新史学而言

① M·布洛赫：《振兴史学》，载《为史学而战》，巴黎1953年版。

② 参见C·塞纽博斯和C·V·朗格卢瓦：《历史学研究导论》，巴黎1898年版。

③ M·布洛赫：《为史学辩护或史学家的职业》，巴黎1964年版，第36页。

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但是，分析、研究这些新资料的方法却与17、18和19世纪所形成的考证史学方法大同小异。不久前出版的《历史学及其方法》[1]一书，虽由巴黎文献学院培养的史学大师之一夏尔·萨马然主编，但书中却并行不悖地介绍了传统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的某些新动向。

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将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对资料和考证本来早该有的新概念现在才刚刚得到论述，这也正是我想在《艾诺迪百科全书》中所做的。

如同从高等学校系统中得益良多一样，史学也从这一方法论成果中所获甚丰。专业史学家拥有坚实的知识功底和建立在完整制度化基础之上的教育体系〔虽然新史学对这一体系的渗透尚少，对智力测试(如国家教师资格会考)的帮助也不大〕，因而史学能够在依靠其悠久传统的基础上转向全新的前景而无后顾之忧。这样，在古典人文科学未曾更新、新科学学科又难以为人确认的情况下，史学的地位就远胜于其他人文科学学科。

英国伟大的民族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61年在曼彻斯特所作的著名报告中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

1.2 新史学的诞生——年鉴学派

新史学有其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立者的传统相关联的。当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

---

① 巴黎1961年版。

布洛赫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创办年鉴杂志时，他们就已怀有多方面的动机。

首先要使史学摆脱陈规旧套，特别要使其突破本学科的严格界限。正是就这一点，吕西安·费弗尔于1932年号召"消除陈旧过时的学科壁垒及由偏见、陈规及概念和理解的错误所造成的巴比伦式的混乱"①。

其次是希望确定由刊名中两个形容词所表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利用"经济"这一词，新史学推动一个几乎被传统史学所完全弃置一边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英国人和德国人远远走在法国人之前。经济领域在各民族和各人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年鉴杂志本身诞生于经济大危机的1929年，这决非偶然。在当时活着的历史学家中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最佩服的人大约是亨利·皮雷纳，吕西安·费弗尔曾打算请他担任这份国际性杂志的主编；皮雷纳去世后，布洛赫曾为纪念他而打算编写《欧洲文明范围内的法国社会史》，这一计划很快即被放弃。布洛赫的这种打算，既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又出于他对皮雷纳的敬佩。皮雷纳于1914—1918年世界大战中被囚期间撰写了《欧洲史》一书，而布洛赫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法处于"奇怪的战争"期间愁绪万千。这又使人联想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在1940—1944年被囚于德军集中营时写了《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在德文杂志《社会、经济史季刊》中，年鉴杂志创始人注意到，研究的重点不仅应放到经济方面，而且应放到因词义模糊而无所不包的社会方面，因为这样就能超越各种壁垒，打破使史学和其他邻近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相隔绝的学科划分。在社会史这一标签

① L·费弗尔：《为史学而战》，第343页。

下，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再次提出了《历史综合杂志》及其领导人、他们的朋友亨利·贝尔关于历史无界限的想法。亨利·贝尔于1921年出版了《传统史学和历史的综合》一书，揭示了一个比较研究的前景。他还在1923年4月9日第五届历史科学国际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学术报告，题为《历史学的比较方法》，费弗尔和布洛赫对之深表赞赏。布洛赫后来在《为历史学辩护或史学家的职业》中写道："唯一真正的历史是世界性的历史，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只能依靠相互的帮助和借鉴。"①

同政治史的一场斗争

年鉴学派在1924--1939年间展开了什么斗争？

首先是反对政治史的斗争。政治史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所反对的焦点，尤其是外交政治史。对他们来说，埃米勒·勃尔乔亚的《外国政治教程》（1892年）是一个最糟的典型。这种政治史一方面是一种叙述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由各种事件拼凑而成的历史，这种事件性的历史只能是掩盖了真正历史活动的表面现象；而真正的历史活动则产生于这些现象的背后，产生于一系列的深层结构。必须深入到这些幕后和深层结构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释真正的历史活动。1931年吕西安·费弗尔在《综合杂志》——他常常同时为《综合杂志》和《年鉴杂志》写稿——以"历史还是政治"为题，对刚出版的《欧洲外交史》的价值提出疑问，他反对从"大人物"的性格、心理及心血来潮出发，或从"外交对抗中的矛盾活动"出发来研究"伟大群众运动"的"种种真正的、深刻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存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知识因素、宗教因素和心理

① M·布洛赫前引书，第50页。

因素等等之中"。①

15年后，他在《年鉴》杂志上评论《武装的和平(1871—1914年)》一书时再次挑起了这一论战。他抓住了此书作者的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们总是在国际冲突中试图夸大经济因素的作用而缩小政治、道德因素的作用。"对此，费弗尔以其特有的辛辣评论道："是啊！天哪，'历史唯物主义'干吗来这里插上一手？……世界就是世界。它在1914年战争前的情况同1920—1940年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而1871—1914年的情况又不同于1848—1870年的情况。为什么？是政治原因？抑或是道德原因？都不是！而是经济原因。这是有目共睹的。"②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援引马克·布洛赫的《奇怪的失败》，否定这样一个论断："法国的失败首先是智力和品性的失败。"

以上的引证可以概括年鉴学派的主张、立场及其深远意义和局限性。它拒绝表层化的和简单化的历史学，这种史学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并将一切都归诸一个因素。但我觉得一种太折中的分析会有这样的弱点：它会在"原因的多重性"面前不知所措，从而分不清因果关系。然而要求有一种深刻的和总体性的史学还是完全必要的。它首先要打破那种贫乏的、一成不变的、披着迷惑人的假史学外衣的历史学。

对史实概念的一个批判

年鉴学派也对"史实"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现成的、自己送上门来给史学家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按马克·布洛赫所说，史学家应当像任何科学研究人员一样"面对众多纷繁的现实"作出"自己的选择"。但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或

① L·费弗尔前引书，第63页。
② 同上，第68—69页。

简单武断地收集资料，而是需要科学地收集资料，并应通过对这种资料的分析来达到重建和解释过去的目的。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兰西学院开学的第一堂课上举了一个例子："史实本身可说是历史学构成中的一个原子。我们该到何处去找呢？亨利四世被拉法亚克所谋杀，这是一个史实吗？我们不妨对之进行分析，将这一史实分解为一系列的因素，其中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因素。在这犹如乱麻般的复杂整体中，我们通过种种分解很快就会看到：这是一系列普遍规律、当时当地特殊环境以及在悲剧中充当各种角色的每个个人特殊情况的综合产物……这是自然所给予的吗？不！这是史学家的创造！无数次的创造！史学家在假设和推断的帮助下，通过细致而又令人振奋的工作，实现了这种创造。"①

1.2.1 年鉴、经济、社会、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鉴》杂志及团结在其周围的史学家们继续推动新史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新的高峰。鉴于战争和德军占领法国等一些具体条件，《年鉴》杂志几经改名，从1946年起确定了一个新名，即《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标志着杂志视野的进一步扩大。首先，这几个名词都是复数：人是"复数的人而非单数的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总爱这样重复强调，以便人们不再从抽象的意义上去认识人；其次，在令人忆及昔日刊名的两个形容词即"经济的"、"社会的"旁边出现了"文明"一词——费弗尔和布洛赫总爱使用广义的、能把物质和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字眼。布洛赫于1944年被德军枪杀，

① L·费弗尔前引书，第7页。

但他的思想长存。他在那本有关方法论和传世之作中提到了基佐，从而事先为使用作为复数的“文明”一词作了辩解：“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一个社会里，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乃至心态的最基本和最细微的表现，这一切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①

年鉴学派和托因比的历史观

关于文明一词，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年鉴学派创始人对这一名词的用法。我们已看到他们喜欢用这一名词，但他们也并未对这一名词所带来的风险视而不见。他们特别注意同阿诺德·托因比的文明观划清界限：后者的文明概念将人类历史分作21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按照“挑战和应战”的规律而分别经历着诞生、成熟和衰亡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他用模糊的术语把“社会”和“文明”混为一谈（当然他也并非指所有的社会，托因比列举650个原始社会未达到“文明”的程度），他使用低劣的方法进行胡乱比较，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大量时代混淆的错误之上的，是求助了许多隐喻和一种“业已过时”的“生机论”思想，把人类武断地划分为“有限数量”的文明。总之，对他的批判主要有两条：一方面，他像魔术师那样制造一种虚幻的史学，像演情节剧那样逐一展现各种文明；另一方面，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学，而是一种历史哲学。

吕西安·费弗尔不无讥讽地总结道，托因比心目中的历史学可以这样来概括：有个年老的图书馆馆员在答复一个垂死而又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知晓全部历史的波斯国王时，这个年老的智者说道：“陛下，历史就是人的出生、相爱和死亡。”②

① M·布洛赫前引书，第96页。

② L·费弗尔前引书，第110—143页。

如果我已对这一争论稍稍多费了一些笔墨的话，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确定新史学的一些基本立场。我以为所有自认为属于新史学的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同意吕西安·费弗尔的这一观点。托因比的历史学尽管有其吸引力，有其开阔的视野和有其把握总体的愿望，但这种草草拟成而又不可避免地大量使用第三手资料的史学，发表不费力气的空论，并不是我们的史学。

一种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

从此，以新刊名出现的《年鉴》就由吕西安·费弗尔独自领导。

《年鉴》杂志从未像现在这样希望让人理解史学的问题所在。它提出历史学的各种问题："(我们) 所提出的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①] 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因此，这本最初就希望成为国际性的，但实际上曾主要是西方化、欧洲化的杂志，便渴望更大的开放，渴望突破并反对欧洲中心论，渴望面向整个世界，特别是面向人们所谓的第三世界。

在这一新阶段的开始时期，年鉴学派创始人的两本"纲领性"著作——《封建社会》和《16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出版了。这是他们在战争初期出版的杰作：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是一部问题史学、综合史学及比较史学的典范作品。此书超越了法制史而向一种阶级的社会史、一种权力史(一权和多权)迈进，它在"观察和思考的方式"方面开拓了道路。吕西安·费弗尔的《16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又是一本杰作：他在书中研究了"16世纪宗教心理"的深层历史，研

---

① L·费弗尔前引书，第42页。

究了观念、情感和信仰的长时段，并破除了那种把拉伯雷当作自由思想家这一违背时代真实的神话。

至于马克·布洛赫，他的遗著《为历史学辩护或史学家的职业》一书问世，虽未经本人校订也未写完，但自从它很快被译成英文(1954年分别在曼彻斯特和纽约出版)，最近又被译成东欧诸国文字，其中包括俄文(莫斯科1973年版)后，新史学便得以向外国传播。吕西安·费弗尔认为这本书既不是论述"一种史学方法"，也不是"冒牌的历史哲学"，而是"在史学领域内对各种错误的思考方式和实践方式所作的一次批判性的回顾"。就此，我只提出新史学最突出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方面它拒绝"奉起源为偶像"，按照一句阿拉伯谚语："人们形似于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形似于他们的父辈。"另一方面，它注重现在和过去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过去理解现在"，然而也"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因而，采取"谨慎的追溯方法"是必要的。

为新史学而战

几年以后，吕西安·费弗尔将他关于方法论的大部分文章汇集成册，题为《为史学而战》，其中包括我已作了简要介绍的一些"开始的基本立场"，还有一系列反对政治和外交史、反对描述史、课本式的历史、哲学化的历史以及他称之为唯历史的历史的文章。这种唯历史的历史建筑在事件史的基础上，对历史现象持被动的态度，缺少提问，自我封闭在对文字材料的反复思索之中。这种史学与目前政界所称的"政客化的政治"同出一辙。

反之，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今天也许已很少再听到这一说法。但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作出了榜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

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1948年成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我们在法国所开展的这一工作予以支持，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途径也赢得了众多大学历史系的赞同。

新史学还主张把目光移向"邻居"，希望使"互不相识的兄弟"进行对话，这些兄弟正几乎处于同样的失望状态。语言学正处于某种衰退之中，但它毕竟能使史学家"在缺少文献史料的情况下通过归纳的方法去揭示历史的一角，这种归纳法或许有其局限性，但它是建立在无懈可击的经验基础上的，从而也是稳固和扎实的"①。从表面看心理学尚无能力主动与史学家进行对话，而史学家则应当"给心理学家带去一个有效的历史心理学"。② 由于一些专家们目光短浅，闭目塞听，这些领域正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使新史学的史学家远不能从一些基本的领域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中获得养料。

1.2.2 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

但战后不久，年鉴学派经历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成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第六部，二是以吕西安·费弗尔为中心改组了《年鉴》杂志领导班子。第一项变化是实现了很早以前就由维克多·杜罗伊所提出的一项计划：他曾撇开老巴黎大学，并多少抛弃了它的陈旧教学法，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内，采用建立在研究、考证或实验实践、像德国那样的研究讨论班基础上的教学方法，同时，他已准备筹备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

① A·梅耶：《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1912年版第163页。

② C·布隆代尔：《集体心理学导论》，巴黎1928年版。

但这一计划因现实条件不具备而迟迟无法实施。此时吕西安·费弗尔终于取得了战后法国新政府的同意而创办了第六部，这个部的宗旨正是《年鉴》杂志的宗旨：跨学科研究、向全世界开放、以探讨问题和集体调查为基础。历史学在这个部中起着鼓动和带头的作用。① 这是新史学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新史学通过教学、讨论和研究与兄弟学科相结合了，并逐步形成制度。但新史学在向大学的结构和研究实践模式进一步渗透的过程中，还遇到许多阻力。即使是费尔南·布罗代尔于 1950—1955 年间主持历史教师资格考试评审委员会时，新史学的精神也未能全部贯彻。

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历史研究引向另一个方向

另外一件大事是：乔治·弗里德曼响应吕西安·费弗尔的号召，将史学引入社会学，确认了泰罗制在工业劳动演进中的地位，并在传统和变迁的深层中，在意识形态的神话中来理解现时，因而成为法国新社会学的鼻祖；此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史学家，即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夏尔·莫拉泽，他们和弗里德曼一起进一步推动着《年鉴》杂志向这一古今结合的新史学方向发展。

不久，费尔南·布罗代尔就为新史学提供了一部代表作——《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当年曾“发现”了这位年轻史学家的吕西安·费弗尔现在又为此书作评，其评论的标题本身就含义深长：《向另一种史学迈进》。费弗尔和布罗代尔当时知名度不等，后者的名望并未超过前者，费弗尔此举已属了不起的新鲜事了。费弗尔指出“昨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我们开辟了

① 由于L·费弗尔、F·布罗代尔、E·拉布鲁斯和C·莫拉泽的缘故。

新的视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作者决定在'政治'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含义上，将西班牙政治的大致图景纳入到其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中去，他首先研究了那些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和为其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所作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一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地中海。接着，在第二部分中，他又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又有稳定存在性的力量，这些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的力量能够用日期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位期间起着作用的力量。第三部分是各种事件。这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居的史实。这些事件往往受第一部分中所研究的经常性力量的摆布，受第二部分中列举的稳定存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总趋势的前景下绘出最出色和最出人意外的画卷。"①

吕西安·费弗尔于1956年去世。布罗代尔先在罗伯特·芒德鲁，后在马克·费罗的帮助辅佐下，成为《年鉴》杂志的主要主持人。1958年，他发表了一篇深刻标志着新史学当时新阶段的文章：《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1969年，布罗代尔、莫拉泽和弗里德曼将《年鉴》杂志交给了由安德烈·比尔吉埃尔、马克·费罗、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和雅克·勒韦尔组成的新班子。1979年将是《年鉴》杂志创刊50周年纪念，杂志将总结以往成果，规定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对新史学现状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新史学悠久而显赫的谱系。

---

① L·费弗尔：《向另一种史学迈进》，载《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1949年。

1.3 新史学的祖先

在年鉴学派之外，新史学确实还能奉18世纪以来的一些著名人物为自己的祖先。

伏尔泰已确定了新史学的大纲

正是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1744年)中写道："也许不久以后，史学的写作方式也将发生物理学已发生过的变革：新的发现排斥着旧的体系。这一变革今天已成为自然哲学的基础，我们也可在这一有趣的细节中认识人类……如果所有的文献资料齐备，可供人们在需要时参考的话，这固然是件好事，而且我已将各种鸿篇巨著作为词典浏览了，但在读过3000至4000份有关会战的叙述和几百篇论文的提要后，我觉得实际上并没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从那里只看到一些事件罢了。我通过查理·马特所指挥的战役对法国人、萨拉森人的了解，并不比我通过帖木尔战胜巴耶洛德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了解更多。我很想知道一个国家的实力在战前是如何，战争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了该国的实力。西班牙在远征新大陆前是否比今天更富有？查理五世皇帝时代的人口究竟比腓力四世时多多少？为何200年前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刚到2万？为何今天它却有24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英国今天人口又比亨利八世时期多多少？据《波斯人信札》中说，地球上人口还很不够，与2000年前相比人口是少的，这是真的吗？以上仅是爱读人口史或哲学史的人所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中的一些而已。有关这些题目的知识还须进行深入的探究；这种探究将引导人们去分析一个民族的主要优缺点：

为什么它们有强大的或弱小的海上力量？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又是怎样致富的？富到何种程度？当然这些可以从出口帐册上查到。这种探究还想了解手工业和艺术是如何建立的，它们又是如何在各国间传播的。最后，习俗道德和法律的演变也成为这种探究的目标。上述种种将使人们了解所有人，而不只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可是我在阅读法国编年史时却一无所得；我们的史学家对这些细节都闭口不谈，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格言：'我是人，没有什么有关人的方面与我是无关的。'"①

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夏多布里昂和基佐在19世纪上半叶又对新史学的这一纲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夏多布里昂的真正宣言

夏多布里昂为《历史研究》所写的序是新史学的一篇真正宣言，他在其中写道："随着旧社会的灭亡，新社会从废墟中诞生了：法律、习俗、惯例、舆论、原则全都发生了变化。一场大革命完成了，另一场大革命又在开始酝酿：法国的编年史必须重写，以便把它同知识的进步联系起来。……古代的历史分析者并不全面介绍各行政系统的状况，而且把科学、艺术和公共教育排斥在史学领域之外。克里奥②不像今天的人们那样身负

① 转引自J·埃拉尔、P·帕尔玛德：《历史学》，巴黎1964年版，第161—163页。

② 克里奥(Clio)，希腊神话中主管历史、英雄史诗的女神。——编译者

沉重的包袱，行走时也当然十分轻捷。当时的史学家往往只是讲述自己见闻的游客。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随意讲讲有关风土人情的故事，也会突然涉及盐税或别的捐税，甚至扯到战争、航运、贸易之类的事：当时武器是如何制造的？建筑用木材在哪里采伐的？一锂胡椒值多少钱？如果作者没有注意复活节是一年的开始，而把1月1日算作新年，那就会搞乱一切。不能他说什么，你便相信什么；难道他不会把引言的页码或出版的年代搞错？如果不知道国王的短裤是什么颜色，不知道一马克银子的价格是多少，社会对你仍是一个谜。近代的史学家不仅要知道本国所发生的事，还要了解邻国所发生的事，并且还必须要有一种哲学的观念渗透到他的思想中，并以此作为他的向导。这些就是近代史学所具有的困难之处：这也许会使我们永远产生不了像修昔底德、李维和塔西陀那样的史学家，但这些困难却不可避免，只能接受下来。”

这是一种将经济、艺术、人类学放在首要地位的新的总体历史。这也是价格和政治经济史(不是政治史)，是旨在研究和说明问题的“哲学化”的历史，是一种为严格尊重科学而不惜牺牲写作文采和构思艺术的历史……夏多布里昂将新史学称作“近代”史学。如果16世纪的人文主义关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不因概念的混乱而被停止使用的话，夏多布里昂的用语也许会走好运，他1831年所说的“近代”史学已是我们的新史学。

基佐及作为历史学对象的文明

基佐在他《近代史教程》的第一课：“从罗马帝国的覆灭到法国大革命的欧洲文明史”里，曾把文明当作历史的中心对象，

他说："最近人们常说历史必须只讲事实，只叙述事实，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应该讲的事实也许比人们最初所想到的要多得多，也广泛得多：不仅有肉眼可见的、物质的事实，如战役、战争、政府的官方行动等，还有隐蔽的，但也确实存在的道德现象，有属于有名有姓的个人的私事，也有不具名称、无法确定日期、不能严格划定其范围的普遍事实，这些事实同样也是历史事实，如果将这些事实排斥在外的话，就会阉割历史……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遍的和最终的事实，先生们，难道不是如此吗？就一个民族而言，构成该民族历史的所有事实或所谓的生活要素以及该民族的制度、贸易、产业、战争和具体政务都是研究对象，这样从整体上、从其联系上去考察、估价和判断，那么，人们该提出什么问题呢？人们将这样问道：这些事实对该民族的文明作出了什么贡献？起了什么作用？占了什么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先生们，我想知道，在通过这些事实去了解历史之前，是哪个事实如此重要、广泛和珍贵，以致单独考虑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概括和体现各民族的全部生活？许多国家很久以来就使用着'文明'一词：人们赋予它的涵义有广有窄，有的较明确，有的则较含糊，但这个词已被人们所使用和理解。正是这个词普遍的、人文的和通俗的涵义，才是应该加以研究的。"①

的确，基佐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人物，作为如夏尔·莫拉泽所说的"步步上升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在"文明"一词中首先看到的是进步的含义（他曾说："在我看来，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是文明一词所包括的基本观念。"）。但是人们定会联想到，吕西安·费弗尔于1930年向国际综合讨论班第一次会议提交

① 见E·埃拉尔、P·帕尔马德的前引书，第203—207页。

了著名论文《文明：一个词和一组观念的演变》；他在1946年又论证了《年鉴》杂志新加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则强调文明一词应用复数。

新史学的两位主要先驱者也许是米什莱和弗朗索瓦·西米昂。

新史学的预言者米什莱

作为新史学的预言者，米什莱的预言不只见诸他的专著之中，他在《法国史》1869年版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法国只有编年史而没有一部历史。学者们主要从政治角度去研究这些编年史。没有任何人深入到法国的各项活动(宗教的、经济的、艺术的)、各种发展的无穷细节中去。没有任何人能宏观地看到构成法国的地理和自然因素的生动整体。我是最早把法国看作为一个生灵、一个人的人……我将历史看作是整个生命的复活，这一复活不是只在表面，而是在内部的深层的机体之中，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更加令人震惊的问题……总之，我所看到的由那些杰出人物(其中有些是令人敬仰的)所代表的历史，在我看来有两个方法上的弱点：在物质方面，它只注重门阀世族而忽视了乡土、气候、食物以及很多生理和体质方面的状况；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到法律、政策条文，而不谈观念、习俗及民族精神的内在的伟大的进步运动。"① 这里又一次体现了对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历史的摒弃和对一种总体的、深层的史学的追求。总之，他在为新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大声疾呼：要求有一种更物质化的历史——它预示着一种注重气候、食物、体质状况的文化史的出现；要求有一种更精神化的历史——这是一种有关习俗道德的历

① 同前，第261—265页

史，正如伏尔泰所召唤的(他的《习俗论》)那样，但它宣告着历史人类学的诞生和在我们的时代恢复“习俗”这一美好的概念。

反对史学家“偶像”的经济学家——西米昂

在这里提到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名字可能会令人吃惊，因为他(1873—1935年)并不是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此外，他的名声也远不如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位史学家高。

然而，西米昂同新史学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值得介绍。他不仅在经济学方面丰富了周期理论，他还为《历史综合杂志》和《年鉴》杂志出谋献策。我尤其想到他写过《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这篇令人难忘的文章。西米昂在文章中借用培根的比喻，提出要摒弃“史学家部落的三个偶像”：

(1)“‘政治偶像’，即把研究重点或至少是始终坚持的研究前提置于政治史上，研究政治事件、战争等等，以致夸大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

(2)“‘个人偶像’或曰一种不可救药的习惯。这种偶像和习惯使人们把历史看作是个别人的历史，而不是去对史实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围绕某些历史人物，而不是围绕制度、社会现象或一种联系去进行……

(3)“‘编年史偶像’，即一种不去首先研究和理解正常类型，并在这一类型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中寻找、确定这一类型，而一味追根究底和寻查各种特殊情况的习惯。”①

废除政治史在史学中的统治地位，这是《年鉴》杂志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的中心问题，虽然一种新的政治史，或更恰当地说一种新政治概念的历史，也应在新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① F·西米昂：“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载《历史综合杂志》，1903年。

摒弃大人物的历史，这一斗争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尽管旨在制造假象的伪史学仍有市场，尽管新史学还应对大人物的问题重新思考，并赋予人物传记以新的科学地位。我们这里首先想到的是恩斯特·坎托罗维奇的《腓特烈二世》和皮埃尔·古贝尔的《路易十四和2000万法国人》，其次才是吕西安·费弗尔的《马丁·路德：一种命运》。最后，纠正史学家们的编年史习惯也是新史学的重大任务之一，这方面现在还只是处在踌躇摇摆的阶段。西米昂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抽象地把握时间，不如说是充分地考虑历史时间的多样性，考虑制订出作为新史学方向的有关长时段研究的确切规则。

1.4 新史学只是法国的吗？

新史学似乎基本上是法国的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事实。据我所知，除了吕西雅诺·阿列格拉和安吉罗·托尔所作的饶有兴趣的论述外，① 还未出版过更深刻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只能提出两个互有联系和互相补充的假设，一方面，从17世纪末或至少从19世纪以来，史学在法国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起着主导的、联合的和开拓性的作用。我们已就此介绍了在这方面曾作出过贡献的几位著名人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现代社会科学主要脱胎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而在法国，历史学则扮演了向导的角色，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于1947年的成立及其所推行的纲领和展开的活动，都足以说明这一点。此外，英国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发展较早，加之

① L·阿列格拉、A·托尔：《从巴黎公社到"年鉴学派"期间法国社会史的诞生》，都灵1977年版。

美国对它的影响部分地阻碍了这种史学的崛起，因而除英国之外法国是唯一具有古老而又连续史学传统的现代大国，这一传统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集权(君主制、教会)，与社会演进(贵族历史、资产阶级历史)，以及与在12—15世纪期间民族感情的过早形成都有联系。最近贝尔纳尔·基内所领导的一系列研究已指明了这一传统的生命力，并揭示了从中世纪起法国历史编纂学就已具有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法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或多或少使法国免受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和法学的双重影响，而在德国、意大利，尤其在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国家里，哲学和法学都程度不同地奴役、阉割和曲解着史学，使史学脱离了实际性和具体性，而新史学正是在这一实际性和具体性中获得其良好灵感的。上述法学在脱离实际的法律史的影响下，和实证考据相结合，便产生出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只是耕种着教堂田契所规定田地的农民"。法国史学并没有受到维科(尽管他对米什莱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黑格尔、卡莱尔或较晚的施本格勒、克罗齐或托因比的控制。法国史学家对历史哲学的疏远很可能限制了19世纪的泰纳和当今的雷蒙·阿隆对专业史学的影响。

当然不能因此而得出新史学只是法国的史学这一可笑的概念。首先是因为新史学是一种对差异性特别敏感的史学，凡是在它可能发展的地方，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都将按自己的独特道路去发展。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些外国人，如皮雷纳、海辛哈和马克思，他们都对新史学的形成起过作用。

法国之外的新史学

最后，新史学在法国以外也在发展，而且常常有引人注目的创新。就刊物而言，我们对德国《社会、经济史季刊》在《社会、经

济史年鉴》创立时所起的示范作用还记忆犹新。今天英国的《过去和现在》(1952年创刊)如同《年鉴》杂志一样是新史学的代表。英美合办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比较研究》(1957年创刊)在广义上推动了社会史的革新。和英国一样，意大利对新史学似乎尤其欢迎，许多出版商的活动便是一个明证。我对此随便举几个例子(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人纳塔利·泽蒙·戴维斯和意大利人卡洛·金斯伯格在人种历史学方面占有领先的地位；例如，引人注目的波兰历史学学派造就了最好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生活在社会边缘者历史的专家勃罗尼斯拉夫·格列梅克，维托尔特·库拉则以一部经济史巨著革新了在经济史、社会史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特别是该书中的新的封建主义研究模式在西方激起了强烈的兴趣，[①] 他还通过《度量衡与人》这本开创性著作，指出了社会斗争的历史是如何常常围绕着日常生活工具而展开的。

1.5 今天的新史学

在《研究历史》这本书中，新史学已经从三个方面显示了其特征：它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提出了改革史学传统领域的新方法(这些改革主要见诸该书所收的一些条目，如历史人口学、宗教史、社会史等)，特别是提出了史学领域中新的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到目前为止，往往还是属于人类学的(这可见诸像“食品”、“身体”、“动作”、“形象”、“书”、“神话”、“性”这些条目)。我将通过50年来这些在新方向上的新发展，通过一系列新

① W·库拉：《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关于16—17世纪波兰经济的模式》，巴黎1970年法文版。

的前景来说明新史学，并在这些新的选择中突出哪些方面与历史学其他潮流或其他方面相对应。

1.5.1 长 时 段

新史学的先驱们较有成效的观点无疑是长时段。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马克思懂得这个道理，他通过生产方式的概念，通过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再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把一些历时几百年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看作是历史的基本形态。我们可从另外一方面来表达这一点，就是将习俗、心态当作历史的衡量标准，将技术、能源形式(先后以人力、畜力和机械力为主)以及对社会的基本现象和问题所持态度(如回答这些问题:对劳动的鄙视观念何时转变到认为劳动是进步的观念的？认为死亡是只能完全消极地接受的观念又是何时转变为认为人们可以部分地控制死亡这一观念的？)看作历史分期的依据。

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以王朝和政府更替为准的政治史把握不了历史生活的内在奥秘：人体身高的增长是同食物革命、医疗革命相联系的；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自于运输的革命；知识革命是由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如印刷、电报、电话、报刊、广播、电视——的出现而引起的；凡此种种都不取决于今天还在报上占“头版头条”新闻地位的政治事件或政局变化。

因此应当研究那些变动缓慢的现象，研究几十年来人们称之为“结构”的东西，但同时也要抵制新史学的某种倾向：今天一些最杰出的史学家深感长期延续的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为了

使人们更好理解实际情况，有意夸大其词，结果使用了一些带有危险性的词——“近乎不动的历史”(费尔南·布罗代尔语)、“不动的历史”(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语)。不，事实并非如此，历史是变动着的。新史学应当做的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地使人们把握这种变动。

1.5.2 野蛮的人和平常的人

富有成果的长时段理论有利于史学和那些研究“近乎不动的”社会的人文科学，如人种学或者像今天人们更愿称呼的人类学之间的相互靠拢。因此，历史学家对习俗，对马塞尔·莫斯所说的人体的技术，对人的衣食住行越来越感兴趣。弗朗索瓦·菲雷和我曾打算制定一项计划，对野蛮人和平常人进行研究。这样，就有必要从一些至今仍被忽视的资料，即从那些表现并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现实的文学材料和档案文献出发，去发展史学的方法，去开拓“人种学的资料”。

但是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接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近几十年来，人类学主要研究欧洲以外地区的状况，而对发达社会则让民俗学去搜集一些鲜为人知的民风民俗，从而降格为一种“研究穷人的人种学”。对这种民俗学，新史学尚可接受，而人类学则继续不予重视。此外，新史学尤其对旨在研究差异性的人种学很感兴趣，而人类学则转而研究对新史学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抽象的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结构主义的影响)。尽管莱维-斯特劳斯的有关著作对整个新一代研究神话的史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野蛮人的思想比野蛮思想更使史学家感兴趣。

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

史学与人类学所进行的这种对话是主要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忘记新史学为同其他人文科学进行对话而作出的努力。法国社会学的杜尔克海姆学派曾对刚诞生的《年鉴》杂志产生了无可怀疑的影响。乔治·弗里德曼参加《年鉴》杂志的编辑工作，以及布罗代尔与乔治·古尔维奇的亲密关系都不足以保证两种学科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新史学不易与社会学取得一种共同语言，因为这种社会学往往在抽象的哲学思辨与带着问题进行调查的经验方法之间摇摆不定，而且，在这些方法后面并不总是出现一种有根有据的或然判断。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对新史学的扩张性也不无忧虑，他们认为新史学具有的概念太少，因而往往仍然只将新史学看作是存放具体事例和经验的仓库。

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也并不容易。经济史的发展以及它在新史学中不可缺少的存在，确实保证了这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但随着经济学技术的日益专业化，随着计量经济学确立了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学家们日益注重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两个学科也逐渐分道扬镳。但它们的联系还始终存在，如塞尔日-克里斯托夫·科尔姆与《年鉴》的合作便是这些联系发展的明证。新史学的杰出史学家乔治·迪比的《社会史与社会意识形态》一文，正是从经济史和社会史出发，通过引进各表现系统而扩大了新史学的视野，并有利于史学与经济学对话的发展。

地理学目前的危机也造成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联系的松解，虽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联系从《年鉴》杂志创立到目前在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思想中所具有的影响。但是，通过对空间的重新认识，通过将时段（也就是史学）进一步引入对空间现象的研究，地理学出现了复兴，从而

为推动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史学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方面，解冻的趋势尚不够明显。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同社会学的联系更甚于同史学的联系，科学心理学的进步同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的联系比同人文科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就保持了、甚至加深了心理学与史学的隔膜。心理学家对集体心理史向心态概念发展几乎不以为然，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两个学科之间的距离。尽管史学家注意着埃米尔·邦弗尼斯特的著作和符号学家的研究——符号学家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1975年起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现代心理学以及它的结构主义倾向并没有使它向新史学靠拢。

此外，还有三项值得重视而成果却有限的演变。

首先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人们对心理分析学的兴趣，并由此产生了心理分析史学。这一学科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比在法国更加发达，然而在法国，米歇尔·德·塞尔都及阿兰·贝桑松也分别从各不相同的途径进行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探讨。但是由于心理分析学难以科学地从个人转向集体，由于许多史学家对荣格心理分析思想存有戒心，这方面的研究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荣格的思想却引起了一些史学家——某些像阿尔丰斯·迪普隆和路易吉·奥里杰马那样的史学家的关注。

其次是史学与精确科学，特别是与数学的结合。这里也诞生了一门新的科学，即社会数学，但直到目前为止，它对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语言学所具有的用处比对史学的用处更为明显。

最有希望的道路也许是力图减少——如果不是完全消除的话——人文科学(首先是历史学)与生命科学之间的隔阂。新史学渴望建设一种从人体到生理的、置于社会历史时段中的总体的人的历史。一些大生物学家希望以一种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方

式，把他们学科的历史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并将他们的研究扩大到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原来意义上的生物学在内的人类生态学的范围，这两者的结合便预示着一些伟大的前景。新史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5.3 心态史学

在史学中的集体心理和精神现象的吸引下，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为新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心态史学。但吕西安·费弗尔仅在这一新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作了探索：心态素材和情感素材的概念。在他的指导下，阿尔贝托·特南蒂对人面对死亡的情感进行了研究，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史学家以其《15世纪艺术中所表现的生与死》一书开创了一条通往硕果累累的成功道路，沿着这条道路，米歇尔·伏维尔、皮埃尔·阿里埃斯和皮埃尔·肖努等都写出了重要著作。

费弗尔死后，乔治·迪比、罗伯特·芒德鲁和雅克·勒高夫等一些史学家继续致力于心态新史学的实践和理论探讨。菲利浦·阿里埃斯和罗歇·夏蒂埃在《新史学》一书中也说明了这一研究在今天新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我这里仅想指出，"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

1.5.4 计量史学和资料革命

经济史很早就使用数字和统计手段进行研究，但近20年来，

开始重视计算的所有史学家都把眼光转向了计算机，由此产生了一个革命：计量史学。埃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故意夸大其词地提出一个幽默的公式：今后，史学家如不会编排程序，就将不成其为史学家。

希望对所有人感兴趣

事实上，计量史学很快发展到一切可被计量的领域，特别是人口史和文化史领域。家庭状况、新兵登记表、文学作品都被分门别类地打孔和制成卡片送交计算机处理。弗朗索瓦·菲雷和皮埃尔·肖努率先从事了这方面富有创新精神的基础研究，后者更是"系列史"的发明者，他以经济史的价格系列为例，建立了一些在特定时间内的统计系列；他正确指出计量史学可通过建立可靠的统计素材而促使史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也承认在方法方面仍有其局限性。马克·布洛赫早已指出过"迷信数字"的危险性。新史学大部分还是定性分析，因为史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成果取决于史学家所编制的程序的优劣，即使在计算机提供了计算结果后，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仍未完成。计量史学目前正处在一场真正的文献革命中，从而特别要求史学家采取审慎的态度。这场文献革命并非没有含糊之处和危险，对此，格莱尼松已作了完整的描述。基本文献作为一种信息单位，从此不再是一项事实，而是一个数据，是计算机所需的数据库。最好的资料来源应能提供大量的数据资料，教区的簿籍便是这样一个榜样。"文献资料爆炸"部分是由史学家希望对所有人感兴趣造成的。但新史学家既不应强迫计算机去计算因这些材料的本身状况或现象的本质而无法计算的东西，也不应忽视不能计算的东西，更不应单靠计算机去"编制历史"或重温实证史学的旧梦：让文献资料去"客观地"制造历史，而自已则袖手旁观。

1.5.5 史学和现时

费弗尔和布洛赫分别是研究16世纪史和中世纪史的专家，但他们都对现时很感兴趣。布洛赫认识到必须有把史学的领域扩展到“对现时认识”的必要勇气，在《社会、经济史年鉴》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有关当代史的。但新史学的主要突破还是在中世纪史和近代史领域内。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和集体的种种例外。在古代史方面，与古典的人性和传统的考证相联系的传统史学仍占有相当分量，因为尽管考古学已有所发展，但目前仍然难以了解当时人的日常生活；除了在考古学中以外，在古代史领域内从事计量史研究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在古希腊文明中的神话问题上，法国新史学派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在现代史领域，莫里斯·阿居隆提出了“社会群体性”这一新概念，他的研究和著作堪称典范。

但是，新史学对现代史领域的渗透仍很有限，近年在《年鉴》杂志中有关当代史研究的文章不多便是一个明证。事件史和政治史在这一领域内仍有很高威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某些杰出记者在研究现时史方面，往往比专业史学家更有成果。曾对共产党现象有过尖锐和完整看法的安妮·克里格尔放弃了史学家的头衔而改称社会学家。然而正如雅克·朱利亚尔、皮埃尔·诺拉和雅克·奥祖夫的成功尝试所表明的，占据现代史阵地已是新史学的迫切任务。总体史具有广阔的前景：皮埃尔·诺拉精辟分析过的“事件的复归”，优先重视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新史学的理想题材，也给新史学家提供了典型的研究领域。

对问题的回答

不仅如此，新史学至少还应当回答我们时代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费弗尔在1946年就说过："研究历史，是的，因为在这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中，唯有历史才能使我们带着思考而不是带着恐惧而活着。"① 我引申一下："唯有新史学最能使我们……"由于在我们这个集体记忆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面对着历史的加速发展，任何人都想摆脱成为过去的孤儿、没有根基的人这种苦恼，所有人都热衷于寻求自己的身份，到处都在清点和保护历史遗产，为了过去和未来而建立信息库；惊慌失措的人们试图把握看来正从他们手中逃遁的历史；在这里，新史学比任何其他的史学都能给人们带来信息和回答。新史学在时间上贯通古今，无所不包，既说明恒定性又说明变动性，既重视物质因素又重视精神因素，既讲经济又讲精神，既提供选择，又不强加于人。从广义说，历史学总是承担着重大的社会义务，在我们这个史学肩负着比以往更为必要的职责的时代，新史学如在教学、科研和传播方面能得到所需要的手段，定能不负众望。

1.5.6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

新史学所代表的史学总体革新，只是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时才遇上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尽管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但是在新史学开始发展的历史环境中，有些公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一般是一方面反对实证史学的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却仍用实证史学方法去研究历史，因此，需要澄清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皮埃尔·维拉以《马克思和民族》为题写过一些文章，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证明了一个史学家

① L.费弗尔，《为史学而战》，同前，第41页。

可以同时是马克思和费弗尔的门生。居伊·布瓦也提供了当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新史学的看法。从最近的一些出版物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朝新史学方向演变。我这里仅简略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与新史学之间的共同点和可能产生的分歧点。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理论

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一种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然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又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家，都有责任把这场讨论深入下去，这也是今天史学界的任务之一。

1.5.7 “年鉴学派”的传统与新一代的史学家

新史学主要是由围绕《年鉴》杂志的一批史学家和本身主持杂志的史学家所创立的，这一点我想已毋庸赘言了。但无论在

昨天或今天，一些与《年鉴》杂志毫无联系或对该杂志并无好感的杰出史学家，他们在新史学中却不一定不具有重要的地位。我特别想提一下路易·歇瓦里埃，他的著作《19世纪上半叶巴黎危险的劳动阶级》(1958年)按照新史学的观点，通过将历史学与人口学相联系，更新了社会结构史与社会史。

这里重要的是将新史学的现状与费弗尔和布洛赫给《年鉴》杂志所制订的大致方针作一比较(尽管只是简要的)，以便更好地看到新史学所走过的历程，费弗尔也曾在《为史学而战》的序言中请年轻的史学家做过相同的工作。

优先与人类学对话

新史学已经赢得了几次大的战役：经济史和社会史已经取得了它们的合法地位并成为史学的基本方面；调查的方法和集体进行历史研究的实践正在发展；尽管还存在困难和失望，但向其他人文科学开放的工作仍在进行。许多史学家看到，必须保护新观点、发现新问题和找到史学研究能达到其高峰的新领域。通过国际间合作、按问题而逐步推进的总体史研究，仍是有待达到的目标。

但是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因为政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关权力的一系列问题又向新史学提了出来。同样，正如皮埃尔·诺拉所指出的，历史事件由于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从而重新恢复了名誉。在《年鉴》杂志初期还只初具轮廓的心态史学和表象史学，在今天则成为一条主线。计量史学则是一个新生事物。

1.6 新史学的任务

我认为，新史学将来可能而又必然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三个方面。

1.6.1 新考证研究的大力推进

传统史学由于其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有效性，其遗产对于今天来说仍是很宝贵的。新史学在更新研究课题时并没有同时更新考证技术，更新技术这项尤其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1.在对史学资料进行新的评判的同时，更新资料概念。资料本身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对伪造的史学资料的传统批判(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对此也未有很大超越)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剖析这些资料的结构以便揭示产生这些资料的条件。但在过去的社会里，不管自觉与否，一些见证材料都成了历史研究的资料，但是，这些见证材料的产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米歇尔·福科在其《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文献即文物"这个概念，正是从这一概念中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同时，人们还应当勾勒、解释历史的空白和沉默之处，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

2.对作为史学原料的时间概念进行"再加工"。这里仍然需

要研究是什么因素能影响时间以及对时间的衡量和利用。必须打破单一的、同质的和直线式发展的历史时间观念。应当根据M·阿尔布瓦克和乔治·古尔维奇确定的社会时间多重性模式去建立历史社会中各种时间的有效概念。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时序，这种时序与其说是按照历史现象产生的时间来确定，不如说是按照该现象在历史中的有效延续时间来确定。这一时序既对物质现象有效，也对精神现象有效。因此我们既有能源的时序(人力、畜力、蒸汽、电力、石油等)，也有信仰的时序(在基督教社会中，炼狱概念产生于12世纪末，随梵蒂冈第二次教廷会议而实际消失)。

3.制订比较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适用于对能够进行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例如，关于封建制，就应当避免下一个过广的定义，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距过远、又不属于可比历史系统之内的历史现实统一在一个标签之下：非洲的封建制其实与9—10世纪的欧洲封建制没有什么关系(后者本身也分作好几个阶段)。此外，也不应满足于过分狭窄的概念，认为欧洲封建制只能与日本封建制进行比较。

1.6.2 向总体史和想象史迈进

为了达到这一点，首先必须重视研究社会遗留下来的所有资料：文学和艺术资料特别应纳入到对社会的解释中去，但也不能无视这些资料及产生这些资料的个人目的的特殊性。也就是说，目前史学中多半还缺少的一个基本领域：想象领域。如果我们能够理清这一梦幻的部分与其他历史现实的复杂关系，我们就能够深入了解社会。在这一方面，史学家应与吉尔伯特·迪朗所主持的尚贝里想象研究中心建立紧密的联系，迪朗本人

是从研究文学史和语言学史起家的。

为了开展上述总体史领域的研究，史学家应当选择以皮埃尔·图贝尔和我曾提到过的"整体化结构"为研究主题。就这一主题，我们曾经提到下述题目：如意大利10—13世纪农村居住情况的独特形式、劳动的概念、战争、乡村人口外流、社会边缘阶层等现象。

1.6.3 对概念和理论的关心

费弗尔于1933年在法兰西学院开第一堂课时，曾希望后人能给他以这样的评价："他很关心概念和理论：关心概念，是因为科学仅在思维的独特创造力的推动下前进；关心理论，是因为理论从来不能把自然现象的无穷复杂性一览无遗，它只是科学始终不渝地扩大人类思维的视野时所逐级攀登的阶梯。"①

到目前为止，新史学试图避开两方面的危险：一方面避免拼凑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像实证史学派那样单纯相信经验(实证史学以为没有理论就能保持客观，但结果却往往变得没有概念)。但应该承认，尽管费弗尔已经有言在先，新史学家在正确地强调多途径研究的同时，却对理论的重视仍很不够。理论家所关心的远不是教条，而仅仅是阐明那些不明确的理论，这是史学家和一切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基点，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些理论，并有责任向他人揭示这些理论。我尤其希望，史学家即便要抛弃那种僵硬的史学解释体系，也必须承认史学体系的存在，并有责任分析这些体系的结构和演变。

① L·费弗尔，《为史学而战》，同前，第17页。

1.6.4 史学的前途

有人或许会考虑，明天或后天的史学将会怎么样。布洛赫如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也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说："只有一种把人放到时间中来进行研究的科学，这种科学不断地需要将对死者的研究与对活人的研究相结合。如何命名这一科学呢？……历史学这一古老的名称在我看来是最明白易懂，最少排他性，也最能对人类千万年以来的努力保持感人的记忆的。"①

我们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仙，只能提出下面三个假设：

史学或许继续向其他人文科学渗透，把这些学科吸收进来，发展成一种无所不包和贯通古今的人文科学，即广义史学；

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

或许史学停止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学科。停止与其他人文科学联合，而坚守一个新的领域，同时实行一次新的"认识论上的决裂"。我想到米歇尔·伏维尔在《历史学和长时段》一文中的种种论述，看来他会朝研究"短时段和长时段的一种新辩证关系"的方向去寻找这一"认识论上的决裂"。

总之，我们应当希望的是历史科学在今后更好地避免历史的哲学化倾向，不再夜郎自大，从而更好地从人类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角度来定义历史学。史学史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应当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

① M·布洛赫语，载《为史学而战》，同前，第15页。



论史学研究活动

米歇尔·德·塞尔多

米歇尔·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年)早年专攻神学。他毕业于里昂神学院和巴黎文学院,获神学学士学位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凭,之后又获宗教学博士学位。其职业生涯也开始于宗教研究界:曾任《基督教研究》杂志编辑、主编助理(1956年),《宗教科学研究》杂志副主编(1966年始)。此外,他还担任过巴黎第七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等。他也是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

米歇尔·德·塞尔多的研究工作也从宗教领域开始而逐渐向宗教人类学、心态史方向转变。他对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思考对西方史学界有广泛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苏立通讯集》(1966年)、《话语的把握》(1968年)、《鲁登地区的中魔现象》(1970年)、《历史学的贫乏》(1973年)、《历史写作》(1975年)、《一种语言的政治:法国大革命与巴都瓦》(1975年)、《日常创造》(1980年)等。——编译者

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他究竟制造了些什么？生产了些什么？当他暂时摆脱这一能使他跻身于史学家之列的辉煌研究，中止在档案馆里的知识遨游，漫步走在大街上时，他会这样自问：历史学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由此，我对自己通过一系列技术活动与现实社会和已往社会保持的神秘关系也产生了疑问。

确实，没有什么理由(不管这些理由有多大的普遍意义)，也没有什么解释(不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何种程度)，能够消除我借以说话的地位的特殊性和我正展开调查的领域的特殊性。这个标记是难以磨灭的。在我揭示一系列总体问题的词语中，这一标记的表现形式是惯用语：我所用的行话本身就已表示了我和一种环境的联系。

但将"观念"归结为环境的行为恰好是史学家的行为。对于史学家来说，"理解"就是用行话来分析材料，每一种方法都首先是根据其合适的标准来选择材料的。① 对于实践者来说，当史学② 成为他思考的对象时，他是否能够颠倒产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事一种回溯的理解过程？如果史学家为了确立他的研究工作的地位，而去求助于一种哲学的外援、求助于一种在一系列正常途径——在史学中，所有思想体系都通过这些途径由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表示出来——之外唾手而得的真理的话，他

① 如果说历史研究工作是以相关环境的确定性，也就是说以局部研究为特点的话，那它同样没有放弃把这样确定的意义(或"事实")的统一性放到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因此，它致力于指出产品和生产环境之间的关系。

② 我先说明一点，我在此说的史学都是指史学研究。这也就是说，我把史学理解为一种实践(一个学科)，这种实践的后果(体现为一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漫游症患者，将在意识形态的托词下屈服。在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表达的看法之间有着同样的二分法，它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用卓有成效的实践保护这种意识形态。这个二分法还将使史学家的经验成为一种理论的梦游症。而且，史学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没有理论的实践迟早势必陷于"永恒准则"的教条主义或"超越时间"的诡辩。然而，怀疑也不应扩及所有的理论分析。

在史学领域内，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米歇尔·福柯、保罗·韦纳以及其他人的工作已证明了一个认识论的觉醒。[1] 在法国，这一觉醒显示着一种新的迫切需要。唯一能够接受的是与实践相联系的理论，这种理论，一方面开创了对一个社会空间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又组织起适合于一门学科的特有研究程序。将历史学看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就是试图根据一个势必有限制性的模式将史学理解为一种地位(招聘、社会环境、职业等)与一系列分析程序(一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就是承认史学是它自己所研究的"现实"的一部分，而这种现实可被"看作人类的活动"、"当作实践"来把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指出的是：史学活动涉及到一个社会环境与"科学"实践的结合。[2] 对先决条件的分析，一般的词语都没有谈及，但它能明确指出确定历史研究活动空间范围的无声规则，历史写作便是按照这一空间构成的，同时它也似乎颠倒了这一空间的结构：事实上，历史写作服从于一系列特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需要

---

①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论自然的人类历史》，巴黎1968年版；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巴黎1969年版；保罗·韦纳，《如何撰写历史》，巴黎1971年版。

② "科学的"一词（scientifique）在所有"人文科学"中都能令人产生疑问（人们常用"分析"一词来代替它）。在"精确的科学"中，同样如此，尤其是当它与规律相联系时。然而，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个术语确定建立一个规则整体的可能性，这些规则能够对相应的特定对象的产生进行"控制"。

得到检验——这是另外一种研究的对象。

2.1 社会环境

所有的史学研究都与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产环境相联系。它涉及到一个受到特殊规定性限制的研究环境：一种自由职业、一个研究或教学的职位、一种文人类别等。因此，所有的史学研究都受到一系列的限制，都与一系列的特权相联系，都深深扎根于一种特殊性之中。各种研究方法、不同的趣向、各种文献以及对史料的各种问题就是根据这一地位而确立、形成和组织起来的。

2.1.1 无　　言

40年前，对“科学主义”的第一次批判揭示了“客观的”史学与某种地位——即主体地位的联系。在分析“对象的分解”(R·阿隆语)时，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取消了史学的特权，这种特权本是史学声称重现以往的“真理”时所津津乐道的。“客观”史学带着这种“真理”观，保持着一种从昨天的哲学或前天的神学中所提取的模式，满足于将这一真理表述为历史“事实”……不过，实证主义的辉煌日子早已结束了。

从那以后就是怀疑的时期。我们已经指出了所有的历史解释都依赖于一个参照系统，这一系统依然是一种特殊的模糊“哲学”，它渗透于分析工作之中并悄悄地组织这种工作，从而反映了作者的“主观性”。R·阿隆在推广德国“历史主义”的一系列主题时，向整整一代人传授了如何揭示“哲学的决定”的艺术，

因为资料的取舍、辨读和陈述规则都据此而定。阿隆的这一"批判"代表着一种理论上的努力。与当时实证研究占压倒优势并对德国的"类型模式"持怀疑态度的法国史学界形势不同，这一"批判"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批判还追溯到19世纪史学的哲学模糊主题及哲学前提；它借助于一种概念的循环，也就是说借助于一种移植，这种移植在整个19世纪中曾将一系列哲学范畴置于史学、注释学和社会学的深层。

现在我们已清楚地知道了这一教训：通过将某种意义引入"客观性"之中，"历史事实"便已形成。在分析语言中，历史事实表达了先于"客观性"的"选择"；这些"选择"既非观察的结果，甚至还是不"可检验的"。在批判的检验下，这些选择只不过是一些"可伪造"的选择。① 这样，"史学研究的相对性"便形成了如此一幅图画：在史学的总体性这一背景中，呈现出无数个人的哲学观——打着史学家旗号的思想家的哲学观。

恢复个人"决定"是在两个公设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在从历史学著作文献中单独抽取哲学成分的同时，我们假定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独立性（这一假定是提取意识形态的条件），这样，一系列观念就被置于史学实践之外了。另一方面（这两方面是并行不悖的），我们既承认这些打着史学家旗号的"哲学家"有着高深莫测的丰富直觉，又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按照他们与思想的直接关系我们把这些思想家组成一个可与他们的社会相隔绝的群体。个人的选择超过了社会特定环境对思想所起的作用，因此，多种多样的哲学主观性引出的结果，就是小心翼翼地给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意义的问题只是在这些知识分子间才得到分析，对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性的解释，

---

① K·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59年版。

只是使整个群体与观念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生产的喧嚣、技术、社会限制、职业或政治地位都无法打破这种关系的平静：缄默是这一认识论的原理。

R·阿隆把观念的统治和知识分子的王国置于一种保留了的地位。“相对性”只是在这一封闭的领地内发挥作用，这一相对性远不是对这一领地提出挑战，而是维护这一领地的。这些论点是建立在M·韦伯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作的区别这一基础上的，[①] 它们虽贬低了知识的身价，但却增强了知识分子的“排外”权力。只要人们指出产生于这种地位的作品的脆弱性，这种地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样，从可检验的作品那儿夺来的特权又重新回到一个无法检验的群体手中去了。

今天最杰出的历史研究工作似乎仍然难以摆脱R·阿隆曾采取过的一种强有力的态度，R·阿隆曾以环境的沉默特权取代产物的沉默特权——这种特权正在不断取得胜利，但又是颇有争议的。米歇尔·福科拒绝参照所有的主观性或作者的“思想”，而阿隆在其前几本书中[②]仍然假定理论环境有其独立性。在他的“叙述”中，一些法则还在发展，科学话语按照这些法则而形成并结合成整体的系统。《知识考古学》(1969年)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标志着一种突变：它既引入了一个学科的技术，又在史学认识论结构的检验中引入了社会的冲突(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样，保罗·韦纳在史学中推翻了R·阿隆曾以“因果科学”出发所支持的各项论点。在他的著作中，解释系统已被分解为很细的个人感知和个人决定，除了文学体裁的规律外实际上不再存在什么严密性，除了史学家的愉悦外，实际上不再存在什么语词所指的对象。看来只有一个先决条件仍然未被触及：这一先决条件，

---

① R·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巴黎1967年版，第510页。

② 特别指他的《语词与事物》，巴黎1900年版

1938年以来的一系列文章，就悄悄地使由史学、史学家集团(或广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集团的实践和法则、这一集团在与公众力量的角逐中实施的社会功能，在认识论上失去了任何合法性。

2.1.2 史学机构

这个被勾勒出单个主体与他的客体间关系的分析忽略或掩盖着的地位，就是知识的机构。

正如一系列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知识机构标志着现代“科学”的产生。这些事实是：17世纪博学者们的“聚会”(例如，圣日耳曼-德普雷的著名聚会)、由“猎奇”阶层形成的通信及旅游网；在18世纪，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俱乐部和学会——莱布尼茨曾对之很关心。[①] “学科”的诞生是与这些群体的创立紧密相联的。

自培根和笛卡儿开始，学科就以学者的“非政治化”特点，从一种社会机构和一门知识的定义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了。我们不应当将非政治化理解为游离于社会之外，[②] 而应理解为一种“团体”在一个政治、学术和宗教机构彼此分工的社会内的形成；不应将其理解为是一种空缺，而应将其理解为是社会空间重新分配中的一个特殊地位。按照“公众事务”和宗教事务(这两者也组织着自己的特殊团体)的方式，一个“科学”的环境形成了。这一使社会整体有可能转向“科学”的突变，反映了社会正在进行全面调整。就其外部而言，这一突变标志着科学机构在一个新整体中与其他机构关系上的地位；就内部而言，则标志着一

① 参见P 罗什，《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巴黎1970年版。有关这方面的实例很多。

② G·巴歇拉尔、A·科瓦雷、M·韦伯等人对这一问题有不少论述。

种与社会机构紧密相联的知识机构的确立。

此后，这一初创的模式就无所不在，并分成许多支系和学派。这种模式倚仗一种“机构基础”对各种支系和学派颐指气使，规定它们的“学说”。社会机构(如某种学会等)始终是科学语言交流的条件(杂志或学报就是从前的学术通信及其延续)。从18世纪“人类观察家”组织、19世纪的各种学院直到年鉴学派创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1947年)，每个“学科”都保持了既是一个群体的法则又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法则的两重性。

机构不仅是一种“学说”的社会基础，它还使这种“学说”成为可能，并暗中决定着这种“学说”。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方面就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术语的颠倒（如经济基础成了观念的“原因”等)，同时又假定这些名词的关系类型是不变的——这些类型是自由思想在给予理论以史学的原始生产方式时就已确立的。我们还应当避免孤立地看待这些术语，不致使相互关系成为一种因果关系。

正是同一个运动组织了社会和在社会中流行的观念。这一运动可分为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制度(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等等)，这些制度的功能互相交错但又彼此有别。没有一个制度能替代另一个制度成成为它的成因。社会经济系统和符号象征系统就是这样既紧密相联，无高低优劣之分却又彼此有别。从这一角度讲，社会变化就好比人体生物变化：社会变化像人体状况那样形成某种语言，与其他语言(如口语)相辅相成。从“医学”角度孤立地观察人体，其原因是解释上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不考虑从躯体化到符号象征化的过渡。相反，一种意识形态词语则是与一种社会秩序相适应的，这就如同每个人的表述都产生于躯体无声息的组织一样。尽管意识形态的词语服从于一些特定的法则，但这并不影响它与其未说出来的那一部分，

即以自己的方式讲话的躯体的联系。[1]

在史学中，任何无视历史与社会的关系的“学说”都是抽象的。这些“学说”否认历史赖以形成的根据。历史在来不及展示，还没有弄明白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因素时就失去了这些因素，这样它就失去了真实性，这些因素是：具有固有逻辑的权力；孕育并“支撑”一门学科并使其不断发展的环境，等等。不谈及与社会“团体”联系的“科学”词语，是不可能和实践相结合的，它将不再是科学的。对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中心问题，而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恰恰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如果不对历史词语本身提出疑问的话，这一联系也将得不到很好的研究。

J·格莱尼松在1965年法国史学的《综合报告》中，提及了知识与地位之间几种不引人注目的结合：一些获得教授职衔并“决定着大学道路”[2]的博士们制定了研究的轮廓；社会禁忌限制和约束了宏篇巨著的撰写；[3]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弱影响和从社会上招聘“在大学里主持讲座和担任各种主席职务的有识之士”，这种影响和招聘之间的联系；重视一个严格等级化、集权化的机构对史学的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发展在3/4个世纪中是在一种令人注目的“平静”中进行的。还应当指出，史学研究的兴趣太过分地局限于本国，这有多种因素：史学屈从于内部争端（人们为反对塞纽博斯，支持费弗尔而争论不休）；法国文化的语言沙文主义也制约着法国史学，使其注重于研究最靠近拉丁文化区域（如地中海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或拉丁美洲）；

① 心理分析学家甚至会说，词语掩盖着，而躯体却表述着。

② J·格莱尼松：《法国当代史学》，巴黎1965年版，序言第26页。

③ 参见J·格莱尼松上述上引著作，序言第24页。关于这两点。N·特利和P·C·帕利若拉也论述过（见《法国社会学杂志》，1971年第12卷，第19—339页）。上述作者把这一“系统”的定义说成是这样四个要素：控制的中央集权化、系统的垄断特性、重要职位的数量有限和头头们身兼数职。

由于财政手段的不足，也使史学的发展受到限制，等等。

在很多其他特点中，上述一系列特点反映着，“科学的地位”是与某种对此表示沉默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可能脱离机构来分析历史词语，历史的词语是按照这些机构悄悄地组织起来的；也不可能想象史学学科的更新只是由史学概念的变化来确保的，而不去考虑现存环境的变迁。正如J·哈贝马斯的研究婉转地指出的那样，人文科学的“再政治化”已成为必然：对它们当前在社会中的处境没有一种“批判的理论”，是无法认识或无法推动其发展的。①

此外，J·哈贝马斯的社会学批判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在历史词语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在理论家对此问题作陈述之前，史学文献就已表明了它本身与机构的关系。举例来说，作者使用“我们”一词便是一种默契的表现(从符号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真正陈述”的反映)。在行文中，“我们”一词是“在我们之间”的社会契约的表现，这表示有众多的研究主体“支持”着这一词语。由于“我们”一词是作为“说话人”提出的，因此就成了一个专门的词语。这就显出了历史论断必然先于每部特定的历史著作，也显示了历史词语和社会机构的关系。以“我们”一词为中介，消除了这样的两者择一：要么将史学归因于个人(某个作者、他的个人哲学等等)，要么归因于一个整体(时间、社会等)，以环境的实证性取代了主观意图和创造性的综合使历史的词语与环境相结合而又不归因于环境。

作者的“我们”和真正读者的“我们”相一致。一般公众并不是历史书籍的真正读者，即便他们在财政和道义上支持过这些书籍。如同过去的学生在教室里发言而老师则站在他的背后一

① J·哈贝马斯的一系列著作都对这一主题作了大量分析。

样，一本历史著作对于作者的"同伴"及"同事"比对于一般购买者更有价值。这些"同伴"、"同事"评价这本著作的科学标准与一般读者不同，而这对于作者是决定性的——他正是从这些标准和评价出发才撰写历史著作的。这里有环境的规则，这些规则勾画了各种不同内容写作的可能性范围，而不是横加约束。这些规则构成了工作的"管理原则"。未被史学家群体"接受"的书，将降格为"村野读物"。虽然人们怀着或多或少同情心看待这本书，但已无法被视为"历史学的"研究。为了进入历史学表述的范围中，这本书首先应当"为人信任"。"有权大声表达自已词语的个人(这些权利要么是合乎规定的、传统的，要么是法律上确定的或自发接受的——只有个人才有这种权利)，其地位"[1]依靠"凝合"，把作者的"我"归入集体研究工作的"我们"中去，或授权讲话人发表历史词语。这些词语(由群众写成的)造就了史学家，而"自由"职业的原子说意识形态却支持着主体(作者)的假象，并让人们以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构建着历史学。

更广而言之，一篇"历史著作"(也就是说一种新的解释、一些特定方法的运用、其他相关情况的提出、定义的变动和资料的使用、富有特色的组织方法等等)陈述的是一种处于实践整体之中的研究活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科学研究中最本质的东西。一项个别的研究是由这一研究与其他因素保持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与这一研究同时代的其他研究，"问题的状态"，一个群体所使用的提问方法及其构成的战略要点，相对于另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的适当差异性等。个人研究的每一个成果都从属于一个学术网络，这一网络中的每个因素都紧密地相互依存，这些网络的能动组合构成了特定时期的历史学。

归根到底，在史学领域中，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作品"呢？

① M·福科：《知识考古学》，巴黎1969年版，第68页。

有价值的作品就是被同行公认的、能够被置于历史研究活动整体中的作品，是相对于史学“对象”、史学方法的现实状况而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作品，是与撰写环境紧密相联，又使新的研究成为可能的作品。历史书籍和历史文章既是群体的一个成果，又是群体的一个象征，这一群体发挥着一个实验室的功能。如同汽车之产于工厂一样，历史研究与一个特殊的群体生产联合企业紧密相联，而不是一种个人哲学或过去“现实”的涌现的结果。它是环境的产物。

2.1.3 在社会中的历史学家

自18世纪的精英论以来，按照法国知识界的一个颇为传统的概念，实践中的研究课题是不能引入“理论”中去的。因此，人们谈论着“方法”，但并不忌讳提到这些方法对一个群体的开创性影响(为了进入一个群体，首先应当学习或实践这些“好”方法)，也不忌讳这些方法与一种社会力量的关系(这些方法就是教育或宗教团体用来显示、捍卫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的手段)。这些“方法”显示了机构的行为以及一种环境所具有的一系列规则，但并不因此而失去科学性。一些人假定，在对科学进行社会分析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科学进行解释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他们一方面相信科学是独立的，一方面又根据这种二分法认为社会决定论的分析是不合适的，认为这种分析所揭示的限制条件是不相干的或次要的，这就显出了这些人的表里不一。

这些限制条件并非偶然，它们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些限制远不代表一个局外人暗中插手圣中之圣的知识生活，而是组成了科学研究活动的结构。研究工作越来越和“群体”、核心人物、财政手段相联系，并进而通过经费作媒介越来越与由于

社会、政治上近期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那种研究的优先权相联系。同样，研究工作又是通过职业来组织的，这些职业有其特定的等级制度、集权化的规范以及接受新成员的社会心理条件。[①] 尽管研究工作试图突破各种禁锢，但它还是处在写作的圈子里：在人们正在撰写的历史中，史学研究优先容纳的是那些写过书的人，以便使史学著作加强作者(文人)、作品(书籍、手稿等)和读者(有文化教养的人)之间的社会文化的同语反复。史学研究工作又与一种教学，因此与读者群的变动相联系，与读者群对研究工作不断加强的压力和社会演进、学生运动在教师中引起的自卫、权威或屈服的反应相联系，与大众文化渗入的人数众多的大学（这些大学不再只是从事研究和教学交流活动的小天地)相联系。大学教授的工作已被迫普及化，转而为"广大民众"(大学生或非大学生）服务，而专家们则力图逃出消费渠道。历史研究的产品分为这样两类："权威人士"的文学作品和"研究工作者"的玄奥难解的科学作品……

社会环境既改变了研究工作的方式，也改变了话语的类型。这到底是"好"还是"坏"？这首先是一种现象，它到处都在发生，甚至不明显的地方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原先被认为是不相干的领域中运动着的或纹丝不动的事物中发现一些被掩盖着的联系。人们围绕着1929年经济大危机，从研究"社会史"转而研究"经济史"；随着大众娱乐和大众媒介的广泛出现，"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趋明显，文化史研究占了优势；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的"历史原子说"是与建立在"开创者"形象的基础上的社会学，以及与一种"心理现象的科学"(这一科学将人的心理划分为"动机"、"激情"

---

① 有关史学家聘用状况的研究，遗憾的是，除了M·圣马丁的著作《科学教学的社会功能》(巴黎1971年版)外，还没有类似的著作。

和“表现”三部分)[1] 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历史原子说”却与19世纪末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这难道也是偶然的吗？考据学中的死亡空间——即那些既不是研究对象也不是研究场所的空间——是处在从洛泽尔到赞比西亚的一些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在没有明确的起源和确切的研究合适性情况下，由于今天经济的发展，才创立了地形学和一些历史学的分类法，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

从收集材料到编辑成书，历史学的实践是完全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在昔日法国，一些结构牢固的社会小单位的存在决定着历史研究的不同层次，如：对有关群体事件有限的文献和更为接近于家庭身份证件的文献的研究；对文艺事业的资助者和权势者们的研究(这些人为了“保护”一项遗产、“保护”他们的当事人及其理想而在文件资料上签名)；对如何吸引知识渊博的文人从事某项事业的研究；对以局部利益作主题，为有限但忠实的读者提供一种合适语言的著作的研究等。

那些对更广泛的对象所进行的研究也包括在这一规则之内，但这些研究所依赖的社会整体已非同一类型：它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研究团体，而是整个学院、大学的知识阶层；在这一层次上的学术研究随着大学的集中化和力量的日益扩大，在提出由19世纪“取胜的资产阶级”制订的世俗的、自由的和爱国的福音主义之规范及法则之前就有别于“稗史”、省级和小人物们所进行的研究。

同样，当吕西安·费弗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段时期里表示希望从16世纪史学中除去昔日论战的宗教气息，例如希望使其摆脱由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而形成的研究范畴时，他首

① 《历史研究导论》(1898年)仍然是一部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尽管很长时期以来它已不再具有当时所具有的主导地位。

先表明要消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冲突的影响，这些冲突在19世纪通新打起宗教"派别"的旗号来为类似的宗教战争服务。事实上，宗教争端长期延续着，即使是在非宗教的方面也存在着，如在共和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或是在公立学校和"自由"学校之间的争端。但只有当这些争端在1914年大战后失去了它的社会政治意义之后，当这些争端所针对的力量分裂成不同的部分时，当各种"联盟"或统一"阵线"重新形成并由经济来组织起法国生活的语汇时，才有可能将拉伯雷置于基督教环境中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印证过去的时间)，才有可能摆脱那些不再记载在一个社会过去中的各种区分；这样，史学研究也才有可能不再优先研究大学的政治、宗教历史研究所重视的宗教改革或基督教民主党人。上述变迁所显示的并不是使用了更好、更客观的概念体系，而是另一种社会环境。社会的变动使史学家能够与总体上已成过去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这一方面，L·费弗尔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与他的先辈们相同。他们把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实"作为理解的公设，即使这样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也在所不惜。当这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在发动对"人"的史学进行搜寻和收复失地的运动（人是资产阶级环境的宇宙中心，是"至高无上的"）时，不也就是如此吗？当他把一个大学的上层人物心目中的概论称为"总体史学"时，当他运用"心态"、"集体心理学"以及所有关联工具建立一个仍然是"理想主义"①的研究结构(这一结构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解毒剂，在"文化"的同一性下掩盖他们自己也涉及的阶级斗争)②时，不也就是如此吗？不管他的史学多么才气横溢，多么

---

① 根据L·费弗尔的说法，H·贝尔早在1920年时就指出了史学的"理想主义"的特点，见《历史综合杂志》，1920年第20卷，第15页。

② L·费弗尔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

具有新意，这种史学并不比他所反对的其他史学更少打上社会的烙印；但如果说他能超越其他史学，这是因为这些史学只符合于已成为过去的环境，他不得不由于自己在现实冲突中所占据的地位而改变观点。

不论有没有L·费弗尔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光彩，上述过程在今天已是到处可见(即使把从出版到任命人物在内的社会和政治分化——这些都有具体禁忌的——的作用置于一边，也是如此)。也许这已不再是有关政党之间或以前各大团体(军队、大学、教会等)之间的论战。他们力量的巨大损失导致了他们计划的"民俗化"[①] 然而真正的战场已不在这儿。在一个专家统治的和不可名状的生产至上的社会中，"中立"反映着信念转化为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既不再知道如何选择，也不再能确定其权力的方位(不管是为了承认或为了揭示这些权力)。这样，在被社会征服了的大学，这个由于规模日益扩大而逐渐失去独立、现在只得听命于外来命令和压力的团体中，昔日的科学扩张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已被退让所取代。在作出选择时，沉默取代了肯定。陈述带有一种灰色的色彩："中立"。它甚至成为一种保护"地位"的手段而不再是能够与某种渴望相联系的"原因"陈述。话语不再能提到那些决定着它的成份：即值得尊敬的光怪陆离的地位和值得追求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这里，沉默既是对成了借口的文章的缄口无言，是相对于人们所说所为的一种外化，又是一种环境的消失：正是在这一环境中一种力量，才与一种语言相联接。此外，这难道不是"保守的"史学参照了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后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吗？这一"无意识"的东西具有一种神奇的稳定性，并由于人们"仍然"需要

① 参见拙著：《多元化的文化》，巴黎1974年版，第11—34页。

肯定一种特定权力而变成了一种偶像——即使人们已"清楚地知道"这种权力已经消失了。[1]

2.1.4 环境：有所允许和有所禁止

在了解史学所表达的关于社会的内容之前，更重要的是分析史学在社会中是如何起作用的。社会这个机构十分复杂，它仅允许用一种类型写作，禁止用其他类型写作。这就是环境的两重性功能。这一环境由于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问题使某些研究成为可能。但是，它也使其他的一些研究成为不可能；它排除了话语在特定时间中的存在条件；与分析时的各项(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现实公设相比，它的作用是检查。也许在允许和禁止之间的这个接合部正是史学研究的盲点，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史学研究才不能随便与别的东西并存。同样也正是在这一允许和禁止的结合部，旨在改善史学研究的工作才有意义。

总之，史学研究工作是由既"可能"又"不可能"这种地位来限定的。如仅仅将这一地位看作是一种"言语"，人们就会把传奇再次引入史学，也就是说以一个非环境或一个想象的环境来取代史学话语与一个社会环境的结合。然而相反，史学完全是由语言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所决定的，因此也是由它与社会团体所给予的限制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决定作用要么表现在史学家借以发言的特殊地位的模式上，要么表现在史学家话语(过去的、死的)对象的模式上。

总的看来，史学还是由它本身借以产生的系统所确立的。今天如同昨天一样，史学是由这一系统上的某一个局部所产生

① O·马诺尼，《想象的关键》，巴黎1969年版，第9—33页。

的事实决定的。因此，只有考虑到这一系统借以产生的地位才能使史学知识从一个阶级的无意识中脱离出来，这一个阶级自身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因而并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史学与环境的联系是进行社会分析的可能性条件。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中，人们知道，没有一种分析在整体上不附属于由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分析关系所创造的环境。

严肃地看待史学的环境，这还不是解释史学。产生于这一环境的东西都还未被提及。但如要使某件既非传奇式的（或"感化人的"）也不是非局部性的（缺乏合适性）事能被提及，这却是一个条件。否认环境的特殊性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原则，因而就排斥了所有的理论。更为严重的是，在将话语置于"非环境"的同时，否认环境的特殊性就使史学无法谈及社会和死亡，也就是使史学无法成为史学。

2.2 一种实践

"研究历史"，这是一种实践。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迎来一个更为系统化的前景，可以考虑展示的各条途径，不再局限于到目前为止由史学社会学所揭示的认识论的现状。

在大学仍然将实践和技术性工作拒之门外的状况下，人们将所有把史学与技术联系起来的学科都列为"辅助科学"，在以往，这些学科有碑铭学、文献研究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古法典编纂学等；在今天则有音乐学、"民俗学"、信息论等。史学研究只是随着解释的"高贵语句"的出现才开始，并最终成为一种高谈阔论的艺术，这种艺术遮遮盖盖地抹去了一种工作的痕

迹。其实，这里有着一种决定性的选择：我们所给予技术的地位，不是使史学倒向文学方面，就是倒向科学方面。

如果说史学的组织结构确实与环境和时间有关的话，那么这首先是通过史学的生产技术来体现的。一般而言，每个社会都利用它本身的特定工具来进行"历史"思考的。但"工具"一词本身是含糊不清的，它也不仅仅是指手段。正如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出色地指出的那样，尽管前景不同，历史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因此，整个19世纪——今天常常也还是这样——对社会史的优先关注是相对的。按照一种人类的辩证法，社会的关系及社会自身、群体的"另一种演化"与自然的演化相联系——这一自然的演化构成了目前科学研究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一种材料同时又是一个作品"①。

正是在这材料和创造物之间、最终是自然和文化之间变动不定的分界线上，研究工作才起作用。生物学在"生命"中发现了一种先于说话人之前的口语，心理分析学在话语中揭示了一种愿望的结合，这种愿望的构成方式不同于意识在表达这种愿望时所采用的方式。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中，环境科学改变着自然与工业之间变动着的组合，但它已不再允许脱离它所改变着的自然结构来考虑社会建设的无限扩展。

这一广泛的领域正"由于我们的干预而发生着(自然的)更新"，② 它"以不同的方式使人类与物质相结合"。③ 这样，"社会秩序就作为自然秩序的形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反对自然秩序的实体而出现"。④ 正是在这里有着从深层更新着史学的内容，这

---

① 见S·莫斯科维奇的前引著作，第20页。

② 同上，第20页。

③ 同上，第7页和第21页。

④ 同上，第590页。

种史学已把“社会史，也就是社会群体史及其关系史”[1]作为“它的中心领域”。它已逐渐转向经济史，随后又转向“心态”史，摇摆于自然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关系之中，并日益重视这项研究。这方面的信号已越来越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中，人们对地理学的兴趣和对“从人与大地紧密关系上研究人的历史”[2]的兴趣，已经显示了一种研究趋势，这种趋势随着对下列主题——城市空间的建设和组合、植物轮作制及其社会经济效果、技术史、性征变化、疾病医疗和体质史等等——的研究而更加突出。

但这些向史学开放的领域不能仅仅作为新的对象提供给未发生变动的史学机构。史学本身也进入话语和产生话语的技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之中。我们必须研究的是，史学是如何处理这些“自然的”因素，使这些因素成为一种文化环境的，必须研究史学是如何使社会与其所处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学象征化的。史学家从研究残渣、废纸、蔬菜甚至冰川及“永恒的积雪”出发，干着那与众不同的事；从这些事物中研究历史，使自然人工化。史学家参加了使自然转化为人类环境、并由此改善着人的本性的工作。他所使用的技术使他确实处于这一人与自然的结合之中。我们处在实践这一层次上，碰到的不再是使自然与社会对立的二分法，而是自然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自然化（或物质化）的结合。

2.2.1 自然和文化的结合

说史学家从事“分析的材料”或研究的“特殊对象”是时间，这无疑是太过分了一点。在感知的连续统中，一个社会的组织

① E·拉布鲁斯：《社会史》，导论第2页，巴黎1767年版。

② 这是F·布罗代尔的说法。

和适合于一种“科学”的特定的确切系统区分出各种物质对象(纸张、石头、图像、声音等),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对象。史学家对某种材料进行加工,使其转变为历史。他在这方面,从事的是一种实验操作,如同其他实验操作一样,这一实验也须服从一系列规则。这一实验操作与从提炼过的矿石制作产品相似:首先将原料(原始信息)转化成标准产品(次生信息),然后把产品从一个文化区域(“珍奇古物”、档案文献、各种收藏品等)转送到另一个文化区域(历史)。社会通过运动使“自然的”东西改变为有效益的(如开发森林)或有审美意义的(如使山脉变成风景区)东西,使一个社会机构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如将教堂改变为博物馆),与此同时,改变着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撰写一本“史学”著作就是参加了这一运动过程。

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将一种文化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化语言,也就是不满足于将社会生产转变为史学对象,他们还能够将从自然领域内提取的要素转变为文化。他们收集资料、文献(其中有石头、声音等)写出著作(植物、细菌、冰川在其中具有象征物的地位),更换自然和文化的位置。他们改变着空间,一如城市规划者将大片草地纳入城市的交通系统,建筑师给江湖筑上水坝;也如皮埃尔·亨利将吱嘎作响的门声变为音乐动机,诗人改变“噪音”和“音信”的关系……。史学家通过变更文化的外限和内部结构而形成这样一系列转变手段,使环境改观,使自然“文明化”——如同人们总是愿意说的那样:“征服”和改造了自然。

确实,今天人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历史书籍变为小说般的或传奇性的作品,它们在文化领地中已不再促成上述那种转变了,而与此相反,“文学”却致力于在语言上下功夫,文学“作品”把“一种重组运动,表现出一种边摧毁边生产的死亡循

环”推上舞台；这就是说，在这一形式下，史学不再是“科学的”，而文学却正在变为“科学的”。如果史学家假定自己的作品揭示了某种特定的过去，那么他的做法便等同于消费者的行为，被动地接受了生产者分发的物品。

在史学如同在其他学科中一样，“科学的”活动是指那些改变着“环境”的活动，或使一种组织(社会的、文学的等等)变成一种转变的条件和场所的活动。这种科学活动在一个社会的某个战略要点上变动着文化和自然的关系。在史学中，它确立了“自然”对现时与过去关系的方式的“统治”——因为这种方式并不是“现存的”，而是一种产物。

从所有科学研究的这一共同特点出发，我们就有可能在史学研究确实作为一门技术的方面找出一系列特征。我不认为这样会改变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几方面探测，这里仅涉及了提出理论问题的类型。在史学中，通过对史学“机器”和其技术程序的检验，便触及这一类型的问题。

2.2.2 资料的建立或空间的重新分配

在史学中，所有研究在开始时都是把某些经过按不同方法重新分类的研究对象放置在一边，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再变为“资料”的。这一新的文化分类是第一步工作。事实上，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复录、翻制及影印对象，改变它们的地位和状态，从而生产出新的资料。如同在物理学中所做的那样，这一行为是把一个物体孤立起来，这就是“收集”。正如让·布德里亚尔所说的那样，这行为将一些东西组合成“边缘系统”，② 并使它

① R·鲁塞尔：《非洲印象》，巴黎1963年版，第209页。

② J·布德里亚尔：《对象的系统》，巴黎1968年版，第120—150页。

们从实践中分离出来以便建立一种"抽象的"知识对象。这一行为绝非接受"资料"，而是组成资料。研究的材料是通过一系列审慎的行动所创造的，这些行动在使用领域内分割材料，也在使用领域外寻找材料并相应地重新加以使用。这就是改变接到的命令和社会观念的一系列行动的轨迹。[①] 这些行动所造成的突变创造了用于特殊处理的符号，它既不仅仅是也不首先是"观察"的结果。其中还需有一个技术活动。

我们近代文献的起源已经在事实上涉及了一个三者的结合：群体（"考据学者"）、场所（"图书馆"）和实践（复制、印刷、通信、分类等）。这条线索标志着一套复杂的技术，这套技术开创于西方，从15世纪开始，首先在意大利随后在法国，由富人出资帮助建立的"成套文献收藏"，这些富人试图以此占有历史（如美第奇家族、米兰公爵、奥尔良的查理、路易十二等）。正是在这里，一个新工作（收集）的创建、新需要的满足（通过传统、文书和特定财产权的建立来说明新兴的家族和政治集团的正确性）和新对象的产生（单独抽出、保存和复制的文献）三者相结合了。一门正在产生的科学（17世纪的"考据研究"）随着"资料的确立"——技术机构——奠定了自己的基础和确定了自己的规则。

起初考据学在文人和穿袍贵族（律师、官僚资产阶级、档案保管员等）中是与法律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专家手中时，就大为扩张和发展，成了生产和再生产者，遵循着增殖法则。从1470年起，考据学与印刷技术相结合："成套收藏"变成了"图书馆"。自此，"收集行为"在很长的时间内便是一种生产行为：复

① 从这一角度看，历史"资料"可比作U·艾科所分析的圣像符号。他说："这些符号在规范化的感知规则的基础上重新产生某些共同感知的条件。"（见"视觉信息符号学"，载《通讯》杂志，1970年第15期，第11—51页。）

制、印刷、装订或分类……。随着产品的不断增多，收集者按照新的知识和社会的合适需要性而成为历史的生产或再生产线上的行动者。这样，文献收藏一方面对劳动工具产生的重大变革作用，另一方面也重新分配着事物、重新确定知识整体的含义；它在建立一个使其他的历史成为可能的"巨大机器"(P·肖努语)的同时，创立了一个重新开始的环境。

考据学者试图便不可胜数的"稀世之物"总体化，这些东西是他的好奇心无止境发展所带来的；同时，他也试图创造语言，以便理解这些稀世之物。如果从考据学工作的发展来观察的话，那么人们可以看到从16世纪末以来考据学者就运用了分析的方法(分解、重新组合)有条不紊地创造着新的符号系统。同样都是以数字为中介(这是辨读艺术的重要一招)，考据学研究和数学之间有着许多相同之点。当然，用来作为建立一种"顺序"的数字与象征是不同的：象征与印入脑际、反映图像(寓意作品、纹章、标记等)、隐藏含义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必须由颇有"学问"、能深刻理解其含义的人作出权威性的评论。但就数字来说，从"稀世之物"的数目到人造的或通用的语言尽管还有很多弯路和险阻的话，这些险阻和弯路却处在发展的路线上，这一发展的路线是由语言建设所创立的，而此也是由技术及特定对象的生产所创立的。

今天，资料来源的建立同样需要有一种开创者的行为，这种行为像昨天一样，是以环境、"机器"和技术这三者的结合为标志的。这一变动表明的第一点是：如果不以另外的方式使用已知的文献资料，举例来说，如果不改变文献资料在此之前一直由宗教或"家庭"的用途所规定的状况，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工作。同样作为一种新的相关性，资料来源的建立把工具、烹调构成、歌曲、通俗画、田地使用权、城市地形等汇集成文

献。这不仅是使这些"数量庞大的沉睡着的资料"说话，让缄默的东西开口，让它发挥可能的效用，而且也是将昔日曾经据有某种地位、起过某种作用的东西改变为一种具有不同功能的另一种东西。同样，对于一种只单纯接受昔日分类的研究，例如，对于只限于H系列文献资料规定的范围，没有自己的客观研究领域的研究，我们是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探索"的。再强调一遍，只有在这样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实行着一种空间的再分配，其目的首先是通过"资料来源的建立"即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行动和一系列转变性的技术自我提供一个环境——介入的情况下，研究才是"科学的"。

今天，这一机构的程序所展示的问题，比上述几点说明所引出的问题更为基本。这是因为每一个史学实践[①]只有借助一个既是条件、又是手段和变动结果的机器时，才能建立它的环境。国家或城市的档案馆在过去是这一"机器"的一部分，它决定着与一种研究系统相称的研究活动。但我们并不能指望在档案文献组合方式不变的情形下改变对它们的使用。同一的技术结构不会给不同的问题以新的回答。事实上，形势已经颠倒过来了：现在其他"机器"已为新问题和新答案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确，一种"现实的"或"真正的"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还处在虚无缥缈之中，它甚至在一种关于历史的文学中发展起来。但这只是旧日实践的民俗化：这一僵化的话语比论战本身有着更长的延续性，它仅仅表明相对于实践而言的既有"观念"的迟滞性，正是这些实践或早或迟会使这些观念发生变化。

"文献档案保存"方向的转变是新史学的起点和条件。这一转变是使文献充当着17、18世纪考据学"机器"那样的角色。我

① 这里不应理解为某一位史学家的特殊方面，而应像在精确科学中一样理解为构成一个时代或一个研究部门特征的程序的复合整体。

就此只举一个例子：计算机的介入。弗朗索瓦·菲雷曾经展示过"保存在计算机穿孔带上的新文献资料之形成"所产生的一些结果：只有根据一个系列而不是按照一个"事实"进行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在程序化之前就已明确建立的东西才是研究的对象，等等。[①] 这里所说的仍然只是一个特殊的因素以及基本上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科学机构的症状罢了。当代的分析方法推翻了那些与"象征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的程序，这种象征分析方法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一直占着优势，并力图重新认识一个特定的和隐蔽的意义；这一分析恢复了对抽象的信任，这一抽象曾经标志过古典时代的特征——但是在今天，却是由关系或"结构"组成的明确整体。当代分析的实践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些具有终结意义的"模式"，在于"用对根据定义而形成的对象的研究取代具体现象的研究"，在于按照"问题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一对象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及这一对象所提供的答案，来判定这一对象的价值。最后，这一实践的目的还在于"确定这一模式意义范围的界限"[②]。

这最后一点在史学中是关键性的。这是因为，如果说当代科学的分析确实是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旨在从"幻影"或"剧本"出发重建对象，也就是说，旨在借助这一分析所产生的关系模式和语言方式(或非语言方式)，为自己提供手段，以便大量增加或改变一些已建成的系统(物理的、文学的或生物的)，那么史学也就趋于阐明这些模式或语言方式的"意义范围界限"：在这种对于一系列模式的一个相对限制形式下，史学重新找到了昔日在一个过去模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一过去模式是与一

① F·菲雷：《史学中的计量》，第66—71页。

② A·雷尼埃："人文科学的数学化？"，载P·里夏尔和R·儒兰：《人类学与计算》，巴黎1971年版，第13—37页。

种起源或终结的认识论有关的。我们从中看出，史学似乎是忠于它自己的基本意图的，也许这一意图还需加以确定，但我们已可以说这一意图使史学同时与现实的东西和逝去的东西联系起来。

史学功能的特殊性并不是由那种将史学置于当代科学机构所产生的限制性和可能性整体之中的机器本身（如计算机）所决定的。就这种机器而言，阐明史学的特性是偏离中心的：这种阐述退回到程序化的准备时期中去了，这一时期是由于机器的出现才成为必要的；从另一端看，这种阐述又被置于由所得结果所展示的开发时期。这种阐述既通过有待于建立的研究对象，同时按照机器所规定的禁令得以制定，又通过处理信息论的标准产品的方式，同时按照这一机器所规定的许可性而得以制定。但是这两种活动必然与技术机构相联系，这一机构把每种研究活动都置于一个"一般化系统"之中。

昔日的图书馆也发挥了将考据学"置于"一个研究系统之中的功能。但这只涉及一种局部的系统。这样，今天在一个通用系统内部区分出来的认识论"时刻"（概念化、资料集成、处理或解释），也能够被紧密牵涉到昔日考据研究的局部系统中去。因此，资料来源的建立（通过目前机构的媒介）不仅仅导致理性和现实之间或文化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新的再分配，而且还是科学研究时刻在认识论上的再划分的原则。

17世纪柯尔培尔图书馆或其他一些图书馆，曾经是人们共同制定考据研究特定规则的聚会场所。通过这一机构，一门科学发展起来了；这一机构今天依然成为研究者们前来聚会、倾听意见、彼此请教的场所。"去档案馆"，表明了史学研究中的一条心照不宣的法则。这一中心场所现在正为另一个机构所代替。这一新机构也迫使实践服从一种法则，不过是一种不同的法则。

在更详细地分析史学在这一新空间中所描绘的活动轨迹之前，我们首先应重视这个技术机构；作为一种历史的丰碑，这机构不啻是一个此后科学研究据以展开活动的场所。

2.2.3 突出差异性：从模式到差异

现时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史学家把迄今为止在他的工作中联系在一起的内容分离开来，这些内容包括：确定研究对象亦即理解整体；积累"资料"(二手信息或加工过的材料)及确定资料的位置、便于分类和移动；① 通过可以处理这种材料的各种活动，利用这些材料就成为可能。

严格地说，史学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整体活动的始末这两个极端的关系之中：即建立模式，和给由信息组合得出的结果规定意义。这一关系最明显的形式，其目的最终在于使一些与事先建立的明确统一体相适应的差异变得合适确切，在于发现在技术上可以利用的异质性。按照由于系列的形成和各系列的组合而产生的材料，昔日的"阐释"就成了阐明模式的相对差异。

也许这一阐释方案还是抽象了些。目前的许多研究已经使这一方案的运动和意义变得更能为人们所把握。例如，史学分析的基本结果并不在于1819—1826年征兵记录中所表现的身高与扫盲的计量关系，也不在于揭示了法国大革命后旧制度在法国的残余，而在于这一调查突出表明的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偶然巧合、不一致性或无知。重要的并不是根据预想模式而对有意义的特征进行事先分隔而得到的系列组合，而是这些模式和系

① 在与计算机相联系的情况下，程序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把信息符号安排在电脑中留出的位子，并根据程序的指令把它们输送到合适的地址。

统使用这些模式所引起的限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这些限制转变为可进行技术处理的问题的能力。此外，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协调的，因为如果由于所设模式精确的外延而使差异性得以出现的话，这一差异性便由于它与这些模式在差距方面所保持的关系而变得很有意义了，也正是通过这一差距，上述差异性才得以回复到这些模式以便纠正这些模式。人们可以这样说：研究的形式化恰恰是以产生在科学上可利用的“错误”——各种不足和缺少——为目标的。

上述这一步骤似乎颠倒了昔日的史学实践。我们曾从数量有限的踪迹（手稿、稀少的物品等)出发进行研究，同时抹去这些材料所有的差异性，将其统一到一个严密和谐的理解之中。[1]但这一归纳的总体化的价值却因此而取决于所收集信息的量。一旦新的调查取得的结果危及这一价值的材料基础的话，这一价值便会发生动摇。研究——及其原型，即论文——便倾向于无限止地延长收集信息的时间，以便推迟这一致命时刻的到来：未知的材料破坏研究的基础。在收集资料中，量的发展使人常常感到可怕，使得由此而变得无休无止的研究工作本身注定要立即失效。但现在这一阻碍已被突破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从根据一个固定模式出发追求量的发展过渡到模式本身的不断变化。

实际上，在研究应当变为并且已变为能够事先确定分析的对象、层次和分类方面，今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其自己规定的统一性之上。结构的一致性在这里是开创性的。随着计算机的运用，按照这些规范而可进行处理的信息量已成为无限的了。研究工作也转移了阵地。根据终结假定的形式总体，研究工作朝着分析通过系列的逻辑组合而揭示的差异方向发

① 实际上，“综合”并不是终结性的，它是在对资料把握的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同样显然也对事先就有的观念保持距离。

展。它致力于研究局限性。如用已不再适合今日新的研究轨迹的旧日词汇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研究工作不再是从"稀有史料"(过去的遗留)出发而达到一个综合(现时的理解)，而是从一种形式化(一个现时系统)出发而达到对"历史遗留物"的理解(这一遗留物是局限性的标志，因而也是成为研究工作产物的"过去"的标志)。

上述这一运动也许由于计算机的使用而得到加速，但其本身先于计算机——如同技术组织之先于计算机，计算机只是这一组织的又一个征兆。其实，还应指出当代史学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史学家已不再是能组织一个帝国的人了，也不再以建立总体的历史为目标，他只是围绕着一致公认的合理性轨迹开展其研究工作，在边缘处工作着。从这一角度来说，他已是一个游荡者。在一个具有普及化能力、具有集权化强大手段的社会中，史学家朝已开发的大片领地迈进：巫术、狂欢、节日、大众文学、被遗忘的农民世界、奥克语地区等等，史学家独辟蹊径朝所有静默无言的地带进发。

这些新的研究对象表明多年来出现在史学战略中的一个运动。费尔南·布罗代尔因此指出今后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最好集中在过渡性的区域，因为在这些区域中能够确定"界限"、"借鉴"、"拒绝"等现象。这些工作的科学意义取决于这些工作与所提出或所假设的整体保持的关系，如"空间中紧密和谐的关系"、"时间中的延续性"等，也取决于这些工作能给上述整体带来的可纠正性。为此也许应当对目前的许多研究加以考虑。甚至传记也起着与总体构建相符的距离和边缘的作用。研究工作以一些具有其自己实践形式的东西为对象：这些对象给研究提供了突出差异性的手段——这些差异性是相对于作为分析出发点的连续性或统一性而言的。

2.2.4 有关界限的研究工作

史学研究实践的这一战略使史学理论化，使之更符合信息科学提供的可能性。它不仅能使史学方法，也使史学在目前科学整体中的功能日益专业化。事实上，史学方法不再在于为知识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对象，其社会角色(所谓通俗化的镜子文学除外)也不再是完整地表现社会的起源。史学也不再像19世纪那样占据着由一种认识论所组成的中心地位，这种认识论虽然失去了作为本体论实质的现实性，却力图把这种现实性重新找回，使之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即隐藏在社会实体内部的时代精神和变化。它在表达意义方面也不再具有取代哲学的总体化功能。

史学按照社会学、经济学、心现学的和文化模式的批判性检验方式发挥作用。人们说史学使用的是“借来的成套工具”(P·维拉语)，确实如此。但确切地说，史学通过将这些工具用于自己的不同领域而检验了这些工具；如同人们在赛车道上以最高速度在超出常规的条件下“检验”一辆旅游车一样。史学变为一个“检查”的场所，具有一种“证伪功能”。有关“模式”的意义的局限性正是在这里才能得到明确的揭示，这些“模式”在它们的诞生地之外的领域轮流得到史学的“试验”。

举例来说，我们可在两个基本时刻上揭示史学的功能：一个涉及到在历史事实的方式与现实的关系，另一个涉及到对已被接受了的模式的使用，因此也就是史学与某一当代理性的关系。在这两个时刻中，一个主要涉及历史学研究步骤的内部组织，另一个主要涉及这些步骤与不同科学领域的结合。

(1) 历史事实已找到了它们的最好表述者——保罗·韦纳，

他是具有抽象脑袋的最佳杀手。和通常的情况一样，他高举着一面先于他出现的运动的旗帜。这不仅因为每个真正的史学家始终是一个注意细节的诗人，他们像美学家那样在一张知识网上无休止地演奏着一个珍奇的音乐片段所引起的泛音，特别还因为形式主义今天还在使例外的细节具有新的合适性。换言之，这一重新重视事实的潮流既不能被归并到反对“结构主义”妖魔的战斗阵营中去，也不能被用来为以前的意识形态或实践的回潮服务；相反，这种对事实的重新重视还是结构分析过程的一个部分，不过是作为一种发展。这是因为今后我们所遇到的将不再是能向学问高深的观察者提供一种表现现实的浮沉的事实。这种事实与一个已有模式相结合后便产生不同的形式。因而，史学家也就不再处于要钱还是要命，要法则还是要事实（这是两个在当代认识论中已被除名的概念）的两难境地。他从自己的这些模式中获得了表现差异性的能力。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他曾希望一种“总体化”，并认为能够调和各种不同的解释系统以便覆盖他的所有信息，那么他现在感兴趣的首先是这些差异性的复杂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占据的地位还能通过类比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名称“事实”：事实，这就是差异性。

同样，这种与真实的关系也变为研究活动中各项之间的一种关系。费尔南·布罗代尔已对界限现象的分析赋予一种完全功能性的意义。他所建议的研究对象是按照一个要进行的研究活动（而不是一个要与之相结合的现实），相对于已存在的研究模式而决定的。作为这一研究工程的结果，“事实”是确指一种关系。这样，事件也能恢复其定义，即历史中的一种突变。当然事件不再解决一种现实的深度问题，对这种现实，我们能通过语言的透明度见到其深处，它本身也零碎地出现在我们知识的表层。事件完全与合理分割的系列的组合有关，并用它轮流

标明这些系列的交错、其可能性的条件和其有效性的界限。[1]

（2）上述这些已经指出了这样一种“史学的”方式：重新使用从其他科学中借鉴的模式，并参照这些模式确定史学的功能。皮埃尔·维拉尔的一个研究可使这一原则明确化。在提到J·马尔兹维斯基和J·-C·图坦的研究工作时，维拉尔指出我们在研究旧制度时系统“运用”当代经济的概念和模式而导致的错误。但这里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大。马尔兹维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工作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参考系统”，历史学家则是“运用经济理论”的人。这样就提出了使一种科学成为另一种科学的工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止地颠来倒去：最终究竟谁利用谁？在这方面维拉尔也转移了同样的概念。在他看来，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使模式变得有效的“条件”，例如明确“回溯性计量经济学”的“可能性的确切界限”。相对于其他每个学科所建立的同质整体而言，史学表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异质性；它同样能够使每个分析系统或分析“层次”（经济的、社会的等）特有的界限相互联系起来。[2] 这样，按照P·肖努的话来说，史学就变成了一种“辅助学科”。[3] 但是，并不是史学为经济学“服务”，而是史学与不同科学所保持的联系能够起着与这些学科不同的必要的批判功能并对各个学科提出这样一个（未定的）课题：将那些以此方法得到的明确的界限联结成一个整体。

史学在其他部门中也有同样的补充性。在城市规划部门，

---

① 在这里，事件对于我来说既是由两个严格分离的系列（萨尔特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把这一地区分为两个政治营垒的心态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的问题，又是通过把它们结合起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手段。

② P·维拉尔：“为了使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有一个更好的相互理解”，载《历史杂志》，1965年，第293—312页。

③ P·肖努：“计量史学与系列史学”，载《V·帕累托手册》，日内瓦1964年版，第165—175页。

史学能够“通过差异性使人们把握我们有权要求当前的土地整治工作者们注意的空间特殊性”，让人们能够“彻底批判城市规划中的实用概念”，并与新的空间组织所具有的模式不同，通过对“深层缓慢演进结构”的分析，反过来使人们了解社会的抵抗性。差异性的战术详细说明了史学的干预作用。科学的认识论则从一个现实理论(如生物学理论)出发，并在一个未被明确说明、未被想到或不可能与之联系的方式上与史学相遇了，过去在这一认识论中首先是作为“缺席者”而起着作用的。史学的理解力是与组织差异性或缺门的能力相联系的，这些缺门是合情合理的和可分成等级的，因为它们与目前科学的形式化密切相关。

乔治·康基莱姆关于科学史的一个意见可被推而广之，并赋予史学这种“辅助性”的地位以全部意义。实际上，史学的对象似乎是不断变动的，确定这一对象很少取决于一个独立的决定，而是取决于它对其他科学的好处及重要性。一种在史学自身“之外的”对其他科学的好处根据各门学科(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心理分析学等，这些学科轮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按照使之成为学科的各种专门问题系列，确定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史学所要不断涉及的领域。但是史学家却把这种好处记在自己的名下，并将其看作是自己更广泛的研究整体中的一个任务，并就此，建立起一些认识论实验室。确实，史学家只有将模式同自己的关于一个社会的资料中的其他领域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些实验具有一种客观的形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史学家使他所接受的科学的形式化发挥作用，以便对它们加以验证，但他用来进行这种验证的对象却是非科学的。在这方面，史学同样保持着多少世纪以来它对各种不同的“理性”所发挥的，使每种已建立的科学都感兴趣的功能：批判的功能。

2.5.5 批判和史学

关于界限的这一研究工作，不仅存在于借助历史"事实"或处理理论"模式"的方面，而且也能够在其他地方发现。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的话，这两个提示就已经把我们引向一个整体研究的定义。史学实践的战略需要史学具有一种地位。一门科学的性质就是有待于从其实际研究程序中得出的公设，是说明这些程序的手段，对此，人们不会感到惊讶。没有这个认识，每个学科都可被视为具有一种本质而被等同起来：人们由此可以推断这种本质存在于其前后相继的技术变化之中，残存于每一个这样的变化之中，它与实践保持的只是一种偶然的关系。

对史学实践的简要检验似乎能够说明史学的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把"意义"或"真实"变为有意义的差异之产生，把特殊的地位视作可思考的界限以及现时形成过去和未来双重表现的一种环境的组成。

(1) 第一个方面以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知识的根本变动为前提。100年前，史学知识以对社会变化整体回顾的方式体现着社会。历史确实曾分裂为多元的(生物学的、经济的、语言学的等等)历史。但在所表现的这些实证性之间，如同在显示它们各自特点的不同周期之间一样，历史学知识通过它们在演进中所具有的共同关系而将它们恢复为同一事物。因此，史学知识一面将上述各方面的不连续性作为在同一意义（就是说同一方向）下前后相继的或相互共存的不同形态来看待，并在一个或多或少是目的论的文章中表现一种变化的内在独特性，从而将这些不连续性重新连接起来。

确切地说，目前对史学知识的判断标准，在于这种知识以

不同于现时形式结构对差异进行正确衡量的能力——这些差异不仅是数量方面的(人口、工资或出版物的曲线)，而且还是质量方面的(结构上的差异性)。换句话说，它的结论是以旧日历史叙述的开场白形式作出的："以前，那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在方法论方面的演进积累的情形下，这一距离("那不是……")已成为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公设和问题。同样，通过假设，"意义"被逐步从已形成的科学领地中清洗了出去。因而历史知识所揭示的并不是一种意义，而是在不同的资料区域使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模式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例外。研究工作的目的在于产生否定，而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专门制造这些相关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是由更为严格的程序化以及对程序化的系统开发"产生"的。

(2) 第二方面与第一方面接近，它关系到一个人们有正当理由将其看作是史学专业性的因素，即特殊性(G·R·埃尔顿正确地把它与"个别性"相区别)。如果特殊性真是既规定史学的注意力又规定史学研究的话，这并非因为它被看作是一个被思考的对象，而相反是因为它是可思考的界限。人们思考的只是一般的东西。史学家正好置身于一条分界线上，在这里，可理解性的法则受到了限制，它不停地移动试图超越这一极限，同时又不断地在其他形式下重新找到这些极限。如果史学的"理解"不自我封闭在传奇的同语反复中，或逃遁到意识形态中，那么它的特点首先并不是使挑选好的资料系列成为可思考的资料系列(虽然这系列是它的"基础")，而是绝不放弃这些规律性与一些(摆脱了规律性的)特殊性所保持的关系。自传的细节、一个不规则的地名、工资的地区性下跌等，所有这些特殊的形式都通过史学中专有名词的重要性而象征化了，从而使处于解释系统及仍未得到解释的"那个东西"之间的关系继续紧张。将"那个

东西”认定为一个“事实”，这只是对不理解的东西的一种叫法。这是一种想象而不是一种理解。但这也是认为那些仍未被思及的东西是必要的。

也许应当将这一经验与每个史学家身上都有的实用主义相联系起来，这种实用主义很快使史学家把理论变成笑料。但如果认为只有像“这是一个事实”或“这已发生了”这样的提法才等于理解，那是一种幻想。满足于添加特殊性的编年史或考据学忽略的仅仅是组织其本身的法则。这一有关特殊性的话语如同圣徒传或“社会新闻”的话语一样，只是说明适用于特殊辩术的普遍二律背反有无数变种。它陷于贫乏无味的老生常谈之中。事实上，特殊性的力量在于它对明确形式化的深层所起的作用；其功能在于在这一深层中引入一个问题；其意义在于反映行为、人物及所有还停留在知识和话语外部的一切事物。

（3）史学在使模式与其差异性相结合时，或换言之，史学在规律性的边界上发挥作用时，创建了它的活动场所。这一场所表现了史学定义的第三个方面。在这一方面中，比参照过去更为重要的是史学以保持一种距离为名对过去的渗入。在现时的科学严密性中，一个断层正在慢慢形成。如果不是通过过去这一能够被客观化的、并有表示相异性功能的东西，这一断层怎样才能确实形成呢？即使人类学在使另一个东西出现于现时之中这一任务上部分地取代了史学——这两个学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过去仍然首先是表示一种差异性的手段。史学活动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现时的法则——这一法则有别于“另一个东西”（过去）——剪辑资料，在于与一种已有的形势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于用一种话语表示使这一间隔效果得以产生的实际变动。

史学活动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使现时历史化，确切地说，

是使一种存在过的状况现时化。它的义务是阐明占统治地位的理性和一个特定环境的关系，这一环境与一个“过去”不同，它已成了现时。法则与其界限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产生了一个现时与一个过去之间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过去的形态仍保持着其表现缺少的事物这一重要价值。随着对一种资料的使用（为了客观起见，这一材料必须是在那儿的，但就首先反映着一种缺少而言，它又是一种过去的内涵），过去的形态又引入了一个未来的断层。人们知道，一个群体只有通过对它的过去进行重新划分，才能表达面临的事物——而这仍属缺少。因此历史学总有其双重性：它留给过去的地位同样是一种给未来让出地位的方式。史学在异国情调和旨在使差异性得以出现的批判之间摇摆，因此也在保守主义和通过自己的功能使缺少具有意义的乌托邦之间摇摆不定。在第一种情况下，史学要么是传奇式的要么是论战式的这样两种；在第二种情况下，史学要么是反动的要么是革命的。但这些过分的特征并不能使人忘记史学在其极其严格的实践中所具有的内容：使界限象征化并进而使一种超越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将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弃置一边，把“史学的道德”等同于通过表现差异性而在现实中所造成的这种缝隙的话，那么，“历史的教训”这一古老的标语从这一角度看重具意义。



概念化史学

保罗·韦纳

保罗·韦纳(Paul Veyne,1930—)曾经在奥朗治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获文学博士和高等院校教师资格证书。他曾经长期任普罗旺斯大学的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历史系的古代史教授。后又北上巴黎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在50、60年代，保罗·韦纳还曾经在罗马的法国学院任教，担任过巴黎文学院的助教等。

保罗·韦纳的研究重点为古代希腊、罗马史，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信仰、宗教、心态等是他的主题。他还对历史学认识论、本体论有系统的思考，他的理论形成了法国当代史学理论的一个倾向，并深刻影响着整个西方史学潮流。他的主要著作有《如何写历史》(1971年)、《面包和马戏团》(1976年)、《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1983年)、《古罗马的色情哀歌》(1983年)等。——编译者

为进入本题起见，我们预先概括一下我们的论题。史学虽不可归结为那些已经诞生或有待于诞生的应用科学范围，但与这些科学相比，它也不是残留的多余领域：它包含着一些带有科学性的内核。因此，史学将得益于人文科学所可能取得的进步；然而人们可以认为科学给史学带来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们无法拥有历史的科学，因为历史的演变并不带有原动力。在这些条件下，向史学展示的还能是什么样的未来前景呢？这就是概念化的前景，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著作仍是范例。关于历史生成，我们并没有直接的知识，不比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更好些；首先，我们对事件的周而复始只有一种部分的和模糊的认识。非事件性的史学，深层史学，比较史学，概括的、类型学的史学，或者历史社会学，甚至局部史学，名称众多，以各种方式表明对这一“混沌总体”的概念化工作，这个“混沌总体”首先便是史学生成变化的场景。从这点出发，史学的努力更像是一种哲学的努力，而不像是科学的努力。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史学更多的是加以阐述，而不是进行解释。例如，这一主题化的研究工作探讨和分析的是人们可以称之为带有集体性的现象(一场战争、一个社会、一种心态——如所谓的原始心态)。

3.1

历史能够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吗？如果不能的话，它能够干些什么更好的工作呢？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人们将会惊奇地发现，史学家们对科学的要求比物理学家们对科学的要求更高。然而，物理学家们并不要求完全被严格规定的自然进程

整体地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仅仅要求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那些必要的方面）适合于作科学的解释和预言。科学能解释高气压或麦价的一次下跌，但并不能预言2月的某个星期日会在昂蒂布下一场雨，也不解释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解释证券市场的恐慌是史学的任务。人类社会中适合于作出科学解释的事件，与自然界中适合于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相比，情况大体相当：都只是一小部分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可靠性的事件。

如同自然的进程一样，历史也是一个事件的整体，其中每一个事件都是被限定的，但仅仅只有某几个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其总体则是一片混沌，并不比一个在某个特定时间内产生于地球表面某个特定区域的物理化学现象整体更“科学”。物理学家只对这些现象的一些必然方面感兴趣，而对其他部分则置之不顾，这正是史学家所不能做的。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没有按照科学解释裁剪事件的责任：如对于人民阵线，史学家没有权利只考虑1931年的经济衰退情况，当然对这一衰退现象我们今天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区分史学和科学的界线并不是区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界线，而是区分整体性和必然性的界线。

历史作为世界的整体进程，人们可从中找到哲学在世界进程中识别出的一切。首先，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的是必然性，找到的是那些肯定会发生的事：物体在空间中以同样的速度坠落，边际效用价值在激烈的竞争中趋向稳定等，这些分别是物理学和理论经济学的领域。随后我们会从中找到那些“最经常发生的事”：头发在40岁左右逐渐变白；所有现代大城市都拥有商业区；哈罗德模式使人们知道，储蓄不足或者说缺少投资倾向，便决不会完全实现可能的增长率等，① 这些分别是医学和宏观

① 有关宏观经济学在可理解的实践理论中的地位，请参阅R·阿隆：《史学家如何与认识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1年第1337页。

经济学的领域。最后我们还可以找到纯粹的偶然性：失土王约翰[①]曾经过这里，他说我要去雅典，但是海盗使我转向了爱其那。总之，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造成的，同时也有必然性和“最经常发生的事”的某些内核；人民阵线的历史是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其间混杂着一些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在政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修昔底德会认为这些现象是有关人民阵线的永恒的知识，而一个现代人则会称之为社会学现象。只有那些必然的联系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事才会引出各种推论，才适合于一种科学；失土王约翰的经过是不能被归并入一个大项的。然而我们可以对之作出历史的解释，人们将会说：约翰王有想经过此地的理由；他是不得不经过此地，或是偶然路过的。

因此，历史学不仅是脱离科学的东西，而且也不是同各门科学对立的：对1937年的经济衰退，如果宏观经济学的解释并不是真正的解释，那什么才是历史的解释呢？因此历史从属于科学，但仅仅是部分地属于科学：因为历史进程的绝大部分从它的定论看有着很多偶然性，并从属于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纯“物质的”必然性。这里可引用雷蒙·阿隆的一段话：“从认识论的含义上来说，社会系统和社会事件是无法最终确定的，如同那些主体亲身经历过的、被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观察到的系统和事件一样，它们自身并没有被分割为确定的子系统，也没有被缩减为这样一些少量的变量：这些变量可被组织成相互间紧密联系的命题整体。我们无法从任何理论中演绎出希特勒分子以工业手段杀死成百万犹太人会是一种必然结果。”[②]因为，

① 失土王约翰(Jean Sans Terre, 1199—1216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之幼子。——编译者

② R·阿隆："什么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载《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67年第17卷，第848页；该文在认识论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如果一切都是决定了的，那么一切都是无法决定的。史学家的苦恼在于永远不能把握"柔中之刚"。确实，既然历史中含有必然性的小岛，那么科学——不管人文科学还是其他科学——的任何进步都将给史学带来益处，但这些益处总是有限的。科学对史学的全面渗透是不会有的。

确实，任何以解释代替验证的史学书，它的基础都是模糊的三段论。确实"堵塞"文献资料的"缺陷"的仿古论也要求从大项出发进行推论：逻辑经验主义一再这么说过。但是这些三段论大多是简单地以"最经常发生的事"为依据，因而没有一点科学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史学与日常生活没有区别。大部分三断论的依据要么是人类的本性这一观念("人类乐意做的常常是不得不做的事，而不是与自己的生存条件作斗争")，要么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习惯和准则(拉丁语 rosa 总是指一朵玫瑰花，罗马人躺着吃饭等等)。人们从这些出发进行演绎("……既然这个罗马人在吃饭，那么他一定是为了吃饭而躺下")、进行归纳("这个普通的罗马人躺下了，这个普通的罗马人在吃饭，因此所有的罗马人想必都躺着吃饭")，从大项和结论向小项外展，这种外展分析就是"发现逻辑"，就是犹如警察调查和历史学调查的推论("画面上的这个罗马人是躺着的，我们从文字材料上知道罗马人是躺着吃饭的，因此这就表明画中的这个罗马人正在吃饭")。

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史学并不归属于各种不同的科学。更不存在一门历史的科学，一把打开历史生成变化之门的钥匙，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将历史推动者的角色赋予物质资料或赋予经济，这是在玩弄模棱两可的把戏：奴隶制形成的原因到底是水磨的产生还是水磨的使用？经济是某些行为的经济方面呢，还是这些包含着法律、心态等其他方面的行为本身？作

为一种“物质的”(就形体意义而言)东西，磨坊只是矗立在土地之上。如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使用磨坊而不是无视这一技术发明的守旧思想，那么所谓的原动力也就是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事件，水磨的推广如同一切事件一样也应当得到解释。人们使用水磨这一物体才使水磨有了“物质因”这个方面（就使用的可能性而言)。这里，充当动力因角色的是一种心态现象：即不因循守旧。当然，这一心态本身也应当得到解释：它自己也转而成为一系列动力因中的物质因，正是这些动力因才使这一心态存在……如果有一种辩证哲学(按照这个词今日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管人们认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多么巧妙，它总是遇上同样的困难：“原动力不可能有什么力量”，如果这原动力在形成之前即已属可能，如果它是一个事件，那么它本身就只能是其他原因的内容而不是第一动因。按照卡迪内的说法，“基本性格”（或更确切地说是决定这一性格的原生制度）并不是一种文化的关键，因为它本身也可以从社会和历史的其他部分中得到解释。① 在历史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中，人们愿意把历史的原动力放在什么地方，它就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然而，一旦一类原因不能优先成为历史原动力，那么这类原因就会受各种情况的制肘，被在这个或那个局势中表现得更有力的因素挫败；战略可变因素的观念正是在这些因素上发挥其作用。一个致病因素的出现不足以导致一场传染病，还应当有相应的蔓延场所，如果患者健康状况良好，细菌的入侵就会失败。不管资本主义多么巩固，也会在“最薄弱的环节”上遭到崩溃；一支军队，不管人们假定它多么强大，它总是会在一个

① Cl·勒福尔："评卡迪内的方法"，载《国际社会学手册》第10卷，1951年版，第117页。

战略要点或一个薄弱环节上被遏止；不管人们认为经济原因多么重要，这些原因也会由于知识的和法律的落后而不能发挥其作用。历史的动力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战略的可变因素，这些因素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人们所研究的、所撰写的历史就不是什么科学的问题，而是审慎的问题。

3.2

如果上面说的就是全部真理的话，人们对历史学就不会有多大的兴趣：它叙述已发生过的、"不折不扣地真实发生的事情"，如叙述一个阴谋，这是回忆录的题材，史学就局限于评判文献资料的内容，并将其编著成书；这样做的话，史学只要以看待日常生活的同样目光看待文献资料就足够了；除一些科学方面的细节外（如为了理解铁剑的胜利，就要懂一点经济学和冶金学；为了理解哥伦布的旅行就要懂一点航海学）历史学读起来显得像一本小说。对于这些细节人们只要请教有关专家就行了……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史学虽然不是科学性的，但依然是一个很严格的创作活动，这一活动并不是即席临时形成的。人们对事件并不是立刻就能理解的，人类社会本身也不是透明的，一目了然的；当它阐明和表达它所经历的事件时通常是迂回曲折的，事件的可以直接理解的那一部分，其周围总有一圈"非事件性的"光晕，而这一光晕正是"先锋史学"、"深层史学"所力图理解的。我们已经知道，自从四分之三世纪以来这一史学已取得了什么进步：我们的世纪将是重建史学的世纪。

史学的这些进步并不表现在发现了解释历史的机制和动力

(原因无需赘述)，而是表现在对非事件性的东西的解释和使其概念化之上。① 这里，我们只指出一个重要事实：与一个只知道关注国王、战役、瘟疫和奇迹的公元1000年的编年史家相比，一个20世纪的史学家想法更多，更加洞察入微。从前人们对现实只有泛泛的感受，而不知道如何使其主题化，因此今天在遣词造句上能使人"理解"这种现实的，就是一本重要的史学书籍。几十年来，抽象研究所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从马克·布洛赫用仍处于印象主义的模式对中世纪时间性所作的研究，到G·迪比以一个共相网络——这一网络可以随时用于其他组合方式，也能被运用于一个局部研究——为论据而作的研究。而在上一世纪，人们还不知道使用这样一些词语：阶级、生活方式、经济理性主义、未开采的财富、心态、高消费、跻身于高一层次的阶级的诱惑力、社会流动性、团体动力学、走捷径上升。

这是对模糊的直接性进行研究的进步。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和社会世界的第一个看法正如对物质世界的第一个看法一样，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种"混沌总体"的感觉——这正如或大体上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一书中开头所讲到的那样。同样，"孩子们在学说话时把所有男人都唤作爸爸，把所有女人都唤作妈妈，只是在后来才知道细加分辨"② 亲属关系，而直觉意识也分辨不出权力或社会不平等（收入、权势、威望的不平等）的各种理想类型。因果关系的运动还更加难以靠想象来认识，只有思考才能够把握一个战略决定或经济保护主义措施的结果；这里同样充斥着错误的理论：如成人吸毒、排犹主义、

① 有关史学的概念化，可参阅R·阿隆的前引文章和G·勒布伦的文章（载《批判》杂志1971年第662页）。凡看过这两篇文章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的观点受到了他们多么大的影响。

②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84b10；勒布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逻辑和方法》，第280等页。

奢侈导致的民族堕落、人口过剩和战争等。在我们眼中我们自己的社会群体惯例、我们自己的制度原则和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都不如别人的惯例、原则和准则清楚，它们是以一种不明确的、模糊复杂的方式为我们存在着的。灵魂对于"我思"来说是一个未知物，灵魂的机制和本能是无意识的。最后，"集体"是一个产生各种误解和错误意识的场所；我们自以为分享着一个同盟的理想，也分享着这一同盟的利益；制度会驱使我们从个人的动机出发去谋求大公无私的目标；我们辨不清怎样捍卫社会准则和职业指数。

有关概念化的智力活动，不管是实际的还是充满诗意的，较之有关科学的智力活动数量更大。史学远不是唯一的概念化学科。我们可致力于作这样一系列的构想：人们以多重的含义谈论着上帝；某些动物是脊椎动物或冷血动物；人在一些地区是散居的，在另一些地区则是群居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古典的或巴罗克式的；某种战略是消耗性的而另一种则是粉碎性的；……人们同样能够把握一份报纸的宗旨，分析人类的情感，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描绘社会；"分解"运动技术和手工业技巧以改进学习和讲授。一门像今天的语言学这样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语言现象的思考：说到"离合器"，如果这不是一种概念化，甚至不是一种哲学思辨，那还能是什么呢？这不是一种解释或一种法则。史学概念化既不是一种实验研究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发现的结果，而是一种仔细的和透彻入里的检验的结果，一种我们可将其与视觉的努力相比的智力统觉的结果。努力的感受出现于史学工作的两个时刻：评判的时刻和解释的时刻。如同自然科学家的才智表现在于解出某种自然现象的方程式一样（至少我是这样想象的），史学家的才智一半是为了发明概念。因此，感受如同影子一样总是伴随着历史综合工作：当人们终于

分清了两个含糊的定义时，或把对一个奇特事物的感受确定在一个初看起来可归结为含义平平的事件中时，似乎人们实际上“一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自己蒙住眼睛不去看它而已。“概念化”只是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另一种说法，它的好处在于，有了它，史学知识才“跳出了仅仅只有模糊感受的事物这个范围”(韦伯语)。① 普通社会学的伪科学概念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真正用处，这一用处是描述性的和具有启发性的：“角色”一词的定义是否是单一的，人们是否使用这一定义而不致对这一定义作更深入的分析（人们扮演不同的形势和习俗为其准备的角色时的动机和方式各不相同），这一概念是否是一个更加站不住脚的隐喻，然而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只要人们把一个史学类型，如将清教徒或工业骑士② 作为一个预定的和明确的角色，他就会被激励，就更想深入弄清定义的结构，并使其更强烈地显示出来，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这对于史学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因为史学是分析高于叙述。正是这种系列概念使史学有别于历史小说和史学资料，如果史学只是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分析的话，那就用不着史学写作了，一部《战争与和平》或新闻纪录片就足够了。现实是未被清晰地认识到而存在着的，小说家就这一现实进行创作或再创作，史学家则提供这一现实的概念等同物；史学家并不仅仅是一个考证学者。

概念化的研究观点，给职业行话所称的“非事件性的史学”一词以确切的含义。人们用这个词表明一个研究的系列，这一系列的统一性并不表现在初见乍看之下：研究热那亚商人谋求安全的态度，研究15世纪的人口；这些研究是否都揭示着长时

① M·韦伯：《论科学理论》，法译本，巴黎1965年版，第187页。

② 清教徒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从而也被称为“工业骑士”。——编译者

段和进化的缓慢？基本上不是。非事件性的史学是在反对以往的史学、反对“条约和战争的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条约和战争的史学是一种叙述性的史学，是在当时的资料水平上，也就是说是在当时的人即资料作者们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具有的看法这一基础上写成的。这些人对他们时代的看法显然是含混的和不完全的：他们常常谈论内阁危机，但无视政治不稳定性的“理想类型”；谈论邻居家一个女孩的出生，却忽视人口的再生产率，他们要么决定只生两个孩子，要么相反，生多少算多少；他们不明白这个问题究竟是由宗教信念还是由一个理性化程度很低的时代的放纵来解决的；他们对历史时间的某些快速冲动也没有明确的意识(例如从政治方面来说，某天早晨，在不可抗拒的信念面前，每个人都通过舆论、大众传播媒介和自己的习性、倾向，感到有一种受人胁迫的感觉，因为他不能没有别人，离开别人什么都干不成。在这样一种时刻，人们对自己说“新的一页已经开始”，也正是在这同一时刻人们有了对未来的信心；人们对这一时刻不是那么有意识的，犹如在剧场里，经过一会儿的踌躇，掌声先是孤单地，随后才是全体一致地响了起来)。确切地说，非事件性的史学，是一种将概念化推向更深层次的史学，原始资料和以前史学家们对此望尘莫及。它并不贬低政治或军事史，而是要将其写得更好，例如汉斯·戴伯吕克或阿尔唐·迪皮克写的非事件性的军事史，[①] 运用政治哲学而写成的政治史就是这样。哲学一词只有在下列方面都属实的情况下，才不会令人感到不安，这些方面是：哲学和“实证知识”间的界限与各领域间的界限相同，都很明确，都不是传统的。在上一个世纪，人们常常讲到哲学化的历史，说伯克的书或托

① 阿尔唐·迪皮克：《战争研究——古代战争和近代战争》，巴黎1914年第7版。

克维尔的书有一种哲学的趣味，表达得也不坏。

构成概念还是列出方程式：概念化和形式化是对知识的两种基本态度；文学精神的对立和科学精神的对立，其意义就在于此。

概念化在历史学工作的各个阶段，显得或使人感到它并不存在。抱有向“用之不尽”的材料提出“新问题”这一想法，就是已经形成了新颖的概念。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或那个新概念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人们就认为可以到处使用这些概念：例如曾经有一阵子，人们发现到处——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西塞罗时期的罗马以及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都有上升的资产阶级。随后人们却发现用“上升的资产阶级”这把新钥匙硬塞在各把锁内是打不开这些领域的。因此，为了打开这些其他的锁，还应当制造其他的新概念。这种错误至少具有启发的价值，人们也许能从这些错误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不夸大，但总还是夸大的)：历史不能以抽象的手段来写成，“尘世间的概念因为是含糊的，所以永远是错误的，又因为其对象在不停地变动，所以又总是含糊不清的”，一个当代作家(实际上大概是我自己)这么天真地写道。

这一反权威式的天真肯定有一些健康的成份，然而不能永存，在缺少概念的情况下，会使史学沦为印象主义。印象主义的危险到处可见，尤其是在文化史的领域中。古罗马的宗教情感或16世纪的宗教情感不是我们的宗教情感，这些情感也确实进不了“现成的”，即今天为人们所确认的范畴：马格丽特·德·那瓦尔既不是真正的伊拉斯谟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福音主义者；诗人贺拉斯既相信又不相信阿波罗神的存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也有必要重提这一点：心态本身要比神学家的分类标准更为变化不定，必须从当时的社会准则和心理来理解这些心态。

人们还会常常重读《拉伯雷的宗教》一书，因为这一忠告必须永远记取。但是也不能局限于这些消极的真理，不能局限于略带文学味地回顾时代精神，因为史学如果还处于半流动状态的话，便会从我们的手中溜走。史学并不是重新创造，而是解释。为了确切地说出贺拉斯关于阿波罗神的想法，应当找出适当的词语，创造一些模式和范畴，找出贺拉斯与这些模式和范畴相应的十分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一系列因素。我们应当不局限于他那个时代的心态所具有的差异性，而应当弄清楚通常所说的心态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人们愿意对宗教情感这个"混沌的总体"看得更清楚，而不是望文生义，认为宗教情感含义十分模糊，就应该对它进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可以看到，对贺拉斯的宗教情感的理解就会是一种社会学分析的结果。我们凭直觉一下子掌握了全部本质，如果没有"混沌的总体"，如果不要再有所发现，那么历史的撰写就降低为可以直接理解的历史的叙述；概念比定义更有价值，推论分析只是多余的空论、实际经验中的无价值之物。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叙述是以分析为前提的，历史并不是直接性的。

3.3

史学知识使模糊的总体主题化。对于这个模糊的总体，我们想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有着现实意义。这三个方面是：实践理论、无意识和集体性（特别是心态的集体性，我们的年鉴学派对此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是不无道理的。

3.3.1 实践理论

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运动不是整体显现在直接视觉之中，这就产生了概念化的必要性。按照材料的合适与否，概念化可以在一个局部中表现为一个协调的概念系列，或是组成一个假设—演绎系统。让我们实际考察一下这种象棋博弈的实践。有一种博弈的理论能推演各种情况下的最佳战略，这在道理上是可能的，但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一台每次下棋都获胜的电子机器该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大陆的各个方面。同样，一个棋手只能清楚地预见将走的一步棋之后，我想也许是五六步内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更远一些，则是一片模糊。幸运的是，有关象棋的论著和棋谱已将不同战略和形势的"理想类型"分门别类，这些"理想类型"虽不能推断一切确保胜利，但能起指导作用，使人避免重大错误。在这里，我们能够见到所有实践理论的寓意；当然，人类事务的偶然性、"物质必然性"和"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于数学学科中一个组合的完全明确的复杂性，在数学学科中比天文数字更大的数字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任何寓意都在某些方面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必胜的电子机器有一套理论、有一套推断的实践理论，即使棋手们有限的预见在亚里士多德"混沌总体"前碰了壁，即使概念化作为一种局部的理论出现在棋谱之中，也都是如此。

在国际舞台上情况也是如此。不管人们是亲身参加角逐，还是成为对参加角逐的人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或成为对参加过角逐的人进行研究的史学家，人们都必须掌握一种理论或起码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局部理论、一种政治哲学，这样就拥有了取胜的一切。概念分析能够"确定子系统的特殊性，提供主要变

量的一览表，提出对实际进行过程的某些假设，便于区别什么是理论什么是伪理论”①。

主题化视其实施领域的不同，或是导致一种演绎理论，或者只导致一种概念化。一种演绎理论、一种(具有“科学”一词的数学内涵的)“人文科学”的典型例子(老实说，几乎就这么一个例子)是经济分析。问题仍然是要弄清楚到底应该将一种只在人们确实像他们所应当行动的那样去行动时才具有描述价值的东西称之为一门科学(描述的)呢，还是称之为一种艺术(起规范作用的)。举一个不像经济理论那样常用的例子，即城市地理学理论，人们可从2—3个从属于空间符号逻辑的抽象看法来解释城市生活极为广泛(如果不是普遍的话)的传播：一种是中心场所的理论，另一种是城市生活能使社会交往关系达到最大程度的观念(我们可以用信息论的手段来分析这一社会交往关系：城市是交流网络汇集的核心)。确实，如果要使彼此间的关系达到最大程度，人们就应当遵照上述规范并建造城市；正因为他们确实愿意使他们间的关系达到最大程度，所以他们建造城市。这正因为人的本性是成为政治动物——哲学家们是这样说的。但是，相反人们也可以像某些动物那样宁愿相互间分开生活；那么实践理论科学就指出应当怎样做才能尽可能分开地生活、如何占据尽可能多的空间，并拥有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容易防卫的边界：这就应当将地球表面积分割为交错相叠的六边形。但是当事人对比自然并不确切地知道，也不一定赞成这样做。

人文科学的领域，按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物质，也是“客观现实”，总之就是说是这样和那样的事物；有形物的稀少和意愿的众多是与每个个体的意志背道而驰的，是一种阻力，

① R·阿隆的文章，载《法国政治学杂志》，1967年第847页。

用哈贝马斯[1]的话来说是"工作"和"权力"的对象也是经济和组织理论的对象。市场的价格并不是每个销售者想出来的价格，它源自不同意志的组合，只有通过推理论证才能预见。个体的多样性相似于有形物的客观性，它强制性地规定着各种条件，并导致既不符合意愿又无法预见的结果；个人行动的互相结合导致了形体的建立(市场、一个城市、企业、团体动力、一次谈判、一次"战争升级"、1914年的世界大战等)，这些形体并不是人们的意愿，它们要求人们像下棋时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其产生的结果那样努力去理解它：因此，为了避免事后这么说："我们并没有料到这样，事件的发展使我们不知所措"，对一次战争升级或一次谈判事先进行概念化是很有用的。在这一领域里，史学不能从直接知识出发进行研究或写作，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特点并不是这一领域独有的。

3.3.2 无 意 识

心智并不仅仅是会思想的物质，那些非笛卡儿主义者认为，无意识是不难理解的。一个艺术家并不知道他正运用着他那一时代的视觉规则，虽然这些规则模糊地表现在他的创造中，但在以前接受专业训练的数年中，艺术家却是无意识地接受了这些规则的：教育的心态影响机制没有为"我思"所注意，"我思"只认识到这一机制的结果。当然，从本体论讲，个人是一个决策单位；如果艺术家适应这些规则，那么他也同样能够不适应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为每个艺术家所接受，但同样也由每个艺

[1] 哈贝马斯(J·Habermas，192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方新左派潮流、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著有《认识与人类利益》、《展望一个理性的社会》等。——编译者

术家所创造。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些规则从历史学角度来讲并不是不可解释的；它们并不是以阿威罗伊[①]的方式产生于集体智力因子的心血来潮。但是个人并不是"我思"，意识也只是心理中很小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本能、能力、本性、习惯、精神的机制、目的，这些都是心理实体，是通过它们的结果而达到意识的，语言的语法、三段论的形式或潜在的记忆等也是如此。正是思考才发现了三段论的形式。如果有朝一日人们能够在心理分析学中筛选出什么有益的东西的话，这一收获自然在这一方面有其地位。

要想知道为什么1916年法军能够守住凡尔登，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去询问这场战役的生还者。这些生还者在当时只会互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今天他们却会回答说："我们是出于爱国主义才坚持的。"他们的回答虽从历史角度看是真实的，但却是不真诚的：因为当时人们并没有谈起这些事。如果他们对孩童时代还有记忆的话，他们反而对自己的力量不会有所意识，爱国的气质是通过学校、环境，通过法国或德国在其他国家人民的眼底下充当着国际舞台上重要角色而产生的自豪感所产生的力量印入他们脑际的；他们只有通过后来在战争时所见到的结果才能判断这种力量，我们自己也会作出和他们同样正确的结论。

3.3.3 集 体 性

我们既不能从参战者们的意识出发，更不能从这些参战者们的每一个人出发，来撰写世界大战史：从首相到士兵，将会一个接一个地以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式来叙述他自己的经历。

① 中世纪西欧人将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世德(Ibn Rushd，1126—1198年)之名拉丁化，称他为阿威罗伊(Averroès)。——编译者

作为集体合力的结果，战争并不等同于各自不同的个人行为，而是比之更为广阔的东西。史学不能归结为个人实体的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单子宾词的逻辑；历史是由集体创造的，因为从各个方面看个人不是被禁锢于自己的单一性之中的。人们接受战争，是因为他们如同感到自己生病一样感到了政治实体的危机，即使他们的私人利益并未被触及。此外，在各个个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模糊不清的关系，如制度关系(每个人都在其中出于自私的动机追求一个于己有利的集体目标)或结盟关系(这些不同利益的联盟在赞同一个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减到最小程度的纲领时，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无意识盘算是准确的)。最后，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断定一个处于联盟、机构、政治体制之外的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子，因为当个人进入社会时，他已被社会所塑造了，也就是说已被先于他的历史所塑造了；自然状态的人是见所未见的。

小学使法国人成为爱国者；在西班牙有许多虔诚的宗教信徒，而且他们也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督教主义者；在德国，人们很喜欢音乐。那么就每个个人来说德国人是否都是音乐迷呢？可以这样想象：一开始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生来就是音乐迷，这是偶然的；后来他们成功地以一种制度和一种习惯的形式把音乐强加给自己的同胞。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那些没有天赋的人之学习音乐，是因为制度为他们提供职业前程，最后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爱上了音乐。

令人困扰的是，当音乐就这样成为了一种教育时，它就会发展到实际上改变个人的先天习性：音乐迷真正的爱好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那么这样如何在历史合力的结果中区分个人的成分和集体的成分呢？这就使人类天性这一观念既难以确定又不可回避。我们准备同意这样的观点：音乐迷有一种天

然程度的差别。但是既然一种文化会使音乐迷们有爱好程度的差别，而置身于这种文化之外的个人又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程度？从柏拉图以来我们就知道，文化、心态、民族天才的多样性在于两个相互联系着的原因：个人受到制度、角色的钳制，而这些角色却反过来改变着个人。

没有什么能够比心态研究更能指出个人的集体性一面了，确切地说，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一现象，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的确，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的诸现象有着双重的集体性：意识形态的实质在于，由个人来分担完成自己所参加的某种制度或某个联盟的各项目标；从这个词的另一种含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如同辩论中的诡辩术一样，是为了满足一种理想主义的和可耻的需要，这就是在康德所说的理性生物（因为丑恶的意识麻痹着人，也麻痹着动物）的理想法庭上为自己辩白一番。[①]

同样，以客观知识为形式的心态确实也是如此：这种心态比起平列的许多个人知识更具有真实性。首先，使整个社会有所得益的绝大部分知识是少数个人的独有财产（如熟悉西印度群岛的航路、知道如何建造水力发电站、真正感到应当把内伐尔[②]列入够得上标准的作家行列等）；此外，对于集体中的其他人来说，知道某些人有所知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懂得可以对之信任；人们很少探究一种理论是否确实可靠，而是较多地考虑能否对专家表示信任（“约里奥-居里将表示反对”）；

---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P·韦纳：《怎样写历史》，巴黎1971年版。

② 内伐尔（G.L.Nerval，1808—1855年），法国作家，其作品风格题材甚异，诗歌倾向于梦幻，对波德莱尔等人有启发。——编译者

这对于信仰或迷信是决定性的。举例来说，西方人(至少是他们中的非职业细菌学家)相信微生物的存在，于是就加信采用无菌措施；而阿赞德人完全是以同样的方式认为巫师确实存在，于是就加倍采取措施反对他们：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并同时沿着这一方向解释一些不明确的地方；究竟是真理还是迷信，这在信仰社会学上都是相同的。① 上一世纪基督教主义在西方民众中影响的下降，同样可以从这一信念中得到解释：与科学相比，宗教只是一种迷信而已。而这一信念也只能建立在人们对一小批知识分子表示信任的基础之上。信任也是解释“留芳百世”的大作家是怎样筛选出来的这一奇怪程序的关键。一般说来，真心实意的信任在文化和宗教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倒立金字塔，它建立在尖端之上，建立在小部分人心智最精细部分的一些激动的瞬间之上。

知道人们能够有所知，这同样是很有决定性的一点。雷蒙·吕耶在某本书里写道，俄国人为了制造原子弹，并不十分需要去窃取美国的制造机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知道有可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来，而这正是当他们知道美国已制造出原子弹后所知道的。文化“继承者们”的全部优势就在于此，这一点，通过对比也可在自学者身上看到：对于这些自学者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向他们推荐好书，而是这些好书得自像

① 这正如M·尼尔森所写的，一位非机械师的汽车驾驶员对其汽车所抱的态度，完全可以与一个巫师的态度相比。我也相信这一点：当一位西西里的巫医无法救活他的病人时，他解释道，“这一次”无法可想了，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让这个病人归天。同样，我的汽车坏了，我要自己修复它，照我所知的去做，如果没有效果，我会得出结论，这次汽车是真的坏了。巫术的方法是为了填补技术知识无法填补的空缺。我们的文化要求给我们做到的理性化只起着这样的作用：为了填补空缺，原始人只会想到巫术行为，也就是只想到象征行为；而对我来说，出于公共的信仰及社会经验的其他方面，我可以假定一种为专家所知道的理性修车方法总是会有的。

他们那样的人的推荐；这是因为他们信任这些人，他们认为既然同他们一样的人已经读懂了这些书，那么他们自己也有可能读懂。一个"继承人"就是一个知道不存在什么奥秘的人，一些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我认为英帝国也在此列）在行政管理上就是建立在这一优势之上的：它们通过权势集团中的青年来管理人民，这些青年从16岁起就开始进入职业生涯；他们未经什么特殊的教育和训练，只是生来就知道管理的乐趣，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父辈身上看到了榜样；有此自信他们就能毫不感到为难地听取有经验的下属的建议，年富力强、头脑清醒使他们比老朽的官僚看问题更为清晰。

知识的社会内涵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知道众议各不相同。假定我们想再现有教养的罗马人（如维吉尔或贺拉斯）的宗教心态，我们会问：他们经常谈及朱比特和阿波罗，难道他们真正相信朱比特和阿波罗的存在吗？从智力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一样，原始性很少，他们那个时代的哲人仍然是我们的哲人，对于他们来说，多神论可能是最少哲学味的观念。读过贺拉斯作品的人认为，贺拉斯的宗教态度是一个谜：他谈论阿波罗时就如同神的存在是当然的事，既没有常见的夸张和讥讽，也没有距离和优越感；他的作品都只使人看到他那个时代：如果阿波罗正式接受着一种崇拜，那么与此相反，持怀疑论者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他的作品还使人们看到当时那些对宗教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都尽可能地顺从着城邦中的诸神。贺拉斯读过柏拉图和卡内雅德[1]的著作，他像当时有教养的自然神论者一样，认为应当为一般群众创造一种更能引起想象的宗教，用优越和同情的语调来谈论群众的宗教活动。

---

① 卡内雅德（Carnéade，公元前215—前129年），古希腊哲学家，或然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编译者

怎样使上述这些说法在整体上站住脚呢？休谟和胡塞尔著作的读者以平静而明确的语调谈到法弟玛，对于这样的读者应该作什么评价呢？宗教现象学和信仰心理学在这里用处并不大，从现象学角度解释贺拉斯对神的看法和观念，就等于把贺拉斯心灵中的矛盾转移到信仰的对象上；但问题是：在这心灵中哪里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该不该假定他有不同的思想层次，从而使坏信仰转变的次数增加？确实，哲学著作的读者可以凭借着寓意的注解，自称在群众信仰的诸神中看到了真正神意的标记；但如果贺拉斯是将阿波罗的名字当作一个借代，他就不会是用这种语调说话了；此外，寓意具有双重性，不能长久使用：象征物的意义瞬息即逝，那么我们就只不过是一些哲人，相反，如果象征的意义依然如旧，那么我们也就成了迷信者了。贺拉斯所持的态度，其矛盾性只有通过集体范畴才能得到解释：当贺拉斯天真地说着阿波罗的名字时，他的根据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信仰，这一信仰即使不是肯定无疑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许多人的共同信仰，又是正式的信仰；而且，既然这一信仰是他自己的信仰，他既不认为它可笑，又不认为它见不得人，他便可以不必自问自己个人是什么态度了。这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因此，今天的哲学家只要对自己的论述有用常常会在一个或两个段落中用上一些斯宾诺莎或黑格尔的观念或词语，但并不因此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或黑格尔主义者：这只要他所引用的这些思想家已为大家所接受就足够了。如果不同意这些思想家的其他观点，那就不引用就是了。贺拉斯内心态度的复杂性，只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宗教社会学上的复杂性而已，在他的思想中同时存在着很多教派的主张。正是这一社会学使我们遇到了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当时并没有"基督教民族"和独占鳌头的玄学意识形态，有的则是广泛的并存互容，以及人

们在印度看到的各种互不相争的教派；那时既无宗教战争，又无文化冲突。现在西方正朝着这一同样的容忍局面发展。要理解贺拉斯，只须看一个当今唱流行歌曲的歌手就够了：这个歌手既虔诚地信仰宗教，又可能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弹着吉他唱着一首赞美圣母的歌；在这种并不矛盾的情况下，人们或是与信教的人谈论宗教，或是不言不语，不使任何人感到为难。修昔底德就是这样对上帝只字不提。正如在政治舞台上或经济市场上一样，在知识领域内每个人都认为别人是有理性的，他自己也以某种方式保持着多种意见，这样，至少能使文化冲突不致爆发。人们对许多人信仰的东西不加贬斥，甚至对思想上直截了当地加以谴责也感到犹豫。因此，对心态领域所作的统计调查是靠不住的。

在所有其他人都相信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会持怀疑态度的，即使在感知认识方面也是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揭示过一个协调一致的群体的意见对其成员所具有的威力(谢里夫效应：我眼睛所看到的只是部分的社会；阿斯克效应：社会能够使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当一种意见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时，人们对它就更少置疑：如同莱昂·费斯丁吉所说的那样，更舒适的莫过于“减少”存在于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之间的“不协调”，莫过于对别人的行为深信不疑。简言之，大家都在使他人内在化。于是用纸牌搭成的信任之塔(每个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张纸牌)，就在某一天倒塌了，因为彼此依靠的基础意外地倒塌了；第一个说国王赤裸着身体的人唤醒了所有其他人，于是这些人都很惊讶怎么自己竟会长期深信不疑；他们差不多都以为当初自己实际上原来是不无怀疑的。这种说法也许不完全没有道理。人们就是这样在公元400年左右，正式停止信仰宙斯，在1650年左右不再相信巫士，在1700年左右则对神的启示产生

怀疑的。我们无法用思想的进步来解释这些信仰的崩溃，如同无法以此来解释一个个人（哲学家或知识分子）的知识演进一样；只有个体之间的结构才能使人理解一个神话的持续时间和它的崩溃。无数有知识的德国人在希特勒时期曾经相信过反犹太主义这一科学神话，后来却不信了；这不是由于生物人类学进步的缘故(人们早在1934年就可以不相信这一神话了，再则也没有什么科学能够确证丘比特的不存在)，而是由于希特勒的统治，尤其是德国人在1945年前对希特勒所持的赞同态度崩溃了的缘故。1650年逐杀巫士的纸牌之塔倒塌得更快，这是因为它只是由法学家和一部分舆论而不是由所有的人和国家机器所支撑的。这不是观念思想史研究的课题，而是信仰社会学的课题，它从属于某种群体的动力学范畴，属于一种对舆论形成的途径和力量关系的研究。比起对当时穿袍阶层的体制和知识结构所作的社会学研究，和对公众舆论的形成所作的社会学研究来，笛卡儿的《方法谈》的出版就显得太重要了。我们并不以为上述这些观点是很新的，但只有在使其更为深入，更为确切时，人们才能找出产生这一系列效应的真正原因，人们还要去为这些原因寻找也许是夸张的或空泛的解释。

如果按照心态与群体的联系来领会心态的话，心态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否则人们虽能带着敏锐的感受叙述一种思想的内容，却不再能理解它或重新思考它。心态似乎专门用来证明深入了解过去的或别处的思想如古罗马宗教、占星术、原始心态的不可能性。让我们对这最后一点稍作一番考察。人类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各自的心态这一观念起源于两个幻觉。第一个幻觉是，把一种思想的内容、一种由特定文化所决定的内容误认为是一种思想的形式、一种古老的思考推理方式；这样就把一种文学体裁与一种逻辑混淆了起来。许多原始人天真无知

的特点，事实上只是意识形态的外壳、感化人的夸张、隐喻或像魔法之类很明确的职业行为；这些东西的特定使用者并没有受骗上当，没有把这些东西当真，也未敢将其用于预先心照不宣的规定的领域之外：埃文斯-普里查德说过："即使是原始人也不把一种想象的关系和一种现实的关系相混淆"[1]。波洛洛人难道真把他们自己当作了阿拉拉人？雨科尔人难道不是以寓意和分类的标准来辨别小麦和鹿的吗？[2] 要认识这一点，只须看看他们从不"想的是做鹿肉块杂烩，煮的却是麦粥"[3]这一点就够了。"原始人"的行为只是部分与他们的言论相符。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特洛布里扬德人绝对相信魔法，但他们只是在可靠的技术解决方式无法奏效时才敢使用魔法："他们不会将魔法和凭经验取得的技术这两种方式的效用相混淆。"[4] 古罗马皇帝乃至古埃及法老的臣民(确实)[5] 也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们的统治者具有的神性深信不疑：他们的这种信仰正如一个苏联人相信斯大林的天才一样。这是确保国民情感，使人们团结在领袖周围，使神圣联盟不致破裂的神圣的、夸张的方式。这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伟大的人民并没有受骗，但"他们希望活着"[6]：在这里，历史的积淀比历史的派生物更重要。宗教这一历史的派生物依然不合适地表达着俗民这一积淀，因而，当事人并不把宗教这一派生物当真；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数以千计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荣誉题辞都把罗马皇帝称作神，但当帝国的臣民真正需要神的时候，如生病、旅行遇到危险或丢失财物时，没有人会乞

① E·E·埃文斯-普里查德：《原始人的宗教》，巴黎1971年版。

② 波洛洛、阿拉拉和雨科尔都是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名字。——编译者

③ O·勒鲁瓦：《原始理性》，巴黎1927年版，第70页。

④ T·帕森斯：《社会系统》，纽约1968年版，第329页。

⑤ G·波斯奈：《论法老的神性》，巴黎1960年版。

⑥ 索尔仁尼琴：《癌病房》。

灵于这些皇帝的神性：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人对罗马皇帝神性还过什么愿。

第二个幻觉是，人们把在事实上是集体内部的变动、精神生活这一社会学的现象和社会控制现象误认为是个人心态的演进，这一演进有着不同于我们的规律的规律（如著名的参与规律）。有时，原始人并非没有技术和理性思想，相反在当代世界，人们却可以轻易找到同样多的原始人心态特点。是否应该说这些特点是一种残余，还是我们思想的形式只是逐渐演进的？都不是，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文化生活集体结构的问题。我们的大脑结构与原始人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样有着迷信、意识形态或参与逻辑的潜在性，只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留给非逻辑潜在性的地位减少了（比如说，从韦伯的观点来看，现代法律比古代的习惯规则更加合乎理性了）；而且，社会控制迫使每个人接受社会精英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并把迷信的微弱愿望斥之为荒谬，从而使迷信局限为个人的离奇想法。我们不像沃伦斯坦和开普勒的同时代人那样相信占星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太想去相信它，而是因为学校使每个人懂得了一种理性主义，而在这一方面，理性主义过去只属于少数社会精英，属于加尔文或伽桑狄。例如一个波洛洛人的部落和我们之间的心态差异，比我们的科学文化和18世纪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但这一差异性在结构上是可以比较的。在18世纪，有许多和今天一样好的物理学书籍，但比今天差得更多，这些书籍有的辞藻过于浮夸华丽，有的则带有前科学的思想，因此群体的合力效果就比一些个人组合的总和要差些：良莠并存使人不知所措，失去了分辨严肃的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准，并破坏了观念市场的一般水平。一个波洛洛人的心态并不原始，但是总体的波洛洛人的文化水平却颇为低下。

3.4

通过概念的创立和对概念的批判，史学领域的研究一点点地进步着；概念在不断明确或不断分化（如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至少有五六个不同的含义）。某些概念的意义非常广泛：如人们研究古罗马皇帝的神圣化或20世纪的政治生活时，提到"集体性"、"派生物"、"积淀"和使用"民族"或"宗教"这些字眼是同样重要乃至必不可少的。当史学研究被推向更深层时，史学与社会学的区分已不再有什么重要性了，或者说只是一个咬文嚼字和学科名称的问题罢了；人们可以笼统地说，一本史学书就是一本社会学论著，或者说一本普通社会学的书就是一部历史学的局部研究论著。史学和社会学这两位很好的朋友为了这一点小事而争吵是毫无益处的，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文献资料的状况。因为事件性史学的困难，全部史学的困难，就在于不能局限于人们在每个时代资料文献中所找到的现成概念，不能仅仅以依靠修艾通纳[①]所提供的概念为手段，去考察公元1世纪的历史，也不能仅通过马克思和托克维尔提供的概念去理解19世纪。否则，将会导致令人不快的不平等：对现代行政体制的研究要深入到它的社会学层次和神话层次，而对古代行政体制却只从公众权力这一观点去描述，其他就不了了之了。历史的主要线索只有当对这两种行政体制的分析达到同样深入的程度时才会显示出来，局部历史也会变得相互关联，甚至在其深层也是如此（人们不再将两种行政体制或两种宗教

① 修艾通纳(C.Suétonius,70—128)，拉丁史学家。著有《12位恺撒的历史》。——编译者

进行详细的对照，而是用一种宗教类型学就这两种宗教的最深层的特点进行对照），全部历史才会以某种方式成为一种比较历史。我们还未走到这一步，但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史学才真正具有了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并不认为史学应当成为或可能成为概念化的史学；我们看到的史学原来就是这样的，概念化一词是对自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进步的最好表述；概念化的史学这一名称比非事件性的史学、总体化的史学、解释性的史学等名称更确切；最后我们还认为如果史学知道它原来就是概念化的而且还不满足这一点，这一认识本身就会刺激史学变得更为概念化：当然人们也不能向认识论提出过多的要求。

概念化使人们对史学产生兴趣。这一兴趣不仅仅是对人类起源的好奇或对人类热情的爱好，而且更是一种知识趣味。使我们对人类的历史感兴趣的运动，可比之为使我们对自然史感兴趣的运动；饲养珍奇动物、爱好集邮，这还都是肤浅的兴趣；但是人们能从珍奇动物身上达到对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理解；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一有机体中认识了自然规律”①。例如，通过集邮人们可以进而深入到符号学研究。当人类对各种事物的兴趣就这样变为一种完全是知识性的兴趣，成为一种“认识的理性”和“社会学”而不再是韦伯所说的“价值关系”和历史时，人们就可被引向对一些领域发生极大的兴趣，在这些领域中生命和国家都不占重要地位，但这些领域却揭示了人类的深层结构。概念化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渡到对历史的动力和人类本质的认识。

概念化史学的发展是推动当代社会向合理化演进的运动的一部分。历史学的合理化同物理学的合理化、生产技术的合理

① 亚里士多德：《动物类》，I.5，645a。

化一样对集体生活起着同样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客观存在的东西主题化，使人们"意识到"没有想到的东西，就是使人想象："已存在的东西"也可能并不存在，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手段，使人们得以希望这东西或许不再存在。我们可以在从抽象艺术、文学界的审美经验到对制度和习惯的争议等各个方面中，到处看到人们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就会表现出来的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现象，即数量方面的现象，这一现象对于史学，如同对于美学一样，产生的结果是重大的：如目前已知的历史的量增加了，"想象的博物馆"也日益扩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知识比我们少，其原因不说也明白；他们知道城邦和城邦制度，知道伟大的国王、蛮族、荷马史诗；他们还能把这一点点历史看作是一场悲剧，赋予剧中的每一幕以某种哲学的意义。但他们不太能想象到，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还会添加人们想象不到的新东西：他们当时所掌握的"排列组合"是十分有限的。当然，柏拉图并不是不知道他所了解的历史只是沧海之一粟，在"过去"的黑暗中，历史也肯定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他这么写了，但他这种原则上的肯定由于缺少更为实际的内容而一直是虚无缥缈的。修昔底德则在当时不仅希望他的作品能永垂不朽，而且他所描述的人也将一成不变。

对历史学的兴趣是智力性的、社会学式的，总之是哲理性的。"一个集体唯有在总体上为人理解，那么只要一个这样的集体也许就能揭示所有集体的本质。"① 如同超现实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最简单的史学研究行为是准备好一张白纸，随后作如

---

① R·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巴黎1968年再版，第193页。

下的游戏：举例来说，知道古罗马执政官有资格举办马戏表演或场面壮观的角斗，并对这些活动授以巨额奖金（执政官高踞在命人精工雕制的、用以纪念他们最高职位的象牙板上，能够举办这些活动就是他们执政地位的象征），随后着手对一系列使这些执政官之所以能如此做的原因进行概念化（很难想象今天我们的部长们会有同等的条件）。显然，这里有公法、政治哲学、权力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娱乐社会学等方面的原因，但具体的表现式样呢？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实质是什么？问题就在这里，历史学不仅仅要确证执政官造就了上述壮观场面这一情况。一旦这个实质被主题化了，那就很容易从中引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并从事件以前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答案。

4 历史学中的计量

弗朗索瓦·菲雷

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 1927—)毕业于巴黎文学院。通过会考而获历史教师资格证书。他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展开的：先任国家科研中心助教(1956–1961年)、后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副研究主任(1961—1966年)、研究主任(1966年迄今)。1977—1982年曾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他还担任过法国著名时事杂志《新观察家》的行政领导，以后一直是该杂志的合作人。

弗朗索瓦·菲雷是近代史专家(法国史学界所说的近代史指的是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的历史)，他对近代法国和西方历史的长时段社会、政治及文化演进尤其注意，他在这些方面的著作影响很大。菲雷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并提倡计量、系列分析，是这方面的论述家。他的主要著作有：《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1965—1970年)、《读和写：从加尔文到儒勒·

费里时期法国人的扫除文盲》(1977年)(与J·奥佐夫合作)、《法国大革命》(1965—1966年)(与D·里歇合作)、《思考法国大革命》(1978年)、《史学20年间》(1982年)、《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1986年)等。菲雷被认为是第三代年鉴派的重要人物。——编译者

今天，计量史学正风靡欧洲和美国。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就已看到史学研究领域中计量化、计算程序和可计量资料的使用迅速发展。但是，同所有时髦的词汇一样，"计量史学"一词最终如此广泛地为大家所接受，以致它的含义几乎能够包括一切：从批判使用17世纪政治算术家所创建的简单计数方法，直到在再现过去时系统地使用各种数学模式。"计量史学"以同一个词汇表达许多不同的事物：时而是一种资料的类型，时而又是一种研究程序的类型；它又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明确或不明确地表示着一种使过去概念化的类型。在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寻求限定历史学知识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时，我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出有关计量史学的三大类问题：

1．第一类问题关系到计量史学资料的处理程序，如资料中不同人口的组成问题、这些人口得以组成的地理单位问题、在同一人口中区别群体的界限问题、两个不同系列的相关系数的计算问题、相对于资料而言的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的价值问题、统计关系的解释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属于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工艺的范畴。确实，这些问题同样能够包括方法论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没有什么研究技术是"中立"的，而且从一个更为专业的角度来看，还因为所有统计程序都必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要知道：史学的或社会

学的知识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与一种概率论类型的数学概念化相容，或者被这种概念所穷尽。但无论是技术讨论或是理论论战都不是历史学特有的；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科学的整体，在这一方面，计量史学相对于今天人们所称呼的"经验社会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本质差别，从这一关系角度来看，"经验社会学"也只是一种当代的计量史学罢了。

2. "计量史学"一词至少在法国也同样表示了一些经济史学家的雄心和他们的工作：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回溯性计量经济的历史，①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我们的国民统计模式来填补以往各世纪有关投入—产出的凭空想象的图表的各栏目。因此，这一计量经济史的追随者们为一种总体的和系统的计量化而辩护；在他们看来，这是从普遍平衡的概念出发，在资料选择中消除任意性，并在资料处理中使用各种数学模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今天这种普遍平衡概念可从政治经济学引入经济史。

因此，根据上述观念的逻辑发展，真正的计量史学是史学双重简化的结果：一是史学研究领域至少是暂时地缩减到经济学的地位；二是从描述和评判的系统简化到由政治经济学——今天的一门最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科学——所创立的系统。此外，我们可以就人口学和人口史学的主题作同样的分析：一门用概念建立起来的科学给一门特殊的历史学学科指出资料和提供手段，这一史学学科就此成为一个主要学科的副产品，它仅是把主学科的问题和概念搬来对过去加以研究。

自然还应当有关于过去的数据资料，正如为了研究现时也需有关于现时的数据资料一样：材料的"存在"或者说起码"能够存在"，其意思是这些材料已被相当仔细地加工、整理或推论过。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已经给历史资料的全面计量化规定了

① 这是P·维拉所使用的术语。

第一个界限：这是因为即使我们假定早于19世纪的这种计量化是可能的话，它也无法超越伴随着欧洲君主制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而来的统计或原始统计计算的时期。然而，历史并不只是因为有了配第①或沃邦才开始的。

另外，对于史学家来说，并没有什么理由要他们赞同即使是暂时地赞同把他们的研究领域缩减至经济学的或人口学的领地。事实上，要么史学只是研究一个事先被确定为研究过去的有限领域，在这一领域的内部人们引入由一些社会科学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并验证这些模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重新陷入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去了，这种现代政治经济学，在我看来是唯一拥有这些数学模型的社会科学；这样，史学就只表现为一个资料的补充领域，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了。要么人们从其最广泛的词义，也就是说从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研究层次的多重性来看待历史学学科，这样，人们就从只是作为研究者直觉的假设——不管这些假设是原来的还是引入的——出发，去描述这些研究层次以及在这些层次间建立简单的统计关联。

3. 这样，即使人们赋予史学以"计量化"的定性分析，人们还是无法回避那些构成史学研究的特殊对象的内容：时间研究、各种现象的历时性维度研究等。然而，从这一角度出发，计量史学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愿望是将历史事实组建成均匀的、可进行比较的单位所构成的时间系列，同时能够通过特定的时间间隔——通常以年为单位——来衡量这些历史事实的演进。皮埃尔·肖努所建议的一个称呼——"系列史"②，就是按照这一

① 配第(W. Petty, 1623—1687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统计学者。——编译者

② P·肖努在许多文章中都使用和维护这一术语。主要可参阅："计量史或称系列史"，载《帕累托手册》，日内瓦1968年版；"系列史：总结和前景"，载《历史杂志》1970年4—6月号。

基本的逻辑活动来定名的：这一逻辑活动是上述严格计量化的史学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足条件。这是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系列史以按照可比性而选择、建立的资料的有规律的重复取代了实证史学的难以捉摸的"事件"，从而显示了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既然与此相反，分割为系列的历史现实使史学家面对分解为各层次、各子系统的研究素材——对这些素材他随后可自由地就其内部联系决定是否提出看法，那么系列史就既不打算对描述性资料的整体进行彻底发掘，也不意味着一个总体解释的系统或数学的公式化。

在作了这样的说明以后，计量史学和系列史学好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但是这两者具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因素，正是这一因素才使这两者互相联系起来：这一因素就是以系列取代事件，也就是按照概率论分析的要求来组织历史学资料。什么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于这一古老的问题，计量史学和系列史学都给予一个新的回答，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一回答改变了他的研究素材即时间的构成。正是在这一内部转变的意义方面，我想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为了避免任何误会，我要再说一句：这篇文章丝毫不包含有使这一领域规范化的意图：10年或20年以来，系列史已经成为历史知识发展最富有成果的途径之一；此外，它还显示着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它向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提供的严格性和有效性，远胜于一般定性方法论所提供的严格性和研究效率。但是从本质来看，由于具体状况的原因（资料的不可弥补的空白）或质的原因（被研究的现象具有无法转换的定性本质），系列史对处理甚至涉及历史现实的一些重要部分无能为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史史学家或撰写知识分子人物传记的专家与研究近代欧洲农业结构的史学家相比，对系列史的吸引力不那么敏

感；对于古代史研究者来说，他们研究的资料在时间上是不连贯的，而人物传记作者更感兴趣的是人物活动及其创造物的独特性，而非系列可比性。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提出另外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了衡量变化，系列史肯定会带来一系列清晰的程序，但在什么范围内系列史会使人们意识到突变？从本质上说，为了能够进行对比，系列总包括着一系列根据同一性建立的单位；当这些单位的长时段的时间变化表现出一系列周期时，就反映着人们所称的稳定中的变动，因此也反映着一种平衡分析；但是当一个或数个系列在时间中的变动表现出一种无限的增长趋势——即累加的趋势时，将这一趋势分解为相对小的单位(例如以1年或10年为单位)，就使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而时间性的结构转变——即变化节奏的转变就是从这一界限开始的：一些令人十分为难的日期的推定和分期问题便产生于此。此外，决定性的历史突变能够不被记录在特定系统的任何内在系列之中，而是要么产生于一种革新——这种革新在以前的记录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么产生于一个外在的因素，这一因素打破了一个系统数百年以来的平衡：这些方法论问题在目前有关工业起飞问题的讨论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什么方法论是中立的"这句话是确实的，系列史由于优先重视一个系统的长时期发展和平衡，对我来说它就特别注重对延续性的研究：对于我们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将历史和变化视为一体的观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纠正，也正是在这一范围内，系列史在作为知识的史学的建设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当然我们仍然应该意识到系列史的先决条件和各种局限。

但是这一不能在这篇文章中加以论述的系列史的局限问题，不应当成为知识怠惰或传统保守的借口：如果说今天各种

史学都在摆脱叙述走向问题的分析，那么人们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因于史学借以再现昔日历史图景的因素发生了变化。由于系列史，今天史学家面临着一个资料的新图景，面临着有关他专业研究前提的新意识。很可能我们现在还未发掘出系列史所带来的全部益处。

4.1 史学家和他的资料来源

计量史学是以同质和可比资料的长系列的存在和建立为前提的，在这一情况下，用新的语言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来源问题。一般说来，欧洲的资料文献是在19世纪按照反映当时史学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认识水平的程序及标准而建立起来并作出分类的：一方面，这些资料文献的处理首先注意了国家的价值，因此就导致了对政治行政资料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资料的保存和分类与当时研究的一个狭窄而又明确的目标相适应：这就是对文献的组织是为了说明事件而不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延续性。这样，文献资料就不得不按照其自身的标准而不是作为系列中的一个因素来得到证实和评价。这些文献资料的参照点是外在的：这是实证史学家的历史“事实”；这是幼稚意识的一个虚幻点，这一虚幻点存在于就证据而言被假设为真实的内容之中；这是无法把握住的、非延续性的、特殊性的序列，存在于无法确定的历史变异或一种以世纪、王朝兴衰、政府交替的观念所组建的编年体例之中。简言之，文献资料构建了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正如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所保留的信件证明着我们的记忆所已选择的内容一样。

相反，计量史学的数据资料并不表现历史“事实”的难以把

握的外在划分，而是表现其内部结构紧密性的一系列标准；历史事实已不再是被选择好了的事件——因为事件只是突出了一些其“意义”已被事先确定好了的历史的重大时刻，而是一种经过选择并基本上按照其重复特性而建立的现象，因此这一现象也可通过一个时间单位进行比较。在通过信息的电脑处理而使计量技术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的时代，甚至连档案管理的全部观念都因此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方法论革命和研究技术革命——两者并非毫不相干——的会合使人们考虑建立一种保存在计算机穿孔纸带上的新的档案资料，这不仅仅反映着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还特别反映着一种不同于19世纪的资料考证法。资料、数据不再是相对于其自身才存在，而是相对于它的前后系列才存在；正是这些资料的相对价值而非它们同不可捉摸的“真实”物质的关系才是客观的。这样，历史文献“考证”这一古老的题目也由于上述革命而发生变化。资料的“外证”不再根据建立在对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本进行比较基础上的可靠性来进行，而是根据同一性质但处于时间系列中或前或后不同位置的文本与其协调一致性来进行。“内证”更简单，这尤其是因为许多资料的“清洗”工作能够被输入到计算机储存记忆中。

资料的协调一致性首先是在整理的过程中通过最少量的资料形式化来构成，以便人们能够就一个时间的长时段及这一阶段的每个时间单位再找到同一逻辑序列中的同一资料。从这一观点来看，史学家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不仅通过由此而带来的时间节省表现为巨大的实用性进步（尤其是当资料的处理正如古久里①所使用的方法一样，采用录音的方式），同样也表现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强制性的理论要求，因为有待于程序化的资

① 古久里先生，“新计算机操作方法刍议”，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6年，第4期。

料系列的形式化，事先就要求史学家抛弃其认识论上的幼稚无知，建立其研究的对象，思考其一系列假设以及从研究的模糊性转到研究的明确性。第二个内在的考证工作，在于把这些资料和同它们相连的前后资料数据相对照，以便验证这些资料数据本身的严密一致性，这就是说要消除错误：这一工作因而也表现为是上述第一步"外证"工作的结果，此外它可通过计算机的资料检测程序而大规模地自动化。

"手工式"的系列史，自然是通过对最容易处理的历史系列如经济、财政或人口等资料的处理而开始的；计算机在数据资料的收集、处理方面所带来的革命，逐步增加了对这些数字系列进行开发的可能性，今天这一革命已扩展到所有能够转变为计算机程序语言的各种历史资料：不仅是财政的或粮食价格的资料，还包括如中世纪教堂、修道院文件集等或君主制法国的三级会议陈情表等相对整齐均匀的文集系列。

这样，系列史的首要任务逐渐明确起来，这就是组织研究素材。这也成为系列史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古典历史学建立在一系列文献的基础上，而这些文献的组建和处理又是按照18世纪圣本笃教会和19世纪德国史学家留给我们的考据规则而进行的，但今天的系列史则应当按照方法论和研究技术双重革命的要求来组织资料文献，正是这双重的革命才改变了史学学科的研究程序和规则。

然而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提出上述资料存在的偶然性问题：这些资料的保存、部分遗失、毁坏或全部消失等都带有偶然性的问题。我不敢肯定这个问题是否能像人们常常想象的那样明确地使史学有别于其他有着更为确定的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学科；因为史学事实上是以其资料的极大的和几乎是无限制的弹性为特征的。随着史学家探奇兴趣的转变，史学资料大量的

“沉睡”领域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如19世纪的史学家何曾关心过对教区档案记录的研究？但正是这些材料在今天的法国，尤其是在英国已成为我们了解旧时前工业社会最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一。

此外，如果研究者给予资料以一种新的意义的话，在过去已得到开发利用的资料也可被用来为另一研究目标服务：如对价格运动的描述同样也可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超越了阿弗内尔而达到了拉布鲁斯的研究层次；再如，从配偶避孕的发展角度而对人口资料系列进行研究，能够阐明心态问题或宗教实践问题。[1] 只要对签名进行系统统计和研究，一系列公证文件就能使我们对扫盲状况进行统计研究；从特定的工作前提出发，按照一系列共同的标准而系统地组织、收集传记，这样能使我们构成一个新的资料系列，从而完全更新一个传统的历史叙述“品种”。

另一方面，直至今天，历史几乎只是建立在记载人类生存经历的书面资料的基础之上。也许给实证社会学提供了大量资料的口头调查，永远是或至少是与研究以前时期的史学无缘的。但是相反，我们还有多少非经记载的历史证据和材料要系统地加以整理处理！乡村居处、田地使用、宗教的或世俗的图像、古代城市区域的组织、房子内部的布置等等，从文明的所有因素出发，这张单子的内容是数不胜数的；对所有这些文明因素的精心整理和分类能使我们组成新的编年系列，并使史学家占有全新的研究素材，这些素材正是史学学科概念的扩展所需要

---

① E·勒鲁瓦·拉迪里：“法国大革命和避孕——朗格多克地区的档案”，载《历史人口学年鉴》，1966年版；“法国大革命和致命的秘方”，载法国《历史年鉴》，1965年10—12月号。也可参阅A·夏穆和C·多芬：“法国大革命前的避孕：塞纳河畔的夏蒂荣的例子”，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9年版，第3期。

的。这是因为并不是资料决定着要研究的问题，而是要研究的问题决定着资料。

也许不应该把话说得太死，从一些当代社会科学对资料的要求来看，在史学中存在着不可补救的材料空白：比如，人们不知道该以何种替换的或推论的材料才能够填补亨利四世时代——更不用说更久远的时代了——法国经济投入—产出图表的各栏空白。但这主要意味着在概念上史学并不能简化为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对于史学家来说，重要的资料困难问题并不在于资料的完全空白，而是在于不完全的资料系列：这不仅因为后者会带来前后连接或推论的困难，还因为由此而易于产生历史编年学上的错误幻觉。

我这里想举一个17世纪初法国群众暴动的典型例子。由于存在着大量有关17世纪上半期群众暴动的行政资料，这一时期成为自中世纪末到1789年间农民起义史中最著名的时期。由于资料保存方面的偶然性，大部分有关这一时期的材料（塞基耶家族所藏的档案文献）最终流到列宁格勒，从而使苏联史学家对法国的“旧制度”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在就这一时期的解释问题的论战中存在着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要对两种不同解释所共有的不明确的假设进行检验：这一检验是要了解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专制王权的形成及财政税收很可能快速增长的时期，法国历史中常见的“扎克雷”①起义现象是否在这段时间特别集中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在年代上表现出的集中只有通过对一个前后一致的长系列的考察，对我称之为系列上游和下游差异性的揭示才能确立。然而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一长系列无法得到建立：首先，这是因为从一个长远的时期来

① “扎克雷”原指1358年法国的农民起义，后泛指一切农民起义。——编译者

看，并不存在完整的和前后一致的有关群众起义的资料；还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像列宁格勒所存塞基耶家族文献之类有关这一方面存留的特别丰富的资料，由于局限于一个家族的文献范围而具有个人经历及生涯的偶然性，从而使我们对农民起义现象的历史编年认识受到了歪曲。其次，扎克雷起义是没有直接材料的历史，是目不识丁者的起义。今天我们是通过行政、司法文献去研究这种现象的；但正如夏尔·蒂伊所指出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所有逃脱了镇压的起义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在一个特定时期中，我们拥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料所能大量表现的是制度的变更（如镇压机构的加强）或纯粹是个人的变更（一个高级行政人员的特别警觉），而不是被研究现象的频繁出现。这样看来，亨利二世时代和路易十三时代对扎克雷起义的不同记录首先反映着王权中央集权化的进展。

因此，对系列资料的使用迫使史学家仔细思考在使用计量方法时这些资料的组织条件所能带来的后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我认为根据在系列建设中不断增长的复杂程度，似可区别出下列三种资料类型：

1．结构性的数字资料。这些资料由史学家按其本来面目进行收集，并用来回答与史学家需要研究的最初领域直接相关的问题；例如人口史学家研究法国教区文件记录，经济史学家研究各省有关19世纪法国工农业统计的调查文件，或者如社会政治史专家研究美国总统选举资料。这些资料往往需要被标准化（当局部单位有变动或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时）；当在资料系列中出现空白时，人们也能够从中推论出一些因素。但是这两方面工作的进行，总伴随着微乎其微的不确定性。

2．同样也是结构性的数字资料，但史学家以一种代用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料，以便回答与其最初开始研究的领域毫不相

关的问题。例如：按照教区记录来分析人们的性行为；通过价格系列来研究经济增长；通过财政资料系列来观察一种人口的社会职业构成及其演进等。史学家的工作在这里有着双倍的困难：他应当尽可能仔细地明确他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那些资料并不是按照这些问题组织起来的，因此，相对于所提的问题，资料的"合适性"问题便不断地被提出。史学家也应当不断地彻底重新组织这些资料，以便使其能够使用，然而也正是这样，史学家使资料的使用变得更主观，因而也更有争议。

3．非结构性的数字资料，但历史学家以一种双重代用性的程序寻求对这些资料的计量使用：史学家应当就他所提出的问题为资料限定一种单一的涵义；他也同样应当能将这些资料重新组织成系列，也就是组织成可进行比较的一系列编年单位，但他为此所进行的标准化工作就明显比上述两种情况下的标准化更为复杂。这一类型的材料随着人们逐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多，这一类型的资料本身也可划分为两个等级，一种是非数字的然而是系列性的资料，而且容易进行计量化，如近代欧洲的婚姻公证契约，这些契约能够按照史学家的选择成为内婚制、社会阶层变迁、收入、扫盲程度等等的指示器。另一种是严格定性使用的，因而也不是系列性的或至少是很难组成系列和难以标准化的资料，如上面所提及的行政或司法材料，又如证明忠诚已消逝的图像残片等。

不管如何，今天的史学家仍然必须摒弃幼稚的方法论，并对他的知识建立条件进行思考。计算机使史学家从耗时的资料收集、编制卡片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在节省时间方面给史学家以方便；但另一方面计算机也迫使史学家进行事先的准备工作，如资料系列的组织、探究资料对于他所要寻找的回答有什么意义等等。今天的史学如同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史

学虽或许有点姗姗来迟），也已从模糊走向明确。资料的编码是以资料的定义为前提的，资料的定义隐含着一定数量的选择和假设，而假设更是人们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人们必须按照一种程序的逻辑对它们进行思考。因此，躲藏在“事实”里面并与“事实”一起被发现的一种伪装的历史客观性，就彻底垮台了。史学家已不再能摆脱这样的意识；他已构建了自己的“事实”，他研究的客观性不仅取决于他在建立和处理这些“事实”中对正确的程序的使用，还取决于这些程序对其研究中的假设的相关性。

系列史因此并不仅仅也不特别是一种历史学资料的转变，这是历史学意识的一场革命。

4.2 史学家和他的“事实”

在对整齐划一的资料的编年系列进行系统性的工作时，事实上史学家对其知识领域的一个特殊对象——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史学家给予时间的概念和对时间的表现——进行了改造。

1. “事件性的”历史学的定义已不取决于对政治事实的研究，它也不是由对某些以时间为轴心而挑选好的“事件”的简单叙述所构成；“事件性的”历史学首先建立在这一观念上：这些事件是统一的，是不可能被归并到一个统计学的分配系列中去的；这种完整单一的事件是历史学的绝妙素材。所以，这类史学有其矛盾之处，它既突出了短时段又突出了一种目的论的意识形态；由于事件是作为一种唯一的和全新的事物突然出现在时间的序列中，没有什么先例可与之相比，所以如要将其归并

入史学，唯一的办法就是赋予这些事件以一种目的论的意义。如果事件没有"过去"的话，那么它将有一个"未来"。何况自从19世纪以来，史学是作为一种有关进步感的内省化和概念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而"事件"就通常标志着政治、哲学美好处境降临的阶段：共和政体、自由、民主、理性。史学家这一思想意识能够具有一些更细腻的形式：它可以使所获得的有关一个时期的知识，按照一些不太与政治选择或价值（如时代"精神"和"世界观"）直接相关的统一模式重新组织起来；但在本质上它还是表现为一种同样的补偿机制：为了能够被理解，事件需要有一个通过外部确定的并独立于事件之外的总体史。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历史时间的古典概念就表现为根据一个连续模式而描述的非连续的系列，这一概念就十分自然地体现为一种叙述。

相反，系列史是根据非连续的模式而对连续性进行描述的：这是一种问题史学，而不是一种叙述史。在必要地区别不同层次的历史现实的同时，系列史一面明确地对一种演进的公设提出疑问——这种公设假定一个社会的所有因素都是整齐划一的、同样演进着的，一面从定义出发把任何有关"总体"历史的先决概念进行分解。为了能够区别一系列趋势的短期的或周期的不同变化，系列分析只有在以长时期为单位时才有意义；系列所揭示的时间不再是事件之周期性的和神秘的突发，而是一种从今以后可以衡量的、可进行比较的以及具有多重差异性的演进节奏，这种节奏人们可以在同一系列内部进行检验，或在不同系列之间进行比较得到。

这样，系列史就通过下列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行动，使古典历史文献精心封闭着的古老帝国崩溃了。首先，通过将现实有分析地分解为可进行描述的各层次，系列史为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的引入打开了大门，这些社会科学专业性更

强，如政治经济学，它也许是使史学更新的一个动因。通过对一系列层次的不同演进节奏的计量分析，系列史最终将时间——这一人类活动的范畴——组织成可进行科学衡量的研究对象。

2.如果说，从此以后史学家的假设从历史哲学的层次转移到一个既特殊又整齐划一的资料系列的层次，那么这些假设从这些系列中所得到的常常是明确性和准确性；但它又使历史现实分裂为相互区分的碎片，从而同时打破了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这一愿望。是否应当抛弃这一愿望？

对此我将这样回答：很可能应当保留这一愿望，把它看作为历史学的前景，但是为了推动历史研究，应当拒绝将这一愿望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除非想重新陷入上文已提及的目的论的幻景之中。当代历史学只有明确规定它的对象，确定它的研究假设以及尽可能仔细地组织其研究资料才能取得进步。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应当局限于反对一个编年系列的微观研究，它还能够重新组合多项这样的系列，以便就此对一个系统或子系统提出解释。但是对“系统的系统”进行总体的研究，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是超越目前史学研究的手段的。

我这里以人口史和经济史为例来进一步说明问题。人口史和经济史是当代法国历史学界（也许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最为先进的两个领域。20多年来，“近代”时期在法国是系列史（人口和经济的系列史）研究最多的对象，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也是人们对之了解最多的时期。从一般价格的重新组合、研究、市场食品价格的分析等出发，法国史学家随后按照一系列人口曲线将这些价格与人口数量的演进作比较。这样就逐步建立了一个“经济的旧制度”概念，这一制度建立在受气候变化无常影响的脆弱的粮食生产之上，也建立在通过周期性危机所表现的系统的周期性“清洗”之上；这些周期性危机同时是由价格曲线的突然

上升和人口数量曲线的急剧下降表现出来的。

但是，作为含义模糊而且多样的价格系列，它们是由一系列有关生产幅度的更合适的指示因素以及对一系列触及供求关系演进的系列的使用而得到补充的，这些供求关系的演进本身也是价格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生产方面，用来表现每年收成的相同百分比的十进位制数字资料并没有使我们知道当时生产的绝对价值，但我们可根据这些资料的相对可比性找到其价值；或者我们可以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利用旧制度行政机构所收集的，并从国民统计角度加以重新组织的早期统计资料。在需求方面，除了总体性的人口变动外，还需了解可用货币的积累状况：社团财政、封建领主财政状况、地产收入、企业利润、工资等。

正是这一多重性的人口和经济系列的组合，才使E·勒鲁瓦·拉迪里得以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对旧制度农业经济进行研究。[①] 事实上，他所作研究的基础是有关朗格多克地区整体的抽样资料，是一个长时段的编年系列(15—18世纪)和广泛、丰富的计量化资料，这些资料，尤其是地籍资料，使他可对农村产业进行研究。15—18世纪，这是一个农村的长周期历史，普遍的平衡和前后相继的不平衡是这一历史的双重特点。普遍的平衡在这里大体上是与马尔萨斯模式相符的；马尔萨斯所建立并力图使之永远有效的这一模式，只是当英国式的“经济起飞”时代来临后才完全失去了其真实有效性：在历史长时段中，旧日朗格多克乡村经济是由农业产品和人口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无法提高农业产量，土地匮乏，也就是说缺少可供开发的好土地，

① 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巴黎1966年版；同时可参阅我在“有关计量史学发展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该文发表在《社会科学信息》杂志，1968年版。

这些正如研究价格的史学家所熟悉的、著名的“贵金属货币饥荒”一样，也对决定性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结构性的障碍。货币解释由于失去了中心作用，因而被归并到多样和同一的解释体系之中。

这一旧时经济结构在历史的长阶段中作为一种内部功能的规律而起作用。但是，它并不妨碍在系统内部被描述的各种不同变量按照其相对于整体所占据的地位、按照每条特殊曲线所体现的以年为单位的节奏和周期划分各个时期，这些变量包括人口数量、产业演变、土地收益的分配、价格和产品的变动等等。因而，结构从编年角度看包含着多种系列结合的类型，也就是说包含着多种局势。甚至正是对这些前后相继的局势以及它们不同的和共同的特点进行仔细地考察，才能使结构显露出来。顺便说一句，也许这一看法能给同时性与历史性之争带来启示，这一争论往往使人类学家和史学家相互疏远，目前这一争论又占据着社会科学演进的中心地位。在经济序列中导致“事件”形成的短期及中期周期性运动并不一定和一种普遍平衡的理论相矛盾，对这些运动的实证描述相反能够使人们明确这一平衡的理论条件；这些运动所表现的弹性范围正表明了这些运动所身处的界限。

3.但是上述E·勒鲁瓦·拉迪里对朗格多克地区的研究只是一个例子，它优先研究了人口和经济不同系列间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又是在一个相对整齐划一的地区空间之内及一个人类活动的特定领域即农业经济中得出来的。事实上，“区域性的”系列史能够扩展到不同的空间中去，能够达到对地区或国家的非平衡性作出分析；而“总体的”系列史(或者说致力于总体研究的系列史)，即使局限于一个有限的地域，也有可能导致对人类活动各层次不同演进节奏间的时间非平衡性的研究。

由于对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日益增多，现在对上述第一点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经济史的专家们尤其习惯于注意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可以测知的差异，这些地区对同一个局势有不同的反映或对不同时期的局势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例子已举不胜举，其中有些研究提出了一些自此之后成为欧洲史研究中的经典性问题：最近重新提出的关于18世纪法国与英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问题，P·维拉指出的关于18世纪西班牙加泰卢尼亚地区农业起飞和卡斯蒂利亚地区农业衰落之间的对比问题，① 或在17世纪法国P·古贝尔笔下的悲惨的博韦地区和P·巴雷尔笔下的相对较为幸运的普罗旺斯地区之间的对比问题，前一地区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就受到了经济和人口衰退的重大影响，② 而后一地区则至少明显是在较晚的时期才受到了经济和人口趋势的大转折的影响。③ 一般说来，17世纪经济、人口发展趋势这一"悲剧性"转折的具体表现时间，按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并按不同的经济性质有很大的差异。同样，对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来说，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同样的经济局势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了。

系列经济史同样能够通向对具有差异性的各局势以及在空间中具有差异分布的局势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系列经济史能够通向对编年史序列中的地理环境的研究，能够考察由编年系列中的矛盾所揭示的结构的差异性。其实，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地区或国家，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周期（这些周期从它们内在的联系方面来看基本上是可以进行

---

① P·维拉：《近代西班牙的加泰卢尼亚地区》，巴黎1962年版。

② P·古贝尔：《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巴黎1960年版。

③ R·巴雷尔：《16世纪末到1789年下普罗旺斯乡村的经济增长》，巴黎1961年版。

比较的)只表现为同一历史的地理的差异性，而相互矛盾的演进趋势，不管是在同一地域的内部(如乡村与城市之间)，还是不同地区之间，都有可能使史学家面对不同的经济结构。

但是史学不能够简化为只对经济活动进行描述和解释。如果说史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面有其特殊性的话，确切地说，就是史学没有其他学科所具有的特殊性，它试图探究时间的一切维度。当然，我们都理解为何经济构成了计量史学研究的优先领域，经济指数所必具的可衡量性，经济领域所建立的概念的确切性，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性——经济的变化在今天西方思想中是构成历史变化的首要图景。但是人不仅仅是经济的动物。当今世界已向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有关西方经济增长模式普及时所遇到的文化阻力的例子，以致史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曼彻斯特模式(或相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提出疑问，并使史学家的兴趣转向对过去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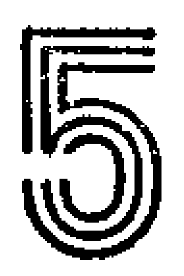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一转变并不是回复到、也不能回复到已过时的“进步”的目的论史学中去，这一史学用经济生活发展的节奏来推论文化生活，因此不管是通过一种“自然的”和平演变或通过革命这种必要的媒介，我们都不能接受这种史学。这一史学所代表的19世纪意识形态公设和原则在今天已毫无用处。史学家并不是只有与这种史学相联系，才能忠实于其学科的“总体”特性；相反，只有从系列史的研究程序入手，同意分析和描述不同于经济客观进程的人类活动各层次，我们才能把握这一“总体性”。正是从这一假设出发，根据现实的各层次或按照已得到分析的各局部系统，我们才可见到不同的时间适应模式和不同的历史节奏。

在实践方面，几乎所有一切都还有待于我们去做。史学家应当检验哪些材料才能成为我所称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的指

示器(可计量化的或不可计量化的)，应当组织他的资料体系，并确定其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及可用来把一个时代与另一时代进行比较的价值。资料就在那里：这些资料与经济史、人口史领域内的资料同样众多，同样可组成整齐划一的系列；这些资料反映着人民大众的扫盲情况，反映着教育社会学与宗教情感，反映着上层精英分子观念的完善，也反映着政治意识形态明确的或潜在的内容等等。在理论方面，注意点当然在于逐步组织一种总体史的各个因素，但特别是甚至首先是要分析历史整体不同层次的不同演进节奏，因为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能达到今天历史学目标中的两个最优先的方面：

(1)修正传统的总体历史分期。这一传统的历史分期基本上是19世纪意识形态的遗产，而且这一分期也是以一种尚需进一步加以明确论证的观点为前提的：这一观点认为，在一个被研究的时期中，整体中的各错综复杂的因素大体上是相伴演进的。对于我们来说，与其从一个特定的历史分期出发，还不如根据所描述的各因素而提出问题，这样或许更富有成效。例如，"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相对于文化史的一系列现象来说可能是合适的，但相对于农田产量的资料却毫无意义。

(2)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便是在具有不同性质的资料的整体中，勾勒出快速演进的层次或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的层次，同时也要揭示出那些在中时段或长时段中变动极其缓慢的领域。举例来说，自11—12世纪的经济"大增长"以来，法国历史的能动活力总带有经济性质这一点并不明显：教育投资、文化投资(广义而言)和国家的干预(通过某些机构)比国民生产的增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也许人们允许我以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来结束这篇文章：只要历史本身未被置于系列史程序的考察之中，那么它就无法得到证实。



历史学和长时段

米歇尔·伏维尔

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 1933—)毕业于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文学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通过会考而取得历史教师资格。他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从普罗旺斯大学的埃克斯-马赛一大开始，历任讲师、近代史教授、近代史讲座教授。1983年底伏维尔接替了因索布尔逝世而留下的空缺，被任命为巴黎一大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巴黎一大历史系近代史教授。此外，他还担任法国南部文化、心态、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罗伯斯庇尔研究学会会长等职务，直接负责《法国大革命史年鉴》杂志的编纂。

米歇尔·伏维尔对近代社会文化心态史和法国大革命史这两个领域作出了颇大贡献。他的研究既继承年鉴派传统，又有很大创新，这表现在既注重长时段研究、心态研究，又不忽视短时段研究、事件与社会经济层的研究；既广泛运用计量、系列分析，又不偏废定性

分析及其他有效的传统史学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有：《马拉文选》(1962年)、《专制王朝的崩溃》(1972年)、《18世纪普罗旺斯的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教化》(1970年)、《昔日的死亡》(1974年)、《宗教与大革命》(1976年)、《意识形态与心态》(1982年)、《18世纪的城市和乡村》(1980年)、《1300年到今天的死亡和西方》(1983年)、《大革命心态》(1985年)、《法国大革命：图像与叙述》(1986年)等。伏维尔被认为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史学的重要人物。——编译者

1958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写了有关"长时段"的著名论文，这篇文章在"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中，成为一种宣言，甚至是一种学术信仰。当时，有关长时段这个主题的史学论著不算很多，值得一提的有：布罗代尔本人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正是他有关长时段研究的实践，充分显示了他对时间、空间中延续性的注意；此外有马克·布洛赫的《法国乡村史的基本特性》和欧内斯特·拉布鲁斯的《18世纪工资和价格运动概论》。当时，研究长时段的范本杰作也就是这些了，虽然皮埃尔·肖努的《1504—1650年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也已经处在出版阶段。正是在布罗代尔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的几年中，一些对一个世纪或更长期进行大胆研究的著作才得以出现，对此，我们可指出的有皮埃尔·古贝尔的《博韦人》(1960年)和E·巴拉蒂埃的《普罗旺斯》(1961年)等。随后这类研究日益增多，同时长时段这个概念也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在E·勒鲁瓦·拉迪里的笔下，这一概念包括了朗格多克农民4个世纪(14—18世纪)的全部社会生活。

我从布罗代尔的上述文章出发，在20年后的今天再来考察一下长时段概念的来龙去脉，这丝毫不是图省事。这一概念在60年代还只是一种预测性的提法，而今天(1978年)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同时又变得平凡化，并常遭人反对。当年布罗代尔曾在史学领域的内部和外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样说已经不够了，他起码在三四条战线上挥戈拼搏。在史学领域内，布罗代尔参照了一种离我们已经颇为遥远的过去，即参照了唯历史的史学的过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而这种唯历史的史学，就是曾经遭到“年鉴派”第一代领袖们猛烈抨击的事件史学。他谴责“爆炸性的事件是十足的新闻……，它释放的大量烟雾充斥着当时人的意识……”这种事件，对布罗代尔来说，最后就转化为“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幻无常和最具有欺骗性的时段”，它在最近几百年中一直在政治史上占统治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虽对经济史的新进展感到满意，但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这种事件史的终结：在“孔德拉蒂耶夫对半个世纪经济局势、周期的叙述”①中，存在着出现一种新事件史的危险；这一新事件史是“吸引人的短时段经济”的栖身场所，甚至也是间接恢复“非常古老的、动人心弦的政治史”的一种手段，E·拉布鲁斯的一篇著名文章对“三种危机、三次革命”所作阐述的②，对布罗代尔来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这些参考材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布罗代尔那篇文章当时所处的确切史学研究背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正如P·维拉所说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捉弄人”的味道，他的这种说法也许并不过分。然而，

① 孔德拉蒂耶夫(Kondratieff)，美国经济学家，原籍俄国。他在1925年出版的《商业经济》中指出，19世纪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15—50年的不同周期。

② E·拉布鲁斯：《1848—1830—1789年，革命是如何产生的》，载《1848年法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巴黎1948年版。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开放遥远超过一种在今天看来也许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证据的范围：布罗代尔在制订研究计划时，同样也参考了不断扩张的、表面上看来已取得胜利的其他人文科学，从而为史学选择了未来。如果说布罗代尔与人类学和人种学还保持着那种一旦消除了当时的误会便加强接触的可能性，那么他对社会学家所使用的短时段则绝对没有什么好感，他打着长时段的旗号，在为未来史学所制订的规划中出现了一些我们今天已在重复使用的关键概念：首先是"结构"这一当时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概念，菲利普·阿里埃斯在其《历史的时间》一书中已拥护这一概念，其次是从定性数学中借用过来的"模式"概念，"模式"已在其他人文科学中用来进行计算……在这一系列概念中，有很多大胆和保守兼而有之的手段可用来更好地领会什么是一般的时间，什么是各种历史的特有时间：这并不是指神话或人类行为基本因素的准永恒性，而是指一种好像被确定为是无意识的社会史的、"普通的"长时段，这种无意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创造历史，但并不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对布罗代尔来说，这种未被意识到的历史恰恰就发生在长时段中，就隐藏在那些显而易见的表面事件的后面，并且可以用一连串的结构组织起来，在这些结构中一个系统的一系列补充成份相互呼应。属于这种情况的首先是社会经济史，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种直到当时为止一直受到重视的运动和突变史，而是指具有稳定性的"经济文明"史，即在一种"缓慢时间"的"半静止状态"中变动的"缓慢的历史的层次"，其次是（也许特别是）文化史或心态史，这一史学领域因为被认为是"稳态"的，是"长时段的囚牢"，因而被定为对历史进行长时段研究的优先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F·布罗代尔和E·拉布鲁斯再次相遇了；后者于1965年在圣克卢召开社会史讨论会时，要求史学家大力开发史

学的“第三层次”即心态史，他对心态史下的定义是“抗拒变化”[①]的史学。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学术主张如果不是已经陈旧，但至少还是至今为止评价史学历程的特殊工具，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主张粗中有细，表达了有保留的开拓精神。显然，到目前为止，不明确的地方已逐步得到说明，问题也已理清；结构主义已经渗入史学领域，而历史学研究也并未因此而进入死胡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批史学家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布罗代尔所开辟的几个研究途径中。长时段历史这一20年后我们能对其各领域进行全面描述的史学方向，虽然它的运动演进曾时常带来一些未曾料到的结果，但其本身却并未违背一开始所描绘的模式。

确实，长时段概念所引起的论战，有些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同时为了不再回复到当时的那些论战中去，唯历史的史学之死亡在今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布罗代尔所大力抨击的“事件”是否同样从史学领域中消失了？答案：既“是”又“不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起码是法国史学的一部分，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巨大事件——甚至是“激动人心的不礼貌行为”的类型——今天已被贬斥到何等地步的话，那么回答确实是肯定的；但是回答又是否定的，因为事件在史学研究中还有其顽强的生命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像1968年5月风暴这样的小浪潮就足以在史学界激起一阵研究短时段的热潮，而不单纯是附和一时的时尚……但这还不是唯一的理由。

如果说有些争论的主题已在20年前的史学战线上解决了，那么昨天的一些预测也许也已成为过去。如同第一代“年鉴派”

① 参见《社会史——资料和方法》，巴黎1967年版。

的其他领袖人物一样，F·布罗代尔为了使恢复对长时段的研究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部分是从首先进行地理-历史学研究着手的；这一事实已很好地反映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可惜！如果史学状况正如我们所断言的那么好，那么对地理学就应当另作别论了。皮埃尔·肖努已指出了(他是最有资格做到这一点的人之一)，那些带有广泛的人种学或地理学(如地中海区域或大西洋区域)特性的重要研究是如何从那时起降格为更为方便的、以地区为对象的专题研究的。① 作长时段的研究并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背景：地中海区域最终也局限在法国南部的蒙塔尤地区，而蒙塔尤地区只是通过那些为出版商所喜欢的推理，被作者用来说明"奥克语地区"的情况的……但它并未因此而丧失其论证的价值。虽然有着这种或那种细微差别，但不能否认，就总体而言，布罗代尔所预言的这种研究趋势是有连续性的：通过对长时段概念所取得的胜利作一总结，可以为探讨完全是描述性的第一层次作好准备。

5.1 "长时段"概念的胜利：史学研究领域的改变

长时段概念的这一胜利也许与一系列的基本原因有关，在此我想将其综合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改变，其次是史学研究方法和技巧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的。

史学研究领域的改变？这不由使我回想到约在10年前(1970年)与E·勒鲁瓦·拉迪里的一次交谈。当时我正要完成我的论

① P·肖努："地理历史学"，载《高等教育杂志》，1969年第44—45期，第66—77页。

著《18世纪普罗旺斯地区的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教化》[1]，我们谈到了我传统上称之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这一第三层次，以及法国史学家中社会学派史学家所参与的、我们称之为"从地窖到顶楼"，即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运动。E·勒鲁瓦·拉迪里表示他本人还是想呆在"地窖"中，……但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对此他还会说些什么呢？

"从地窖到顶楼"，这也许是一个可以对长时段这个概念获得胜利的明确前景作一番大致浏览的命题。我们为了方便而称之为"古典"史学的时间已发生了变化：甚至政治史本身也不仅在一个方面摒弃了事件的樊篱而探讨那些只有在时段中才能得到理解的问题，特别是国家问题：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结构；这一结构并不能混同于以前的政治制度史所分析的那些呆板的现实，因为这种制度史老是一成不变地罗列国家的各种类别。时间的这种变化在宗教史中还要更为明显，宗教史正日益受到宗教社会学和心态史的双重压力或者说刺激：人们已不再以"于尼让尼图斯教皇谕旨在某某教区"等作为论文的题目，而是在以数百年为时间单位的长时段中注意研究诸如群众宗教、前基督教时期泛灵论的延续继承等主题——这一泛灵论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从12、13世纪到古典时代天主教的再度强化，这一泛灵论始终以基督教化了的群众宗教为形式而渗透、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宗教感情之中。如果相信了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是处于一种"基督教国家"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就不禁要和J·德吕莫一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法国的农村有一天已被

---

[1] M·伏维尔：《18世纪普罗旺斯地区的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教化》，巴黎1978年版。

真正地从深层基督教化了？所有上述问题只有在一个极宽广的范围内，在以数世纪为时间长度的时段内才可以理解。

经济史以前曾作为推动方法论革新"生力军"，至今仍没有半点衰落，正是这种经济史以一种最为明确的方式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观点变化。经济史庄严地把自己说成是运动史和局势史：从F·西米昂到E·拉布鲁斯，法国经济史学派使人们承认了经济学家关于三种时间划分的框架——这种划分自那以后便变为通俗普遍化了：首先是周期为10年左右的短时段，这一时段以一年甚至一个季度为危机的顶点；其次是介于两个周期之间的中时段；最后是长时段，它体现着以世纪为单位的经济变动，我们看到从中世纪到今天，西米昂所提出的关于经济长时段运动的传统划分：A阶段(扩张)和B阶段(收缩)正在逐步缩短。这一经济史的时间辩证法随着价格史的研究而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和成果，这一价格史的建立，是从市场谷物、手工制品价格表等重要材料系列的分析出发的，初期的计量史学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虽然当时它与系列史还没有什么区别。如想讲得简明扼要，用必不可少的漫画手段作一番描述，那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些20年来的具体变化已改变了这种状况：某种经济计量学，如像《新经济史》，已出现了脱离经济史的倾向，以便继续走自己的道路，把对经济情况的研究从时间上延长到非常近的现代。在史学领域中，经济史并不否认自己那些现成的研究程序，但却从重视对突变、经济形势的偶然变化和危机进行研究的价格史领域脱离了出来；经济史尽可能向生产史和增长史转变，力图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在一个更宽的时间跨度内；这也许仅仅是因为那些更为众多、也更为粗糙、又常常是不连贯的材料系列进一步使经济史从对数量的调查研究过渡到系列史。这样的转变也不是一点没有教训、毫无困难的。昔日的研究者曾花了很大

力气才把谷物的增产曲线(它们的一朝分娩经过了10月怀胎)和还原到收获年份的价格曲线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和颜悦色地提到这些研究者的坚韧不拔，那我们同样应该想到，R·巴雷尔曾提出的带有某种挑衅性的新思想(用增长史和生产史来代替价格史)在开拓道路的过程中曾遇到何等大的困难，以及多么不为人们所理解。今天史学的这一系列革新已被承认，新的方向已被接受，反对派也正在逐步退却和消失。人们将不会忘记一系列代表着研究新途径的典范作品，这些作品都主动以世纪为长时段单位，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传统，把历史学和地理学结合起来，对人类的运动、定居、社会关系、生产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在这方面，E·勒鲁瓦·拉迪里对朗格多克地区农民所作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首要的范例：他回溯到中世纪的全盛时期(14世纪这个转折时期)面对一个始终由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外省进行研究：这一双重根源(中世纪加农业)也许解释了为何出现一个在很长的时段中在其经济方面至少大体上是“不变动的”世界。但那些眼下已成为时髦的、在新的形式下对村庄小天地进行短期总体研究而写出的力作范文也同样是这样的证明；有人要讲他的另一部具有革新意义的试验之作《蒙塔尤》(主要是根据一个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访问记而对14世纪初一个“奥克语地区的”村庄进行深刻的剖析)几乎没有为我们的这位圣贤辩护，它论述的仍然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但是，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可以想到G·布夏尔对巴黎南部索洛涅地区的研究(但这丝毫不是一种好奇！)，他从这一地区在古典时代坚如磐石的旧有结构中揭示出“静止不变的村庄”①。在这一被E·拉布鲁斯已经习惯地称之为“旧类型”的经济状态中，在这一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出现显著变化的经济中，我们才理解一种

① G·布夏尔：《静止不变的村庄：索洛涅地区的塞纳果》，巴黎1972年版。

被E·勒鲁瓦·拉迪里以挑战性的方式定名为"静止不动的历史"模式如何得以产生：在勒鲁瓦·拉迪里那里，这一历史至少时跨4个世纪(14→18世纪)，但这一模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一个总体结构中把一种总体历史的各不同层次结合起来。

但在评价这个值得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方面之前，似乎应当在这一研究中先关注一下在人类的物质史或者说人类的生活条件史中开拓的一些新领域：对于传统的经济史来说，对物质文明稳定层次的研究兴趣正在不断增长。我们在此只举几个例子：如对居住条件和住房的研究等，P·肖努和他的研究小组对诺曼底和巴黎这两个地区的居住条件和住房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的延续状况作了研究。这一历史并不是停滞不变的，波兰、英国、意大利等国的研究中世纪的专家使我们了解到随着土地在长时段中的价值变化，乡村居住条件也发生着缓慢而长期的变迁，这种状况在对遗弃村庄的考古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这一物质文明的非常缓慢的演进史能够转变为一种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在这一方面，还是E·勒鲁瓦·拉迪里为我们提供了例子，他根据19世纪的征兵资料建立了法国新兵人类学。但是，一系列细而又细的研究程序(如在材料齐全的一些地点研究人的血型等)也有助于建立这种离经叛道的史学，这一史学的离经叛道之处在于，它既是研究人的又是避免主动把握人道的，这后一种情况至少在主要的研究方法方面是如此。

史学在这一研究道路上并没有理由停止前进：各种不以人道为研究对象的史学(我们这里所指的是研究生物或地质方面的物理现象的史学)是近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之一，即使这些成果在以前的成果中也能找到其踪迹，如疾病史就是这些正在形成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是疾病的出现、消失、变动以及

各种疾病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人们已经开始谈到地震史，尤其是因为E·勒鲁瓦·拉迪里的研究，气候史也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学科——他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踪迹，如关于宣布摘葡萄季节开始的公告的时间、冰川的消长或树木年轮的研究，对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进行了概述。[①] 即使气候史并未真正揭示农业繁荣或衰退的长时段运动的最终奥秘，它也远远不止是一种辅助性学科或一种猎奇。有了这一历史，就引出了另一种时间，这种时间并不是人类的时间，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对自己必然要遇到的这些物理或生物条件一筹莫展，实际上，自巴斯德革命以来，疾病生态史已大部分被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但是，这种时间的节奏是特殊的，基本上与人类的时间无关，可也有助于去完善后一种时间概念。

5.1.1 从社会运动到社会结构

在社会史领域内，根据史学家所作的解说对长时段的结构和系统所进行的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之一：因为这一研究并不是在研究结构与研究社会动力之间的基本辩证关系中作出一种要么偏重于这一方向，要么偏重于那一方向的选择或仲裁。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开始于对“社会运动”，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研究，“社会运动”这一名词在今天已有些过时了。从对19—20世纪工人运动史的出色研究开始，人们通过一个回溯过程(在这方面，某些开拓之作已有所突破)，最后研究了发生于工业革命前社会中的一系列起义造反（如扎克雷起义或曰“愤怒者”的暴动等)。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观念渗入最为明显的领域中，在如何表达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诸形式(如果允

① E·勒鲁瓦·拉迪里：《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巴黎1967年版

许我这么说的话)的问题上，多种解说之间出现了最为尖锐的对立，在对于法国17世纪上半叶群众暴动的解说问题上，R·莫尼埃和B·波尔契内夫之间的论战便是明证。[①] 很多人力图把这些没有前途的群众暴动说成是一种就整体而言是静止不动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几乎不变的稳定现象，因为这些暴动将是这种社会中旧式危机的爆发在社会方面的反应和表现；但暴动者的意识形态则必然是尊古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从天主教神圣联盟时期(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的连续性。[②]

在这种解说中，对社会动力的研究，至少是对群众所起社会动力作用的研究——这在某些著作(仍请参阅《朗格多克的农民》)中占有重要地位——就让位于对结构的研究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史学家所分析的长时段的结构，而这些史学家也是从60年代起就根据1955年E·拉布鲁斯在罗马国际史学大会上提出的、名为"通向西方资产阶级史研究的新途径"的纲领展开研究的。但社会结构和历史并不是由此"发明"的，它早在对乡村世界的研究中就已存在了：它有着坚实的传统基础，这种传统诞生于1900年左右那个鲁契斯基的英雄时代，并在30年代因G·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郡的农民》这一专题论文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随后的一系列专题研究使其一直保持了延续性，直到当代的一些综合研究革新了研究的方式。只是在这一领域的城市社会研究方面(这一方面部分是由于其复杂性，才为人们所弃置一边的)，60年代拉布鲁斯的革命才最为明显地被感觉到：为了避免举大量的例子(这有点不公正)，我们想在那些描述城市在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上时间里的主要面貌的文章

---

① R·莫尼埃：《农民的愤怒——17世纪暴动中的农民》，巴黎1967年版；B·波尔契内夫：《18世纪法国的人民起义》，1948年俄文版。

② F·菲雷和D·里歇：《法国大革命》，2卷本，巴黎1965年版。

中，提一下M·加尔当对18世纪里昂面貌的描述，P·戴戎对17世纪亚眠的分析。①

城市或乡村的社会结构史是一种研究长时段的新史学，直到最近为止，这种史学所研究的静止性和延续性一直在向正统史学所研究的变动性进行挑战；但在我看来，近来还有一种最直接推动新社会史向长时段研究转变的趋势，这就是日益明显地向心态史发展的研究趋势。

5.1.2 心态——长时段的优势领域

作为一个心态史学家，我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认为，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但根据一系列有力的推断，这一第三层次确实能被视为“长时段的囚牢”(布罗代尔语)或“抗拒变化”（拉布鲁斯语)的层次；人们由此而对心态结构的“惰性力量”进行探究。在开始阶段，这一层次的研究似乎只能从心态借以展示的以数世纪为单位的时段出发才能着手进行，这至少对一种史学倾向来说是如此，这种史学倾向似乎忘记了在心态史开创之前的一本杰作：乔治·勒费弗尔的《大恐惧》。这本书几乎以侦探小说的手法研究、揭示的恐惧浪潮，在3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内通过各种间接途径而扩及法国乡村社会，并粉碎了旧农业制度。然而，文化史和群体态度行为史确实已最为明显地深入到旧制度传统社会的长时段中。罗贝尔·芒德鲁从研究《特鲁瓦文库》那套蓝皮小丛书的长期演变情况着手，揭示了法国18世纪大范围

① M·加尔当：《17世纪的里昂和里昂人》，巴黎1970年版；P·戴戎：《外省的首府亚眠——17世纪城市社会的研究》，巴黎1967年版。

的群众文化的一系列特点。这一群众传播的文学随着近代时期的曙光而发生微小的变化，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才消失。在心态史的开端时期——也是文化史的开端时期，人们还不能回避一些前提问题，简言之，就是时间的一分为二问题：群众文化的时间——这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精英”文化的时间——这里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等因素。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正表示着另外一种重要的辩证法，从而成为当前研究的主题之一。

但事情也许不如人们所相信的那么简单。为了阐明群体心态的“长时段囚牢”，F·布罗代尔在20年前是以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一文中所作的卓越论证为依据的。费弗尔此文给布罗代尔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结构”的图像，一种联结所有层次的世界观念，一种驱除实证史学那些过时解说的手段：费弗尔这样回答阿贝尔·勒费朗：不！在一个宗教控制着全部集体生活的社会中，拉伯雷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如您所想象的自由思想家的。费弗尔的这篇论文，公道地说，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但这一对心态结构的综合阐述（人们尚不敢说是总体阐述）还继续有效吗？人们虽已从M·巴克丁的著作以及C·金斯伯格或N·戴维斯的论著中发现拉伯雷是当时还很活跃的群众文化的代言人，后两人的论著揭示了16世纪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充满紧张状态、斗争冲突、矛盾和生动辩证的而不是单向的交流，① 但人们不能无保留地接受吕西安·费弗尔所提出的结构日趋贫乏化的观点，因为他当时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使史学研究从注重于明确的思维或文化转变为注

① M·巴克丁：《拉伯雷的作品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群众文化》，1970年法文版；C·金斯伯格：《群众文化》，都灵1976年意大利文版；N·Z·戴维斯：《近代法国早期的社会与文化》，1975年版。

重于心态史的新领域，也就是注重于对态度、行为举止以及人们称之为"群体无意识"(阿里埃斯语)层次的研究的话，长时段所显示的重要性则更加确凿无疑。

在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及死亡史等这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中，人们看不到动乱、突变，也看不到传统含义上所说的事件。心态史的开创者之一菲利普·阿里埃斯曾研究了有关儿童、家庭和死亡等各个方面，他有力地证实了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阿里埃斯向我们揭示的——特别是在其研究死亡史的近作中——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历史图景(尽管他还是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基础史学，也许就是那种研究传统社会的史学，留有一席之地)，而是历史的一系列宽广视而，是行为举止的模式和结构不仅前后交替而且也相互重叠、结合的图景——犹如房顶瓦片的排列一样。他向我们指出：从中世纪到古典时代，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从"视死如归"(如伊万·伊里奇、勇敢者罗兰等史诗人物所表现的那样)演进到第一次意识到对个人死亡的"愤怒"，到了浪漫时代，又转变为对他人(爱的对象)死亡的"愤怒"，时至当代，把死亡视为忌讳。正是通过历史的这些主要方面，一个结构才转变到另一个结构；在这些主要方面中，感受不到的变动要比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中世纪末期对死亡的恐惧是否是一种附加现象?)或可以意识到的转折(如18世纪末期)更重要。①

菲利普·阿里埃斯从人们对死亡或儿童的态度着手所作的研究绝不是孤立的，它代表了当今最系统化、最吸引人的研究趋势之一。研究家庭(这是当前的另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家庭、

① Ph·阿里埃斯：《人在死亡面前》，巴黎1977年版。

儿童或死亡难道就不是同一种大胆探索的几个不同方面吗?)的史学家们也同样对我们谈到了这一长时段的模式；欧洲家庭模式也许产生于16世纪末的西欧，覆盖了整个古典时代，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出现了核心家庭、婚姻年龄推迟、在马尔萨斯之前就已自发出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主张等。这样一种历史能够容忍“革命”吗？有关18世纪避孕的起源问题展开过长期的讨论，这场讨论因E·肖特尔的“性革命”(E·肖特尔把“性革命”的发生时间定在18世纪)这个有争论的概念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就导致了提出一个有必要重提的问题。

要我去同这种研究集体心态缓慢运动的史学进行论战，那我也许会感到不乐意：我并没有(甚至是适度地)要求以我为榜样，像我一样从丰富的图像学资料(法国南部地区教堂的炼狱灵台)出发，从15世纪炼狱形象的出现到20世纪初这些形象的消失，来追踪人们对彼世的描绘所出现的变化。这些变动只有在很长的时段中才能观察到。这类研究在今天已远不是独一无二的了，但它也许要求从另一种角度来考虑长时段在当时所取得的胜利。直到那时为止，我们已把这看成是扩大研究领域和探索新的研究层次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在这些新的研究层次中衡量历史时间的传统标准已变得不适宜了；这种解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化以使其变得更为基本和深刻。

5.2 研究手段方面的原因：有关资料的新概念

上述有关时间或历史时间的观念变化，总的说来，只是历史资料概念本身变化的产物吗?我们虽然没有必要重申，每个时代都创造了适合自己需要的资料，但对这个先决问题不能不

作一番考察；总之，在清扫了各种史学的研究领域后，这一问题能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综合的方式来评价史学到底在哪个层次上发生着变化。

人们可以略带天真地说，长时段的出现是新资料的发现和运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一些领域的探究遇到资料困难而产生的恶果，因为这些领域中的资料状况，迫使人们去建立一种跨时更长的编年史。这两种论断，一褒一贬，其实它们的对立只是表面上的。

从第一种观点来看，我们今天已拥有了在不久前还无法想象的有关长时段的系列资料。不管我们变得多么麻木，还是要对P·拉斯利特就英国非婚生育所建立的时跨4个多世纪（自1550年到今天）的曲线大加赞赏，非婚生育这远不是什么逸闻，而是说明了人们对家庭的态度。① 气候变化的曲线、人口学曲线、价格和生产曲线（这些已为人熟知）等，这些虽然有点东拉西扯，但就此我们能够看到所有涉及人类事务各个不同方面的一整套曲线。

一系列有关日常琐事、涉及无名群众生活延续性的各种新资料的发现，也许是这一史学革命的起源。谷物的市场价格表和旧时居民身份记录系列（包括洗礼、婚姻和葬礼等记录）最先被发掘和利用，并使史学家获得了种种理论原则，如像今天的系列史所运用的原理。但是，这些资料允许史学研究深入过去的程度由于受到技术的束缚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除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情况外，16世纪代表着一种界限，在这以前大部分的新领域都几乎无法深入；18世纪又代表着另一种界限，在这一世纪的前30年和19世纪的前30年之间，历史逐步转向了现代化，从18世纪的前30年开始，教区记录在各地都已普遍不全，

① P·拉斯利特，《我们已失去的一个世界》，1969年法文版。

19世纪的前30年，各个不同领域中的统计方法则已普遍化了。从上述这些资料出发，史学家们已作了既细致又平凡的研究。社会史的一系列创新领域已发现了有关长时段的许多新资料系列，例如，日益重视大量公证人材料（如契约、租约、遗嘱、财产清册等），在我看来只是事后才显得更为清晰的程序之一，这些程序有力地打破了传统界线：如从11—12世纪、或至少从14—18世纪末，乃至到当代（为什么不到当代呢？），遗嘱材料就给研究人们对死亡的社会行为和心态行为提供了完整而明确的研究基础。这样，在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与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之间就消除了相互不理解的顽固隔阂。双方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或许还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他们是在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

这些在长时段中可组织成系列的新书面资料的发现，是对以前显得毫无意义的大量沉睡着的无名文献进行重新估价的成果，但这些资料的发现既是重要的，又是有局限的。许多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一直到中世纪中期，财政文件常常填补着旧时居民身份状况记录的空缺（如对户数与田亩占有数的计算等，特别是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和意大利），同样，世俗法庭或教会法庭"可使用的"法律文件可使人们回溯性地追寻镇压和反抗之间辩证关系的长时段变动曲线。但这些资料及其使用上的局限也同时存在着，众所周知：在不存在书面文献资料的时候，对这些资料的价值认识就自然中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些资料来代替，这些资料的性质本身已要求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书面资料在这些资料面前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考古学，在历史人种学范围内的图像资料、甚至口头调查等则开始走红。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或群众心态的一系列不同领域，目前史学领地的整整一个部分都表现出一种固执的愿望：即通过昨天人们还认为是间

接迂回的手段来解决资料的空缺问题。房屋或居住场所考古学被引入到对物质文明的研究中；图像学系列资料被引入到心态史领域之中；对教堂或教区等宗教场所的财产清册或教会动产的分析，也被用作研究中世纪到近代乃至现代群众性宗教演变的资料基础。

为了不举例太多，我们这里有选择地说一下在当前法国各地及外国教堂财产清册中的还愿物，[①] 有关这种还愿物的资料构成了长时段的系列：在法国南方，现存最古老的形象还愿物可追溯到16世纪，最新的还愿物则今天还在产生着——无名大理石还愿牌并未取代传统的工艺。这是一种既丰富又贫乏的资料：它的丰富性在于我们利用这类资料能进行多种研究——它可用于物质文明史、服饰史、疾病史、死亡史、对家庭的态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它还可通过奇迹的发生、上帝恩惠的接受等信仰来间接研究人们的宗教感情。但是这一资料系列也有其贫乏之处，即难以确定其年代日期；人们只能在变化甚微的表象的长时段中观察还愿物资料的形象，以便对其作出大体上的年代划分。此外，这一资料系列主要反映的是延续性，而对革新则反映迟缓：例如，在整个古典时代，甚至19世纪，群众图片制作与销售业仍在复制那种“代表”15世纪祭坛后部装饰屏的、一成不变的圣徒像。在这里，时间的流逝是沉静的、悄声的，既不中断又不急转直下：这就是这些图像资料系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资料缺乏精确性（或者说因为它缺少书面资料所具有的清晰性），而且在于这些资料都更为直接地反映着客观存在于节奏缓慢时段中的慢速演进过程。在传统文明（如房屋文明或家具文明）中，研究对象的静止性符合图像资料的画面所

① 指人们过去许下愿后或感谢神意帮助在教堂中留下的信物，包括图画、雕塑、铭刻、物品等。——编译者

显示的静止性。那些图像资料所拥有的价值更有理由存在于口头资料之中，正是这一种非常特殊的时间，被一些历史学家（如菲利普·儒达尔）揭示了出来，这些历史学家通过以人种学方式的直接调查，根据一个特定的主题，把集体记忆的各种因素重新组织起来（儒达尔调查有关卡米扎尔战争的集体记忆①）。这种集体记忆虽然既不丰富，又带有创造性，常常在同一回忆中吸收一些不同事件，但却能使回忆富有与书面文化相联系的前后层次。尽管如此，口头调查却能使史学家接触到民俗学家、人种学家的时间观念，史学家不再拒绝接受这种与他的研究对象不相一致的时间，但他关心的是尽可能明确这种仍处于令人发怒的永恒中的时间，从而给这种对理解传统文明来说如此基本的时段盖上史学的印记。

根据不同的资料对时间作了上述解说后，人们对时间的印象仍是含糊的。就大部分创造历史的群众及其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部分而言，除了精确确定日期有技术上的困难外，还有其他的困难；在人们的印象中，已把握的一些节奏好像是一些不同的新旧交替运动。众所周知，从P·肖努和F·布罗代尔开始，法国历史学的一部分曾试图用系列史这一更受欢迎的概念来取代计量史学这一也许太"经济"化的表达方式。系列史的研究前提是按照时间把同一现象所提供的前后相继的形象组织起来，但并不一定要求这些形象的鲜明度必须是可测量的。这样，我们可以从要求豁免兵役这一现象中看到人们的家庭观念系列；根据还愿物看到人们的神创奇迹观念；根据祭坛后部装饰屏上的炼狱形象看到人们的彼世观念；根据法庭审判文件看到人们的违拗行为或镇压行为等。在不摒弃计量化的情形下，这一系列

① P·儒达尔：《卡米扎尔战争的传奇》，巴黎1977年版。

史的调查对于开辟心态史的新领域，同时在长时段中作新的探索来说，是很理想的。

通过上面这个新的例子，我们能对历史时间有一种新的解说吗？

5.3 长时段的时间

为了评价这一对历史时间所进行的新探讨，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的时间观将是很适宜的：传统的政治-军事史注重于事件的短时段：1610年或1815年等等。这一时间划分当然已不再有人愿意接受了(但当真是如此吗？)，它所涉及的只是人类历史的狭小肤浅表层罢了，真正的历史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是体现在别处的。例如，在用线性因果关系把历史事件简单地联系起来这一方面，经济史把时间波动划分为三个层次，这真是功德无量，它将历史时间分为：危机的短时段、周期间的中等时段、缓慢变动的长时段。这一划分在经济史领域中是可以实行的，但早在20年前布罗代尔就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可以希望在其他史学领域(从社会史开始)中也移植这种时间的划分模式呢？对此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者宁可说是有的，至少在实际上是有的：对于长时段历史的研究者们来说，这一时间模式似乎显得过于机械化了，从而也就用处不大了。

由此看来，我们所走的是一条研究时间多重性的道路，这就通向了如同阿尔杜塞所说的历史时间的“错综复杂”。经济史的时间、社会史的时间、心态结构史的时间等，这些时间的节奏快慢都互不相同……当E·拉布鲁斯说到有待于在心态领域内发现抗拒变化的历史时，他隐约想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时

间节奏，但他依然认为，从物质方面(或者说经济基础方面)的最初冲动开始，到保守的社会结构，最后进入心态的长时段囚牢，存在着一种逐渐由快到慢的唯一演变运动。这一解释十分明显地参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在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学圈子内已不再时髦了——在这一圈子中，人们会对陷于如同我们的美国朋友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中的想法一笑了之。人们最多(并不总是明显地)回到一种不那么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即人民大众的静止的或几乎静止的时间与"精英"的冲动的、变化的、创造性的时间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或许也是一种表面的层次，但这是一种有益的表层，是一种能反映出整个面包的表层，也是能揭示那运动着的历史的表层。我们可以说，目前法国年鉴派的大部分成员就体现着这一倾向，或许仅仅是分担着角色：其中一些(F·菲雷、D·里歇等)史学家研究精英时间的运动性，而另一些(如E·勒鲁瓦·拉迪里等)则研究人种历史学角度的静止性。

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时间就多元化了；时间的互相重叠是我们所提到历史时间"错综复杂"的另一个方面。只要看一下菲利普·阿里埃斯的《死亡史》就够了：如同我们所说屋顶上的瓦片排列一样，在这同一领域中，就存在着一些部分重叠在一起的不同时段。早在古代社会中就存在着的甘愿死亡的静止时段，即"非编年性的"时段，至今仍未结束，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经验中观察到这一甘愿死亡的表现；但其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在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如对"自我死亡"的自私意识，这一意识作用于所爱对象的升华(你的死)，以及随之而来的近代关于死亡的禁忌等，这一切都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宗教教派的环境、社会环境和个人状况而交错发生、演进。据此，我们自然会形成这样一种想法：在"交响乐式"的历史中各种时间是独立的，

这些最后得到揭示的不同节奏，或交织成一个严密协调一致的整体，或相反在它们的差异性中相互矛盾和对抗：这也许就是用一些显然超出狭窄经济领域的术语来重新表达的“行情”了。

对于当前的许多史学家来说，这一研究倾向仍然还是规则吗？人们将会说，我是在为与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联系的菲利普·阿里埃斯谋一席之地。阿里埃斯以其研究活动的新颖性和代表性而受到这种关注，这是当之无愧的。对于他来说，像群体对死亡的态度史这样一种重要的长时段史肯定是按照一种真正的独立性演进的：相对于人口压力、各种社会表象结构，甚至相对以意识形态为形式而出现的结构（宗教的、哲学的等），菲利普·阿里埃斯正是根据一种成熟于其自身内部辩证运动中的“群体无意识”的独立性，来研究长时段的演进的，从而使“群体无意识”这一现象有了其特定的节奏。

菲利普·阿里埃斯在这方面是一个极端的或特殊的例子吗？我并不认为如此。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所明确表达的观念在其他领域中往往还没有得到表达。但是，人们不难找到另外一些十分相似的论述（例如，在目前正日见兴旺的家庭史领域中）。历史人种学如同物质文明史一样，它们都难以在自己的时段中引入一种从史学角度看是短促的节奏，因而也都恨不得从中推断存在着一种很长的时段，一种也许是很特殊的时段……

我们不难看到，这一切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对最后的结局，我们可概括为这样两个相互有联系的主题：首先是研究干脆静止不动的历史；其次是探究史学中的变化及急剧转折的概念，简言之，即革命的观念。

第一种研究观点（我们不说第一个危险）是和费尔南·布罗代尔联系在一起的，确实，他撰写这类主题的史著，正好是在其他社会科学对史学压力最强的时候。皮埃尔·维拉曾亲身经

历过这一时期，且看他是怎样带着那么一点幽默而提到有关这一静止不动的历史的内部论战的："布罗代尔很愿意被别人所迷惑。这些创新是沿着他的研究方向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研究抗拒变化的历史。但是，他喜欢自己的历史学家职业。长时段，史学家当然很愿意考虑。如果不再有一点时间，他也只好消失了……"靠一种几乎是道德上的（我们不说是职业上的）反应，布罗代尔最终能驱除在他笔下表达出来的静止不动的时间这一观念吗？似乎不能。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E·勒鲁瓦·拉迪里从中得到的启示就可以了，拉迪里在法兰西学院首次上课所作的那篇纲领性演说（1975年）就是以《静止不动的历史》为题的。我们并不迫使这位研究朗格多克的史学家说出他想说的东西以外的东西：他笔下的历史也并不是完全静止的。他的书中有一个很长的静止期，也许是从14—18世纪初（即1720年左右）；但随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各种表现因素（如土地的利用、居处、生产、人口、物质的和心态的工具等）也都在毫无疑问地发展和变化着，此外，在非常漫长的几世纪的基本稳定性之中，也存在着很多围绕中等时段的变动，这些变动有时是缓慢的，但在通常情况下是突变性的，如人口的升降、家庭规模大小的变化或群众暴动的烈火等。但是，如果说勒鲁瓦·拉迪里把布罗代尔的"结构"概念作这样的调查，认为这"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非常缓慢"，如果说这是一个最后来拯救历史运动的折中办法的话，那他就完全不成其为这场游戏的主角人物了，在这场游戏中其他人走得更远。

像禁止乱伦这样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在如此漫长的时段中经久不衰，深入到一种真正的非时间性中，这些基本特点在如此遥远的、同样非时间性的起源中持之以恒；这些特点中是

否存在着一些历史的不变因素？布罗代尔已经从人种学角度出发在思考这一问题了。为了表达这些因素，人们富有挑战含义地使用一些诸如“聚合性”、“狂迷性”这样的词。关于“狂迷性”，在历史人类学家的指导下，人们将会感到这是确实存在的，也曾亲身遇见过的。如同克洛德·盖涅贝在他研究关于狂欢节的书籍中所说的那样：狂欢节所显示的是从史前到我们今天的逆反结构、隐藏在群众性纵情狂欢中的力量，人们重新使用和发掘一些如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或至少是和前基督教时代乡村异教等古老宗教一样古老的行为、形象及态度，来为相同的发泄精力活动服务。喧闹、狂人节、情人节的情人和熊皮高帽、滑稽可笑的舞蹈又使我们回到法兰多拉舞中，乃至人类的起源及彼世！拉伯雷确实也会这样说。这些多少世纪以来存在着而又通过民俗学家的话语而获得揭示的行为和神话残余，是否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行为或理解已失去了意义和其真实内容的形式结构的最秘密的钥匙了呢？我们且让那些现代的帕尼尔热①(Panurge)来致力于破译这些冻结在挪亚时代以前的响岛冰层中的话语或行动：有机会我们来加以利用就是了。如果他们经过旅行以后像帕尼尔热一样终于看到了“女预言家的洞穴”，那真是做了一桩大好事！

对于这一寻找起源或寻找稳定因素的努力来说，它的一个补充成份，特别是一种相反的趋势，如像我们早已提到的那样，那就是不仅对愚蠢、丑恶的事件，而且对所有激烈的“变动”（布罗代尔对这一表达提出异议也许是有道理的）重新提出疑问，人们不很清楚的是如何才能越出这一封闭的和参差不齐的结构：这一新史学有可能像其他史学不堪重负那样为运动问题所困

① 拉伯雷所著《巨人传》中的人物。

扰。在承认"一次危机"、"一次革命"这样的主题反映了对历史因果律的机械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是拉布鲁斯式的。拉布鲁斯式带着一种假作天真而让人们注意到，如果有10年期的危机，可没有10年期的革命）的情况下，对于一种并不简单地区分"庸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来说，便是希望连同洗澡水一起从此倒掉"革命"这一讨厌的婴儿。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有关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讨论会①上，人们当时可以通过一些讨论中的提问而自问：大革命是否真正存在过？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神话，根据传统解释，它构成了近代史上一次主要突变，把民族的前途分裂为两种，从而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遗产"（F·菲雷语）。读一下F·菲雷、D·里歇和他们的学生（如G·肖希南-诺加莱）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们已发展了对大革命这一现象的新解释：真正的革命在1789年以前就已发生了，这就是启蒙时代的革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刚开始现代化进程中联合成紧密一致的"精英"集团的革命，而这个事件本身，只是由于带有一种过时意识形态的平民大众不必要的和有复古倾向的干预，才破坏了原有历史的健康发展的前景。法国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就因此而发生变化（对于法国小农来说，这是一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氧气球）；因此，这一事件，或者说短时段的干预，如果不是毫无价值的话，至少是与本来历史所应当走的那条直线发展的道路不相协调的：这就是F·菲雷和D·里歇所提出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开倒车"论的含义，这一论点15年以来不断激起了论战。

我们并不想在此再次点燃论战之火：其他不那么引起争议的例子也有的是。不妨直接以高山地区为例，看一下1348年的

① 指1974年联邦德国哥廷根学术讨论会。

黑死病所造成的历史断裂。根据一种传统的解释，1348年的黑死病将中世纪分为两个部分：先是上升时期，随后是直至15世纪中的下降时期。然而，一种并不是古老的、在方法论方面则相当精细的史学，最终还是提高了事件这种外伤所引起的断裂的价值。米勒德·迈斯通过对14世纪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绘画所作的分析，仔细地分辨出这种外伤在群体心态中所留下的痕迹。① 从那以后，人们无须多说就知道黑死病的地位已大大降低了。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348年以前（常常是1315年甚至在13世纪末）；阻止了人口增长的，并不是黑死病，而是不断逼近的以前的各种瘟疫在起着作用；在意大利，有时甚至在别处，人口的回升也相当快，所谓中世纪末期人口大萧条是不存在的……但时至今日，由于精确性和细微的研究，黑死病竟不再存在了：在菲利普·阿里埃斯的著作中，黑死病像变魔术似地消失了，阿里埃斯不允许在他的非常漫长的时段模式中出现剧烈的突变，因此他就尽力来对付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弊多利少），以便就中世纪衰落时期对死亡的恐惧作出解释。

我们不是去重新揭示历史事件，而是在史学中确定短时段与长时段的新辩证关系，这样做难道不合适吗？

5.4 短时段与长时段的新辩证关系

我们已完全有理由指出，今天的史学研究远不是只有长时段研究一条路可走。在进行长时段研究的同时，还可以不断地对历史变动的急剧或渐进的形式进行探究：如果人们在这一

① M·迈斯：《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绘画》，纽约1964年版。

方面希望对各阶段进行分类的话，那么合适的方法将是从不止一处可以看到的、人们赋予事件的新角色出发进行研究。

当M·克律贝利埃在1965年圣克卢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上为事件进行辩护时，人们可以说这是通过歪曲基本特点来捍卫事件已失去的地位。① 当10年以后皮埃尔·诺拉在集体编写的《研究历史》这部著作中提出“事件的复归”时，这对于研究现时历史的史学家来说，是为了记录具体事件的力量和意义。这些事件迫使人们接受，毫无讨论余地，并无疑是由于传播媒介的夸张而畸形发展；然而这也是对观念力量的最好说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思想，这一观念深入群众中去后就会转化为物质现实。皮埃尔·诺拉为事件“恢复名誉”，虽然具有说服力，但从某种角度看仍有含糊不清之嫌。从表面上看，根据一种狭义的解释，这可以看作是就历史加速发展这一老题目进行研究所出现的一种变化：对于一个当代的时期（只要确定它的起点就够了），人们看到的是历史的运动性，是寓于各种事件中的历史的冲动性；而对于一系列以前的时代，人们看到的是历史的不动性和历史缓慢演进的长时段。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试想他们能同研究静止不动的历史的史学家（如E·勒鲁瓦·拉迪里认为，历史在经过4个世纪围绕一个基本稳定的层次而波动后，于1720年左右开始运动了）和人种学家取得一种妥协。对于人种学家瓦拉尼亚克和许多民俗学家来说，这种几乎是铁板一块的传统社会，只是在一个晚近的日期（如1870年或1914—1918年）才瓦解：具体把哪个日期作为分界线这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从此表明一个很古老的系统瓦解了。

我认为虽然达到这一阶段已很重要，但还应当更加深入一

① 参见《社会史——资料和方法》，巴黎1965年版，第35页。

步；我们可以明确指出，事件(为了避免所有的模糊不清之处，或者称之为“剧烈变动”)远不是当代研究的专利，过去20多年来，史学研究的整个系列都为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辩证关系、为事件与长时段的相互作用所吸引。几个例子说明着一些不同的研究程序，通过这些程序，这一问题史学才得以展开研究，并常常在一个回溯性的调查研究中寻找所提问题的答案。从研究结构开始，中间经过长时段，然后论及事件，这就是保罗·布瓦的有关《法国西部的农民》的那篇博士论文的研究程序；从研究事件开始，通过回溯性的历史研究的道路，再达到长时段，这就是M·阿居隆和我(有关死亡和节日)的研究程序。

保罗·布瓦的著作①于1960年问世，这一著作独辟蹊径，并在论证方面堪称典范，其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显示出来。从表面看，P·布瓦是恪守传统，从概述19世纪末法国西部一个省份——萨尔特——开始的。他在研究该区域时所分析的形势也毫无新奇可言：根据从A·西格弗里德著名的论著《西部法国政治形势表》中得到的观点，这一形势反映了一种社会学短时段的特征，这一短时段同时也是一种很长的时段，因为我们将这些结构性的现实理解为长时段的遗产，甚至是无年龄的决定论，这些结构性的现实包括：由树林和草地分隔而成的田地、分散的居处、教会和领主的双重统治等等。但是，作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很快使他认识到这一历史只是在表面上保持静止不动的。

当地存在着一条使农民分为两派的界限：白党或朱安党(保皇党)人在西部，东部则是共和党人。对于这一界限来说，上述各方面(田地、宗教人士和领主等)并没有提供什么实际有效的

---

① P·布瓦：《法国西部的农民》，巴黎1970年版。

解释，因此，作者从历史中寻找有效的解释，从而追溯到造成这一分裂的确切事件，即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两派从他们的结构（尤其是从他们的积极性和好斗性）看各不相同的农民在当时就已长期地确定了他们的集体选择。甚至在这一简单的介绍中，人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一典范性的研究在何种范围内具有丰富而又广泛的信息：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对长时段作调查研究的合理性，说明了对百年以上的过去作深入探究的合理性；正是从这一长时段的过去中导致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这种行为即使在导致其产生的条件消失时，依然靠着一种名副其实的惰性，苟延至今。这是有关"心态结构的惰性"档案中的重要一页。但反言之，或作为一种补充成份来说，短时段又重新具有了它的全部重要性：这个短时段就是初始创伤产生的时段，也就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突变时段，正是从这次革命突变开始，长期以来一部分人成为朱安党人，而另一些则成为雅各宾党人，至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我们现今的政治选举图还在使其持续化。那么到底是短时段重要，还是长时段更重要？如要作一并不是"资产阶级妥协"的仲裁，使每一方面都具有它自已的地位，那这种仲裁至少要把长时段诸形式中的一种排除在外，这就是古老的超时间性的决定论；同时，也需优先考虑和重视我们以及P·维拉所称"中等长度时段"的研究——这一表达并不要求高雅，但也许表达了这一史学家感到更有研究价值的时段。

也许P·布瓦并没有对他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疑问作出解答，这个疑问便是人们态度得以完成转变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已看到了人们行为转变的归宿点，我们还须追溯到它的出发点：在这两点之间是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记忆的活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菲利普·儒塔尔试图根据一系列书面资料和今天所作的直接口头调查，来理解根深蒂固的人的记

忆所经历的变化，他所研究的是另一个造成人们心灵创伤的事件，即塞文山脉的卡米扎尔战争；如果愿意通过另一头来考虑，他把资料和分析程序都颠倒一下，就涉及到一个类似的研究课题：但是，人们重新试图估量一个表示了主要转折时期的事件在时段中的重要性。保罗·布瓦从一个结构出发而碰到了事件，其他研究者则从事件出发而重新发现了一个结构，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在对东普罗旺斯地区进行的结构严密的研究中，莫里斯·阿居隆显然是从一个具体事例(1851年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为了保卫共和制而举行的起义)的研究入手的，也就是说是从19世纪上半叶法国南部"红色"与"白色"区域划分的意外出现开始研究的，这一划分后来一直延续了下来。作者对这些地区城市化的乡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调查，这使他从共和党人的秘密社团开始，追溯到他想研究的旧制度下社团组织的结构。在研究中，他分析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革命俱乐部，以期发现18世纪各种男性协会的密度，其中苦修士协会只是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但事实上，由于作者在他的《苦修士与法兰克共济会》那本重要著作中，已指出了18世纪下半叶普罗旺斯精英分子们如何摒弃了苦修士协会而团聚在更符合他们新要求的共济会中，这一表面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掩盖着事实上的运动。在这里，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辩证关系表现得特别丰富多样，这一辩证关系通过对长时段(中等长度的)的回溯性深入而揭示了一种缓慢的演进；在这里，不变性也许就只表现在这一"社会群体性"的特点上，作者既指出了这一特点的重要性，又揭示了它要明确依赖变动着的历史的局限性。①

我用以研究从古典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非基督教化现象

① M·阿居隆：《大革命后内普罗旺斯的社会生活》，巴黎1971年版；《旧时普罗旺斯的苦修士与法兰克共济会》，巴黎1968年版。

的程序并无另一种打算。最初的具体事实是共和2年非基督教运动引人注目的爆发，在法国东南部的1/4地区，这一现象的主要特点都得到了研究和区域定点：这一事件的类型不仅是"悲怆的"……而且是骇人听闻的，连所有的史学都不想去了解这一历史的污点。在大革命短时段的决定论（如认为是由一般的政策、政府的特派员或各种俱乐部在地方上的创新等才引起这一非基督教化）中，我们不足以找到对这一表现在地域上有着如此明显对比的、结构化的现象的解释；正是在一个广泛划定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启蒙时代的时段中，我才得以根据普罗旺斯数以千计的遗嘱这一宝贵而又丰富的说明性资料，追踪法国南部"巴罗克"的宗教性和宗教实践系统的演进，即先是达到顶峰，随后逐步解体，最终达到瓦解；我通过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当即把握了这个触动群体感情的转折点是在1750年左右。① 关于普罗旺斯地区的这种研究模式表明是可行的，它所缺少的是还没有同其他地区进行对照，以便进一步得到证实；后来，这一点也由于皮埃尔·肖努及其小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巴黎的死亡现象》——的问世而做到了。② 这一研究表明：巴罗克式豪华葬礼的行为系统于168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随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下降曲线；对巴黎地区的调查更为深入地表明这一巴罗克风气出现于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中期。这样，社会史学家和心态史学家在实际研究中所运用的结构概念就因此而失去了它的所有刻板性和严整性；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系列特点的汇合，也许正是这些特点组成了一个紧密一致的系统，但这一汇合是在平衡不断被重新打破的框架中，也就是在历史的变动中进行的。我担心

① M·伏维尔：《巴罗克虔诚和18世纪普罗旺斯地区的非基督教化》，巴黎1978年版。

② P·肖努：《16、17和18世纪巴黎的死亡现象》，巴黎1978年版。

通过我的研究而对联结短时段和长时段的这种辩证程序作另外的说明会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一种相似的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1750—1820年普罗旺斯地区节日的演变的，[①] 也就是说，是为了说明一种已有的、群体性的、丰富的和有生命力的、也是在文字出现以前就存在着的"民俗性的"节日系统，与大革命的、民族性的、国民性的、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历法的节日相汇合。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感染、相互共存或相互排斥？回答是两者有细微差异：大革命的节日特别是在局部地区为保留古老的和已在消失的节日这份遗产提供了机会，从而使狂欢节在共和2年举行的各种大型假面舞会中占了统治地位。我的结论和莫娜·奥祖夫在其《大革命的节日》[②]一书中所论述的毫无矛盾，远远没有矛盾：在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大革命的庆典仪式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神圣物，并受到人们的崇拜这一新的神圣物将支配着19世纪表达国民的和爱国的宗教感情的一系列形式。在这一争论点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反对，对此，F·布罗代尔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长时段的文章中就已明察秋毫，有所预见：转向急剧的变动、爆炸性的事件，但事件真有创造性吗？因为需要，他用一种激烈的词汇赞同并表达了就一种深层的和长时段的演进所作的总结，他难道对此还不满足吗？莫娜·奥祖夫所作的这类论述在一个具体方面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有什么比大革命的节日更不合适的、像歌词中的上帝这样"空前"和"绝后"的现象吗？然而，大革命的节日却继往开来，是所有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而又集中的表达。除作为催化剂或仅仅作为回声的事件以外，在热烈的气氛中是否有一种在瞬息中产生的创造性呢？我由此而想到当我

① M·伏维尔：《1750—1820年普罗旺斯地区节日的演变》，巴黎1976年版。

② M·奥祖夫：《1789—1799年的大革命节日》，巴黎1976年版。

介绍关于18世纪非基督教化长时段研究的第一批成果时，A·索布尔与我之间的争议：雅各宾主义史学家①以一系列大革命热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创造物为例来反驳我，这些创造物有：爱国圣人、自由烈士、马拉之死的连祷文等，所有这些表现即使持续时间并不长，但都比一时的好奇冲动更有价值。谁更有道理呢？当然，两人都没错。

但是为了对长、短时段辩证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作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请允许我在结束引用自己个人的研究领域之前，再提一下死亡史这一古老的知识，对于这一长时段的历史来说，死亡史倒真正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因为如果不是带太多刺耳的幽默话，死亡倒体现着一种理想的不变性……我在菲利普·阿里埃斯的书中看到这些没有冲突、没有变动的漫长演进图景时不免感到有些生气（当然是友好地，恕作者原谅！），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自己触及了上述问题所带来的基本困难之一；如同中世纪后期对死亡的恐惧这一事实已被一笔勾销那样，我们已没有权力对1580—1630年间的巴罗克式死亡感到不寒而栗，也不再注意到启蒙时代晚期黑色恐怖观念和坟墓诗的回潮；至于人们以反用法称之为“大好时光”的悲剧性转折时期，作者也只是有一天才提到，死亡恐惧成为一些德国和比利时艺术家的好奇对象，在象征主义和颓废时代，则成了依斯曼斯、蒙克、易卜生、达纽齐奥和托马斯·曼等人的好奇对象！对于我来说，我深深感到群体感受方面的这些大危机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危机并不是简单的文学艺术上的好奇，因而自然而然地使一种远不是静止不动的心态感受史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种猛烈的、阵发性的节奏。死亡在这里只是一个例子或只是总体中的一个因

① 指A·索布尔。——编译者

素；在最近的一篇综合性文章中，我提到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有点幼稚的问题：1750年左右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陈旧的问题(人们会说，传统文学史已回答了这一问题)，但也是一个通过系列史途径而有了新意的问题；只要看一下这一揽子反映令人高兴的差异性的曲线就知道了：非婚生率、婚前避孕的实行率、各种罪行上升率、图书发行的增长率、对弥撒与圣职授礼的要求增长率等。在1760年前后的法国，不仅只对于社会上层精英，对于其他人来说也同样是世界观已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我们童年的噪音变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快慢不一的节奏，会出现一些就广义而言的危机，这些危机并不是历史在现代所加速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总体讲是静止不动的历史的表层泡沫……在我看来应当重新界定这一长、短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意义。对于经济史学家(或人口史学家)来说，这种新的考查并无什么秘密之处，但在社会史和心态史领域中的研究者们却应当重视这一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受到阻碍的原因之一，难道不正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难以重新找到时间的协调一致性吗？

5.5 最终的问题：时间的协调一致性

说真的，我相信不久以后这一长、短时段的辩证关系问题就将时过境迁，或许成为历史的陈迹。它或许有可能作为某种雅各宾意志主义而载入史册，但作为我们时代的一种“修正主义”载入史册则也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一倾向曾试图驱除大革命的“古老”形象(按F·菲雷所说，这些形象是“意识形态的遗产”)：这其中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只有辩证的超越。

如果说这一对话有点像是风格练习的话，那么从我们上述的一些实例看来，它还是应该富有刺激性的，还是能够激起另一层次的一系列提问的。

在我看来，要在我稍嫌简单地命名为历史时间的"协调一致性"这一点上，或者说要在阿尔杜塞所说的"时间的错综复杂"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这将是很困难的。我像P·维拉一样深为阿尔杜塞的评语所触动，他的这个评语从表达方式上说是相当轻率的，然而从实质上说，在说明"实证"史学家的思考方式落后于形势方面又是顺理成章的。他说："史学家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但他们只满足于发现存在着漫长的、中等的和短的时段的时间，只满足于将历史运动看作是这些不同时段相汇合的产物，而不是决定这些时段的生产方式的产物……"①

史学家，尤其是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的这种谨慎说法，也许是应受指责的，造成这种谨慎的原因也许是：在目前历史科学的所有方面都在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如"从地窖到顶楼"的变化)，他们常常是禁锢在人们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长时段的)囚牢中，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里，机械的辩证法突出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唯命是从。这一由于史学新领域的发现而使历史时间复杂化、因而很容易被推翻的解释，也许是很容易作出的，因为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害怕去触及这个留给一些更为"内行的"专家去研究的、历史解释的"第三层次"。正是在这一史学研究的背景中，我们才高度评价E·拉布鲁斯于1965年所发出的英明号召，他敦请史学家对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心态史"的史学第三层次进行研究。也许在这一层次上，唯有保罗·布瓦的著作(《法国西部的农

① P·维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一种建设中的史学"，载《历史研究》第1卷，第187页。

民》)，或者说几乎只有布瓦的著作，提供了一种总体把握的实践经验。这一著作从社会、经济结构到群体态度，以及这些方面在时间中的辩证关系，对法国西部的农民作了总体研究。拉布鲁斯当时只能将这一关系定义为“抗拒”变动的和“惰性”的历史，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对那些互换关系所作的一种相当贫乏的解释，而这种互换关系是在像阿尔杜塞所说的生产方式“决定一切”的范围内进行的，有这种可能吗？

皮埃尔·维拉在此再一次提醒我们，马克思(比人们所介绍的更少教条主义！)是如何让史学家在把生产方式定义为“一种普遍的指南，是决定着由此产生的所有存在形式的比重的特殊媒介”时，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应当说这就在这一“决定一切”的框架中留出了自由选择的余地，同时也迫使史学家承担义务，作进一步说明和有所创造，重新认识那些按等级次序把不同层次联系起来的复杂关系。

诱惑就在这里：对于抗拒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细则的史学来说，如果人们几乎不再(在秘鲁的矿藏或太阳的黑子中)寻找另一种指导史学研究的普遍适用的方法，那么长时段能够成为一种捷径，但是，既然这一长时段能具有历史时间的多重性(或特殊性)，在这一时间中每一种历史学都能随心所欲，那么它也许会在一种静止不动的历史中或一种越来越少历史学气息的人种学中陷入困境。这是令人陶醉的诱惑：这是疯人之舟。菲利普·阿里埃斯是根据一种无法用其他方法来确定的“群体无意识”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来使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在气垫上演变的……

请放心！我并不希望用这种贫乏的框架内的丰富所具有的某种“伟大包容性”来取代这一疯人之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皮埃尔·肖努(我如此不合情理地以他为例，还望谅解)，当他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的长时段的演进假设为一种“平均寿命

的衍生物"时，他就确实使一个联结幻觉的惰性和创造性的更为复杂的现象简化到一种过于纯粹人口学化的方面去了。但在这一揽子的历史时间中，在这一揽子的现在已摆到我们面前的长时段系列中，我认为解决的方法是使各方面相关、相比较、划分层次和等级……从这一点来说，长时段这一方法论进步的客观成果，就将既不是一种诱饵，也不是一种障眼法或一种退却，而是一种表明对历史时间进一步把握的手段。

此外，现在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值得我们悲观：我们已经说过，自从费尔南·布罗代尔这篇文章发表至今，结构主义的渗入已经发生，而史学并未因此走上绝路。况且，这篇文章所反映的对史学依附于其他人文科学的忧虑，在今天已为史学事实上的自信所取代。"长时段"这一概念虽然目前还未被真正完全掌握；但我们已经试图对其各个含糊的方面进行研究分析；长时段意识也许对于真正把握史学领域的特殊性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心态史学

菲利普·阿里埃斯

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 1914—1984年)是一位业余史学家的典型。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历史，但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家庭因素是主要的)并未进入学术界，而是成了一名商人。尽管如此，阿里埃斯对自己的专业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坚持业余研究，并以其著作对法国史学界及史学潮流的演进起着很重要的影响。鉴于他的出色工作，阿里埃斯曾被许多出版社、学术机构邀请担任各种职务。1978年，他被选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主任。

菲利普·阿里埃斯主要研究中世纪后期与近代史，人口社会史、家庭史、心态史是他所先后耕耘过的几个领域，一些法国史学家认为他是这些领域的开创者、先驱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18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史及法国人对生活的态度》(1948年)、《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及人们的家庭生活》(1960年)、《人面对死亡》(1977年)等。他的著述不算很多，但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激起讨论并对西方史学演进有很大影响。他的著作在英美史学界也很受重视。——编译者

我在这里先凭记忆引用吕西安·费弗尔曾叙述过的一个故事。我并没去核对原文，因为留在我记忆中的这个故事是否走样，是否简单化等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它清楚地应用了心态这个难以说明的概念……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离开他情妇的床第悄悄回到他的城堡中去。当他经过一所教堂时，正好晨祷钟响。他因此心有所感，于是停下来，转而去参加弥撒并虔诚地向上帝祈祷。

今天的人们一定会对罪恶的情欲和纯朴的虔诚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感到惊讶，他们可能在这样两种解释中作出选择。

第一种解释：教堂圣地的钟声唤起了国王内心对罪恶的忏悔情感，于是他祈祷，请求上帝宽恕他刚犯下的错误。如果他不是伪君子的话，那他决不可能在夜间是罪人而到早晨却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像今天的人，或至少是像稍有理性的人一样行动，像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或对弗洛伊德持怀疑态度的人，像重罪法庭的陪审员或大法官那样去行动。他深信，道德的一致性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没有这种道德一致性的人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会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道德一致性这一正常状态是一种不变的价值；人类的本性在某种深刻的和普遍的层次上是不变的。这种解释是传统的史学家们所作的解释，他们希望在所有的时代，在所有文化或至少是文明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中看到相同感情的不变性。

第二种解释是心态史学家的解释。国王对祈祷和爱情的态

度都既出于本能又出于天真的真诚，他并没有感到其中的矛盾。他是怀着同样纯洁而清白的激情进入教堂或上了他情妇的床。他那祈祷的真诚性并不因为他在私生活上的不检点而逊色。对私生活进行忏悔的时刻尚未来到。

在今天，认为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情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说法，已不再为公众舆论所接受。尽管有人试图通过精神分析法使人接受这一说法，但甚至当舆论似乎考虑到这一说法时，舆论对这一说法仍嗤之以鼻。而在过去，这一现象则显得非常自然。现在和过去的这种不同，不仅仅涉及一种感性的、迷信的基督教与一种在道德方面要求更为严格的、更为理性化也更为严密的基督教之间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性还有其更深的原因：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尽管是这种差异性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它的原因。

吕西安·费弗尔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明原先可以并存的态度后来怎样变得互不相容。法兰西斯一世国王的姐姐，那瓦尔的玛格丽特可以没有过多的顾忌既写了《七日谈》这本放荡的故事集，又写了《罪人灵魂的镜子》这本宗教诗集。我们现时的道德也不能容忍这部天真的杂集和这种善意。

因此，一些事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一种特定文化中是可理解、可接受的，而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化中就不再是如此的了。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不能像16世纪的这两位王室人物那样，抱着同样的善意和同样的任性态度来立身行事，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发生了心态的变化。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道德标准不同了，而是说对这些准则的基本反映已有差异。自吕西安·费弗尔以来我们对"心态"一词的理解大体上就是这样。

6.1 心态史的诞生和发展

6.1.1 一种新史学的先驱者

这里我们借助吕西安·费弗尔著作中所举的例子提到心态这一概念。事实上，心态史已不再是一门新的学科了。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形成的一个学术团体中，其中有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地理学家A·德芒戎；社会学家L·列维-布律尔、M·阿尔伯瓦克等。从1929年起，这一团体创办了著名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因此人们常常将这一团体称为"年鉴学派"。然而，即使年鉴学派组织得较好、战斗力最强，它也不是唯一的创新者。还应提到一些独自为战的人物，他们同样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杰出的荷兰史学家赫伊津加；一些长期默默无闻的作者，如德国人诺尔贝·艾利亚，他的开创性著作[1]初版于1939年，但由于战争的爆发而被湮没，现在则重新被人们发现；还有一些学者，他们与心态史的关系并未马上显示出来，其研究一时也没有为人所称道，如专门研究魔鬼、病态文学的文学史家马里约·帕拉兹，他的主要著作于1920年以意大利文出版，1977年译成法文，书中对于文学表达与群体想象之间交流的描绘、分析很精彩。

所有这些作者，不管是属于年鉴学派的，还是年鉴学派外的、处于边缘状态的，都承认历史有其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与原先的方面不同，原先史学研究的仅仅是指导政治决策、观念传播、人的行为和事件进程的有意识的、主动的行动。

① N·艾利亚:《习俗的文明》，巴黎1976年版;《宫廷社会》，巴黎1977年版。

例如，赫伊津加认为，想象、情感、游戏、不趋利等领域与经济领域同样重要。在《中世纪的衰落》一书中，他曾明确地谈到这一点："文明史应当像重视人口、税收数字即人口和经济史一样，重视对美的梦幻和浪漫的幻想。"他又说："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幻想具有一种真理的价值。"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应，雅克·勒高夫在50多年后的今天，在他那《研究另外一种中世纪》(1978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到："要给中世纪想象史的研究以一些坚实的基础。"

赫伊津加、M·帕拉兹、N·艾利亚等著名而杰出的人物，没有打破传统史学的壁垒而形成一个学派。而斯特拉斯堡的"年鉴学派"集团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6.1.2 以费弗尔和布洛赫为核心的年鉴学派第一代人物

在心态史创立者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在上面下过定义的心态史实际上只是一种比人们称之为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更广泛的历史的一个方面。当时人们已经提出了关于历史的总体研究的要求，但这一总体性还只是通过经济史或在经济史研究中才得以体现。这种总体史学同政治史、事件史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史学只是在"社会史"这一名称下，才闻名于英、美，并在那里得到反响。这样，就有了两种史学，即：传统史学和包括经济史和文化史在内的，以后被称为心态史的社会史学。

传统史学所注意的几乎只是个人、社会上的最高阶层人物及其精英(国王、政治家、大革命家等)和事件(战争、革命等)，或由这些精英控制的制度(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社会史则相反，它感兴趣的是与权力无缘的社会大众，是受制于这些权力的人。而且，这一研究方向并不是用来指导研究过去，它

同样刺激着一些对现状进行研究的新学科，因为这些学科的诞生同样是出于对被统治的、被历代上层人物所忽视的、至今仍难以名之的群体性的现象感兴趣。但是，人们日益趋向于在这些现象中找到真正的力量。在法语中这些学科被称作为人文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还有历时已久的老大哥——古老的经济学。在英语中所有这些学科都统称为“社会科学”。在法国，古老的经济学与其他年轻的学科之间的分离在史学方面的表现是：30年代《年鉴》杂志的名称是《经济、社会史年鉴》。经济、社会这两方面的区别肯定是一目了然的，我们通过费弗尔对法兰西斯一世和那瓦尔的玛格丽特这两个事例的分析，可见他对心态的心理现象是相当熟悉的。马克·布洛赫也同样如此，他对创造奇迹的国王所进行的研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在第一代年鉴学派时期，心态这一领域还未与经济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很好地区分开来。总体史或人们所认为的总体史是由这两个领域组成的。

在经济史经过50年来不断专业化、数学化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不太了解经济史在当时怎么能与心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两者都是卑贱者和社会群体的历史。经济现象（价格、工资、税收、贷款、市场）反映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昂贵、贫困或富足、饥馑、瘟疫、死亡率等）。人们发现这些现象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反映这些现象的数字化的材料系列使人们可以如实地看到日常生活，而非轶事趣闻。就是这个原因，使经济史与心理史在当时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史从一开始就被年鉴学派所提倡，因为它是第一种研究群体现象的科学历史。人们反对描述个人的不连续的历史，反对描述由这些个人所引起的事件史，反对描述受这些个人控制的制度的历史，而代之以另一种既是群体的又是连续的历史，

一种建立在不间断的长时段发展中的历史，一种无以名之的人类群体的历史（然而我们大家都能认识到自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6.1.3 第二代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创始人如果活到今天，也许已有百岁高龄了。第二代年鉴学派的年龄现在也60挂零了。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在年鉴学派遗产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些遗产。M·布洛赫和L·费弗尔当时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即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出发对社会所作的研究，在第二代中已黯然失色。这个属于心态的领域已留待少数探险者去继续开拓了。

而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哪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对在美国等地很流行的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后备的，可以由数学模式来确定的领域这一趋势十分厌恶。在美国的大学里，经济史属于"经济系"而不属于"历史系"。

第二代年鉴学派注重经济史可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及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解释。30年代，法国还生活在一种缓慢的节奏之中，旧制度末期的很多陈规陋习依然存在。此外，它仗着自己的殖民帝国，形成了一个完整和封闭的世界，给人以一种异国情趣和无所不在的幻觉，而在今天看来它像是一个避风港，可以避免全球性的激烈动荡带来的影响。但受到

世界大战的震撼后，法国向国际性潮流敞开了自己的大门，经济繁荣、需求与消费的迅速增长、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都使法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代的"长城"倒塌了。年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经济力量所吸引，这些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上述巨大变更的原动力。史学家们也理所当然地试图从对现实的兴趣转向对过去的研究，并且试图找出正在吸引着他们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或迟缓)的起源。心态现象过于强调回溯过去的古老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既不那么重要，研究起来又很困难；这些现象又很少科学性，难以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处理。

然而正像法国传统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史的一个变形将心态现象重新纳入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中，这一变形就是人口史。

对经济史的研究，最初的方法之一是分地区进行专题研究，我们后面将讲到这一点。然而对地区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们很快就将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用于研究人口运动了，他们详细研究人口和生存资料、饥馑和流行病之间的关系。雅克·迪巴基耶写道："这些开创性研究始于1946年，当时最早的几期《人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便是新近去世的J·默伏瑞的'生存资料危机和法国旧制度人口学研究'。"① J·默伏瑞便是第二代年鉴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可被当作典型来剖析。他在广大的知识界并不很著名，因为他生前只发表了一些可与鸿篇巨制媲美的、言简意赅的生动文章，他那部经过反复思考才动手撰写的重要著作只是在他死后才问世的。通过文章，尤其是通过亲口教诲，默伏瑞对今天已成为著名人物的当时一批法国和外国年轻史学家有很大影响。他的一篇最著名的，也就是J·迪巴基耶上面提及的文章，论述的是饥馑和流行病、经济局势和人口死亡率

① J·迪巴基耶：《历史人口学导论》，巴黎版。

之间的关系。此外，J·默伏瑞还非常注意不使社会经济和人口现象脱离文化背景。

在1944—1956年这同一时期里，J·默伏瑞的学生P·古贝尔正在撰写著名论文《博韦和1600—1730年的博韦人》。此书原来被认为是对“17世纪法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但后来却成了人口史的模式。P·古贝尔的这本书开创了一种体裁，从而在他以后涌现了大量同类杰作。这是50年代这一代人对历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人口史不仅重新复活了年鉴学派创始人的那部分已冻结了的遗产，还使一种新的心态史从文学传统的轶闻趣事般的印象主义中脱胎而出，并使其具有统计资料的基础，最后还使心态史能对各种现象作非经济学的、更为广泛的解释。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在40年代，我也同样为人口学所吸引，但并不是通过经济学，而是因为我深深地被20世纪初期法国的人口形势以及它与旧制度时期法国人口形势的差异所打动。怎样解释这一如此引人注目的变化呢？例如，在英国，这一变化的进程就与法国不同。当然，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不同于研究经济的史学家，我对严格意义上的人口学、对人口变动的机制以及人口变动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太感兴趣，而是对人口学向那些善于读懂这些数字的人所揭示的隐秘心理状态更为关注。我确实是从人口学材料出发的，但是不久我就把这些材料弃置一边(也许是过早了一点)，进而对这些材料所掩盖的现实加以研究。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过去人们不喜欢谈论，甚至他们常常对之并没有意识。在长时段中形成的数字系列使人们的行为模式表现了出来，而这些模式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把握的，是很隐蔽的。因此，心态问题的研究就出在人口统计分析之后。

我的这一经验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一代的人口史学家几乎都有同样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停留在对过去人口进行重新组合统计的局限之中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对材料进行了分析之后，就会遇到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作出心理学的、人类学的解释，这在过去是留待医生、伦理学家、法学家或那些研究非书面文献领域的人去解决的，对于这一没有书面文献资料的领域，史学家一直无意进入，这也许是因为史学家们认为人口学所测定的现象过于接近自然、过于接近生物学的研究领域的缘故。在研究的最初阶段，人们确实特别注重分析人口对生存资料和经济状态的适应关系。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一适应关系既非自动的，也非立即产生的，在人口学行为和生存资源之间还有一个选择系统，这一系统改变着真实的形象：这就是心态系统。这样，心态史就由于历史人口学而获得了复兴。

6.1.4 第三代史学家？

在60年代，心态史的重新出现彻底改变了法国历史学。这件事意义重大。许多重要杂志(即使是最保守的杂志）的栏目、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题目都朝这个方向转变。在70年代，人们发现社会经济主题锐减，十几年前的人口学主题相对失去了吸引力，与此相反，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或很少为人选用的主题却在研究中大量涌入。1973年，历史人口学协会在其刊物上出版一期专辑《儿童与社会》。1972年《年鉴》杂志也出版过一期有关家庭研究的专辑，篇长433页，致使还有三篇重要论文只好放在下一期杂志刊登。此外，论述死亡、性、犯罪、社交、年龄阶层、噪音、群众狂热的文章更不知有多少！以前，公证文件保管处只是研究艺术史或国家机构的学者常去寻找一些传记资料的地方，一些社会

经济史学家也去那里寻找关于分割财产情况的材料，而现在那里的材料，尤其是遗嘱，已成为研究宗教心态的一种材料，M·伏维尔、P·肖努和他们的学生便借此作出大量研究。在我看来，历史学的这一重大的、最新的变化却似乎没有引起一位既仔细又敏感的观察家的注意，这位观察家便是L·斯通。他在最近的研究中①指出，年鉴学派是一个封闭的集团，自创建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过，它的机体已被流逝的时光销蚀，它的老一套东西已使人厌倦。不！今天的年鉴学派已非昔日的年鉴学派；而且，心态史也只有在现在才成为我们当代文化的一个富有特征的现象。心态史学已超越了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系统，这一类史书在它所赢得的广大读者中销售量很大。大家将这一史学通俗地称为"新史学"，这是什么原因难道还不清楚吗？

内行的读者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在对心态史起源的分析中，我没有给人文科学的影响以足够的地位。然而，我认为人们习惯于将这些影响看作是决定性的，这在一开始是很有益的，但现在也许就毫无意义了，如同我对上面所引的L·斯通那篇文章所作的解释那样。当然，社会学与人种学对L·费弗尔也许特别是对马克·布洛赫的《能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有过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表现在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开阔了他们的思考范围，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等方面。因为，19世纪末的史学家，如同那一时代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直相信我们那种与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主义一脉相承的文明是无比优越的，也都相信把它与原始文化相比是一件荒谬的事。而人种学的认识却至少打破了这一偏见。然而，在法国，人种学家的影响对于史学家的工作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它不像在美国；在那里的大

① 见L·斯通的文章，载《史学的特征》，主编为C·F·戴尔齐尔，美国1977年版。

学中，“社会”史学家如果不去参考其他社会科学，并按史学资料的需要从中选择一种模式的话，是不会去进行史学研究的。

1946年，《年鉴》杂志更名，希望成为一种包括历史学在内、以史学家为首的社会科学杂志。① 然而，正如上面曾指出的那样，《年鉴》杂志在宣称扩大研究领域的同时，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确实，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史学自称是由《年鉴》杂志的新计划推动起来的所有社会(或人文)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但在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内，以前的大思想家和今天的大理论家直接影响着史学家，并马上被史学家们所效法。除此之外，50年代还有大量相互并列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各学科相互交流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不同领域本身的研究结果。

这样，人们所能揭示的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一些相互影响，并不能解释法国当时历史学变化的广度。实际上，这一变化是与新一代研究者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区分老一代与新一代研究者有一个年龄标准：以50岁为界限，但某些先锋人物则超出了几岁。

如同其他知识活动一样，史学研究无法摆脱席卷西方世界的主要文化潮流的影响。60年代末的20—25岁的青年，他们已开始用一种不同于他们长辈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们对经济增长及其带来的好处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外，以前的史学家有这样一种趋势：他们在历史中寻找一些导致或预示以后现代化的因素，并突出这些因素。现代化也被看作是人类启蒙时代的进步演进的目的和结果。

然而，在20世纪末叶的今天，我们也许看到这个启蒙时代的结束，或起码看到了认为科学和技术进步是不可逆转并必定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鉴》杂志曾多次更名，直到1946年。

带来益处这一信仰的破产。当然，这并不是说进步终止了，而是说对进步的迷信，对进步的信仰结束了，也许这仅仅是对一种发展过于迅速或过于剧烈的工业化所作的一时反应。这种对进步提出的批评依然成为今天舆论界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意义深远的一个主题；反动的右翼人士已一改初衷，不再作这样的批评，但左翼人士，或者说界限模糊、条理不清但很凶猛的左翼理论却继而对这种进步进行抨击。我相信(这是一个假设)，在60年代对发展、进步和现代化所持的迟疑态度和青年史学家对前工业社会及其心态的研究之间有着一种联系。这些史学家已不再承认历史有一种意义，也就是说不再承认历史有一种方向。他们不再认为昔日社会是一种循序发展过程中的演进阶段，以致对历史所受各种影响的历时性，以及对这些影响所作的系统研究持怀疑态度。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几乎已经脱离了史学范围，从而以一种结构主义人种学家观察他们所选择的社会的方式来评价文化。

一件奇怪的事是，当史学家试图研究共时性时，其他人文科学却常常离开这一共时性的研究，力求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建立其研究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阻隔最终开始逐步缩小了；在正式宣称跨学科研究（但又从未真正实现过）的50年后，这一目标在最近才真正有所实现。

我们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米歇尔·福科在打破学科界限这一方面作了极好的榜样。他是一个哲学家，但他从哲学转到史学，并没有经过心理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炼狱”，而这些学科是他那一代哲学家(临时的)避难所。他本来能够像其他玄学家或社会科学专家一样，将他的研究置于共时性或非时间性之中，建立一个超越时间的，在一种特意安排的、与日常生活经验无关的时段之中的概念体系。但相反，他却愿意使自己的著作成为一

种历史：这是一种分析近代政权与知识相混合的时代的历史，是一种研究17世纪末以来近代政权如何像血液流遍全身一样向社会渗透的历史。史学家的经验主义使这位哲学家（事实上他还依然是哲学家）摆脱了体系(也许就是哲学的体系)的单义性，使他把握了人们所采取的策略之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以及这一无法回避的多样性的深刻含义。M·福科从哲学家开始，通过自身的思想运动成为了一个史学家，但他仍然是一个哲学家，其原因与那些今天承担使心态史深入人心这一重任的原因并无多大区别。

因此，我们开始这样设想：人类今天向某种特定史学所要求的，正是人们过去一直向形而上学所要求的，也正是人们仅仅在昨天才向人文科学各学科所要求的：这是一种恢复哲学反思命题的历史学，但这一历史学要将这些命题置于历史时段之中，置于人类事业执著顽强的重新开创之中。

6.2 心态的概念

尽管近来有关共时性的研究有着颇大的吸引力，尽管人们对历史“单线性发展说”持不信任态度，但心态史对更好地理解历史向现代过渡的问题，一般而言，还是表现出了一种持久的兴趣。这里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6.2.1 税收的例子

我在这方面首先要举的例子源自心态史大师G·迪比最近写的一本著作中。迪比在此书中研究了今天被放在经济领域中

加以研究的征税或交换对当时的人具有什么意义。① 他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章名："心态"。这一章要论述的就是我们所称的税收。迪比将税收比作马尔塞勒·摩斯和社会学家研究过的"原始"社会中的馈赠：人们是将税收作为馈赠"奉献"给统治者的，人们把这些统治者看作是全体人民和非尘世力量之间的调节人、求情人，是繁荣的保证；土地的肥沃，庄稼的丰收，瘟疫的结束，全凭他们的允诺。这就是中世纪早期的情况。但在12世纪，虽然这一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但还是与近代或当代市场经济有很大区别："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实际上如同对于他们更久远的祖先来说一样……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这都是些转瞬即逝的现象。真正实在的结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这样，就在死亡的彼世和此岸之间建立了一个广泛、复杂的交换体系，这一体系通过遗嘱途径而达到了对财产的重新分配，甚至可最终导致财产的毁灭。这一体系使今天的人们感到难以理解，唯有改变习惯，重新构建当时的心态的严密体系，今天的人们才能够理解这一体系。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有一种无谓和疯狂的挥霍习惯。在节日期间，穷人们大肆挥霍着他们那点微薄的钱财和富人们慷慨的施舍物，G·迪比对此这样说道："在这个如此贫穷的世界里，最卑贱的劳动者也不会忽略节日；在普遍的贫困状态中，由于对财富的短暂而愉快的集体消耗，节日在人们中间周期性地重新产生着友爱，也使人们强行得到平时那些看不到的力量的恩惠。"

6.2.2 时间的例子

如要使我们今天的现代经济及其条件得以产生，应当在技

① G·迪比：《战士与农民》，巴黎1973年版。

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之前首先转变人们对待财富和享受的态度，现代经济的存在条件包括：注意节约、为了前途而自愿节制享受、用收入来重新投资、资本积累、劳动分工等。心态的变化贯穿着整个中世纪，J·勒高夫在题为“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①这篇杰出的文章中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另一方面——时间观念。教会时间是由教堂的钟声来划分的，钟声召唤着教士们到弥撒合唱团来，唱起“日课祈祷”之歌。这一时间按照我们的惯例来说是不规则的：按照古罗马的方式，白天每隔3小时为一段落；夜晚处于祈祷和休息之间，分为三段：晚祷、午夜晨祷和晨曦初起的赞美诗。

然而，时间的这种划分法已经固定化了，已经使农民的劳动日具有某种规律性，尽管这种劳动日的长短并不精确按照太阳的出没来划分。僧侣的时间与农民的时间虽然并不完全相同，却还是和谐的。但随着J·勒高夫提出了“商人的时间”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商人的时间同样也是“工作的时间”。它开始借助于教堂的钟声，然而这是一种工作的钟声；“他们(指亚眠的工人们)把钟挂在钟架上”，“在朝阳初升出工时，在应当去吃饭以及饭后再去工作时”，“就去敲钟……”但接着就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而又引人注目的变化。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的度量习惯更保守、更固执不化的了。工人的时间在一开始也是仿照教堂时间的，也就是说按照神课的钟点的。神课始于早晨6点钟左右的早祷，结束于下午3点钟左右的午祷。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这也是古罗马的集市或公共浴池的开放时间，总之，这是一种“连续的工作日”。但是在13世纪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无论对于商人、雇佣者还是工人，这一时间已不再适合他们的

① J·勒高夫，“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载《研究另一个中世纪》，巴黎1978年版。

需要了；另一方面，人们还没有想到可以创立一种更适用的时间（这种时间是在后来才由机械钟的发明与使用而逐步形成）。这样，教堂的时间就通过一种妥协而悄悄地作了些调整，以便适合劳动者的时间。J·勒高夫写道："我们注意到从10到13世纪末，昼夜的时间划分因素有了变化；午祷原先在我们现在的下午2点左右，后来逐渐往前移，最后就固定在中午12点左右（英语中的noon〔中午〕一词就是从拉丁语none〔午祷〕一词演变来的）。"勒高夫继续写道："在按照教堂钟声即教会时间作息的城市地区，午祷是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象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通过改变午祷的时间而创造性地对劳动时间作了进一步的重要划分：一天可分作两个半天。这种划分方法在14世纪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我们的近代时间划分就这样出现了：白天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部分，以长期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午餐为界。这个例子表面上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所有涉及人们生存状况的最普通、最平凡之处，都表现着心态的基本特点。时间观念便是能说明我们称之为"心态"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例子，这一例子出现在中世纪后期心态发生变化的时期，是很有意义的。

6.2.3 魔鬼观念的例子

正是在有关巫术魔法方面，吕西安·费弗尔在发表于1948年的《年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极有力地表达了这位史学家对心态差异性的感触："在心态的深层结构上，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最有知识、最有教养的人（如大法官等）与我们现时这样的人相比，应当有本质的差异。"对于这种把两者明确对立起来的观点，我个人一直是赞同的。但这种观点会使今天年轻一代心

态史学家感到不高兴(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们倾向于用一种对心态更复杂更充满矛盾的微观变化的研究，取代对心态走向现代化宏观变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心态的微观变化延续时间更长，而且如何向现代化过渡还值得怀疑，从而有可能延缓。

R·芒德鲁的《历史心理学的研究》用词审慎风格高雅，一直是心态研究的典范之作(他对"心态"一词用得很少，当他在无法回避时便喜欢用"心理结构"一词来代替"心态")。

这里就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在17世纪初期，对巫术魔法的追究仍然是世俗法律机构的重要任务……，这个由尽可能受到教育的人(但还不是"知识渊博"的人)组成的强大机构毫不犹豫地(除了少数例外)追捕这些魔鬼的帮凶，追捕这些威胁着人们获得上帝解救、策划可怕的堕落阴谋的人……到了17世纪末，各地的最高法院都已放弃了这一类诉讼，只受理一些指控神甫亵渎神职、骗子欺世盗名和假善男信女的案件，以及利用公众的轻信，故作虔诚的行骗者等。一种牢固地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延续的习惯基础之上的法律原则，是如何成了问题，遭人非议，在几十年中最终被抛弃的呢？这个问题值得一提……这里提到的正是法官(以及被告)们的整个心态世界，因为魔鬼及其帮凶们在日常犯下的罪行证明尘世间有魔鬼出现……透过这些诉讼程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涉及并最终受到质疑的，是他们对某个人、上帝和魔鬼对自然和其他人行使的权力所形成的全部观念。(……)一句话，不再追究巫术魔法的罪行反映了一种心态结构的解体，这一心态结构曾在好几个世纪里是划分这种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芒德鲁对历时一个世纪的这种漫长变化进行了分析，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年代程序及其发展阶段还可以讨论，但其大体方向还是毋庸置疑的。此后，他谈到了我们所称的心态现代化问

题。他说："心态结构根深蒂固，是由源远流长的对世界的看法构成的，并且得到某些社会集团甚至整个社会的承认，现在，人们对就这种结构进行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提出疑问，这不仅是因为科学有了进步，人们为在18世纪中各门科学发现的真理感到欢欣鼓舞，也不是因为每个大哲学家都为概念问题上的争论作出了贡献，而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更为广泛了。""重要的变化"表现如下："上帝和魔鬼不再每日每时干预事物的自然进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进一步思考之后发现，事实上不是上帝（正如塞尔日·勃内神父在《今天法国人的暗中祷告》（1976年）一书中所证明的那样），而通常是魔鬼、痛苦和恶运，已开始退却；今天，人们在逐渐消灭肉体上的痛苦，逐渐消灭疾病、苦难、直至死亡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这一退却还在继续。

6.2.4 避孕的例子

我列举的这最后一个例子取之于人口史。这一例子很好地表明，在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史学家是如何开始以不同于经济学家或人口学家的方式来解释经济或人口资料的。它也指明严格意义上的人口史向心态史的转化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有论述。我的这个例子讲的是避孕史。

我们知道，在18世纪以前，传统社会的人口变动状况一直呈锯齿型，从这种变动状况中可以看到一系列周而复始的时期：有因饥馑、流行病而引起的高死亡率时期，也有因持续高出生率而导致的人口快速回升时期。

当时的人口调节措施只有推迟结婚年龄、妇女不在哺乳期间怀孕等。尽管如此，当时的怀孕数字仍然是很高的，从而威胁着母亲的健康和生命（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外，除通过流产、禁

欲和杀婴外，还可用其他方法来阻止人口增长，这是很诱人的。

然而，似乎夫妇们从未真正认真考虑过如何在性行为方面想想办法，防止生育。也许人们已经知道避孕技术，宗教忏悔条规、忏悔神父手册、道德规范中对此都有记载。但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去运用这些技术。然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些技术至少在法国获得了广泛传播，并达到了全面改变人口运动和改变年龄结构的程度；我们分析人口统计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技术的实施和流行。那么人们是如何使一种旧的人口状况转变为一种新的人口状况的呢？这里有两种回答。

一些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首先考虑到的是心态的变化。即使人们对性行为的二分法已有模糊的认识，但这种二分法还是要求有预测能力和自控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过去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到了19世纪才成为现实。另外一些史学家则相反，他们利用宗教界人士对避孕提出的谴责，以支持这一论点，即人们对避孕的做法比对人们愿意承认的其他做法更熟悉；避孕之所以没有更广泛地得到传播，那是因为教会实行着有效的道德控制，人们害怕受到惩罚，当时也没有广告来推动这一传播。只是在教会的条条框框逐步瓦解时，只是在人口的地理移动和道德的世俗化解放了人们的意识和语言时，避孕才开始传播。

在第一种答案中，人们所重视的是心态；在第二种答案中人们所重视的则是引起这一变化的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并不特殊，与其他一些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经济的现象都有关联。

希望指出避孕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做法（即使避孕很少实行）的史学家们，引用了宗教界人士所写的材料。而事实上他们的这些材料是含糊不清的。他们斥责避孕的做法是反自然的，这些做法在《花花公子》等色情杂志的某些读者眼里是色情艺术的

古典状况，但对人口史学家来说都是避孕方法。也许色情会导致避孕效果(除了一些偶然差错外)，但人们应当承认不孕本身并不是色情所追求的目标。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一起源于人口学上的争论如何导致了今天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的性史的诞生。正如今天J·L·弗朗德兰、L·斯托姆、M 福科等人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人口学这个先导的话，性史的研究也许就不会存在。

6.3 史学家的领地

上述例子表明了“心态”这一概念的引入是如何引起（或意味着)P·诺拉和E·勒鲁瓦·拉迪里所谓的“史学家领地”的不寻常扩展的。事实上，自60年代末以来，史学家的这一“领地”已经扩展到了社会观察家所能触及的所有方面而无一例外。史学在将其领域扩展至旧有界限之外的同时，也就重新回到了它以前认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今天的史学家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但这是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的。今天史学家的常见的主题就是那些由经济史和人口史所准备的主题：工作期限、家庭、寿命的年限、教育、性、死亡，这些领域介于生物学与心态学之间，也介于自然与文化之间。有关这些主题的出版物——然而，这在5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已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系列，构成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文库。这是心态史所赢得的第一个领域。

其他一些不那么常见的主题也在引起研究人员的兴趣：如体质变化(身材、肤色、眼睛的颜色、步态等)、食品结构(这是

文化的基本特性)、健康状况和疾病、比拉本医生研究的瘟疫、E·肖特研究的妇女病、尼科尔·卡斯唐所研究的犯罪行为(一个特定社会与司法法律系统有特殊的联系)、E·勒鲁瓦·拉迪里、伊夫·卡斯唐、M·阿居隆等研究的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或者说19世纪的人际关系，这也许是新史学最出色的一个成果)。历史学家研究的关键因素是团体战略、道德标准体系、集体组织，即形成一种乡村或城市、大众或精英文化的全部举止行为。顺便指出，过去的史书偏重于研究法国的北部和东部，即讲奥依语和有文字记载的地区，而现在南部地区的资料已占了重要地位。以上列举的这些主题还不完整，还要加上节日(M·伏维尔、Y·-M·贝尔赛认为节日是人际关系的延续和发展的顶点)；加上那些残留在人们的心目中，并变成了神话的近代历史事件(反对路易十四的加尔文派教徒)；最后还有对在今天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群众性宗教的研究，法国(J·德吕莫)、英国(K·托马斯)、意大利(C·金斯伯格)、美国(N·Z·戴维斯)等，曾就这一主题发表过著作，许多讨论会也曾以此为中心议题。

以上提到的主题通常是在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中，也就是说，是在地方史中进行研究的。新的心态史，既注意社会差异性，又很注意地区的差异性。这也是三代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一些著名地理学家对法国史学家的长期影响。当时这些地理学家组成了一个“维达尔·德·拉布拉舍学派”。学派的名字也是这一学派创始人的名字，他是E·拉维斯主编的鸿篇巨制《法国史》有关地理方面引言的作者。

这些地理学家如果活到今天该有100多岁了，他们实际上都是“年鉴学派”新史学的开创人，其中的A·德芒戎曾与L·费弗尔合作写过一部关于莱茵河历史的著作。

有关大区的一些地理学博士论文，如布朗夏尔对佛兰德地区、A·德芒戎对庇卡底地区的研究等都曾是地区文化史的开创性模式。以前的地方史只是全国政治史在地方史中的缩影。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一个地区的政治和宗教机构，出生于这一地区的大人物的生活等等就是这种地方史的内容。但上述这些地理学家既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当代地理研究，又分析了历史档案文献，以便突出一个地区的"基本特点"(马克·布洛赫语)，正是这些特点使这一地区具有特定的整体性。这样，打算理解现状的地理学家就像他们的同事——事件史史学家一样，也研究起过去来了，但这一过去是史学家们所忽视的非政治性的过去，这种非政治性的过去，今后将受到未来史学家的偏爱。德芒戎曾出版过一本供地理学家用的文献资料索引。这样，人文地理学对1930—1940年间的史学家就有过很重要的影响。

随后，地方史便出现了研究领域发生转移这一有趣的现象。从1940—1950年起，地方史从人文地理学领域转向了经济、社会史领域，乃至更为广泛的文化、人类学史领域。我认为地理学所经受的这一转移导致了地理学研究的贫困化。而史学却从中得益良多。从人文地理学转到历史学的地域研究，成了三代年鉴学派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必要框架：L·费弗尔对弗朗士-孔德地区、M·布洛赫对法国农村的"基本特点"、F·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区域"、P·古贝尔对"博韦地区"等的研究，都是法国省级地方史的重要专题著作；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研究17世纪农民起义的地区级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如E·勒鲁瓦·拉迪里和Y·卡斯唐对朗格多克地区的研究，等等。人们就此希望最后能有一部类似于文化史或亚文化史那样的总体地方史问世。通过这一新的研究途径，一套由P·沃尔夫主编的、名为《法国天地》的分省地方史丛书终于在法国出版了。这套丛书希望成为

一部地区文化史，撷取新史学的累累硕果。

我们上面提及的几个例子(当然还可加上其他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意识到两种心态的差异性：一种心态是以已为人知或至少是为人泛泛了解为前提的，这一心态被当作"证人"为人引证着；另一种心态则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是人们想去挖掘、了解的"处女地"。但是在这里，发掘首先是要理解差异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充满着民族间的明争暗斗，分属两种当代文化的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十分罕见，对此我们是最明白不过的。两种在时间上相距甚远的文化要做到相互理解也十分困难。但是可以通过在不同于我们的心态和我们自己的心态(即大家对之已有朴素的认识的今日之心态)中找出相似点，即恒定性，来达到相互理解。这种理解还可以通过考察两种心态间无法克服的差异性来达到。差异性就这样成为特殊性的条件，成为认识这种特殊性的条件：它使这一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所区别并确保了它的独特性。因此，就我们看来，一种文化就是在与我们的当代心态的比较之下，才是另一种文化。

一般说来，研究战略确实是很复杂的。用作参考的过去(即原来的过去)随之取代了现时，以确定另一个过去(即作为研究对象的过去)的一系列特性。我们可就此排出这样的顺序：现时，第一过去(原来的过去)，第二过去(作为研究对象的过去)，随后再辩证地从第一、第二过去回到现时。[①] 当代的心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现代性，它总是成为引起历史学家的好奇和对差

① 这里就有一个长时段回复的例子。我在P·韦纳的"罗马的爱情"这篇文章中读到，古罗马社会很流行领养孩子，人数之多与亲子不相上下。对这一事实本身我很感兴趣。但这使我马上想到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人们对此事的不同态度，当时人们惟恐没有继承人，然而却没有领养孩子的现象。最后我想到我们的当代社会，在当代社会中，领养小孩给母亲提供了一种选择自由，因而变得更为流行，但这一现象在心理上和法律上都还有许多障碍。

异性感知的本源。没有对现代性的意识，也就不再会有差异性，因此也就不再会有历史，甚至还会使人们连非差异性，即恒定性也看不到。

6.4 为何有心态史？

心态史，更确切地说是过去的心态，非当前的心态的历史。这一历史在今天(历时还不长)所显示的吸引力，也许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心态的一个重大变故得到解释。古典时代的、启蒙时代的和工业进步时代的人们，也就是说18—20世纪初的西方人，确信他们文化的恒定性和优越性。他们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并不是始终都存在的。即使某些文化衰退时期割断了西方文化的连续性，他们也不肯接受上述观念。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实证史学虽承认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承认由于缺乏知识而出现了“落后”，出现了衰退，但不承认在知觉和感觉方面有什么差异。

现在上述这些信念已经变得极其淡薄了。今天人们既不再坚信现代的优越性(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也不再坚信一种自从发明文字以来就为现代化作了准备的文化的优越性。他们看到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而又同样有意思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在传统史学家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文明和一些野蛮行为而已。因此，传统史学家注重的是某一种文化与一个普遍模式的相似性，而今天则相反，对这些文化差异性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相似性的研究。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描述过的、起源于中世纪和近代的史学在其跨入当代史的门槛前，曾一度徘徊不前的原因：事实上当代史是人们对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时期的反思，这一时期的

相似性多于差异性。然而当代史的深度在减少：过去的时期与我们的时期相比所具有的差异性显得越来越清晰，这真是历史性所作的了不起的报复！因此在我们看来，今天的史学可以脱出我们昨天还相信的全部史料的俗套，深入到差异性的海洋中，正是在这一海洋中，这些史料才与所有的传统社会相吻合。所以，这些材料今后就使心态史在寻求心理差异和人种学差异的方法上显得更为有效，而心态史则有助于这些史料加速向过去转化。M·阿居隆的著作就是通过心态史的途径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他的著作将19世纪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他通过分析认为这种文明和旧制度的文明一样，可能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文明，它有着咖啡馆、俱乐部等一些自己的社交形式。①

R·吉拉尔代在他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史学家在两个相近而又相互区别的时代之间来回变动。他指出19世纪法国军事民族主义是如何从左派转变为右派的；而在20世纪，对种族特殊性的忧虑却从利奥泰或德拉维涅特的殖民主义和"土著主义的"右派那儿转到法农的革命的和反西方的左派一边的。② 通过对这些观念和情感的转变所作的分析，人们就能在现时中看清过去的一些侧面，对现时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这样，过去，这种不同于现在的时间，就接近了我们，并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这正如人们已不能再忽视黑人的艺术、印度的艺术或前哥伦布时代的艺术一样，变得刻不容缓。各种时代之间的差异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天真、直观的理解力却总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一时代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

① M·阿居隆：《旧普罗旺斯地区的苦修士和共济会》，巴黎1968年版；《资产阶级法国的俱乐部》，巴黎1977年版。

② R·吉拉尔代：《1871—1962年的法国殖民观念》，巴黎1972年版。

个点罢了。最近对现时和过去所展开的对照研究，难道不是心态史出现的真正原因吗？

不管差异性有着何种意义，不管人们如何拒不承认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把现时当作固定的参考系，还是能使史学倾向于一种过于简单的概念，这就是奇妙的和漫长的文化适应概念。自中世纪后半期开始，这一文化适应就逐渐而持久地以我们的现代文化来取代传统文化；最后就像古典史学偏重"西方文明"那样偏重现代文化。

有数种方式可以避免这一倾向。一种方式就是破除心态模式，也就是不承认实际存在着一些严密一致、为数众多的模式，以众多的微观因素代替这些模式，这些因素不太稳定，它们之所以能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严密的整体状态，是因为有一些为数众多、各自独立的原因（这些原因有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等等）凑到了一起的缘故，这些原因之中也没有哪一个可以真正占优势，在持久的变化中，这些原因都在相互抵消。这就是L·斯托姆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日见流行的研究途径。

另外一种方式旨在回避起源问题或影响问题，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使史学家成为一种遗传学家或分类学家（特别是在艺术史领域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人们仅作一些共时性的研究。史学家孤立地看待一个过去的整体，就像人类学家选择一个野蛮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一样；史学家在这种研究中尽可能地避免涉及起源问题和以后的历史发展问题。这就是人种历史学。其典型的例子是E·勒鲁瓦·拉迪里对"蒙塔尤"的研究，但他对变化还是很敏感的。在这类研究中，人们往往不谈过去同现代的关系，但果真如此吗？即使史学家本人没有意识到，但这一关系对他来说难道不总是不言而喻的吗？

最近在对大众宗教和扫盲问题所作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

新概念，它有助于消除由于现时与过去关系所造成的困难。这一概念涉及自文字发明以来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之中的两个基本文化因素的互相影响。按照F·菲雷和J·奥祖夫的表达能力极强的说法，我们的文化是由口头和书写这两方面"杂交"而成的，文化的历史发展节奏或许也应归因于口语与文字的相互运动，这就是以前史学家所称的"衰落"和"复兴"、退步和进步的轮换运动。心态史学追踪着这些潮流的整合与分化。在我们今天文字的理性占优势地位的文化中，心态史学向我们揭示了那些深藏不露的、意识不到的旧日口头文化，或以一种掩盖着的残存形式，或以空白、空缺等形式还在继续存在着。

精神分析学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获得成功，也许可以从它能够给个人的忧虑作出回答这一点来解释。人们今天对心态史学的兴趣，在我看来是一种相同类型的现象；在今天的这类现象里，曾由口头文化所支持而被书面文化所抑制的集体的无意识，取代了或压倒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的无意识。

然而，什么是集体的无意识？更正确地说，什么是集体的没有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循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采用的或不准使用的感情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史学家使用"心态结构"、"世界观"等词语以指明心理整体的一系列严密相关的特征，这一心理整体是在当时的人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今天的人能够使以前埋藏在群体记忆深处的情感浮现到意识的表层来，这是今天的人日益感到的一种需要。这就是人们对所有无以名之的智慧进行的深层研究。这些智慧并不是超越时间的抽象智慧或

真理，而是各种经验的智慧；它们调节着人类群体与每个个人、自然、生命、死亡、上帝以及彼岸世界的紧密关系。



即时史学

让·拉库蒂尔

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1921—）并非传统含义上的史学家，而是一名著名记者。他早年就学于波尔多蒂伏利学院和波尔多法律与文学院，获文学与法律学士学位。后获巴黎政治研究学院文凭。从经历而言，他曾去过印度支那，担任法国驻印度支那军队莱格莱尔将军参谋部新闻处专员(1954年)；在摩洛哥任法国报刊专员(1947—1949年)；担任过《斗争》杂志外交栏编辑；当过《世界报》编辑（1951—1953年）、《法兰西晚报》驻埃及记者(1954—1956年)等。从1957年起曾任《世界报》海外新闻主编、瑟伊(Seuil)出版社主任，并长期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让·拉库蒂尔对当代史、即时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写作与思考不同于一般记者，总是力图从历史角度、即昨天与今天的联系上来展开分析，从而在作出结论与进行解释时具有深刻性。在这一方面，他可算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史、即时史专家。他的研究范围宽

广，但相对集中于亚洲的越南、柬埔寨甚至中国，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色列等阿拉伯国家和法国等地。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所著的大部头作品不下十数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有：《变动中的埃及》(1961年)、《第三世界的分量》(1962年)、《胡志明》(1967年)、《埃、以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纳赛尔》(1971年)、《莱昂·布鲁姆》(1977年)、《戴高乐》(1986—1987年，3卷本)等。他被认为是新史学即时史研究的推动者之一。——编译者

即时史是真正即时的吗？也就是说，是在它刚发生时，不经过任何媒介，在一刹那间就被把握的吗？如果这样来想象即时史，实际上就是否认即时史，或至少是对它加上了一些限制的条件。这样的话，研究即时史，那就应当是乔治-雅克·丹东本人在走向断头台时向民众谈论他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谈论他死亡的意义。小孩坐在正编织毛衣的母亲的膝头上，听着母亲述说历史往事，这也是一种即时史。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抨击斯大林时，这已不算是什么即时的了；要说即时性，那就应当在10年前让斯大林本人来作这一对自己政策进行反思的报告。这类历史产品应该来自历史的生产者，并且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这种假设我们可以保留，但不应当把它庸俗化，走向极端。归根到底，历史之神所作的各种反应，哪怕是非常迅速的反应，也并未完全排除她所作的反思。

7.1 即时史的研究领域

我们首先看到，我们所理解的“即时史”的面目是不断变化的，它既不能用一个真实的框架来套，也不允许我们作一种令人满意的调节。从那些置身于事件之中，既是事件参加者又是事件反映者的记者所从事的不那么严格的新闻报道，到以调查-采访方法对一个最近阶段进行纯历史的研究；从《世界报》记者对西撒哈拉沙漠危机进行的调查，到巴黎第八大学一位“当事人”所写的1968年法国5月风暴史，都属于即时史的范围。在即时史的这些特定研究领域中，各必要成分在时间上都与撰写和论述的主题相近，在物质方面也与作者在研究危机时所处的条件相近。

我们这里所要考察的历史研究活动是由历史事件或经过反复推敲而作出的决策的直接参加者或见证人进行的，研究者直接参与了这一瞬息即逝的活动。菲利普.罗布里厄对多列士的分析就是一例[①]；虽然所研究的史实已经过去15年了，但所描述的演进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作者也是直接卷入其中的，因此该书就远不是一个爱挑剔的观察者对1978年竞选运动所作的一种描述了。但这里的界限是很难确定的。人们因拿不出什么确切的“罪证”，常常举棋不定，不知道该为某种新闻体裁辩护，还是为某种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类型辩护。

如果说即时性在史学这样一个领域中几乎难以达到，这是因为史学研究活动的内容是核对、剪辑、去伪存真、收集，并要求以起码的技术手段——如笔、纸、胶水、分类卡片箱、文

① P·罗布里厄，《多列士的公私生活》，巴黎1975年版。

件资料等为中介。

这样，把“即时史”的媒介和重点场所冠之以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总称呼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瞧！这是多么奇特的即时性，它竟然建立在对传播媒介的依赖上……

这一正在形成中的、各种因素处于融合状态的历史最接近于时间的即时性，对特殊事件——如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伊斯利街头的机枪大屠杀，1968年5月巴黎圣米歇尔大街街垒的修筑——进行“直接”报道，就是一例，在这些现场直接报道中，记者的声音不仅是事件的回声，还是正在进行的行动的某种组成部分，甚至是行动者的召唤（歌剧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记者朱利安·贝桑松就不由自主地起过这种作用）。大众传播技术正是在这种最接近于即时性的历史中，以专制的和令人难以摆脱的方式影响着人们。但一旦声音画面由于某种事故而中断或巴黎的上司突然需要插入一段广告，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研究活动也就突然停止了。

还须提出：“即时史”这一略带刺激性的用语，在60年代初得到普及并成了常用语，它不仅试图缩短社会生活与对这些社会生活所作的初步解释之间的时间差距，还试图让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说话；它不仅要求快速反映历史，还要依靠这些作为活资料的参与者来建立这一史学。这里谈不上重视口头材料、贬低文字材料的问题。但是，假定人们能够在枫丹白露的告别之夜直接采访奥尔施泰特战役的胜利者达武将军，那么人们为何反而更为相信拉斯卡斯的笔记本，而不相信这位将军的亲口之言？

今天正在写作的一些历史著作，虽以一些名著为蓝本（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些名著），但采取了一些特殊手段，减少了所包含的风险，这些著作的即时性既建立在历史的瞬时性上（美国人称其为“瞬时史”，其实这一概念的限制性更大），又建立在

作者与其研究对象的感情关系上。就这一角度而言，人们可以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看作为这类历史著作的一个典型：托洛茨基是在那书中所讲的事件发生几年后才写成此书的，他以极大的兴趣来叙述这些不仅是耳闻目睹，而且又是亲身参与、亲自筹划的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出自一位亲自参战的统领之手，这位统领虽因在战争中犯有错误而受到了惩罚，但并不因此而没有直接卷入这场战争，至少在"尼西亚和约"签订以前是如此。这本书不是即时史的范本，又是什么呢？

我们之所以提到修昔底德，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是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写成的，而且它的作者又是一位对这一事件的进程负有责任的著名人物；是因为我们要指出，一种史学研究活动首先是要寻找一条可以理解这一历史的线索，是要寻找原因与结果之间、手段与目的之间、表面议论与真正含义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人会有对因果关系更敏锐的洞察力，比这位雅典统领写得更好了。以修昔底德为榜样，所有的史学家(不管他是研究古罗马-高卢战争的，还是研究第三等级形成的，研究法国的弗朗士-孔德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学教育的，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或是研究吉斯卡尔·德斯坦青年时期的）都首先确信在自己调查得到的各种结果之间肯定有着一些合乎逻辑的动力关系，并揭示这些关系，使之能为人们所理解。

"即时史研究者"（如果即时史不算是一门新的学科，那何时才能创造一个新词？)所进行的工作无非是这样四项：制定研究方向、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编辑整理和使之合理化。这种史学研究活动的四部曲，使即时史研究者从他们各自拥有的文化资料出发来确定他们的研究方向和阐述重点，并使他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一位史学家进行

研究活动的时间和所处的地点决定着他的研究工作，《蒙塔尤村》[①]一书作者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并不是要混淆史学与新闻学，推崇一方或贬低某一方。阿尔贝·加缪把新闻记者称为“即时史学家”，但他只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记者，所有研究第四共和国初期情况的史学家都得参考他的报道和论述。把时间作为参考因素，这当然是不无价值的。但新闻记者的弱点，究其原因，与其说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快速完成的，不如说是他们的资料来源贫乏，能进行的相互印证工作寥寥无几。新闻记者搞研究，太匆忙这倒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他们占有的事实太少，对局势和情况观察和分析不够，这种差别与其说是性质方面的，不如说是数量方面的。正是就这一点而言，技术的发展，如计算机的运用，能一下子大量增加记者所掌握的分析因素，从而使他们的工作发生质变。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尽管史学与新闻学之间的关系常常充满矛盾和冲突，史学界推崇长时段研究并讨厌“事件史”，而新闻界却热中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轰动一时的新闻（正像《巴黎晚报》所强调的那样），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两个学科正呈现出一种相互推近的趋势。近10年来，在史学中，皮埃尔·诺拉所说的“事件的复归”已经完成，而在《世界报》等出版物的影响下，新闻业也颇有点夸口，试图占据大学学术研究领地。就这种发展趋势而言，目前所能肯定的，是史学家和新闻界的逐渐接近，而不是合二为一，至于新闻学与严密史学之间的靠拢，则还须假以时日。如果说我们过去经常看到有些新闻记者曾临时跻身于史学家行列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雅克·凯泽就是这样），那么可以这样说，我们从

① E·勒鲁瓦·拉迪里：《1294—1342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巴黎1975年版。

来没有看见，有些真正的史学家(如F·菲雷和J·米利亚尔)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如此坚定和热忱。

7.1.1 一个古老的传统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科学，这门科学只有通过辛勤努力，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梳理提取出有用的材料，才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历史学的这一定义是晚近时代才产生的.大约在第二帝国的末期，实证史学建立其统治地位的初期，法国的大学才在雅克多·迪律伊①的鼓动下形成了这样的原则：史学只研究消逝了的和过去的对象。如果一个学生胆敢选《维克多·雨果在格恩西岛》或《俾斯麦统治时期普鲁士的行政》之类的题目，那么他就只会被送到"七星诗社"时代的百花诗会上去。

那么，按照这种教条，是否就应当反对作为集中研究现时史的典型——A·梯也尔的《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代的历史》一书呢？在此书的前言中，梯也尔提出，写史的可谓理想时刻，也许是历史的参与者从当时的活动中脱身出来，并摆脱了曾经激励过他的激情，但对一系列自己曾影响过其进程的事件记忆犹新的时刻。当然我们对梯也尔曾运用过的这一研究原则可以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这一提议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历史研究活动在与过去保持时间距离、在与自己所选择的材料保持的关系方面，似乎已经历了几个相互矛盾的阶段。恺撒和科明尼斯②自认为是历史学家吗？不管怎样，他们留下的

---

① 历史学家V·迪律伊(1811—1894年)曾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任公共教育部长(1863—1869年)，他在其著作《恺撒的一生》中曾提到此事。

② 科明尼斯(Ph.Commynes, 1447—1511年)，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史学家，写有《回忆录》8卷，记述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时的军事和政治史。他本人也是政治、外交活动家，直接参与这一时代的活动。——编译者

巨著完全是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他们不仅是自己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而且也是行动者，有时甚至是作为主角而参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的。

直到19世纪中叶，史学研究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过去”之间的这种关系类型一直没有遇到过根本性的挑战，但在19世纪中叶，随着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时髦，以及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而登上历史舞台，史学研究者突然转而对久远的历史和金石学发生了兴趣。但在拉维斯时代的史书中仍然充斥着对事件的研究。史学研究曾经试图从跌宕曲折、扣人心弦的事件中揭示那种生动和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但之后就转而收集有关瞬时的材料，只要这些材料是距今年代久远的。向历史上的英雄们致敬，但要用拉丁文……

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史学在将现时史研究罚入地狱之后，又对事件研究进行了贬斥。史学家以马克思和吕西安·费弗尔为祖师，开始只研究漫长的时期和整体的演进。史学家重视研究对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来说无比重要的“冷漠的社会”，禁止研究充满集体活动的文化，以便使史学固定在特定的“试管模式”中。

确实，在民族国家的创建、巩固和社会化的时期，史学在成为如人们所说的“民族意识内在化”之后，应当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那么，是否就应当仔细而审慎地在弗雷德贡德与贞德之间，在孔奇尼与马萨林之间，在西哀士与马拉之间，也就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作一番挑选呢？这些历史上的榜样人物随后就应当介绍给法国的学生们，以便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或使他们引以为鉴。毋庸讳言，这样的观念也许在今天已完全过时了，历史正从教育系统中消失，而教育系统也显然没有在历史的长卷中找到足够的“正面英雄”来使法国青年成为工业

消费社会中安份守己的良民。史学虽在半途中失去了丹东，但有可能重新得到科雄吗？

在史学被奉为圣物之前，史学家们也许还是值得去研究10年前（即1968年5月）发动的那场留有后遗症的乌托邦运动在1978年时使人们失去了什么。史学家也许还可以分析一下，为何在法国，交通的迅速发达（高速公路、高速火车和国内航空）带来了自治主义的增长：哪些是原因，哪些是结果？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新闻学这三个学科的出现。但是，史学家总是不遗余力地要把这三个妖魔赶走吗？尽管人们可从像P·韦纳在法兰西学院授课典礼上所作的那篇演说①一样，吝啬地将史学家的领地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并相信史学家研究途径和方法有它的特殊性，但人们同样可以将史学想象成是无界限的，与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种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等边缘学科相结合，或与一些使人有些怀疑的社会学或政治学以及不值人们一提的新闻学相结合。

像这样一种混合型的史学已经有一些著名的先例，有一些能使人感到欣慰的大作。我们已提到过修昔底德。这种线性发展的、阐述事件的混合型史学，其起源怎能不追溯到他的著作呢？我们还可以提一下伊本·卡尔都温②，他是一个"自传"史学家，其作品带有更为明显的总体化和社会学化色彩。上述这些都是表示历史的即时性的惊人例子，这种即时性既表现在作者同所作出的决定以及由这些决定引起的结果之间的联系之中，也表现在作者力图使这些原因和结果具有某种联系、得到某种直接的详解中。

---

① P·韦纳：《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差别》，巴黎1976年版。

② 伊本·卡尔都温（Ibn Khaldoun，1332—1406年），最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

当然我们并不把恺撒的《高卢战记》和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①]看作是纯粹的历史著作，甚至也不把它们看作是“即时史”，因为前一部著作写得极其平淡，像是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报告，而后一部著作恰恰是因为“即时”史研究的并行发展已使其丧失了价值。有关同盟国关系史、法国抵抗运动史或亚洲、非洲民族主义诞生史的一系列著作层出不穷，从而将《战争回忆录》这样一种庄严崇高的独脚戏剧本置于优雅的骑士传记行列，在这种时候，怎么还能把戴高乐的这种日记型回忆录看作历史学著作呢？

在一个很容易找到其他材料加以印证的时代里，戴高乐作为一个传记作者，对史学研究来说既是十分可贵，又是可以取代的，而和他一样的那些撰写战争编年史的先驱者，如儒瓦尼维尔[②]或维拉尔都安等，则是不可取代的。他们既是战争的见证人又是参加者，既是战士又是谈判者，既忍受着苦难又赢得了光荣，既是王公贵族的密友、又不断与敌方接触，因而他们满怀激情，撰写了有关他们时代的即时史，他们的主观性并没有损害这些作品的内容的丰富性。

批判精神在当时最为基督教化的国王周围的群臣中有所发展，在回忆这一情况时，有哪个“严肃”的史学家能像儒瓦尼维尔这样叙述他怎样在尼罗河上被撒拉逊人俘虏的经过呢？儒瓦尼维尔提到一个军官，他与他的同伙故意要不信教的人来杀死他们，按这个军官的话说：“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起进入天堂了。”对此，儒瓦尼维尔这位务实的明眼人只是这样简单地评价了一句：“我们并不相信这位军官的话。”作为路易九世的密友心腹，儒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4卷本，巴黎版。

② 儒瓦尼维尔(J.Joiniville, 1224—1317年)，法国编年史学家，写有《回忆录》。

瓦尼维尔的这番话很能说明问题。在5个世纪以后，米什莱敢于作出这一评价吗？菲利普·德·科明尼斯从大胆查理的亲信摇身一变，成为路易十一的宠臣，从官居显位到饱尝普莱西-莱图尔的铁窗之苦，但这一切都不影响他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清晰性从事即时史的写作。当然人们也能够对他就佩罗纳事件所作的叙述和解释提出异议，正像人们曾对米什莱的有些叙述或马蒂埃有关"热月"的叙述所提出的异议一样。为了同政治决策(如果不是说与事件)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弗鲁瓦萨尔[①]的编年史也为"即时史研究者"提供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尽管他拒不像费奈隆那样断言：最杰出的史学家既不是那些只是有条有理地罗列日期事件的人，也不是那些绘声绘色地展示时间的特殊性和当时英雄的特色的人。

在这么多先例和榜样中，我还是想向即时史研究的后继者们推荐利萨加雷[②]。由于他接近所发生的事件，由于他充当着积极的"一般"角色，从而避免了像大多数既是历史参与者又是历史学写作者那样为自己辩护。他着意搜集回忆文章、旁证材料和文献资料，力图避免向民众重弹骗人的"老调"，最后还由于他无拘无束地公开直抒己见，因此，他的《巴黎公社史》是一种即时史的典范作品。一些研究现代史的著名专家，从维诺克和阿泽马到鲁热里，都可以发掘出一些其他文献资料，并对利萨加雷的这点或那点叙述提出疑问（他的立场毕竟只是站在当时对垒双方中的一方的），但这些专家中有哪一位会对这位公社老战士所具有的史学家的能力、素质提出疑问呢？利萨加雷提出了"即时史研究者"所需要的一种工作方式：高度注意事物

① 弗鲁瓦萨尔(J.Froissart，1333—1400年)，法国史学家，曾就英法百年战争写有《回忆录》。

② 利萨加雷(P.O.Lissagaray，1839—1901年)，法国记者，写有《巴黎公社史》。

的出现和发展，广泛收集行将消失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当时人们的行为举止、语言情绪、那些参加工作和战斗的人民大众的政治色彩、氛围等。有了这些资料，其他的史学研究活动才得以深入展开。

7.1.2 即时史的力量所在与薄弱之处

正如我们愿意指出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史学，其特点和薄弱之处，在于即时史研究者与一般的史学家不同，他们并不知道历史的结局。他们不知道恺撒会被谋杀，不知道贝利公爵的《富裕时光》的抄写人员会由于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而无事可干，也不知道印第安人后来会被叫作美洲人。他们既不知道雷蒙·巴尔年老后会怎样，太阳能会在欧洲被普遍利用，也不知道在通过电缆播放节目的时代里电视将在选举中起什么作用。

但是早年研究基督教诞生史的史学家难道会考虑到后来从死海中发掘出来的手稿的重要性吗？又有哪位研究中世纪史的史学家会天真到认为丝绸之路的秘密已经暴露无遗？米拉博城堡并未展示它的全部文献资料。史学家的调查与研究到底何时才能最终结束，才能一锤定音，留芳百世？是到历史终结之时吗？也许是的，但首先是到史学研究活动终结之时……在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历史这具尸体上，无数的史学家还在大做文章：寻找一份从未问世的信函，分析一张温度表，研究医学秘密所掩盖着的一种症状，查看一份缴税申报单等等……

"即时史研究者"虽对自己所研究的事件的"结局"到底如何一无所知，但他们既不是那么孤独，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历史长剧中的一幕(要么坚信自己就是这一长剧中的一幕，要么像"御用史官"那样盲目附和)，也

许是因为他所探讨的题材构成了一个范围相当明确的整体，即使今后发生演变也不会彻底改变它的性质和方向。

例如，埃德加·莫兰就属于第一种情况。在1968年5月风暴中，莫兰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所描述的内容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它的深度，自5月风暴以来却从未被超越过。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兼新闻记者，他并不满足于成为史学家，而要成为历史本身，要和历史融为一体；也许他并不是要成为历史的观察者，而要成为历史的推动者。托洛茨基在发表《俄国革命史》时也是如此，当时他还希望改变俄国革命的进程。对他来说，斯大林将来是死在权势犹存时呢，还是死于流放或谋杀，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的写作、叙述和评论为另一条革命道路辩护。

《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B·伍德沃德和C·伯恩斯坦[①]也属此列：他们以《总统的疯子们》为题写过一篇卓绝的历史报道文章，以一种无比细致的笔触揭示了"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显然，对于这两位记者和帮助他们展开调查并编辑成书的总编B·伯雷德利来说，揭露创伤是为了治愈创伤。在这里，史学家兼记者接触了这一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一个事件（对于史学家兼记者的专业来说这只是第一层次的事），而且还是为了使这一事件成为某段历史的终结。

一位最有影响的国际事务评论家看到1977年的某些重大事件(如法国左派联盟的分裂、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访问耶路撒冷等)在大部分时事"专家"中所引起的惊愕后，这样说过：缺乏预见，或更确切地说相反的预见(如这样断言："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在近期内举行任何直接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使时事评论

---

① B·伍德沃德和C·伯恩斯坦是《总统的疯子们》(巴黎1974年版)和《水门事件——尼克松的末日》(巴黎1976年版)的作者。

丧失了其价值。一个不善于成为一名预言家的分析家，人们还能指望他什么呢?如果我排除了埃及总统访问以色列的可能性，那么我在随后就这次访问再作解释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这样说，是把历史学的不足说得过头了。预见与评论事实上似乎是相互有别的。在萨达特总统访问以色列这件事上，心理学家(他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赌徒”)和经济学家(他会说:“埃及经济已经崩溃……”)其实是能够预测到埃及元首是希望这样做的。然而最认真、洞察力最强的史学家则会注意到历史的障碍、社会文化的禁忌、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外交否决权等，从而排除埃、以和谈这一假设，即使这种出乎历史学家意料的历史事件以后可能会成为一种推动批判性研究的动力。缺乏预见同样可以有一种理性的含义。在7世纪，有谁会说阿拉伯人将在下个世纪打到布瓦提埃呢?[①] 当时墨洛温王朝宫廷的克鲁德·卡恩和阿拉伯史学家伊本·卡尔都温的先驱都未曾预料过这一点。但是对这一奇迹般的突然变化，却有大量最有道理的解释。

史学家(不管是否是“即时史学研究者”)的“威望”并不来自对突发现象的预测能力(如预测大卫王的胜利或1939年8月苏德和约的签定等)。在1940年夏天，更明确地宣告纳粹德国会失败的，到底是戴高乐，还是马克·布洛赫，戴高乐确信德国必败，从而成了政治家和国家元首，但《奇怪的失败》一书的作者马克·布洛赫却是一位史学家。正是使虚构的现象理性化，正是从突然改变了一场角逐中诸因素的事件中提取新的因素来重新把握这一角逐的研究活动本身，才保证了批评的威信，这一研究活

① 这里所指的是8世纪阿拉伯人向西欧的扩张。732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大臣查理·马特在布瓦提埃(Poiters)打败了阿拉伯人，阻止了阿拉伯势力向西欧扩张。——编译者

动直到一位参加角逐者发生意外(如中风)或一场新角逐的出现打乱了原来的进程时才得以中止。

无法预见或不可能知道结局，也就是说，研究"即时"史的学者常常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那段时期会有怎样的结局，但这种无知也能成为一种力量或一种美德。研究法国宗教改革初期情况的史学家如果对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1]还是一无所知，他的研究就不会更深刻、更有意义吗?和幼稚联系在一起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有什么样的力量关系的变化，幼稚不能适应！事先了解了一场战争的结局，也许会导致低估战败者的能力和斗志。史学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当历史学撇开历史变化的最终结局而只考虑历史变化的进程时，其研究也许更为出色。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将历史进程和它的结局分离，并对之进行详细的说明，使其向所有可能的假设开放呢?

今天，一位研究殖民地和殖民政策的史学家，他能以其所有的科学手段，以其公正无私，以其资料的可靠性，使人们对19世纪80年代西方人的殖民幻想，乃至对朗松和克列孟梭染指他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吗？当然他可以引用当时的文章，但他能再现当时的情调吗？我们当然也不会过分赞扬即时史研究的这种无知。史学研究活动的要旨显然在于对那些经过分类处理的等级和顺序进行比较。法兰克王国的崩溃阐明了蛮族入侵、蛮族与罗马帝国总督的谈判、耶路撒冷沦陷的原因。但维拉尔都安和儒瓦尼维尔也同样……

7.1.3 即时史中的人

我们打算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来使传统的史学家与"即

① 亦称"圣巴托罗缪惨案"，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编译者

时史研究者”作一适当对照。前者是在一个历史的范围内，在一个时空的“宽阔层面”上展开研究的，虽然其研究的特定领域也可以是非常狭窄的。如要研究16世纪安特卫普商会货币交易状况，我们既可阅读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社会的著作，也可阅读研究弗拉芒绘画的史学家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依靠冈城的中世纪文献资料和德国银行的档案记录，参阅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冲突的专家们的著作、航海日志的作者和莱茵河地区编年记事者的记载以及西班牙语专家的分析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展开的。而即时史研究者则如梯子靠墙般地将其研究与事件相联。他应当迅速地抓住事件，调查事件，发现事件，并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热忱和极高的效率来表达事件，至少从表面来看是如此。

“即时史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时段一般说来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性正在日益得到补救，他今后可以得到多种多样的信息来源。例如，日本、美国各大报和法新社的编辑已拥有电子计算机系统；这一系统在事件还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就已能够满足他们的资料要求，提供数年来有关这一主题的所有出版物；与此同时，编辑们还会收到派驻北京、开罗、莫斯科和墨西哥记者的电话报告。哪个史学家不幻想、不希望一阵狂风把整个世界卷到面前同自己对话呢？当然，对这个扑面而来的信息世界应当进行整理、控制、分割、分类，以便使它转化成一种创造知识的能源，但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这阵旋风也会带来无数的谬论、错误观念、官样文章和蛊惑人心之言吗？显然是会带来的。但这些东西在阿维尼翁教廷档案中，或在奥克拉纳的文献中，难道会少吗？如果“即时史研究者”是真正的即时者，那就是说，H·基辛格以后要在R·尼克松逝世的当天晚上写尼克松传记，只有在那个时刻他才能占有几乎无可比拟的历史学优

势。他在其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又突然添加了世界五大洲对尼克松之死的反应：从德国教授、法国社会学家、英国记者、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观察家、苏联和中国的官方发言人、日本的调查员，到新加坡的商人等。他一下子就遇到了资料信息的共时性问题，这种共时性开始使人有点受不了，接着就令人陶醉，就开花结果。人们要求即时史研究者像造物主那样，在自己所能使用的时间内迅速整理的正是这些大量的信息，而研究阿拉伯王朝、研究印加帝国的史学家们却花费如此之多的年月来收集一百来份碑铭、十几种旅行者的叙述等，并对它们进行说明，从中获得研究成果。

电子技术对史学领域的大规模渗入不仅使计量方法和所有能想象到的计量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还为即时史研究带来了大量的可能性、危险性和模糊性，它所带来的后果比大众媒介对史学领域的渗入一个世纪以来所造成的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可以观察到大众传播媒介在一个世纪以来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报刊杂志的大发展时期，德雷福斯案件对报刊杂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其次是电台的发展时期，希特勒和罗斯福在伦敦电台工作小组之前，最有效地使用了这一传播媒介手段；最后是电视发展时期，电视保证了肯尼迪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保证了戴高乐的威望。

我们不能把即时史的发展简单地归因于大众传播媒介三个发展阶段中的任何一个。利萨加雷在新闻报刊在法国取得巨大发展前就已写出了他那著名的《巴黎公社史》；托洛茨基并不求助于无线电系统来传播他的思想，列宁只是对大批工人公开演讲时才使用话筒和扩音器，而斯大林的官僚系统则一直小心地避免采取直线的电台广播；在上述《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兼史学家就水门事件展开的调查中，电视也只是起着次要的作

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听说过或没有注意到希特勒在柏林的公众集会上、在纽伦堡体育场上通过话筒所发出的叫嚣和煽动，是不可能写出一本有关纳粹现象的严肃的著作的。纳粹头目的嚎叫难道是对森林而发的吗？

在这里，唱片和影片都是不可取代的资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也许首先是一部第五共和国的电视史：三位总统的形象，各党派为了长期控制电视屏幕而进行的争斗，各人为在电视上发表演讲的时间长短而展开的论战，为了"挤入"黄金时间而施展的手段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民意测验的结果。

即时研究者一旦使用了报纸、电台、电视这些大众传播媒介手段，不论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他都面临着一种很特殊的危险：即资料来源的枯竭。如果即时史研究者既是事件的反映者又是事件的制造者(如果不是社会动力的话)，那么他总是在不停地削减自己对之进行研究的资料。对历史学家来说，利用私人日记除了能引起读者的假正经外，并无其他危险。但是，一位调查者要是在1978年披露了第三世界的某位国家首脑的隐情，那么从此就有不止一个国家向这位调查者关上国门。谁要是想写一本1958年以来的几内亚历史，那么他就应当忘掉他所获知的一半信息，或者不得不停止使用自己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一切当地资料。这样，研究者就必须在已知的信息资料和"应知"的信息资料之间作出一种神秘的取舍。确实，哪一位研究当代东方的学者，哪一位研究非洲的学者，没有经历过这类内心斗争呢？

这些问题不仅仅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才会碰到。除非将研究成果和书籍都视为互不相干的空瓶废罐扔入大海，或者把它们付之一炬，不然的话，所有的"即时史研究者"都必须对他们的信息来源和研究对象持一种有保留的谨慎态度。任何团体、个

人和机构都有其需要掩饰的阴暗面，都要尽力加以掩盖不让其不合时宜地暴露。哪一个研究当代西方政党和选举制度的史学家不应该注意这一点呢？

所有的"即时史研究者"，不管是撰写了自己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来龙去脉的夏尔·狄戎①，还是在1974年5月的一个夜晚披露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选举纠葛的J·奥祖夫，他们都既是现象和事实的收集者，又是后果的造成者。这些后果也是即时的、直接的。很少有专家能衡量对原法国游击队领导人的揭露和控告会对共产党造成何种冲击，更多的人是能够估计这类及时的和揭露性的分析对法国左派内部力量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总之，这两类"即时史研究者"与《驯鹿文明》或《战士与农民》的作者相比，在写作时思想状态有很大差异。

"即时史研究者"既应当为了以后的写作而保护资料来源（如，不应当为了讨好雪铁龙汽车公司的领导，而批评普吉奥汽车公司的生产制度），又必须预测他对当代社会某一方面所作的反映和分析将"立即"带来何种冲击，也就是说，他既要顾及眼前，又要考虑到他未来的研究领域。这种瞻前顾后的史学家能去开拓所有的探索领域吗？1978年的世界对于即时史研究者来说，也许比1878年的世界更为不易捉摸：对于那些想深入到档案文献堆中去追根究源、并深入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去采访调查的研究者来说，又有多少国家允许他们这样做呢？这里尚且不说柬埔寨这样的特殊例子。10亿亚洲人，几乎所有的非洲人，大多数的南非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资料库"，但却是研究者的禁区。从技术方面讲，在100 年前撰写非洲帝国史或马来西

① 夏尔·狄戎：《巴黎的莫斯科帝邦》，巴黎1971年版。

亚移民史，要比在今天撰写更容易些。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拟定了写一本有关摩洛哥历史的计划后，拉巴特的警察当局就冻结了有关的档案资料。①

确实，当今世界的多样化信息已变得无比丰富。当代一名著名观察家在不久前曾说过，消息最灵通、获得信息最多的应当是带有一架性能良好的半导体收音机的会讲英语的牧羊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远离尘世，从黎明到午夜耳朵不离收音机，来自五大洲各都市的无数英语节目都在向他不断叙述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阿明总统对他作直接演讲，而邓小平则通过他的发言人表达意见。也许还有可能，这个牧羊人在沉睡时知道的事比10个世纪以前教堂中的苦修士知道的还要多。

总之，信息资料的丰富性是无可比拟的，“即时史研究者”可以从中大量汲取。1977年底法国电视台播出了一套极好的资料片，这是一套使史学家(包括研究埃及的学者、中世纪史专家)很感兴趣的资料片：这套影片是本世纪初的一位银行家阿尔贝·卡恩制作的，他把摄影机对准了世界各地，特别是多次拍摄了巴黎一些繁华大街的人行道镜头。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有人想超过卡恩这套资料片，要把这一成果更系统化，每年都在巴黎热闹的黎塞留街和德鲁奥大街的交界处拍片一小时，坚持20、30年，那么这该是多么丰富的一套资料呀！它将向我们揭示出交通、服饰、发型、男女体态、生活水平、广告、报刊、爱情、戏剧表演的种类、寿命的长短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一套古希腊的陶器对一位古希腊研究者来说就已说明了许多东西，那么以这种摄影方式来收集的材料呢？

人们肯定会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

① 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前进中的北非》，2卷本，巴黎1972年版。

越多样，越尖端，价格越昂贵，史学家的自由也就越脆弱。一旦出现了财政问题、资料“生产者”问题、研究经费问题，那么研究者在行动自由方面和表达自由方面也将出现问题。当代史学家当然能够使用一些其费用、投资不会使史学家的自由遭到异化的器材与设备，但使研究设施向现代化方向演进的势头却有发展太甚的危险，并且已经引起了史学家们的警惕。

7.1.4 客观性问题

与上述危险同样明显、同样复杂也同样时常被人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客观性问题。当代的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具有神圣真理性质的“客观对象”曾被实证主义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可在当代历史学中，它还留下了什么呢？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人相信什么不受某种哲学上的预先假定、不受史学家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制约的研究了（更确切地讲，这类研究是一种发现，也是一种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

M·德·塞尔多写道：“‘历史事实’在构成时已经在‘客观性’中引入了某种含义。（在这里的引号很说明问题。）用分析的语言来说，‘历史事实’所表示的是一些‘选择’，这些‘选择’是先前就有的，因而不是观察的结果，它们甚至是不‘能证实的，但是，通过批判性的验证是‘能证伪的’。”[1]但这些在马蒂埃的著作中已那么显而易见的选择在“即时史研究者”的研究中难道就不更加强烈、更加突出吗？修昔底德与阿尔昔比亚德之间的关系、C·朱利昂与法兰克等级制之间的关系、C·塞纽博斯与耶稣会教士之间的关系等已经是充满着激情的了，而今天研究

① 参见《研究历史》，第1卷，第5页，巴黎1974年版。

者与佛朗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弗朗索瓦·密特朗等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更有受政治、哲学条件影响和限制的可能了。然而，如果某人既是公民，又是研究者，那他在研究雷蒙·巴尔的财政政策时，就一定比他在研究查理九世的宗教政策时更带有偏见吗？研究者是与他的时代、他的文化、他的研究环境相联系的，因此他也一定会在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对这一方向所作的解释中表达这些制约条件的。J·米什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著名的先驱：他以其杰出的天才迫使法国的群众意识形态接受贞德和拿破仑这两个有着鲜明对比的形象。

"即时史研究者"常被指责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但他可以在表明自己的倾向性中找到解救之道。正是在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的研究才是中立的，或者说，他的研究途径才是公正的。正是在指明自己的倾向性时，他才能重新处于公正的地位。要是研究倾向不明朗，遮遮盖盖，那么即时史研究者肯定就偏离了史学研究活动。像《古拉格群岛》[1]这类"即时性"杰出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开宗明义和说话毫不含糊。《古拉格群岛》一书就是一个人在叙述着自己的独特经历，他把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资料扔到了桌面上。他大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和他所相信的东西。正是通过这些，他才完全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是历史学吗？这是一种充满溢美之词的传记、一份公诉书，至多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已，教授们即使不讲这是一种"引起轰动的新闻玩艺儿"，也会这样咕哝道。但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说，当研究者的工作消除了偶然性，或者说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偶然性时，新闻的性质就会消失了呢？在新闻业活动中表现得如此明显的这种偶然性不仅与

① A·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巴黎1974年版。

这一职业本身(新闻界的活动、研究成果)的临时性，不连贯性和反复多变性相关联，而且还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突变偶发性有关联。

如果在希特勒的坦克部队越过奥地利边境时，在卡斯特罗率部走出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而进入首都哈瓦那时，在戴高乐对议会怒声说“我理解你们了”时，一个记者正好在场，那么这些时刻就是他扬名的机会。如果在1952年军官发生暴动时，在萨达特自称准备走到“世界的尽头，甚至走到以色列的议会”时，一个记者由于请假或生病正好不在开罗，那么他就是报界的失败者。作为即时史的基本和初级形式的新闻业对“独家新闻”的依赖性极大，独家新闻既要首家报道又要使人震惊。但史学家难道不也在寻找“独家新闻”吗？死海文献和富尼埃关于蒙塔尤地区的调查报告也都是“独家新闻”。但是，被事件的变幻莫测折腾得无所适从的新闻工作者仍是史学研究活动的候选人，因为他们是见证人、行动者、中介人、推动者或旁观者，在研究中注入了一种理性意志，这就是要确定和理顺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这些事件至少与自己探讨的问题的某个方面联系起来。

这也是一种收集信息的意愿。即时史观察者用来说明越南和柬埔寨冲突或法国汽车工业密歇兰公司大罢工的期限尽管很短，但是只要信息资料丰富多样足以使他能够验证和核实，他就能进行史学研究活动。我们已看到时间因素在这里并未起大的作用，或者说总的看来时间是起着越来越少的作用。新闻记者像田鼠一般贪婪地乱嚼乱咬着榛子，史学家像松鼠一样致力于收集和积累这些榛子，而“即时史研究者”则一面收集一面嚼咬着榛子。这一工作的优劣与其说是根据时间，不如说是根据空间而定；与其说是取决于时间节奏(即时性或相隔一段时间)，

不如说是取决于对批判评论范围的开放度。

7.2 事件的复归

在19世纪这100来年中，“事件”一直是实证的、“客观的”和厚古的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随后遭到了“年鉴学派”的贬斥，但它还是在一种顽固的延续性中生存着。尽管“事件”经历了这几个阶段，但它在史学领域中的突然复出无可否认是与即时史研究倾向相联系的。

事件的两大定义是能引起突变和为大家所知道。事件需要有由它所造成的差异和轰动。总之，它完全可能只是社会变化过程中很次要的、转瞬即逝的现象。如果必须弄清楚社会是通过什么发生变动的，集体的变化何以发生，人们就可以看到，“事件”所造成的往往只是短暂的冲动。应当加以描述的运动往往发生在人声鼎沸的大集市之外，因此，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对这些事件的鼓噪声的注意程度来辨别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史学家如同印第安猎手一样，他们很少关注野兽在地表上发出的声音，却很注重用耳朵俯贴在地上倾听地下的回声；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就是一连串沉重的回响，在过去的50多年中，它经历了从青霉素的发明到口服避孕药的研制成功（青霉素的发明只是在弗莱明的科学发现后才成为一大事件），从1912年布拉格秘密大会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到遵义会议(1935年)上湖南的农民党员领导的地位最终超过了上海列宁主义者的地位；在此以后，冬宫被攻陷，古拉格群岛也建立了集中营；北京换了新主人，而“文化大革命”也呼啸而至。

这些都是事实。但事件也保留着它的特有价值和它的固有

能动性。是否应当把事件看作是"即时研究者"与真正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汇点(如果不说和解点的话)呢？人们试图向"即时史研究者"揭示另一个"领域"。然而，新闻记者和"即时史研究者"之间的区别，也许就在于他们各自把握和确定事件的真实性的能力。

在真正的事件——如奠边府战役、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等——中，变化的力量是与信息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同样也沿着其他的道路发展着，1960—197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对未来世纪的影响就比爱丽舍宫或白宫更换新主人要大得多。但真正的事件就没有界限吗？历史研究活动主要在于研究真正的事件所具有的和谐关系和引起的反响。到2200年，史学研究也许就不再会去注意20世纪中叶一位法国将军的苦难和烦恼了；但那时它仍将重视3个世纪以前英国创建的代议制在法国的解体过程以及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工业化和专家治国论三者基础上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崛起。

事件显然不是自报刊、无线电、电影电视技术出现后才开始的。陈情表的起草和厄尔巴岛的回归，由于直接地和戏剧性地引起了公众舆论的警觉，就成了事件。但自19世纪末以来，上述3种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很可能也确实预示着"事件妖魔"时代的到来，从而使年鉴学派作出反应和反对事件的垄断地位。这方面的论战还在继续。正如实证史学家为了使研究对象科学化，摒弃了即时史，注重研究过去的历史，但同时又没有摒弃事件(从此，事件被小心地保存起来)那样，反对研究事件的史学也同样能够接受即时性概念。巴黎19区一位管子工的日记和对第五共和国时期农村医疗、保健普及状况的系统研究等等，都属于非事件性的即时史。

"即时史研究者"确实具有重视大人物的研究倾向。这首先

是因为在这一层次上出现的重大变动最多，而这也是新闻学训练经常强调的。记者从蓬皮杜总统身上找到了同时代的许多小公务员共有的苦恼；记者要知道埃及人对埃、以和解的看法，也总是先注意议会要员、报界名人和部落首领的反应。记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有其一系列理由。首先是：如果说一个间谍和一个报刊通讯员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责任向他的雇主说明情报来源，而后者没有这样的责任，报刊的调查分析文章只有大量引用多少有点威望的人的话时，才是可信的。其次是因为收集“大人物”的意见极为容易，而且发表意见也往往是“大人物”的本职工作，他本人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扩大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小人物”在新闻报道中几乎总是被遗漏的。小人物即使说了一些真相，也不会有人乐意相信，只有人云亦云的人才会随声附和。这就给对小人物进行调查造成了困难，至少对那些要在短时间内很快组织好资料的人来说是如此。E·莫兰和他的小组为了收集资料撰写那本令人赞叹的《奥尔良传闻》[1]，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对法国一个小的工作场所，对一个企业进行了调查，在这样一个企业中人们的言论毕竟是自由的(当然也不是不负责任地乱说)。即时史研究者最经常接触的社会上层(狄戎本人在叙述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领导机构对他所进行的荒诞起诉时，也几乎只讲到某些等级，对“基层”依然没有论及)不仅是由“重要人物”组成的，而且他们还高踞于司空见惯的常人之上。他们所提供的都是非同一般的、令人惊异的、从未见到过的、极不典型的情况。即使是具备了最全面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知识、最认真的新闻记者，他在从事自己的新闻职业时，也会认为世界只是由暴力、饥荒、冲突和人口迁徙等一系列间

① E·莫兰：《奥尔良传闻》，巴黎1972年版。

题所组成的。他很少会从平凡而真实的日常生活方面来认识一个社会。对他来说，卡比尔人[①]就是游击队，爱尔兰人就是恐怖主义的民族，而洛林的煤矿工人总是一些罢工者的社团。

在我们这样的人(新闻工作者、记者、“即时史研究者”)中间有谁不想通过调查研究来恢复集体生活的平凡性和大众性呢？有谁不想离开这些上层人物来到普通人物中间，去认识一个摆脱了痉挛和冲动的人类、一个仅在日常生活中才表现出来的人类呢？

当然，即时史研究者所从事的往往是新闻记者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受一种建立在轰动性基础上的新闻概念支配的。法国著名报刊杂志的领导人如同书籍出版商们一样，他们更愿出资对不断闹事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调查，而不愿对其他悄然无声的爱沙尼亚人进行调查，他们对喧哗不满的阿根廷人远比对只发出小声怨言的墨西哥人关注。昔日决斗“先见血”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新闻出版界。请让我看看您的鲜血，我将给您发言权……

确实，我们应当推翻这条规则，或使这条规则进一步完善。研究当代的学者在思想上和技术上拥有比过去更完善的装备，他们最终都应该去研究最普遍的层次，各个省、区的历史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写就的，这些历史首先表现为一系列平凡的生活。到那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业余的”调查研究者和专业的调查研究者之间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结合，他们的调查是有质量的、理性化的和不失时效的。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例子，这些例子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调查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工作方法和原始材料，而不是在认识我们的时代所作的

① 卡比尔人(Kabyle)，阿尔及利亚卡比山区的居民，他们曾组织各种游击队抗击法国殖民当局。——编译者

贡献方面有所不同。

7.3 几个模式

即时史研究者既要迅速写作，又要迅速检查资料和增加资料来源，在这种要求下，单独的个体劳动就越来越成问题，甚至变得令人不可思议。我们也许正生活在最后一代个体手工工匠的时代。对于即时性研究和与史学研究活动有关的工作来说，集体研究正在不断出现。就新闻行业而言，伦敦《泰晤士星期日论坛》就是一个极好的典范，即由最好的记者和分析家联合组成工作小组。

特别是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发生时，这个英国记者组在几个星期后就成功地发表了一份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调查报告。法国人在这方面却总是个人主义式的，他们不顾一切地将研究和发现看作是个人的"丰功伟绩"，杰西·皮茨正是在这一点上如此正确地看到了高卢人的这一特性，因此，一些法国最好的出版物还未像英国人这样做(《新观察家》杂志也只将这类集体调查研究局限在一些被称为是"社会性的"问题上)。

在将这种多元化的研究组织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之前，即时史还是可以有大量杰作的。我们当然可以提到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所作的叙述，这是说明即时写作的清晰性和重现当时震撼人心的情景的最好作品。但是，有些《回忆录》却有着很强的内倾性，在写作、出版方面又拖延了不少时日，这样的作品真能称作即时史吗？像维克多·塞尔日的《回忆录》就是如此，但他本人却是20世纪必不可少的历史人物。

我们已经提到过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在何种程度上可

被看作是一部即时史著作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然需要提一下马克思：他从伦敦的一位新闻记者转而成为一位史学家，写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及有关巴黎公社的一系列作品。此外，马克·布洛赫的《奇怪的失败》也可看作是一本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即时史著作。在他的这一本著作中，作者面对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现象，怀着一种刚毅的精神使他的分析精神和文化素养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便使自己和他人去理解、去衡量、去预测、去提出建议和想法。

但如果要刻意探求这一即时史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只能在一部史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在新闻记者的作品中重新找到。在我看来，这就是夏尔-安德烈·朱利安的《前进中的北非》一书，尽管这本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该书写于25年前马格里布地区各种事件风起云涌的时代，1952年夏季出版时，正值北非非殖民化过程中即使不是最悲剧性的时刻，也至少是动荡的年月：突尼斯面临着废黜贝伊的威胁，阿尔及利亚岌岌可危，摩洛哥的宫廷王党与群众力量正在联合起来。

在这一充满紧张、狂热、阴谋以及蛊惑人心之举的巨大漩涡中，作者以顽强的把握力推进着自己的研究，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使他那积极的现场调查结出硕果，并大放异彩。所谓积极的调查，是因为这位史学家当时也是这出戏中的一个角色，他毫无畏惧地写文章，提建议，发警告，参加了论战。作者来回奔波于出版社和印刷所，并根据来自突尼斯的最新电文反复修改校样，使书的内容越来越新，可见作者想立即说明正在变动中的历史的迫切心情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这部作品显示出写作过快、调查时间短促、作者有倾向性立场，后来又发现事实有出入，人们完全可以反对这部作品。但人们也同样可以坚持说：这种幼稚，确切地说，这种主观性

和这种一挥而就的写作速度正是"即时性"的规范属性。人们确实可以写出许多比夏尔-安德烈·朱利安的这部作品好得多的作品用以反映马格里布地区非殖民化的历史，但人们还能从这些著作中再感受到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如火如荼的景象，那种充满幻想、充满义愤的热情，那种同情与博爱精神吗？正是这些情感，把马格里布的战士和他们最勇敢的法国朋友马西戎、莫里亚克和朱利安等联系在一起。

就此我们看到了即时史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也可说是必然性。即时史的诞生不是因为出版商或部长的一时兴趣，它不是一门人们看到其诞生的时髦学科，它的诞生是因为出现了一种生活类型，这种生活类型不仅是充满变动、富有戏剧性(除了某些处于"冷漠的社会"之外，所有的生活类型都是这样)，而且还神奇地牵动着社会的热情。即时史并不是我们时代的"新鲜玩意儿"，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分泌物、一种投影和反映。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发生着突变并能互通信息的世界，它的特性不仅在于一切危机都会立即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管是中东战争、阿拉伯酋长发生车祸，还是波兰爆发罢工；不仅在于这些危机能在片刻间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破坏生产的进程或冷酷地判决整个民族（萨拉热窝谋杀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例)，还在于这些文件将立即为公众舆论所获知、所感受并引起忧虑。正是这一信息沟通的即时性才推动着即时史的发展，这种即时史犹如一个模模糊糊的信息社会所发出的种种模糊信号，它有权要求在将来对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1952年，整个世界每时每刻都为北非发生的事态所吸引。不管重要与否，每天早上我们醒来便会收到很多信息资料。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召唤像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这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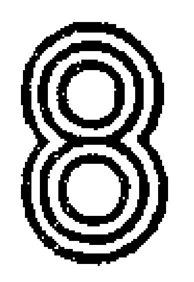
要他们充满激情地投入世界的漩涡中心，要他们运用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科学武器和清晰的快速分析，来说明、解释、整理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资料。西方社会是为了获取观察自己死亡的手段以便最终能有生存的机会，才着手使口头史与文学史互相接近的吗？一个世纪前，在拉维斯与罗什福尔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半个世纪前在皮埃尔·勒努万和阿尔贝·隆德尔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但在今天，除了既研究“令人讨厌的大事”，又研究朗格多克地区的犁铧演变这一巨大的史学研究潮流外，一种来自基层的共同激情，也迫使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即使不能相互联合，至少也要谋求相互交流信息和研究方法。新闻工作者和即时史研究者都已向对方开放了自己的档案资料。史学家们知道如何看待现时，也知道如何运用他们的职业的严谨性来分析现时的种种突变。

史学作为一种研究变化的科学，是否通过文化对自然的作用来描述结构变动？我们重提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取消“即时史研究者”的研究。如对1970—1980年期间和从蓬皮杜总统到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期间巴黎与汽车工业之间的关系作一严密而细致的调查，那么其结果就足以说明文化的变化和法国社会的变化。

为了给即时史寻找一个定义，“即时史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他们努力实践着的这一学科，确切地说，并不是研究上述变化，更不是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学科。正如马尔罗开创悲剧存在主义和文学存在主义道路时通过《康庄大道》主人公之口所说的那样，重要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正在发生的死亡”。因此，“即时史研究者”首先注意的是这一存在的过程。

“即时史研究者”是这一历史研究活动的承担者，他像常为

喜马拉雅山登山者担任向导和脚夫的舍尔巴人一样，肩负着事件这个重担，身后留下了一串粗大的脚印。他也许不值得我们向他进言，建议他把旗子插在喜马拉雅山之巅。但是，他却在陡削的山坡上探路、钉扣钉、安界石。他在歇脚的帐篷中将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历史人类学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è Burguière,1938—)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大学等院校学习，并获得学士、硕士等文凭。他主要工作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和研究主任。1969年起，比尔吉埃尔进入《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任编辑部秘书，1975年起任编辑委员会秘书，1981年起为编辑委员会成员，从而与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马克·费罗、雅克·雷凡尔等人一起实际负责这本在国际学术界有极重要地位的杂志。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方面，家庭的结构及其演变、人口的结构及其运动、社会宏观分析的展开，以及历史人类学的长时段研究等都是他关心的主题。他的主要著作有：《布罗柴维的布列塔尼人》(1975年)、《第三世界与左派》(1979年)、《一个民族在它的历史中》(1982年)、《家庭史》(1986年)等。比尔吉埃尔被认为是新史学年鉴

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编译者

“史学家由于要叙述重大事件，不得不去注意那些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他表现的只是帝王将相及所有这一层次的著名人物，这些人物的智慧或错误、手段或阴谋给国家带来厄运或繁荣。但是还有那些城市里的资产阶级、茅草房中的农民、城堡内的贵族绅士，总之在工作、娱乐着的、和他们的妻小一起生活着的法国人，这正是史学家没能向我们介绍的人们。”这段话并不是善于指出史学家不足的吕西安·费弗尔所说，而是一个与启蒙时代同时、但又不那么著名的人说的，他叫勒格朗·多西，我摘录的是他3卷本《法国私人生活史·致读者》中的一段话。此书出版于1782年。这几行字颇清楚地勾勒了已被事件史所忽视而近来又被史学研究所日益重视的领域。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它的复兴。

8.1 一个概念的历史

勒格朗·多西的研究方向的意义在于：这是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上述引文就是证明)，但他仅仅跨出了第一步；这还是一种“食品史”(3卷本的)，有着丰富的信息和浓厚的现代气息：它既是一部食品史，也是一部技术史，又是一部饮食习惯史。作者在这里是按照一个主题计划来进行研究的，从而表明他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结构着手而不是从事件着手。对于他来说，道德习俗史并不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现象和革新现象可以说清楚的，而是要通过各种世代相传的(因而是持续的)

行为举止和各种适应或创新现象这两者的长期结合才可以说得清楚。

8.1.1 先驱者们

在勒格朗·多西的时代，这一类型的主题已从历史学领域中消失或至少是退居幕后了。自从17世纪末以来，造诣很深的考据学(主要是那些圣莫尔的本笃会修士们)已抛弃了对《圣经》资料的解释，出版国家的档案资料。王室行政系统又鼓励发展对政权史的科学研究，并为此提供方便。这是一种双方的持久结合：世俗政权设立了国家档案基金，从而向史学家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手段(这些研究都是以材料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史学家也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事件和国家机器的运行上来了。最后，大部分的哲学运动都发展着一种理想的和政治的概念社会：人是出于对自由、公平和理性的需要而聚合的群居动物。就人只有在国家生活中才能获得社会性这一点而言，研究社会的历史就应当局限于研究国家生活的历史(如政治史、政权史、不同政治制度的历史等)和文化构成(艺术和文学)的历史。

正是这一概念才启示着孟德斯鸠写下了《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伏尔泰撰写了《路易十四时代》。这一概念体系还推动着百科全书派的一系列著作及稍晚的马布利、孔多塞的一些著名著作。然而卢梭的学说却别具一格：如果说卢梭历史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表现在《社会契约论》中，从而适用于政治领域的话，那么他是将社会看作历史的产物，历史的一种不幸产物，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实体。同样，他假设存在一种原始的、前社会的人类历史，因而他也意识到建立历史人类学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布封[1]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人类学的史学只是在没有

历史的民族中，也就是在野蛮民族中才可能找到。

如果这些没有文字也没有“文物”（在18世纪“文物”一词是指所有能证明过去的物体）的民族有其自己的历史，而这一历史能说明他们的文明的话，那么人们就应当在他们的穿着方式、饮食方式中，在他们家庭生活的组织中，在他们的两性关系中，在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仪式中才能找到这一历史。道德风俗在这里是历史的承担者，因为它们取代了政治制度的地位。

在启蒙时代的余辉中，一些旅行者、知识渊博的医生或行政人员已于18世纪末期以一种人种学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上的社会，特别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勒格朗·多西便属此列。在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这一潮流逐渐在夏普塔尔和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统计中心的工作中高涨起来；这个中心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收集一些有关法国生活方式的资料。但随后克尔特人研究学院使该中心转向研究历史残留物及祖传秘诀，使它完全失去了改变史学研究方向的机会。

然而，在作为启蒙时代副产品的这一潮流中还存在着一种很古老的传统，这一传统在18世纪还很出名，它体现在一系列题为《历史描述》、《自然史》（按照传统方法说明某一个省份或国家中的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的著作中。这就是研究这一社会或地区的习俗史和生活方式史。

这一观念甚至和史学精神一样古老。我们往往忘记：希罗多德，作为史学之父，他在“为了不使时间消蚀掉人的劳作”而作的“调查”中，感到需要详细描述吕底亚人、波斯人、马萨其人或埃及人的习俗，以便解释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冲突。史学

① 布封(G.L.L.Buffon，1707—1786年)，法国自然学家和作家。著有《自然史》和《自然的时代》，有颇大的影响。他已开始觉察到物种进化和宇宙的变动。——编译者

家在历史中所研究的正好就是他在现实中要理解和证明的东西。自从人们把研究日常生活形式作为勾划文明的发展过程和进步的主要着眼点以来，研究日常生活形式就成为史学思想的一部分。但是，自从新型的民族国家一形成，就采用群体的记忆，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它们在某个地方的统治及其组织社会的方式，这时对日常生活形式的研究就变得多余了。

实际上直到第三共和国初期，在法国一直并存着两个历史学派：一个学派更注重叙述事件、接近于当政的精英阶层和政治论战，它继承了编年史学者的衣钵，注重于揭示制度和政治冲突的起源；另一个学派更强调分析，它继承了启蒙时代的哲学，注重对社会道德、习俗和社会行为态度的描述。如果说到1914年前，前一学派一直谴责后一学派只是沿着实验性的、非专业性的歧路前进的话，这是因为前一学派比后一学派更好地确立了自己的科学地位。一些新兴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的发展，更促使史学来重新确定自己更为狭隘的研究领域，局限于研究国家问题和政治问题。在知识阶层中日占上风的科学化理想也推动史学按照实证科学的模式来建立严格的方法：对于史学来说，相等于生物学中的细胞、物理学中的原子的东西便是可以观察到的现实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就是历史事实，也就是在国家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事件。

但实证史学的这一变动并不是完全与史学知识当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无关的。由于周围的实证主义对资料考证工作大加赞扬，这种工作被理解为是对史学知识的经验资料所作的必不可少的对照，国家就大力收集和组织国家档案资料。为了遵守实证史学为自己所规定的科学性的标准，史学研究试图把社会记忆混同于民族记忆，再把民族记忆混同于国家记忆。所有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现象都可能为史学家们所忽略，这不仅因

为这些现象不符合一种有意识的和自觉的行动，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游离于历史运动之外的。

然而也不应当对19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路线描述得过分简单，特别是不应当忽视在米什莱著作中达到顶峰的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一潮流对一些史学大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完整地再现过去”这一计划促使米什莱不但要求描述政权的形式和变迁，而且要描述人民大众的生存条件。当他以喝咖啡对18世纪法国社会上层阶层的行为和情感的影响为例，说明饮食方式的作用时，当他描述了深受食品危机和大众悲惨境况而影响的路易十四时代悲剧气氛时，米什莱是基本通过人种人类学的方式来间接论述和研究历史现实的。

这样，我们就不必对实证史学对他的反对感到奇怪，也可以理解吕西安·费弗尔为何相反把他视为情感史、心态史的大师了。米什莱注重直觉（材料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要再现的现实所具有的征候而已）和情感同化的能力来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看法和感受方法，这种研究方式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研究潮流是格格不入的，这一潮流所希望的是将历史知识建立在对历史现实的客观和科学研究上。

然而正是由于几乎是神秘的群众主义，由于赋予历史中部分是无意识的重大群体运动以重要意义，由于轻视大人物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米什莱才使实证史学派无法接受，却受“年鉴学派”的创立者们的青睐。

8.1.2 “年鉴”学派

由于历史学领域缩减到只对国家生活进行研究，一种范围狭窄而又集中的概念体系就形成了；这一概念体系不仅反映了

历史学的变动状况，也反映着社会本身的状况。正是因为反对这一概念体系才形成了“年鉴”学派。如同印象派画家号召人们走出画室、到大自然中去“直接”画大自然一样，年鉴学派创始人鼓励史学家走出政府和议会圈子去“直接”观察社会集团、经济结构等，总之从最广泛、最深刻的层次上去把握每一个社会。

正是研究最久远时代的史学家才最容易接受年鉴学派的要领。当代史研究者们对年鉴学派观点的冷淡，确切地来说，不能归咎于政治的保守主义：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代表人物为塞纽博斯①，他是年鉴学派的主要论敌)鼓吹左派观点，在他们的史学实践中倾向于宣扬革命运动的价值。但在这些冷淡的背后则隐藏着一种历史变化的等级概念：他们认为历史变动必然通过领导人物(如政府领导人或革命领袖)和政治制度（如国家机器、议会、政党等)来体现的。根据这一概念，只有能够从远近多方面说明政权掌握者及其对社会看法的事物，才具有历史意义。

年鉴学派方面，他们在推行着一种群众主义：除显要人物的历史外也应给小百姓历史一个地位；在一个遗传继承的社会行为系统之中和一个表面上持久不变的空间环境之内出现过一些诸如改良过采伐技术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们是和赢得了一次战役的将军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历史人物。但年鉴学派观念的更为深刻之处，是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一种从多种范围研究社会现实的观念之上，社会现实的每一个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层次，都既表现着其特定的历史，同时也通过一种联接模式而与其他层次相结合，从而显示了一个社会的运动。对于年鉴学派

① Ch・塞纽博斯(Seignobos)，实证史学家，著有《史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1901年巴黎版；和C.-V.朗格卢瓦合著：《历史研究导论》，巴黎1898年版。

创始者们来说，日常生活史只是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一种方法。那么是否今天只要把日常生活史这块招牌翻翻新就可以称得上历史人类学这个美名呢？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其研究领域来界定它的话，也就是像研究与特殊性和事件性的东西作对照的习惯性的东西那样，我们还会有走老路的可能。如果这一研究被看作是对一个时代的生活环境进行描述，那么我们就回到了最传统的日常生活史去了。从A·富朗克兰的鸿篇巨制《历史上的私生活》(12卷，1890年版)到年代近得多的《日常生活史》系列丛书，都可见到同一类型的既引人入胜又可有可无的考证研究；这一研究类型将日常生活形式看作是重大历史的装饰，而这一重大历史便是通过领袖人物的意志和政治制度的变更来体现的。

8.1.3 历史人类学的领域

如果对历史习惯性层次的研究只是对作为政治决定和政治冲突基础的社会、经济主要平衡力进行分析的话，那么这也只能算是经济、社会史而并非什么其他的学科。以所用材料的类型来界定历史人类学，看来也不见得更合乎情理些。日常生活史从使用叙述性的、外在的材料到使用系列性的材料，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使它成为历史人类学，而只是向经济、社会史方向演变。这也正是年鉴学派创始人所希望的：他们主张通过分析市场价格表或什一税账目来研究农业生产的起伏，通过分析公证文件档案来研究财产分割和家庭遗产的演进，通过教区记录(现代公民身份证明的前身)来研究人口运动。但这些材料只记录着原始信息，并不包含任何看法、任何反映现实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促使史学家把材料重新分组，如采用统计

处理来揭示演进的趋势和逻辑。

这一研究途径和方式能够导致一种人类学思考的产生。如同人种学家利用他所看到的存在于他自身所处文化与他研究对象所处文化之间的距离，来摆脱他固有的等级观念，以建立他所研究的社会的逻辑系统，史学家也能利用这些原始材料的零散性和未经加工的特点——在显而易见的现实背后——找出能够解释某一情况(所谓一个时代)或某一演进的机制和逻辑。对性质明确的材料或文学材料也能采用同样方式，如果这能使人们有系统地对某个社会的主要论述所掩盖的和忽视的内容感兴趣的话。马克·布洛赫在他《国王的幻术》一书引言中写道:“我很怕我对之寄于期望的人不止一次地将我看作是古怪的，总之是毫无意义的猎奇的牺牲品。”如果此书对于历史人类学来说仍是一本典范性杰作的话，那就不仅要归因于布洛赫研究的问题本身，还更应归功于他研究问题的方式和他为了直接揭示已被埋葬的表达系统所使用的迂回艺术。

没有什么再比对法国、英国君主制的研究更传统更唠叨的了。但那些专家们，其中包括那些对专制主义理论、神权君主政体感兴趣的人都把庆典仪式的过程（一般是在加冕典礼结束后)丢在一边，正是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君主实施着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对于这种仪式的遗迹残留，就是最落后的见证人也认为它只具有一种多少带点民俗色彩的趣事轶闻价值。然而，法、英君主制仪式的这一怪现象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工业化时代，它不仅将英、法区别于其他欧洲君主国家，还揭示着君主制形象具有魔力的方面，这些方面一直残留在群体表象中。马克·布洛赫指出:“在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民俗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要比任何理论学说都经久。”同时，这也表明了一条从民俗研究走向真正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道路。长期以来，民俗学只是一些

寻奇探胜的业余研究工作者才感兴趣的，如今由于它的社会边缘性才给史学家带来了意义。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看没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的意义。真正的权力不一定总存在于它所表现的地方，这就是为何人们常常感到政治制度史只是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如果要想证明法国国王或英国国王的基本职能就是当欺世盗名的江湖术士，这当然是荒谬的。但是一再重申存在于仪式中的这一初始的或神秘的职能，这就证明这种职能对近代还继续有着它的意义，它象征性地并具体地创立了王权的神圣特性（因此也是一种合法性），而这正是制度或法律家所乐于肯定的。

所有这一切的发生过程，如同每个社会为了生存而需要破坏自己的透明度，为了自己和外部世界而需要搞乱线索。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已经熟悉了这一构成所有社会现实特点的模糊性原则，他们知道应当绕过一个社会自己所宣称的东西才能理解这一社会。相反，史学家却难以摆脱这种官方神话的束缚，尤其因为他们自己也常常致力于创造和传播这些神话。研究一种与君主制相关的仪式史、研究像耕犁和轮作制等内容的农业技术史、追踪肉类消费或种种"调味汤汁"的演进、寻找法国旧制度时期避孕方法的出现日期和对它进行解释。上述主题没有一个可以归属于历史学中的另一个部门：不论是政治制度史、技术史、经济史或人口史都不能包容上述主题。因此，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

8.2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

上面提到的上一世纪末A·富朗克兰的《历史上的私生活》一书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一书，研究的都是同样的一些主题：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等；前者主要研究法国，后者则研究前工业社会中的世界。A·富朗克兰只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历史汇编，而布罗代尔则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指出主要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表现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

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但又有哪一种习惯不是心态的呢？马克·奥热在论及权力的人种学时说道："我们也许可以将史学和经济学规定为研究各种力量的关系，而将人类学规定为研究各种权力的关系。"①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是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

我们将避免把我们给历史人类学所下的定义当作一种定论。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

① M·奥热：《生死权》，巴黎1977年版。

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今天它如同50年代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一样，正吸引着大量的新方法和新研究课题。如果我们观察一下30年以来《年鉴》杂志内容的演进，就会看到杂志以一种特殊的明确性反映了史学理论的这一变动。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列一个反映历史人类学最新成果的表格，因为即使我们只限于法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那也是无法做到齐全的。我们只希望指出在目前史学研究和论战中某些堪称典范的中心要点。

8.2.1 饮 食 史

在"饮食史"这一名称下，《年鉴》杂志于50年代末刊登了一系列调查结果，这些结果最近由J·-J·埃马尔丹凯汇集出书，名为《研究饮食史论丛》(1970年)。当时这一系列调查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种消费史：其中包括分配给船员、宗教团体成员或医院的寄宿者们的定量食品，包括一系列既表明食品质量又表明食品数量的资料，最后还有工资合同(如同E·勒鲁瓦·拉迪里借此研究朗格多克那样)，这些合同以食品定量的形式规定雇佣者必须向日工或帮工提供的实物；这些因素勾划了一条群众消费长期变化的对比曲线，从而间接反映了经济、人口的变动：从15世纪直到16世纪初肉类消费定量的上升反映着当时"人口稀少"和畜牧业的丰收状况；随之而来的情况是，在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在低层群众阶级的食品构成中肉类消费定量的不断下降，直至基本消失。这一时期的人口压力和农业产量的固定性导致了扩大一般农田面积，从而缩减了畜牧用地，使牲口数量下降。小佃农所得和收入的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人数最多的阶层的食品消费结构趋向贫困化。

一个简单的机制(几乎是太简单了)使食品结构服从于"马

尔萨斯的剪刀差"，也就是说服从于人口负担和可供使用资源两者之间的剪刀差。但是通过直接由经济和社会平衡机制操纵的演进过程，一些反常的、不规则的阻力或发展路线也表现出来：如玉米所经历的奇怪的发展路线，玉米开始是由第一次旅行美洲的人带回来的，被西班牙的消费者有保留地接受。在法国，玉米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被接受和种植，而且好景不常，而在巴尔干半岛却广为传播。然而一个世纪以后玉米正是在"土耳其小麦"这一名词下才重新传回到法国，从而进入了不景气的西南部农业系统，并使当地居民渡过周期性的饥荒。同样饶有兴趣的是油橄榄树种植，已于16世纪在法国传播：它是从南部向北部发展的；油橄榄树在占据了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地区后，给群众饮食提供了动物脂肪宝贵的代用品，而当时在一般群众的餐桌上是很少见到动物脂肪的。和一般年代顺序及文化交流顺序相矛盾的是，正是在西班牙人大肆驱赶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并追捕"改信宗教者"的时候，他们才广泛地把橄榄油作为调味品，而在以前一段长时期里，橄榄油是被西班人视为异教文化的标志的。马克·布洛赫在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的一个条目里谈到："总之，饮食史如同一架录音机，由于心理方面的阻力而在稍晚的时候记录着所有经济的兴衰更替。"①

即使受到食品匮乏和饥荒的压力，如果食品革新并不适应当地口味特性的话，它也无法被采用和推广。举例来说，在法国并不是那些拥有最适宜土地条件的地区最先接受土豆的种植，而是那些能够用土豆来代替传统基本食品（也就是说栗子）的地区（利穆赞和奥弗涅地区）才最先大范围地种植土豆。吕西安·费弗尔通过调查而绘制了脂肪油和调味品使用情况的地区

① M·布洛赫：《旧日法国的食品》，载《法国百科全书》。

分布图，从而揭示了在当代法国饮食习惯中地区性口味和分隔的令人惊奇的持久延续性：从一系列的食物偏好中，人们能够看到植物种植的迁移(如油橄榄树向法国北部的扩展情况)，能够看到一直食用猪油的旧农业系统在法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变为牧场和奶制品产地的情况，也能够观察到消费植物油的汝拉省南部和消费牛油的北部之间的耕作分界线。

饮食习惯的差异性和持续性及其对于经济界变动的相对不敏感性，是否只能用人们坚持饮食习惯的机械论来解释？饮食偏好确实是文化特性的一个主要支柱，但这些偏好同样也是社会分化分隔的产物。近来对饮食史研究的兴趣，尤其是那些与《年鉴》杂志所发起的有关物质生活的调查相联的研究饮食史的兴趣，是只研究那些社会面貌在其中十分清楚的材料，如果对于咖啡、烟草和烈性酒等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或在社会中的发展情况没有办法予以确定的话，那么这些新产物的引入对于史学家来说是很少有什么意义的。

不仅其他资源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划分不平等地分配的，而且建立在农业生产和交换基础上的可供使用的食品资源也是以一种不平等方式来分配的，而且人们还可以确定：直到工业化时代的初期，由于食物是反映生活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志，因此，口味也以一种炫耀的方式表示着社会不平等，这一方式要么以浪费式(统治的标志)，要么以对一些食物使用上的克制(被统治或依赖的标志)来显示。直到18世纪，喜欢各种调料和喜欢重辣的菜肴还是贵族美食家们的典型口味。反之，直到20世纪初为止黄油同样也在布列塔尼农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小农来说，这是主要的常常是唯一的货币来源，因此他们在生产和出售了全部黄油的同时却禁绝了他们自己对黄油的消费。一些民俗，尤其是有关偷黄油巫婆的传奇故事等，都证实了这种消

费被禁绝的情况。

社会分隔和社会对抗都表现在饮食习惯中，面包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每一个社会等级消费一种特殊的面包，因此，奥利维埃·德塞雷把这些不同类型的面包和三个社会等级联系起来。马鲁万于1766年宣称："我们让人民吃黑面包是为了不让他们染上浪费恶习。"大众阶级实际上是消费着以小麦与黑麦相混合的面粉为基础的"麸皮面包"或"高脚面包"，这些面包最黑而又最富有营养。上层阶级则吃"夏庇特面包"，这种面包很白，用筛得很细的小麦粉做成(相当于现今的切片面包)；要么吃"戈耐斯面包"，一种很好的小麦面包（相当于现今日常消费的面包)。

"如果他们(指人民大众)没有面包的话，那就让他们吃奶油圆球蛋糕，"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一刺激性的和假惺惺的话语，充分说明了与旧制度时期面包消费相联的社会符号系统；此外，这一话语也具有预言性，因为不久的法国大革命就宣告所有人都有权吃奶油蛋糕。更确切地说，法国大革命对面包的成份作了严格的规定，促使城市人民去消费白面包：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征服，但又是营养学方面的退步，因为对于富人来说，这些精制而又缺少卡路里的白面包代表着一种辅助食品，它在大城市中都逐渐变为群众消费的基本食品。土豆则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历程：直到法国大革命，土豆一直不受贵族欢迎；而在19世纪土豆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社会上升"过程（马克·布洛赫语)。

在一系列有关19世纪饮食口味的著作中，让-保罗·阿隆指出烹饪艺术怎样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种优先投资场所。[1]

① J·-P·阿隆：《论19世纪巴黎的饮食口味》，巴黎1974年版。

在得到了能上贵族餐桌的佳肴特权，以及受到意大利口味的合理化影响（这一口味以从咸到甜的顺序上来）后，美食学在大革命期间进入了一些由前王公贵族内厨好手开设的高级豪华餐馆。在19世纪美食领域成为社交的场合，资产阶级在这一场合倾注了自己的享乐需要和大摆阔气的需要。面临城市无产者的食品低劣匮乏状况，美食以精致、浪费来确定其地位。因此，在饮食行为的演进中，我们既可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又可以研究文化系统史。历史人类学的明确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学科的交叉点。

8.2.2 体质体格史

直到晚近时期，人类学在法国指的还是对不同人口的体质体格特征及其演进的研究（这也是人类学在18世纪的原意）。通过与英美语言中关于人类学一词用法的混淆，现今它已包括了人种学（或民族学）的领域。但由于史学家们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矛盾观念，他们在确定研究人类学的第一层次方面花费了最多的时间。他们的研究被一个前提式的问题所困扰：身体是否是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是否能够在物种演进与生物周期之间确定一些更为复杂的与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有关的变化形式呢？

人们在体质方面的变动是否应当被看作是社会变动的一种形式？由絮特医生领导的以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综合工科学院考生身体测量资料为基础所作的研究，以及最近出版的以E·勒鲁瓦·拉迪里和历史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组从新兵体质测量材料出发所作的研究，[①] 都明确指出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平均身高

① E·勒鲁瓦·拉迪里和J·-P·阿隆：《法国新兵人类学》，巴黎1972年版。

的不断的增长状况。这一身高的增长，特别是通过低身材人口的下降所显示出来的这一趋势，似乎是与经济进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相关联的：19世纪以来平均身高增长最明显的地区是法国北部、东部，而这正是法国最发达的地区。身高增长也同样随着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婴儿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食物结构，以及成长期的个人生活方式的所有因素(其中也包括他的教育)都阻止或促进着他们的身体发展。从统计数字的关系来看很容易证实身长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有相关性，这种证实也许是太轻易了点。生物学目前的研究倾向是否与史学家的解释相容呢？前者否认环境对人体遗传特性的世代交替变动有影响，后者则将社会经济环境看作是人口体质一切变动的原因。

近来对疾病史和时疫史的研究工作使人们注意到既不能完全相信单纯生物学观点的解释，同时也不能完全相信单纯社会经济观点的解释。例如，在有关前工业化时代欧洲高死亡率的问题上，人口史学家(特别是J·默伏瑞①、P·古贝尔②、A·巴雷尔③等。但巴雷尔还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观点)强调谷物价格飞涨和死亡率急剧上升危机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青黄不接的月份(也就是在新的收成来临之前2—3个月)中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一日程本身已揭示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由于一次坏收成而引起的价格上升，从而使粮食库存迅速耗尽，进而使最穷困者陷于饥荒的境地使死亡率上升，尤其是在收获年度的最后几个月中。众多的资料(如地方长官的通讯文件等)和死亡曲线——这一曲线在夏季几个月中常常又形成新的高峰，都

① J·默伏瑞：《收成和人口》，载《人口》杂志，1946年。

② P·古贝尔：《博韦和博韦人》，巴黎1960年版。

③ A·巴雷尔：《下普罗旺斯农村地区的一次人口增长》，巴黎1961年版。

证明由于饥荒的刺激而引起的死亡率的上升又因时疫而持续，而时疫的入侵又是因为饥荒削弱了人们的抵抗能力。

至少在17世纪，时疫现象与小麦危机的周期性节奏相吻合，时疫现象只是扩大了社会经济灾难的广度。瘟疫病菌只是在人们由于食品不足而变得衰弱、变得无法抵抗病菌侵袭时，才显得具有危害性，才带来大量的死亡。确实，这些食品危机的出现仍然可以说是由于气候的偶然变化，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其真正原因还是与社会不可分离的；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矛盾和困境规定了人们的生理命运。

对于史学家的人类中心论来说，上述解释方式显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致人们试图将其扩展到解释所有类型的瘟疫。然而，如果举例来说，在1348年，由于当时欧洲已经人口过多，以致人的生理已处于易受攻击的衰弱状态，从而爆发了黑死病（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是事实的话；如果说在摆脱了周期性巨大饥荒前（最后一次是在1709年可怕的冬天），法国从未彻底摆脱过瘟疫的侵袭（最后一次是在1720年马赛发生的大瘟疫）同样也是真有其事的话，那么还有多少次时疫不是在坏收成的情况下蔓延的呢？就法国而言，人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法国似乎在征服了瘟疫以后，它还继续在18世纪遭受到天花、粟粒热周期性的袭击，在19世纪遭到霍乱的周期性侵扰。

M·D·格尔马克近来提出关于一种独立的、纯粹生物学的传染病史假设。① 某些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中具有传染性的疾病随后又减少了，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终于能够征服了这种疾病，而是因为又有另一种病菌取代了它的地位。所有可能发生的疾病，其病源体并不是一直在运动着，也不是从开始就一直在整个地球上同时存在着的。E·勒鲁瓦·拉迪里指出，世界

① M·D·格尔马克：《疾病史研究初探》，载1969年《年鉴》杂志。

性人类生物层次的统一化是一个在美洲发现以后很晚才出现的现象。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并不会在同一时间里面对所有细菌的威胁，而是在一定时间中面临按照一种不相容性机制而演进的一组疾病和一组疾病的分类系统。一种新病菌只有在驱逐了自己已成为其克星的原有疾病时才能进入发生系统。例如麻风病与结核病就互不相容，这就解释了近现代时期结核病的上升在欧洲为何正好与麻风病的消失相吻合。根据M·D·格尔马克的说法，在瘟疫病菌和假结核病菌之间也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

正如存在一种气候的自然史一样，否定一种时疫自然史存在的可能是荒谬的。再以1348年的黑死病为例：当时瘟疫的流行至少是两种变化的结果，一是老鼠种类和数目的变化，一是欧洲人口的变化：黑鼠向欧洲的迁移给瘟疫提供了一种基础，再加上人口的密度增加，黑鼠就成了瘟疫病菌的储藏所和持续性的媒介。只将这些瘟疫现象置于社会经济背景中，还不足以具有一个历史维度。如果这些现象看上去是受一些生物机制支配而社会控制力量又对此真正无能为力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要隐瞒这种独立性了。但是重构一种时疫现象的历史，这同样也是分析一个社会的组织、文化规范用来理解并对付自然环境的限制的方式；这同样也是发掘每一个时代通过其生物的行为所表示的社会目的和联系人体的各种方式。历史人类学在这一领域中的特殊任务，便是突出自然限制和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结合机制及结合点。举例来说，我们能够注意到从精神病学术语意义讲的歇斯底里行为，由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逐渐消失，但这些行为的一些最古老的表现，及其在残余的形式和强烈的仪式化形式下的表现还时有出现：意大利人种学家德·马尔提诺所研究的布依地区"蛛舞"仪式就是如此。

这一行为的消失也许和一种情感表现方式，特别是人体表现方式的转变相一致。在一个重视组织、节约和效率的经济系统中，人们的行为举止被推向实施一种最大程度的纪律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实施一种最省体力的办法，是在寻求一种随大流的立场和中立性，以便在社会组织中保持和谐一致性和灵活性。相反，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在一种禁欲的和压抑的宗教模式的驱使下，当人们要摆脱一种焦虑和争执的形势时，在农民和城市平民阶层中还残留有一种借助于身体动作的语言，用身体的动作来表达受压抑的冲动。E·勒鲁瓦·拉迪里曾以弗洛伊德初期的一些理论为指导，很好地分析了这些形式在宗教冲突中的表现。对巴黎地区群众性冉森教派的表现形式之一，即圣梅达尔墓地"痉挛狂热分子"之类的鬼魂附体现象，也可作这一类型的分析。

诺贝尔·埃利亚在他的一本经典性的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行为模式，特别是有关在欧洲文明中人们使用身体动作作为社交工具这种模式的演进的一般假设。① 从16世纪开始，一个文明化的过程首先迫使统治阶级，随后逐步通过教育的模式（特别是一系列"儿童礼貌"的实施），迫使整个社会对生理机能有了一种羞耻感和自我遵守纪律的态度，对肉体接触也有了一种提防之心。在个人行为中对肉体的遮遮掩掩和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正反映着刚形成的国家官僚体制在个人行为方面对社会所施加的组织化，也就是现代化的压力。分属不同年龄组的人相互疏远、对不正常人保持距离、监禁穷人和疯子、地区间团结减弱等，这些现象都属于同一个普遍的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改革人身在社交中应持态度的整个运动。

① N·埃利亚：《道德习俗文明》，巴黎1974年版。

关于这一人体动作社会化的复杂历史的研究，今天正朝其上游(也就是中世纪时期)发展：像捉虱子这种常见的生理习惯动作，在13世纪时是一种普遍见之于所有社会阶层的社会公认的习惯(如同我们在蒙塔尤地区所见到的那样)；到了16世纪初期，这一行为就只限于平民阶层了，到18世纪则只在农民中还有这样一种不礼貌和令人讨厌的习惯了。相反，用手臂表示顺从或辱骂的动作，却令人惊异地一直被收列在13—20世纪人身表意动作大全之中。由雅克·勒高夫领导的有关人体动作史的调查，能够使我们通过对身体的使用技术和代替语言表意的风格演进来揭示构成人体社会史特点的一系列机制：暂留和转变机制、竞争机制、抗拒和模仿机制等。

8.2.3 性行为史

没有什么问题比性行为史更能说明要想给历史人类学规定一个领域和一系列特殊主题是多么困难的了。然而，也没有什么其他研究方式能像这类研究途径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希望了。如何使性进入史学家的领域？将性看作是一种习俗？人口学材料和法律方面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参考基点，从这些基点出发，我们能够整理出性习俗的演进过程：在法国，从17世纪中期开始教区记录中有关出生的系统记载，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教区、一个小地区或一个城市出发，整理出一条从那时直到旧制度末期的非法出生和婚前怀孕的曲线，同时也能使我们追踪婚外性关系的变动情况。从还未十分明确的事实出发，J·-L·弗朗德兰提出了一个假设，① 甚至在旧制度道德控

① J·-L·弗朗德兰："基督教西方世界的避孕、婚姻和爱情关系"，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9年。

制最严格的时代，也都并存着两种性行为方式：一种是禁止实行避孕的夫妻性行为，另一种是使用避孕的婚外(要么在婚前，要么是婚外)性行为。这两种行为在17世纪是由宗教决疑者们通过细致的"区别"方法而侦知的，除此之外也难以用更直接的方法来获知了。然而决疑者们像桑谢(他认为一旦夫妻间犯了奥纳昂罪，即避孕行为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之类对上述两种行为所作的区分，将含蓄地鼓励这种性行为的二分法。即使我们认为一种婚外性关系特殊行为的可能性是次要的，但非婚生子女出生率的记录也明确表明它并不低于合法出生率的记录；不管法律机构和社团力量的监督是如何地严厉，由于流产、杀婴，特别是秘密分娩，以及因通奸而造成的虚假的父子关系等原因使每个时期都有大量非婚生子女的出生被隐瞒。

诸如J·德布[①]从妊娠申报材料出发对南特市所进行的这类研究，能够使人们对上述现象有更为明确而详细的了解，从而使分析更为深化，如果人们在教区记录中通过一种明显的非婚生子女出生率的上升现象，观察到18世纪下半期存在着一种婚外性行为的飞速发展情况的话，那么就特别应当注意到，这一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上升的新趋势其实反映着一种新的爱情和道德氛围：这些非婚生子女的出生已越来越不是那些主人与女仆间的私通或是社会礼仪所不允许的、双方根本不可能结婚的爱情冒险的产物。这时的非法出生儿却越来越多属于门当户对的男女双方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结合本来是可以通过结婚得到确认的。

确实不要低估人口学曲线的价值。虽然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本身只是表示了一种不明确的倾向，那么这一出生率与婚前怀孕率的平行演进则具有明确的意义。然而，我们现时所拥有的

① J·德布："合法的爱和南特的社会"，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3年。

从各乡村和城市教区专题研究中发表的反映法国不同地区的所有曲线，虽带有一些细微差别（如更为松弛的诺曼底地区和更为严格的巴黎盆地），但都指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在17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初，非法出生率和婚前怀孕率是很低的，但是相反，几乎所有的曲线都指出从18世纪中期开始非法出生率及婚前孕两者都有大幅度上升的现象。这是人们性行为和性道德不容置辩的转变的标志。

但是如何解释这一演进呢？我们所目睹的，究竟是一种新的性道德和一种新情感的产生呢，还是单纯地因为天主教的改革放松了以前它所向往和强行实施的禁欲主义苦行规范的清规戒律呢？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期教区记录的空白或者说空缺，阻碍着我们将上述曲线再往前追溯。其他一些数据价值差的材料如法律文件(王室的、教会的或地区性的)或见证的材料，也可使我们了解道德氛围和行为方式。J·罗西奥对15、16世纪罗讷河流域一些城市性犯罪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对青少年和男性性方面的问题持宽容态度的社会形象：如那时广泛流行的娼妓，不仅不被认为是下流无耻，还常常出没于官方场所及高级男性社交场所，这些场所是由市政当局管理或至少是控制的。① 当时强奸案例频繁，而且制裁得软弱无力。

最后，当时的文字材料在讲到作爱之事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放纵语气，也能说明问题。私生是一种能得到社会宽容的缺点，并广泛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表示一种相当自由的道德伦理在统治着社会的整体。16世纪下半期开始妓院逐渐关门，出现了对非婚生子女出生持更严厉的态度的司法系统和其他方面的现象，都表示道德规范开始严格化和迫使性关系限制在夫

① J·罗西奥："15世纪法国东南部城市中的娼妓、青年和社会"，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6年。

妻生活的范围内。事实上，性行为只有在得到有关法典认可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当时，负责规定配偶生活的道德，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哪些性行为是允许的而哪些又是被禁止的，是篇幅浩瀚的神学著作，但是，性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遵从这些著作的呢？

米歇尔·福科最近在有关性史的一本非常出色的书中指出西方文明已在何种程度上，将性封闭和吸收在数不尽的论文之中。[①] 在这里，我们理解到：西方文明不仅使性实践隐埋在大量宗教、法律、医学、政治的评论中，而且还使人们有谈论性实践的需要——也就是说既遮盖又承认性关系的需要——是一种取乐的形式，一种体验性生活的方式。这并非说所有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都是相互通气的，举例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决疑者神学家和严格派神学家在17世纪有过论战，或者甚至可以认为由下层教会人士传授的婚姻的神学基本原理能在不识字的人民大众中引起丝毫兴趣。

希望通过宗教心态的变更来解释性行为的所有变化，这也许是一种幻想。菲利普·阿里埃斯在其《法国人口史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1948年)一书中，率先强调了18世纪末期马尔萨斯式人口学行为的重要变动。一系列早期的关于合法生育率的细致研究都指出：围绕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个生育率的突变，某些史学家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一法国式的“生育控制”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18世纪末宗教感情的普遍减弱，也使夫妻们去违背教会所明确宣布的关于反对避孕行为的禁令。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新兵招募，使青年人脱离了他们家乡的狭小世界，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像“中止射精”之类不那么神奇而又被神学家特别

① M·福科：《知识的意志》，巴黎1976年版。

禁止的避孕方法的流行。

历史人口学研究的进展在今天迫使我们要对避孕行为在更远的历史时期流行的状况进行了解。在18世纪最后20年，巴黎盆地的乡村已经有人使用避孕法，也许从18世纪中期开始还有城市中也出现避孕行为。路易·亨利曾经相信能够指出这样一点：在这一方面，某些部门的统治阶级充当着先锋者的角色：因而17世纪下半期开始，贵族(德·塞维涅夫人给她女儿的一些信已证明了这一点）和日内瓦的资产阶级在节制生育了。[1] 但A·佩雷努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却指出，在这一时代，节制生育在日内瓦已经涉及到整个社会层次了。总之，我们对法国西南地区一些乡村教区的合法生育率情况的了解，似乎表明，从17世纪初开始，避孕行为就已经在实践而且已经相当普遍了。

菲利普·阿里埃斯曾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教会的禁止使避孕成为“不可想象”的事。在教会禁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人们忘记了早在古代就已知道和实践着的粗陋的避孕技术。避孕行为的重新出现因此就表示着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变动。这一假设本身看来是有问题的。从中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一些宗教书籍中有不少谴责避孕行为的记载，这可使我们联想到这些行为早就存在着，甚至已传播很广。这样就允许我们作这样的设想：一些人口学曲线(有关意大利、英国等地）也向我们表明，节制生育的现象只是于17世纪末在教会的宣传和压力下在一些地区消失了；到18世纪下半期当教会控制大为削弱时，这一现象又重新出现了。

然而教会在人们行为的变动中是否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有一份晚近的但又有意思的资料：芒斯大主教布维埃于1849年

[1] L·亨利和C·列维："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公爵和贵族"，载《人口》杂志，1960年。L·亨利：《日内瓦旧家庭》，巴黎1956年版。

给圣赦罪院写信，要求为他明确教会在节制生育方面所采取的立场。该信告诉我们说，在芒斯这一大部分人口都在采取节制生育措施的教区内，虔诚的教徒对教会人士在他们忏悔时询问有关避孕行为时，觉得反感和惊讶。因此，这并不是抛弃基督教的思想促进了避孕的推广，而是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节制生育行为的接受本身产生了意识上的变化，从而使人口中的一些层次同教会疏远了。

一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对第三世界一些地区节制生育的情况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们指出，宗教禁忌远比家庭结构或男女关系以及夫妇双方的联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小。举例来说，在波多黎各，信奉基督教的黑人远比印度人容易接受采取节制生育的措施，而在印度，宗教意识形态对于避孕行动没有任何禁忌。而在研究欧洲尤其是法国时，人们却将避孕行为过多地与对宗教的态度相联系，却不那么重视避孕与人们对家庭态度的联系。在节育方法之前，在旧制度社会中，已出现了一种推迟婚姻的节制生育倾向：就是这种晚婚的现象，导致从16世纪以来夫妻尤其是女方生育期的缩短。晚婚，重新实行避孕，对于子女的新观念和配偶关系新观念、新情感的出现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过渡性的文化系统，经济组织(出于节省观念)和社会组织(为了巩固以家庭为核心的单元)既推动又延续了这一文化的系统。①

8.2.4 家 庭 史

15年来对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情感历史的研究同样反映

① A·比尔吉埃尔，"从马尔萨斯到韦伯：晚婚和企业精神"，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2年。

了分析生物的行为、社会构成和心态表象这一整体的需要。亲属关系状态这一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支柱，是连接人类生物性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层次。乔治·迪比对中世纪早期马高内地区和E·勒鲁瓦·拉迪里对朗格多克地区的研究，①都指出了政府统治的垮台和社会结构的解体是如何使家属关系恢复活力和变得密切的：在马高内地区，贵族们组成了强有力的家族门第；在朗格多克地区，人们组织起大家族，甚至由公证人作证的假家族。在法国中世纪时期，或更广泛地说在法国旧制度时期，国家政权组织已经广泛地破除了所有地区性的互助团结形式和社会低层次的互助团结形式，然而家庭联系似乎还是充当着法律、道德裁判的角色。一旦人口减少，从而推动了家产的聚集，或国家不再能提供一种足够的保护时，家庭、家族就重新实施它们的权力，重新成为人们的堡垒；亲属关系结构也就包容了社会生活。

到底是法律、道德的裁判所，还是隐蔽的下层组织？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1939年)一书中谈到有关"血缘"关系的那一部分里，令人钦佩地指出了封建制是怎样按照肉体联系的模式来调节社会关系和权力转移问题的。13世纪末期的蒙塔尤地区远离国家政权的控制，也和教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不是通过肉体联系的合法化和具体化的话，那里的农民就无法意识到什么是社会联系。他们从属于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就是某种门第家族的持久形体；他们也尽力通过婚姻或教父母关系的建立来扩大家族集团。② 以N·埃利亚和Ph·阿里埃斯的著作为先导的一系列有关家庭的研究在今天已经揭示了这样一点：如果自从16世纪以来国家政权已在法国就所有司法和社会功能

① G·迪比：《11和12世纪马高内地区的社会》，巴黎1954年版；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巴黎1969年版。

② E·勒鲁瓦·拉迪里：《蒙塔尤——讲奥克语的村庄》，巴黎1975年版。

方面逐步取代了家庭、家族作用的话，那么只是通过家庭集团，国家才能在整个旧制度期间对人们在经济、情感、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行为维持其影响。

我们因此能够就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在官方政权机构背后，“亲属基本结构”已不再像它在“没有国家机构的社会”中一样组织社会了？在有关婚姻方面，唯一明显的规则就是宗教法规的禁忌；根据宗教裁判所文件档案对教会文学及其司法惯例的分析(让-玛丽·古埃兹对诺曼底的研究，我本人对巴黎盆地中心地区的研究以及近年来的其他研究)，揭示了一种等级模式，这一模式与莱维-斯特劳斯对一些原始社会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模式有联系。例如，就人们的联姻形式，我曾对巴黎地区一个教区在18世纪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这个教区所显示的是人们维持着一种很强的血缘亲属联姻关系，这种分析同样也揭示了：除致力于保留家产、维持等级关系甚至发展这种等级关系的社会战略之外，还有一种“重新加强联姻”的程序。在有关法国当代乡村团体方面，M·瑟加朗①等人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曾相信：在我们这种复杂的、有很长历史的社会中，是社会组织决定着联姻方式；然而，今天通过一系列详细的专题研究，我们发现结构人类学的一些有关亲属关系的概念还是能够运用于对我们社会的分析的。

8.3 历史人类学的前景

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卓有成效的研究，由吕西安·费弗尔引入史学家词汇库的心态概

① M·瑟加朗：《婚姻与联姻：厄尔一个地区的配偶选择》，巴黎1972年版。

念，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还不够明确，但相当开放。心态研究的危险性在于：要么将其框在一个纯粹心理学的范畴内，从而使其很快过时；要么将其框在一种观念思想史之范畴内，这种思想史总是急于要从一个时代的理论和重要的知识成就中推断出该时代的心态机制。

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接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安德烈·瓦拉尼亚克的一本书对民俗所下的定义是没有教义的群体信仰和没有理论的群体实践的整体。吕西安·费弗尔在评论此书时不禁自问："在'经过推理'和不经过推理就接受之间界限是否就那么容易划分？""像这样划分的界限难道不会引起人们对我们科学概念体系的起源，对魔术妖法般的和数学式的历史关系，对以逻辑的、数量的关系逐步取代性质不同的和非理性的影响提出疑问吗？"一个社会中争论得最少的态度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活动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结。

通过对各层涵义的分析和对组成一种神奇话语的等级层次进行描述而重新找到上述的这种联系，确定各种动作的象征意义，这正是人们对中世纪社会所展开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的作用所在，如J·勒高夫对时间、劳作和宗教民俗的表象系统所作的研究；乔治·迪比对中世纪早期社会馈赠和讲排场摆阔气大肆挥霍现象所作的研究等，都是如此。伊夫·卡斯唐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善良和社会联系》一书是根据司法档案资料写的，这些资料对人类学的意义不再是为了证明18世纪法国南部地区

荣誉概念具有交流和沟通价值而已。J·勒高夫和E·勒鲁瓦·拉迪里就传奇人物梅吕茜娜而进行的结构研究，或是J·勒高夫和P·维达尔-纳盖对森林战士主题所进行的探讨，这些尝试都向我们表明：通过对表象系统的分析，不仅可能在这些系统之间把一个时代的表达的不同层次重新联系起来，确定它们的模式，而且还能在这些"长时段囚牢"中发现时间的足迹和那些影响着历史运动的各范畴的缓慢变动。

我们在工业时代的前夕，在一个如此靠近我们的时代，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我们对这一世界陌生感的产生，似乎是因为史学家不是解释这一世界如何崩溃或如何为明天铺平道路，而是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得以维持和重新出现，它又是如何在今天工业社会的毛孔中仍然存在。莫里斯·阿居隆关于政治文化对法国南部社会的渗入和依附问题所作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方面是一种最为完善的把政治分析人类学化的努力，也是一种对当代法国的成因作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描述的努力，以前，总把当代法国说成是自然到来或自动变化的结果。政治并不纯粹是由"有明确意识的精英分子"和诞生于革命危机中的政党所创造的、随后逐渐通过它特有的说服力和动员力而传播到社会机体各方面的纲领性思想的堆积。为了使政治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政治就应当变为另外一种事物，一种超出政治这一狭义理解范围的事物；政治不仅是一种如何安排权力的计划，还是一种与其他人建立联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它应当与社会交往的传统方式相结合，尤其是与M·阿居隆指出的、表现为法国南部地区文化地方主义的"社交性"相结合。M·阿居隆从"阿安女人"到"节日中穿军服游行的少女"勾划了"生活和政治机制的真面貌"的轮廓。

在有关大革命的节日问题方面，莫娜·奥祖夫和米歇尔·

伏维尔最近采取了同样的研究途径，指出了在象征性形式和仪式化的实践中隐约包含着塑造了当代法国政治行为的意识形态话语。① 从广义上说，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应建立有规律的统计数字信息，将给史学家提供手段，使他们能跟随法国所有人类学研究因素的持续性或变动性而了解到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弗朗索瓦·菲雷和雅克·奥祖夫对当代法国扫除文盲状况的研究② 和红色白色现象的研究（这一现象是将法国分为两种选举区域的两派政治制度）都旨在揭示在我们民族统一的表面一致性的后面还存在着旧有的和封闭性的(地区、社会阶级等)文化模式的延续。这些研究首先要指出的不是具有明确途径的演进本身，而是演进的一系列机制，也就是为了使变化能被人们接受而必须赞同的形式。

我们都与时间的观念相联。由于经常观察历史的运动，我们有时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存在着一种变动局势的历史一样，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知识的变动局势。史学作为不那么过于理论化的、原则上用来分析变化的科学，它也许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可能经历变化。如果说人类学在今天对于研究欧洲社会的史学家们有如此影响的话，如果说这些史学家们更容易摒弃所有历史发展的直线概念的话，这是因为在旧制度社会中所发现的阻碍、平衡阶段甚至倒退等现象使他们对进步的概念提出了疑问，这也是因为进步的概念、发展的神话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了疑问；而正是为了这个社会，我们才去探究过去的。因此，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学也许是一种不甚理想的过渡。我们需要寻找各种不同的变化系统，查清这些不同的变

① M·奥祖夫：《大革命的节日》，巴黎1976年版；M·伏维尔：《普罗旺斯地区节日的变化》，巴黎1976年版。

② F·菲雷和J·奥祖夫：《读与写》，2卷本，巴黎1978年版。

化系统，理解其机制并确定其多元性，而人类学是与我们的这些需要一致的。



9 结构史学

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

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1934—)是法籍波兰史学家。他是在波兰华沙攻读历史系专业的，之后在华沙大学历史系任教。1973年以来，他来法国工作，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师。他对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有素，注重对这两个领域的更新探索，此外他还对当代法国和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写出了这方面的专著。他用法文与波兰文发表了不少论文与著作，其中《时间的序列》(1984年)引起了人们的很大重视。——编译者

如果需要指出结构主义的诞生日期，那毫无疑问是1916年：那年费迪南·德·索绪尔的信奉者们出版了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正是步这一著作的后尘，布拉格和哥本哈根的语言学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活动就是沿着这部著作所开创的

道路展开的；特罗贝斯科依、雅各布森和耶尔姆斯莱夫的研究成果分别标志着这两个学派的成就。随后，结构主义随着乔治·迪梅齐尔的研究工作而进入了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构主义引入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一情况出现稍晚，只是在1952年莱维-斯特劳斯出版了《亲属关系基本结构》一书之后才变得明显，然而只是在50年代末他出版了《结构人类学》(1958年)以后，围绕这一新潮流及这一潮流所具有的作用展开的论战才开始兴起。这样，人们就开始对"结构"一词的含义和用途、结构研究方法和遗传研究方法以及史学的有效性进行探索。有关史学的有效性问题，《结构人类学》中有一章在讨论让-保罗·萨特的一系列观念时，事实上等于否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具有自我定义的权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1]一文中对此作了回答，他指出：史学远非一门只对事件进行的研究的自我封闭的学科，它不仅能够分离出结构，而且它所首先感到兴趣的也正是这一任务。与此同时，布罗代尔还明确指出了史学家应当给予"结构"一词这样的含义："所谓结构，社会观察家们认为是现实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的一种组织、一种紧密联系及一系列相当固定的关系。而我们史学家则认为，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分化瓦解了。但所有的结构都既是历史的支撑物又是历史的障碍物，说它们是障碍物，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

① F·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第4期，第725—753页。

限制。试想一下，打破某些地理环境、某些生理现实、某些生产力限制，甚至这样或那样精神心理局限是多么困难。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①

9.1 一个实例：中世纪拉齐奥地区的结构

20年前的那场论战，现在看来已经时过境迁了。在今天，结构史已不再是宣言或公设的主题，它也不再需要去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或毋宁说，每当一本新的自诩为结构史研究的著作出版，为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增添了一些重要内容时，结构史的合法性就又一次得到了证实。所以当人们需要理解结构史时，应当从历史著作本身而不是从原则性的声明中去观察。在此我们选择了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世纪拉齐奥地区的结构》②。顺便说一句，这样一个题目在30年甚至20年前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今天这个题目也还显得令人惊奇不已；在历史书籍中，"结构"一词通常都有一个修饰词，以限定其含义，而这里却什么修饰词也没有。皮埃尔·图贝尔的这本书，一开始就表明了它是对南部拉齐奥和萨比纳这一明确限定的地区的结构进行的整体研究，其研究的时间则明确限定于9—12世纪末。作为我们今天结构史研究的杰出典范，此书能使我们说明这一研究的具体状况。由此，我们就可能迅速了解使史学家为了结构而舍弃事件的研究途径。随后我们还将指出今天结构史的问题，以及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主要趋势的新方向。

① F·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第4期，第725—753页。

② P·图贝尔：《中世纪拉齐奥地区的结构——9—12世纪的南部拉齐奥地区和萨宾纳地区》，罗马1973年版。

马克·布洛赫常说："对自己原先不太了解的事物，要探究其起源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描述拉齐奥地区农业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之前，人们无法研究这一地区的农业结构史；而在图贝尔的书中，这一结构却占着中心位置。因此，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在对南部拉齐奥和萨比纳地区分散的村庄进行对比的同时，人们除了一系列地方性的差异外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稳定因素：当地人的居处都集中在高地上，小块的耕地都是分散的；同样，人们也可以观察到各地都存在着农耕空间的向心组织。最靠近居住地点的，是粮食蔬菜混种地；在有些地方，紧挨着粮食蔬菜混种地的是专业性的种植地：冬令谷物与补充性的豆科植物轮种；也有大麻地；再过去就是小麦田；更远一些，处于耕田与未开垦田边界的是自然牧场。葡萄园不在最靠近人们居住的地方，而是沿着旧罗马执政官大道蜿蜒、攀附在石头的山岗上，俯瞰着潮湿的低地。与这些田地类型相呼应的是不同的耕作系统：

粮食蔬菜混种的集约性耕作制。"这是人力工具的领地，这些田地的耕作系统，其基础是人类劳动力和必要的肥料这两者的结合，肥料保证了土地有足够的肥力，不致因轮作而贫瘠"；

谷物种植的粗放型耕作制，让耕地有一种周期不等的休闲。

显然，在这样一种农业耕作组织中，农民的每种开垦作业都只能由分散的小块土地来组成。同样明显的是，交通网络应相当密集。最后一点也很清楚："土地的占有和划分要求居住场所高度集中。"只要这一整体中的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其他的因素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这里看到的正是结构的问题。

然而，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一个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由

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将导致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动。这样一个整体，事实上只有在也满足了其他条件时才会使史学家感兴趣；特别是这一整体应当维持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应当成为一种长时段的现象。皮埃尔·图贝尔所描述的农业结构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它出现于10世纪并持续了很长时期。在5个多世纪里，这一结构构成了一种永恒不变和稳定的框架，农民就在这一框架之中开展活动。这种框架的稳定性使农民的活动具有一种单调、重复的特点：年复一年，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田地里，用同样的手段进行着耕作。无数个人死亡了，无数家庭消失了，但村落居所和分散的小块土地耕作系统所构成的整体却依然遗留，给新的居民规定了与他们的前辈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一结构不仅规定了个人活动和群体活动的重复特性，而且还在宏观层次上引入重复性的同时，规定了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上升的界限，即经济、人口局势的变动范围。这一结构因而组成了一种制约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力量与刚性是成比例的。“正是随着14世纪危机的发生，拉齐奥农业结构的刚性才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越往北去，人口密度的下降使统治阶层能够推行新的土地经营社会模式；如同托斯卡那地区的‘梅扎德里亚’一样，这些新模式要求田地和耕作系统的再适应，甚至要求以分散的第二居所为中心将小块土地合并起来。但在拉齐奥地区却一点也没有这种变化。在拉齐奥地区，中世纪晚期的稀疏人口既无法摆脱集中居住的束缚，又不能改进农民耕作系统的结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一村社经济缺乏转变，加之领主、‘资本家’的资金又用来获取土地利润，致使拉齐奥地区深深陷入意大利南部经济不发达的状况之中。”

我们看到，对结构的描述最终导致了结构史的诞生。这是

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内在化的"历史，由于结构本身的稳固性，这一历史也具有十分缓慢、近乎不动的特点。然而，这还不是皮埃尔·图贝尔在书中叙述的唯一的历史，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其他一些演进更为迅速的结构的历史；这些结构史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特定的节奏，因为每一种结构史中都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所有这些历史的出发点，都是上面所描述的农业结构的形成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结构（衣食结构和交换结构）、环境结构（家庭结构、宗教结构和公共生活结构）中的新变动。

在11—12世纪的拉齐奥，凡人口长期聚集居住和设垒防护的中心都叫作"卡斯特朗"(Castrum)或其对偶词"卡斯特兰姆"。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名词"英卡斯特拉芒多"(incastellamento)，这一名词表示了农业结构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当地的地域空间划分为一系列小单位，每一个小单位由一个卡斯特朗组成，卡斯特朗的周围是成向心状布局的田地。"10世纪时形成的这种重要的居住单位，事实上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跃进的标志，"它很可能是在此之前的人口飞跃所引起的。对"英卡斯特拉芒多"的研究要考虑到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即"卡斯特拉"(Castra，集中的居住场所和周围田地组成的整体)数量的增多和从一个农业结构向另一个农业结构过渡的质的变化。因为，在10世纪以前，土地为一些间有分散农舍的公有中心所占有，这种方法盛极一时。换言之，在"英卡斯特拉芒多"过程以前的结构，是以分散的居处为中、小块田地围之为特点的。所以"10世纪的'英卡斯特拉芒多'就是居住形式和农业结构本身的一种深刻的突变"、一场"真正的革命"。

新结构的出现首先是一连串"卡斯特拉"的形成，我们对每一个"卡斯特拉"都应当标明其形成日期和空间地点，以便确定

其增长的节奏和指出其失败与成功的地方。新结构的出现是这一地区的整个空间被划分为一系列"卡斯特拉"之前不断重复的革新的结果，也是农民和领主的关系发生相应变化的结果。这是因为正是领主们推动着"英卡斯特拉芒多"，也正是他们从这一结构变化过程中获利。但从此以后，领主们就没有再以沉重的地租迫使农民开垦耕种，这方面的图景并不像其他方面那样暗淡。只是我们并不能将农民和领主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纯粹经济方面。"村落，以其封闭式的辖区、严谨的田地结构和团聚的居住场所，给领主们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使他们得以更有效地行使原属公众的赚钱的权利和已被他们占为己有的教会权利。除经济的约束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约束，这些约束使乡村社会陷于家族的、宗教的和司法的限制网络之中。"然而，货币的流通、通衢大道和城市的出现为一些人脱离农村，提高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性。但如果说这种运动在村庄之间为数众多的话，"那么在整个地区来看，使观察家们感到惊讶的还是总体上的稳定性"。

在此，我们就不能跟着图贝尔对拉齐奥社会的其他结构作极为细致、深刻的分析了。但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此书在一般结论中关于"英卡斯特拉芒多"过程的总结吧："在'卡斯特朗'中，社会的和心理的束缚比领主对佃农的收成所收取的租税还要沉重。由于被集中在封闭性的村落中，农民们就此屈从于一种新的束缚。如果家庭在基本结构上依然是男女配偶型的话，罗马民法和教会法就相互联合致力于在世俗世界上建立一种'更紧密的配偶次序'。人们集中于设防的居住场所一事也造成了一系列束缚：应当考虑邻居关系和公众舆论。私生子女很难为公众意识所接受，而婚姻所受到的限制则增加了独身者们的数量，他们仅能维持一种贫苦和克勤克俭的生活。我们再重复

一下：‘卡斯特朗’标志着开创性生活的结束。它导致了乡村区域的封闭性，使拉齐奥农民社会不仅被领主所统治而且还被其内部的年长者及结过婚的人所统治。这种社会结构在11世纪上半叶由于当地私人教会的胜利和城堡领主获得司法权而得以完成。”①

对皮埃尔·图贝尔这本著作的简要介绍，可使我们对结构史的最初特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初步的回答。结构史首先是从整体上对居民进行研究的一种历史：我们已经提到居民的极大多数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但图贝尔的书却以大量篇幅研究了领主、城市居民和教会人士。拉齐奥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在此书中叙及了。同样，此书还以其齐备的资料对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分析：劳动、交换、家庭、宗教、各种不同形式的统治关系等。结构史将一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分解成一个一系列结构的整体；虽然每一个结构都按其特定的节奏演进着，但其整体在长时段中有着稳定性。正是这些结构的存在才使日常生活有了有规律的、一再重复的和可预见的特点，但也正是这些特点使日常生活封闭于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越的界限之中。

然而还是会有革新：这些革新符合掌握力量的集团的利益，并成功地进行了扩展，从而打破了一个现存的结构，让一个新的结构取而代之。这样一种革命在所有其他结构中引起反响，并引起了这些结构的程度不等的深刻变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皮埃尔·图贝尔的这本书就是把这样一种革命作为历史来研究的：领主们在开始时靠了“英卡斯特拉芒多”而占了统治地位，1050年以后，当教皇势力在拉齐奥重新获得权势后，领主们又丧失了一部分重要的地位。皮埃尔·图贝尔所写的历史，其出乎意

① 以上引文均摘自P·图贝尔的前引著作。

料的特点也许就在于此：它既是一部结构史又是一场革命的历史。

9.2 局势与结构

前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家实践的转变，正由于指导着研究的课题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料观察角度的变化才有可能。旧时的研究课题首先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在这个或那个地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就需要考察：发生了什么新的、从未见过的和出乎意料的事？随后便是要找到发生这些事的合适原因；显然，这些原因本身也应当是特殊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结果的特殊性质。我们立即就可看出，这类问题虽然贫乏，但却使史学家瞩目于事件，因为事件从其定义本身来看就表明是非同一般的，因而在日常行为的背景中就显得十分突出。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说道，幸福的时代是没有历史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人们的视线从重复性的平淡现象前滑过，而从不去记录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样的观念态度是经久不散的精英主义的残余，人们对之并没有意识到，甚至那些明确宣布摆脱了精英主义偏见的人也是如此。人们可以宣称对国王和大人物不感兴趣，宣称他们坚信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但人们却很难从一种人民-国王的图景中摆脱出来，人们所歌颂赞美的正是人民-国王的一系列辉煌业绩，并使之成为史诗中的英雄。这种观念认为，叙述性材料的作者们特别注意描述各种事件，使这些事件具有与它们的特殊性质相称的重要意义，因此人们对于过去已经一目了然，对它怀有一种无意识的信任。当然，考据评判的发展使史学家

知道怎样去对这些材料提出疑问，从而更好地控制并掌握这些材料。但史学家们还是屈从于这些材料，尽管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并没有照搬引用过这些叙述。这样一来，史学家的态度就同搜集者的态度一般无异了：两者都在搜寻稀少、珍奇的事物而忽略了所有平凡、日常和普通的东西。为了达到对过去的认识，史学家就不得不成为一个搜集者；为了汇集所有美好的、丰富的和珍奇的东西，考古学也常常忽略反映大多数死者的物质生活见证。

以上述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无法与社会科学建立任何联系，而社会科学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发展而显得极其重要，并赢得了威信。然而，史学要求拥有自己所需要的科学地位，即使仅仅是在大学系统内部保住自己的位置也好。在19世纪末，历史学的实践和它所标榜的研究目的之间的矛盾已成了人们的老生常谈了。一些人曾经试图干脆摒弃使史学具有科学性的任何想法，并宣称历史女神应当仍然留在缪斯的行列中，用这种方法解决矛盾。另一些人则想给史学以一种特殊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这样就可以将特殊事件所享有的优先地位与某种科学性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史学是一种特殊的描述性科学，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不再重复的现象；这样，史学就成了一门这一类型的唯一的与所有其他科学不同的独特的科学——其他科学则是法则规律型的，它们通过对重复性的研究来揭示规律或法则。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史学成为一门享有全部权益的社会科学，并要求史学清算过去的失误，从而对人们称之为"事件性的历史学"进行猛烈抨击。

上述论战持续了很长时期，我们在这里也无法对之进行全面的回顾，只要提一下这些事就足以使我们了解论战的进程了：

首先是弗朗索瓦·西米昂的不朽之作《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1903年),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已是一个完整的纲领,其次是由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于1929年所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在《年鉴》出版之前,不论在宣言、号召中,还是在史学家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与传统决裂的最初迹象在法国早已到处可见。1911年,吕西安·费弗尔在巴黎大学就他的学位论文《腓力二世和法朗士-孔德地区》进行了答辩,我们可以把这篇论文看成是新史学的第一本著作。这倒并不是这一论文反事件研究而行之,而是赋予了事件以一种新的含义:它们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属于14世纪孔德地区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的征候表现。"雷家族、拉勃姆家族、邦瓦洛家族和佩尔诺家族为了总主教职位而竞争,基克雷事件,西蒙·勒纳尔和安托万·佩尔诺之间的无情决斗等,由于王室的让位、登基和一个和平条约的签订所引起的结果,15世纪中期和末期感到忧虑、动荡的贵族们的争权夺利还在激化,上述事件在他们的生存条件中造成了麻烦和新的约束。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事件并不能仅仅用当时的实际形势、个人脾性的不合、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等来加以解释。相反,我们认为,这些政治事件、这些人物间的争权夺利可以在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冲突之中找到其深刻的存在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孔德地区的全部内部历史使我们得出了上述结论。"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吕西安·费弗尔并不是由于事件的独特性而对它们发生兴趣,他明确反对只注意独特性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排除了所有对理解这些事件来说起着必要补充作用的解释因素。费弗尔所注意的事件,是一个系列中各种因素,这些事件,揭示了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局势性的变动。在他

① L·费弗尔:《腓力二世和法朗士-孔德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巴黎1970年再版,第243页。

所研究的这一历史时期中，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着。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结构"、"局势"这两个词，在那时显然还未出现，然而这看来并没有违背费弗尔的思想：他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地理环境"(这是当时的术语)和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则分析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费弗尔似乎有这样的意识：所有这些现象都从属于长时段范围，而最后一部分所研究的则是发生在短时段的现象。长、短时段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已有明显的表现，只是还缺少适当的词汇来表达而已。

史学家们的新课题，到今天为止在转变的同时逐步形成，它促使人们首先去注意那些重复性的、周期性反复的，甚至在一个漫长的阶段中稳定的或几乎是稳定存在的东西。人们的观察点也同样从例外的事件转到有规律的事件，从奇特的事物和现象转到日常普通的事物和现象，从特殊单一的事实转到大量出现的事实。人们不难理解，这种观察点的转变反映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政治史程度不同的冷淡——在这种政治史中，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像念珠一样接连出现；这一转变也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史，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成为尖端领域的价格史的发展。这并不因为从本质来说价格史只对史学新实践开放，这里如同别处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在潜在资料的整体中以及可供利用的研究技术整体中所作的选择。如果人们愿意写出一种旨在再现特殊性事实的价格史的话，就应当选择能够了解商业交易的帐册，这些帐册记载着在特定人员之间、在特定地点及确切时间之内确实发生的商业交易事实；总之，利用每一次商业交易的特殊性。反之，如果人们想就重复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就单一性的现象写出一部价格史的话，那就应当选择市场食品价目表为材料，只有这种材料，"一经考证和确立能为人们提供一系列具有代表意义的平均值：即全月或全年中发

生的全部交易的有代表性的平均值。而在帐册中，人们常常只能够找出这一历史的几个片断而已"①。

在有关研究技术方面也同样如此，人们利用这些技术从材料中找出人们所寻找的信息并对之进行解释。亨利·奥塞是帐册材料使用的著名捍卫者，因此就顺理成章地也是平均值的批评者，尽管这些平均值有着代表性。换句话说，他反对对与旧制度有关的材料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他说："在工业文明普遍化以前的时代中，主宰经济生活的是时间或地点上的偶然性。人并不依靠平均值而活着，而是依赖那在特定时间中、以特定重量、特定价格出售的、实在的面包生活。"② 与此相反，人们在拉布鲁斯的著作中则可以看到他偏爱市场食品价目表材料，而这种偏爱又是和他那认为使用统计方法是正确的这一态度相联系的。他说："经济史学家为重复性的频率而感到震惊。但并不仅仅是重复性才使他们感兴趣。他们不同于某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并不忽视特殊性；但他们又与某些杰出的史学家不同，因为他们也不轻视普遍性……在这一几乎一切还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史学的宽广领域中，如果一定要在规律性和意外性、本质之间作出抉择的话，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说：正是重复性才是我们所要选择的。虽然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力量迫使我们作出这一选择。"这是因为"在经济史中，重要的是重复性，这一点与我们在史学的其他领域中所要考察的不同。"③ 正是出于这一理由，经济史研究才显得更有利于将观察点从特殊转移到日常平凡现象、从个人现象转移到大量出

---

① E·拉布鲁斯：《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巴黎1943年版，第12—13页。

② H·奥塞：《有关1500—1800年法国物价史的研究和资料》，巴黎1936年版，第72页。

③ E·拉布鲁斯前引著作，第170—171页。

现的现象上去。

因此，人们对这一点不会感到惊讶：正是经济史才造成了以不同节奏演进的现象的分级，也正是经济史才与事件史的直线发展的、呆板的时间观念相决裂。举例来说，拉布鲁斯总是认为运动有三种类型，即长时段的运动、周期性的波动和季节性的变化。就谷物价格的情况来说，长时段的运动是一种价格的上升运动。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就法国而言，它开始于1732年和1735年之间，一直延续到1817年。而1726—1790年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四个周期性或周期间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谷物价格特别低廉的时期，这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在1726年和1741年之间。第二个时期是价格缓慢上升的时期，这一时期历时与上一时期相同：16年，从1742—1757年。第三个时期最短，而谷物价格上升也最剧烈：在5—6年的价格下降后，价格的上升不断加速，直至1770年的危机发生，这一时期只持续了13年。随后就是一系列的周期，在这一系列的周期中价格先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随后又开始迅速上升；这一阶段共19年，从1771—1789年”①。

拉布鲁斯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32年，道路就此被打开了：人们着手研究局势变动的内在机制，以阐明引起这些变动的原因。拉布鲁斯在其第二本著作《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1943年）中所引入的旧类型经济危机的模式，就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然而拉布鲁斯并未在分析几百年的经济运动时使用这一模式。在当时，利用统计资料是行不通的，至少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如此。因为，如果说我们对16世纪以来的价格运动已有所了解的话（尽管资料本身特别是对

① E·拉布鲁斯：《18世纪法国价格与收入运动概述》，巴黎1932年版，第147页。

资料的解释已成为论战的对象)，我们对农产品、人口在长时段中的波动则还缺乏确切的资料，更不用说关于地租和工资运动的信息了。

但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资料的问题，还应当首先在史学家工作的理论前提这一层次上有新的突破，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如何提出研究的问题这一层次上有新的突破。这就需要将观察点从局势，也就是从周期性的波动转移到以世纪为单位的“趋势”上来，并将这些趋势汇成一种更为缓慢的演进。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后必须深信史学家有权利也有义务，不仅关心变动的现象，还应当注意那些在很长时期内呈稳定或几乎稳定状态的现象。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始于2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写成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一书，显示了不同于拉布鲁斯的第二种研究方式，这一方式把重点研究重复性的方案引入了史学研究的实践之中。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就不是西米昂的观念，而是吕西安·费弗尔的观念了。因为布罗代尔笔下的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期中围绕价格和收入变动而组织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史，它当然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史，但也是地理、人口、文化、政治、宗教、军事等等的历史。所以布罗代尔所关心的重复性，不仅仅是这种或那种曲线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但这种重复性同样也是值得考虑的。由于布罗代尔的努力，对重复性的研究超出了原先似乎把它封闭住的领域，它也不再是与倾向于只研究事件的传统史学并存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渗入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史学领域。当史学研究不再以小部分空间和一个短促的时间流程，而是以广泛延伸的空间和长阶段的时间为对象时，对重复性的研究就成为其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布罗代尔对“无数次重复着的历史”[1]的重视，其直接结果便是此书首先从分析地理环境着手。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只是一个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整体；人们应该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在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作出反应，但他们并没有给这些问题和挑战以最后的回答，也未建立起人与空间之间稳定持久的平衡。波动、重复、周期就由此而产生。山区的生活问题是：“如果说资源的品种既丰富又多样，那么它们的量总是很少的，”这就迫使多余的人口向平原迁移。但平原地区的生活也有其困难之处：“对平原的征服从来就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一旦人们放弃了努力，平原地带就有重新变为荒蛮之地的危险。”这两种地区及其困难的结合，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即山区与平原地区的共存问题。“谁想理解地中海地区的生活，谁就应当在这两者的冲突背景中进行思考；只有这一冲突的背景才给地中海地区的生活以历史的和人文的意义。”人类对自然进行一劳永逸的征服的不可能性，就表现为一系列阶段的前后相继；这一系列的阶段使这两种既互相对抗又互相补充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史具有节奏，并使这一历史成为一种“周期性的历史”。

大海也是同样的情况。大海不是一种液体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地球表面。总之，对于那些生活于滨海地区和岛屿上的人们，对于那些打渔、经商，甚至是行劫的人来说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人所要解决的困难也是由一系列的冲突所造成的。首先是由内海和外海之间，因而也是两种相反的趋势之间众多的差异所造成的问题：要么蜷缩在邻近的平原上，要么挂帆远航。其次是由于前一种差异波及到整个地中海区域，把地中海划分为东部、西部两个部分而引起的问题。这东西两个部分相互接

① F·布罗代尔：《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巴黎1949年版，第173页。

触、彼此相连，但每一个部分都具有自我封闭的趋势。此外，“地中海的这两个部分是由敌对的主人控制的，它们在人种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相互有别，每个部分都自成一个历史区域”。人们可以把布罗代尔的思想简化为：这一东部和西部的严重对立主宰着16世纪的地中海生活。正是这一对立才表现为各种武装冲突和商业贸易潮流。

除了大陆内部和海洋地区内部的冲突外，还有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陆路和海路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竞争。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和它们的对手，即散布在东起里海、北到巴尔干的欧洲大陆各城市，保持着关系，这种关系所带来的问题，不同于地中海地区各城市之间内部关系的问题。简言之，在地中海与欧洲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但在地中海与沙漠、大草原之间，在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对立。“正是经济，而且也是文明、社会、生活艺术在互相冲突。”正是这些空间冲突才规定了布罗代尔所看到的地中海世界的整体：这是一种人种的整体、人类的整体。但还有一个气候的整体，这一整体和前两者一样也充满了矛盾。“海洋性气候以其两个急剧变化和泾渭分明的季节，使地中海世界生活在两个相互有很大差异的阶段中，而且年年如此，长久不变。地中海的人们就好比相继轮流居住于夏季住所和冬季住所之中。”简言之，最后我们把握了包括地中海世界所有内部冲突的冲突，以便在同样的角度上与另外两个在16世纪兴起的新世界进行比较，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新世界就是大西洋世界和印度洋世界。

通过上述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是如何在他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基本、最有力量的一部分中，逐步展开其研究的。他不满足于只列举他所发现的这些冲突和由于这些冲突的出现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他建立了一种树形结构、一个

相互重叠交合的分叉系列，将这些冲突和问题排列在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等级之中。这样，地中海世界就呈现为一个不同层次上的各种冲突线索的整体；这些冲突线索的周围是各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的力量，每一种力量都试图为自己的利益建立一种持久的平衡。于是就有斗争，但也有交换、疏远和接近，总之，是一系列的运动：当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成功地压倒其他力量时，这些运动就是周期循环性的；而当对抗力量中的一种力量消灭或严重削弱其他一些力量时，这些运动就直线发展。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为何在空间和时间中都无明确的界限，他怎样能确定这些界限呢？就时间而言，某些现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重复着了，这就需要指出这些重复性，揭示这些重复性的持久特性，并从中找到结构的因素。就空间而言，地中海世界与其他地区、其他世界的联系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直到它借以获取黄金的苏丹，直到大北方地区，在东部，到里海地区，达到中亚，甚至直到中国。总之，空间和时间的边界只能是模糊的；并不是这些边界赋予布罗代尔所研究的对象以特点，而毋宁说这些边界只是在根据上述对象的特定动力机制而收缩、扩张时才赋予这些对象以特点。

缓慢的、“几乎不动的”、“常常表现为周而复始、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的结构史是史学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发现这一领域，是布罗代尔这本著作对我们现代史学的思想和实践的贡献之一，而且它还不是这本著作的全部内容。

此书的第二部分专门研究局势，更确切地说，是研究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等一系列局势的。我们还是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这些发生在比上述时间更为短暂、快速的时间中的局势史，是如何与结构本身的缓慢转变相契合的，如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对立。在15世纪末，这一对立还只是潜在的。

但是从16世纪初起，大西洋开始缓慢地夺得了优势。这一争斗是围绕两条道路、两个地区展开的：地中海一方为的是保住财源，大西洋一方则是夺取这些财源，人们可以通过香料贸易，特别是胡椒贸易的变动来追踪这一争斗的线索。由此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在1600年以后才找出远东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其最终衰落的确切时间当在1600年之后。大西洋商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西洋与地中海这两条商路互相敌对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它们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经历了前后相继的危机与复兴。"从1590年起，小麦的贸易已为来自北方的输入所控制，我们可从对小麦贸易的研究中得出与上述结论差不多相同的结论。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些帝国的形式有助于15和16世纪的经济增长。当时有两个帝国在争夺地中海的统治权：一个是土耳其帝国，另一个是西班牙帝国。人们当然不会不看到这两个帝国都从属于各自早已建立的结构，其中土耳其帝国以地中海东部为基地，而西班牙帝国则控制着地中海的西部盆地。这两个帝国一面继续着长达数世纪相互对抗的局面，同时它们也在变换着对抗的方式，因为它们双方都不是只有自己一方与内海相联：土耳其人还向印度洋扩张，而西班牙人则向大西洋和北方扩张。因此，雷邦特战役作为两大帝国之间的巨大冲突，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却似乎只是一个暂时的胜利，它只是建立了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在一定时期内还因为土耳其人的推进而受到威胁。

在提到这一战役的同时，我们也过渡到布罗代尔模式的第三方面：事件方面。在这里，我只想提一下人们对该书论述事件的这一部分多次提出的指责，人们认为这一部分与前两部分没有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指责是有道理的。如果对

一个事件只是从它的独特性上来考察，那么人们是作不出任何解释的，它发生了，而人们也只能证实这一点。从很多方面看，发生于1571年10月7日的雷邦特战役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同时，它也是土耳其人与西班牙人之间一系列战役中的一次战役。而这一系列的战役则能通过一些长期的结构限制和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文明，最后还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帝国政治得到很好的解释。两大力量就是如此多次发生冲突的，但冲突并不在任何地点都会发生，而在地中海两大盆地的"交接处"，"在待定的边界线上"[1]。因此，事件产生于结构和局势。事件要么打破了平衡，要么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所作的结构、局势、事件三分法与拉布鲁斯的时间划分不完全对应。季节性的变动从属于结构，因为这些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变动，使旧时经济、社会和文明的具有持续的性质。以世纪为单位的运动和周期性波动则从属于局势。至于事件，布罗代尔与拉布鲁斯在这一点上看法相同，他们将其置于研究的边缘，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因为，标志着自40年代以来史学家研究方向的新课题，是围绕结构与局势的对立而组织起来的。

所谓结构，或更应当说是各种结构——因为在史学家的语言中结构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一系列地理的、生态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学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一个长时期中呈稳定状态，它们的演进也只是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进行的。所谓局势，就是在结构框架内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幅度的变动。换句话说，结构的定义是模糊的，它是由一系列障碍、限制、局限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不允许其内部的可

---

① 引自布罗代尔的前引著作。

变因素超出一定的范围；而这可变因素的变动则构成了局势。结构的变化在于革新，促使旧有限制的崩溃，这种变化具有质变和打破连续性的性质。结构的时间非常缓慢、近乎不动，至少人们可以这样说：各种结构的内部几乎都是稳定的。但是当我们对先后相继的结构作一比较时，我们可以见到正是在结构的这一层次上才有着不可逆转的转变：即一系列使一种结构类型转为另一种结构类型的变动。

布罗代尔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它推翻了史学的旧有理论基础并开创了一些新的方向。吕西安·费弗尔立即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道："让我们试着从总体来看一下，这本杰出的著作，这本表明一个史学家深刻把握住他美好专业的出色作品，不仅是一本专业名著，而且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在构想历史方面的一次革命，是我们旧有习惯的一次巨大转变，也是一次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史学变动'。"① 《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出版9年后，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重提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对长时段现象、即结构的研究置于中心的地位。这就完善了结构史的理论论证。

9.3 结构史的特征

让我们现在回到最近30多年来的史学研究实践方面来。刚才我们只是研究了一个例子，以便阐明一些突出的特征和指出这些实践所提出的问题。

---

① L·费弗尔：《为一个完整的史学而奋斗》，巴黎1962年版，第168页。

传统的史学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种精英主义史学，甚至在一些试图研究“人民大众”的人中也是如此。与此相反，结构史是一种民众的历史。它所研究的是民众而不是大众，因为它丝毫不排除那些在权力、知识和财富等级中占优先地位的人，而只是把他们置于正确合理的位置上：即得益于一系列特殊条件的少数一部分人的位置。结构史对于人口，对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对于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感兴趣，这就将人口学问题置于史学开发领域的中心；而从传统观点来看，人口问题只是极其无关紧要的。在菲利普·阿里埃斯的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中，长时段的发现与历史人口学的推动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他写道：“存在于两个前后相继时代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说明其中每一个时代与历史整体的紧密关系。两个时代的关系常常只是概括了一系列完全是表面性的因果联系。如要理解今天的法国人，我们能不参考古希腊罗马文明所留下的踪迹，不追溯我们国土上更久远的古老农业传统吗？马克·布洛赫在他对封建社会所作的研究中已经出色地指出了，封建道德习俗的传播和渗透是如何从中世纪起就塑造、划分着近代欧洲的政治、心理地理分布形态的。仅回顾19世纪的演变并不能把握德国纳粹主义的根源，还应当追溯得更远。我们应当深入到全部过去之中，应当通过过去中的所有阶段，但又不因深入得过远而失去将现实与过去相联系的明确性。”①

上述这些文字写于1946年。但历史人口学的全面发展则稍晚一些，是在路易·亨利和“国家人口学研究院”(INED)及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等史学家三重影响下兴起的：前两者建立了人口学研究的技术，随后供史学家使用着；拉布鲁斯提出的旧制度

① P·阿里埃斯：《18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史》。巴黎1971年版，第14页。

经济危机模式则激励人们去研究人口的变动状况；至于布罗代尔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及。从整体和从各个最不同的方面来研究人口问题，不仅是研究方向的中心，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一系列反映人口研究成果的著作的中心。最常见的是专题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为对象，时间通常是一个包括几个世纪的长时期，有时再从中选择一段稍为有限的时间以研究其细节。在分析皮埃尔·图贝尔的著作时，我们已经看到过运用这个方法的一个例子了，但我们还可参考皮埃尔·图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1960年)、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1960年)以及莫里斯·加尔当、克洛德·佩罗对18世纪里昂、里昂人及冈城的研究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方法。而这些只是从一长串书单中随意选出的几个书名而已。

精英主义的历史学是一种封闭在短时段中的历史学。仍是这种与精英主义史学的决裂，导致了人们摒弃特殊的或只与一小部分人有关的现象，导致人们偏重那些平凡的、重复的、显现在如果不说全部、至少也是在数量上占了全体人口中很大比重的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著作，这些著作不是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专题研究，而是对非常广泛、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的研究：这些现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于所有的人类社会之中，尽管出于一些实践方面的原因，人们不得不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和一个特定时间（哪怕是一个长时段)中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让·默伏雷有关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生存资料问题的研究，让-诺埃尔·比拉本对瘟疫史的研究，菲利普·阿里埃斯和让-路易·弗朗德兰对性的研究，让·勒布伦、米歇尔·伏维尔和菲利普·阿里埃斯对死亡的研究，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有关环境和人类活动所引起

的变化等的研究都属于此列。我们这里也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

对所有这些新对象的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人口或各种人口的研究，但这是对人口问题的诸多方面之一所进行的研究，因此与历史人口学直接有关；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条获取有关婚姻、出生、死亡等计量材料的道路，不仅能够对各种人口结构进行描述(旧时人口正是在这些结构中演进的)，还能够深入到这些人口在他们各自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方式，能够揭示这些人口最深层、最隐秘的行为举止。这样人口学就成为历史心理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30年之前就被菲利普·阿里埃斯挑明了："出生率、寿命、人口密度分布、人口运动等这些在时间中前后相继的变化向我们显示着人类心态、人类对自己本身的观念的最深层、最隐秘的变化及其表现。人口学统计数字使我们看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自身、对自己的躯体、对家庭生活，一句话，即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① 因此，正是通过统计数字这一间接途径，人们才能够对决定着个人行为方式的心理结构和心态框架进行研究；正在孕育之中的全部历史人类学就是运用其特定方法对这些主题进行集中研究的，其中包括对时间的安排、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群众习俗(例如狂欢喧嚷)、节庆、举动、群体记忆等。

不管是以地区专题性研究的方式，或是以研究我们称之为(也没有更好的称呼了)一般历史现象的方式，结构史都打破了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现象来进行分类的传统框架。让我们以人们测定和度过时间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活动和规定作息时间等等为例。雅克·勒高夫在谈到14世纪这一方面出现的一系

---

① P·阿里埃斯的前引著作，第15页。

列革新时指出："在惠更斯[1]以前，新的计时机械都还是脆弱的、不牢靠的、无规律的。新的计时器常常出错，而城市大钟又常常出毛病。钟表不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用具，还是一种奇迹，一种装饰、一种城市为之骄傲的玩具。它属于城市华丽饰物之列，它所带来的荣耀甚于它的使用价值。而且新时间产生于'财富创造者'资产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面临危机，想更准确计量可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工作时间。新时间很快就被更强有力的上层阶级用来为自己服务了。新的计时器成为统治的工具；对于大封建领主和王公贵族们来说，它是娱乐的器具，但更是权力的标志。当它成为政府效率的标志时，其意义更大，但这是在都市的范围之内了：1370年，查理五世下令巴黎的所有教堂的大钟都应根据王宫钟声来校对，王宫大钟每一刻钟及每一小时都会准时报点。新时间因此而成为国家政府的时间。爱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国王奴役了理性化的时间。尽管这些时间的变化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和局限性，14世纪时出现的时间方面的动荡变化也是心态、精神心灵上的一种动荡变化。"[2]

我们由此看到，时间的问题是不能被封闭在任何事先确定好的领域之内的，因为它正好处于经济和政治的交叉线上，也处于社会和心态的交点上。用马塞尔·莫斯在人类学研究中用过的一个术语来说，作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时间是一种整体社会现象。它表现了根据不同社会、不同时代而以不同方式结合的各个方面，人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予以揭示的，正是这一系列方面的结合及其变化。今天史学家们感兴趣的大部分现象能够激起一

① 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1629—1695年)，荷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创立光的波动说。对望远镜有重要改进，改进了用摆来控制的时钟。——编译者

② J·勒高夫：《为另一种中世纪史而奋斗》，巴黎1977年版，第75—76页。

系列相同的议论，特别是，尽管专题研究者时而出于兴趣、时而由于研究对象的清晰性而偏重于这个或那个方面，但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居民们的生活，却几乎总是作为一个总体社会现象而得到研究的。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也不管史学家宣称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信仰，结构史总是把单方面的和简单化的决定论排除在它的研究实践之外，这一决定论首先将所研究的现实划分为一系列部分，随后在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引入一些被认为是能够"最终"解释个人活动和社会演进的原因。结构史则以一个极端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取代了这一决定论，在这一机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被孤立为一种独立的变量，而这种变量的演进又支配着其他因素的演进。

看来，我们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方法在于研究一个特定社会以便从中分离出一系列结构并对之进行分析；随后再就这些结构的组成或这些结构从一个起始状态开始的缓慢演进、变化提出问题；明确揭示由这些结构所引起的局势变动，以求指出一系列结构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些结构时而加强着、时而削弱着其他的结构。第二种方法偏重于研究同时具有各个不同结构的特性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各个方面的研究揭示它们间的联系。第一种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那些稳定的、或在某些特定限制发生波动时很少受到变化影响的对象；只有当这一系列特定限制被突破时，人们才可说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二种方法用以比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的同一现象，这一研究有时要从这一现象的出现直到其终结(欧洲瘟疫史的研究就是一例)，或是从一些非常遥远的时代直到我们今天(例如对西方死亡史的研究)。

人们所熟知的将这两种方法和谐地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证实了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补充关系。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各有

其不同的方向。总之，第二种方法旨在研究一个很长的时段，一个比结构时段还长的时段；而第一种方法则能使对短时段及快速变化时段所作的研究重新具有意义，然而这种研究是在一个不同于以往事件史研究特定方向的前景中展开的。

食品、性及对躯体、死亡、疾病的态度，人们在对这一现象表示关注的同时，事实上就已在研究人类对自然对他们的制约作出的反应了。这样，史学就开始与生物学有了联系。人们似乎已经预测到这一联系在以后的几年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生物学所能够提供给史学的，正是对人体这一极其丰富的源泉进行研究的成果；而直到目前为止，史学家由于缺乏研究能力而一直忽略这一方面的研究。例如，在对血液标记进行研究的同时，血液类型学"能够通过血液类型来确定一个人(指他所拥有的全部素质)，通过一个基因频率的系列，能够确定一个人口的整体特征。通过这些标记，认识人类群体的基因组成、追踪群体的演进线索、揭示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即人种相混)的意义和重要性，使按照'基因的相近程度'来划分不同的人种有了可能"①。借助某些条件，血液、基因类型学能够使我们深入到历史上的一些时期，而对这些时期目前人们还只掌握非常零碎的资料——诸如遗骨、工具遗迹等；特别是，它能够发现一系列重大历史现象，使漫长的时段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如黑色人种约形成于12万年以前，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的分离约发生于5万5千年前。但我们还能够希望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给史学带来更多的东西。这两种学科实际上像地理学在当时把自然环境引入史学那样，有可能把人体研究引入史学。虽然创立一种真正的人体生物史学还只是一种希望，但有关资料正在汇集，也许

① J·吕菲埃：《从生物学到文化》，巴黎1976年版。

有朝一日能使我们如愿以偿。从已有的一些研究工作，如A·勒鲁瓦-古兰、J·吕菲埃，以及一些动物生态学家、生物社会学专家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来看，如果人们将研究的出发点置于文化演进完全取代了生物学演进的时刻上（即使这种取代需要几百万年），如果人们意识到人是通过猿人而从他们的祖先那里得到一脉相承的遗传的话，我们就可以设想这一历史将涉及到很长的时段，甚至是几万年长的时段。

以上所述的一切，清楚地显示了结构史的一个明显特征：对所研究的对象视它们在时间中存在的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对象的存在时段越久，时段赋予对象的重要性也就越大。但是由于这种表面上的悖论，结构史对极缓慢演进的关注才使相对快速的变化具有一种新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快速，是指产生于远比结构时间要短的时段中的变化。事实上，人们只是在不再研究事件以来，才对历史中的革命大加议论的。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像说明"结构"、"革命"这两个词有一种亲和性、类似性，好像第一个词的出现迟早会引起第二词的出现，反之亦然。例如，皮埃尔·图贝尔在描述了9—12世纪间拉齐奥地区的居住结构后，就曾探讨过这种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并在研究了"英卡斯特拉芒多"的历史后，得出这是由于"英卡斯特拉芒多"把自己看成是一种"革命"的缘故这样一个答案。同样，对旧的人口结构类型所作的研究，也使人们看到在18世纪初期法国有过一次"人口革命"。人们常常提到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也不会忘记政治革命，这一自"新石器时代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革命的单子，还可以很容易地继续下去。

结构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为，任何革命无非是一种结构的崩溃和另一种新结构的建立。从这一含义来看，"革命"一词就失去了它那意识形态的气息。"革命"

一词不再表示一种社会整体的转变、一种将所有以前的历史都贬低到无意义地位的全面更新及一种新纪元，从这新纪元起世界就变得与以前完全不同。一场革命也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变动，这种变动即使不是剧烈的和壮观的、至少也是激动人心的，它对于那些进行着这一革命的人来说却常常是平静的、意识不到的；农业革命或人口革命就是这样。革命甚至也不总是快速的，它有时会延续几个世纪。这正如弗朗索瓦·菲雷和雅克·奥祖夫所指出的，一个以只有极少数人能断文识字为特点的文化结构，被一个以在人民大众间扫除文盲为特点的文化结构所取代，在法国，这一过程持续了300年左右。[①] 同样，一种以自然周期来划分的时间(即群体性的时间)过渡到一种以机械来衡量的时间(即个人化的时间)，这种过渡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它开始于14世纪，却几乎到了我们当代才随着农村中广泛使用钟表而结束。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所接触的都是革命，因为发生着变化的正是人类活动的范围。

然而，如果从革命进入结构史范围这一现象中，得出这是某一事件的死灰复燃这样的结论的话，那就错了。这正与事实相反，传统含义上的事件一词已越来越趋于消亡；革命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独特单一的事件系列，它是一次革新的浪潮，它从一个起始点出发通过无数次的重复而扩展着：人们是一个个地学会读书写字的；钟表也是一村接一村、一庄连一庄地普及的。引起结构史关注的正是这一重复的浪潮，而不是几个虽然壮观但却是单一或孤立的事件。因此，现时有关历史上的革命问题，就与我们祖父一辈所热衷的这类问题有很大差异。这些问题首先表现在如下方面：革新的起始点，革新发生的场所，谁去冒

① F·菲雷和J·奥祖夫：《读和写——从加尔文时期到儒勒·费里时期法国人的扫盲运动》，巴黎1977年版

险做一些在特定社会中甚至当时别处都还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个人心理学（尽管心理方面也是很重要的），而是历史社会学，它所要回答的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一种革新在何处才有可能发生？什么类型的革新在这一社会中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有机会得以传播？哪些集团会首先接受革新，又是什么理由驱使他们去接受的？革新是怎样传播的？革新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而在传播过程中革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研究革命，也就是研究革新方面，这几个问题已明确指出人们有必要以“精英”为对象，但“精英”这词应当带引号，因为它在这里只表示一部分革新者而不是指特权集团。因此，以“精英”为对象，也就是以活动为对象。这些活动在近30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从属于事件的，从而为史学家们所忽视的。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如上面提及的F·菲雷、J·奥祖夫的研究工作所表明）在于他们特别指出了一个在开始时只为一小伙人所关注的现象是如何扩展到所有的人中，甚至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中，并改变了这些结构的所有方面的。正是沿着同一方向，H·-J·马丹及其他一些学者对书籍史进行了考察。① 研究知识分子阶层的史学家们也正是以这一革新的历史为主题的；对此，我们可以达尼埃尔·罗什所写的有关18世纪法国外省学院的著作为例。可以这样假设，结构史对革命的重新发现，将迟早更新对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研究。

在结构、局势和事件这种历史时间的三分法中，只是在最后一个方面，即在事件的划分上还有问题。对于结构的时间是很容易下定义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几乎不动的时段。局势的时间也

① H·-J·马丹：《17世纪巴黎的书籍、权力和社会（1598—1700年）》，日内瓦1969年版。

并不难概括：这是周期性的波动。至于事件，其地位可以说还处于朦胧之中；作为传统史学的遗产，事件幸好没有成为史学研究实践的障碍，因为人们大可不去研究它。在今天，正在发生变化的却是对历史时间的构想方式。在长时段和周期性变动之外，事实上还出现了一个革新的时间：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这一时间从局部开始到变为总体性而告终，它随着在新结构中的逐步体现而改变着自己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在被贬低为事件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中，有一部分只属于局势的范围：这就是所有那些虽然没有周期性、但还是重复出现着的事实，以及那些并不导致结构发生变化的现象（这些现象正是从这些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从15—19世纪土耳其人与西方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就是一例。但是，大部分的事件都属于革新范畴，这些革新时而失败，时而成为革命的一个部分，革命缓慢地进行着，并以一个新结构的建立而告终。从15世纪开始的宗教运动最终导致了宗教改革，就是一个例证。结构、局势、革命：这就是关于历史时间的新的三分法。一系列的新问题就产生于其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史学家在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0 想象史学

艾芙琳娜·帕特拉让

艾芙琳娜·帕特拉让(Evelyne Patlagean)是巴黎第十大学的历史系教师，主攻古代晚期历史及拜占庭历史。她的研究重点是古代社会的经济机制及社会组织。她经常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撰稿，并在不同杂志上发表许多文章。她还出版过几本专著如《拜占庭史》等。随着法国当代史学研究潮流的演进，她的研究也从社会、经济逐步转向对想象与心态层次的研究。——编译者

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换言之，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也是在变化着的；既然现实和想象这两者都从属于人类经验的整体领域，那么两者界限所通过的领域也总是一致的，在各方面都是相同

的，这一领域从最具有集体性的社会层次到最内心化的个人层次：如探求时间、空间最远边界的好奇心；希望了解未知地域及人类与民族起源的强烈愿望；由于前途和现实中存在着令人不安的未知因素而引起的忧虑；对人体实在的意识；对灵魂不由自主的运动如梦幻等的注意；对死亡的探究；渴望以及受压抑的渴望之间的谐调；导致逃避或抛弃现实的社会制约，这种逃避或抛弃通过聆听或阅读乌托邦式的叙述，通过图像、游戏，通过节日及盛大场面的艺术得以体现。然后，如果我们希望通过所有这些主题深入了解那些在时间上或者也在空间上远离我们的社会的想象，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描述想象与真实的界限。对我们来说，想象与真实的界限就是通过这些主题进入我们自己的文化。

这一研究倾向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我们至少应当意识到这一矛盾的存在。欧洲社会过去的想象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的。中世纪和近代的人们把过去时代的想象看作是一种还活生生地延续在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东西，他们根据不同的主题和环境来相信或抵制这些东西。启蒙运动抛弃了古老的传统；浪漫主义又由于人们的审美志趣和民族虔诚重新捡起了这些古老传统；科学的出现结束了19世纪，并开创了20世纪，这种科学通常是实证主义的，至少是若隐若现地建立在一种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文化等级制上的。启蒙运动的开展、浪漫主义的出现和科学的创立使想象出现了历史的差距。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已初具轮廓，这一革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刺激着一个壮观的、人文科学与历史学共同发展的浪潮。之后，人文科学和历史学都同意将过去的和现时的文化进行系统而非等级的划分，都把对社会的人和个人的人进行整体理解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这样，这一有关过去的想象的领域就完全向史学研究敞开了大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史学听取着诸如人类学、

心理分析学等人文科学的意见，但同时也提出这样一些特殊的问题：如何利用这些学科的方法来对时间上远离我们的资料进行研究？如何解释某种社会何以成为某种宝库的。然后，又如何认识这一宝库中所发生的变化？这些问题所涉及的面太广，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分析，因为它们也触及"宗教史"、"艺术史"等一般史学传统的中介领域。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超越这些领域的界限，此外，对这些界限的重新认识也许正在开始，但在进行专门研究时，我们是不会过分冒进的。

10.1 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如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米什莱以其特别雄辩的风格开辟了想象史研究这一领域。他对"古老的法国人民"（这是他杰出著作中的主角）[①]在深层中变化着的运动极为注意，他也许并不是出于理解，而是感受到那些使下层贫困人民去参加十字军东征或爆发出千年至福希望火焰的激情。特别是他以其对自然、女性特征和生命的深邃的目光、巫师的人格，还专门写了一本书(1862年)。在他死后，J·弗雷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了一部著作，[②]他在书中指出了古代的神话、民俗仪式与当代"野蛮"民族的神话、仪式之间的一致性。他的名著《金枝》并没有包含就历时性角度而言的历史，这是他的弱点之一；但是书中所显示的系统比较研究的努力使弗雷泽的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并由此激起巨大反响。当时还处于"宗教史"研究的辉煌时代，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比利时人F·居蒙对罗马帝国时代

① J·米什莱：《法国史》，巴黎1974年版。

② J·弗雷泽：《金枝》，巴黎1923年法文版。

的人们的想象所作的大量研究，他指出：在来自东方的智慧和典礼仪式的影响下，罗马帝国的人都想象着非常幸福地长生不老以及达到这一步的种种途径。[1]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成果倍出的时代，标志着今天正在进行着的各项研究的真正开始。想象在当时年轻的心态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子，并在心态史的研究成果中大放异彩，如马克·布洛赫对中世纪的人们的彼世概念、吕西安·费弗尔对拉伯雷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表现所作的研究[2]等。尤其是E·马勒和最为杰出的H·福西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一个时代的想象放到了心态、文化和社会的完整背景中加以研究，成为一种艺术史的基本对象。

图像学资料看来确实像是过去社会的想象的最明显的见证，但也还有许多其他的见证：如书写资料，包括作者直接写作的作品，也包括对过去人们话语的记载：如宗教法庭审讯者的记录、在公证人前写下的遗嘱等，这些都是过去与最近的收集所得，并或多或少地经过了加工处理。这些材料都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环境的传统。最后还应当注意反映口头传统和现时实践的生动的话语材料。这些材料向史学家提出了各种研究的构想：或选择某个范围的材料并从中分离出一系列主题或某些主题，如中世纪雕塑中奇妙的斗兽者形象、普罗旺斯巴罗克教堂中的死亡及彼世图景等；或集中研究一个主题并在一个时期的所有资料中跟踪追寻这一主题的变化；如中世纪末期的死亡问题的研究等；或建立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系列主题，如《中世纪之秋》一书；或在一个总体研究中确定

---

① F·居隆：《罗马异教中的东方宗教》，巴黎1904年版。

② M·布洛赫：《封建社会》，巴黎1968年再版，L·费弗尔：《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巴黎1942年版。

一个社会想象的地位，如将14世纪末上阿里埃热的村民的想象观念置于当时整个时代中加以理解等。在所有这些方面中都存在一个时代的划分问题；应当检验一下原有的分期框架与现有的研究主题是否适应，否则的话，就必须根据现有调查及其结果来重新作出划分。

对规定着历史演进的起始、终结界限的划分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一历史演进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它对我们现时的这一介绍也起着指导线索的作用。我们同样将会看到：迄今为止，想象史研究与旧大陆史学上的4个时期，既不平均，更有差异。学究式的划分4个时期使旧大陆史的研究备受苦恼，这肯定与材料的差异性、研究观念的习惯性、学派的倾向性以及史学家本身的个性差异等因素有关。然而从更深刻的层次来说，我们的构想从属于其本身也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序列，这一序列一方面说明着诸如巫术或异国风情等这些欧洲式主题的长期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各领域在随时间、空间而发生变化的一系列想象的主题和媒介物中的前承后继，最后，还说明在这一想象领域中有一个独特的分界，它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就是在欧洲社会中基督教主义的出现。

10.2 古代希腊与罗马

我们古典时期的古代有其双重性：它有古希腊的一面，又有古罗马的一面。古希腊显示了一种极其丰富的神话表述，这些表述对古希腊社会和礼仪、习俗起着解释性的作用。这些表述也是在历史之中产生的，城邦国家及其组织、文化、殖民地扩张的形成时期，就是这些神话产生的主要时期。一些著名

学者如H·于贝尔等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对这一文化整体的研究，能够从当代人类学家的工作中汲取灵感，这种人类学原先还只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其杰出的领袖人物曾是马塞尔·莫斯，[1]但只是在J.-P.韦尔南、P.维达尔-纳盖和M.德蒂埃纳等人的研究中，古希腊神话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结合才取得了真正的成果；在这一人类学中，C·莱维-斯特劳斯提出了把神话与习俗相结合进行分析的模式，[2]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分析；因为出于一种整体感知的意图，这一分析指出了民俗仪式的作用与民俗仪式举行时间的联系，指出了神话人物之间的相互地位和关系，也指出了文化或社会的具体条件事实上是构建所有神话的首要基础。

M·德蒂埃纳基本上是以这一类型的分析为其研究途径的，他由此也提出了这一想法：古希腊神话和礼仪的组合，"如同古希腊人通过奇妙的故事及美好的叙述才更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字母组合一样，他们正是利用这些字母来拼读这个世界的"。正是从这一研究途径出发，举例来说，M·德蒂埃纳的《阿多尼斯花园》[3]才有意义。人们就这样来称呼那些花瓶中的脆弱的花木，这些花木还要被那些只有很少一点自由的风流女子放在房顶上，经受盛夏酷暑，以纪念深为爱神阿弗洛狄忒所爱的漂亮猎手阿多尼斯。此外，阿多尼斯从其诞生时起就与一种芳香的可药用的树脂"蜜尔"相连，这样他也就属于一种象征性的植物符号系统了：在这一系统中，那些干燥和芬芳的香料、谷物及潮湿生涩的草类，构成了一个与社会和宗教符号系统价值系列相符合的价值系列：社会符号系统的价值系列为戒绝／婚姻／

---

① H·于贝尔、M·莫斯：《宗教史研究汇编》，巴黎1909年版。

② C·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巴黎1958年版。

③ M·德蒂埃纳：《阿多尼斯的花园》，巴黎1972年版。

男女混杂，宗教符号系统的价值系列为忌食肉类／献祭／野蛮的消费。对同一价值系统的这三个符号系列的释读使德蒂埃纳能够以历史学的语言揭示古希腊人对任何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答案就是思索自身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地位。

J.-P.韦尔南则致力于对古希腊思想史的研究，他指出：如果说6世纪左右古希腊思想从神话阶段过渡到推理理性阶段的话，那么这种理性首先是在特定区域中的历史产物：如爱奥尼亚的物理学便是一例，这种理性也是以前神话思想的世俗化，而并不是什么所谓永恒理性的出现及所谓"希腊奇迹"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同一时期即希腊城邦的起始时期，哲学家取代了具有探知冥冥彼世能力的先知圣者。① 韦尔南与维达尔-纳盖一样，他们的研究实际上都集中在古希腊城邦的诞生及其作用上，而且又主要研究了具有特殊丰富性的雅典城邦。他们对神话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政治史的一系列因素：如为妇女确定的地位、由青年期过渡到成年期时的仪式；② 悲剧艺术的诞生以及悲剧作者群的形成，这些作者利用古代的传奇向城邦公众介绍法律的和道德的论战，剧中的英雄们要么是在公民集团之外，要么是在其出现之前，而这一公民团体则是以集体的声音(合唱)来表达其意见的；③ 悲剧甚至也出色地表达了柏拉图的思想。④

在古罗马研究方面，乔治·迪梅齐尔远在莱维-斯特劳斯发

① J.-P.韦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学研究》，巴黎1965年版。

② P.维达尔-纳盖："黑色轻骑兵和雅典军校的起源"，载《年鉴》，1968年，第947—964页。

③ J.-P.韦尔南、P.维达尔-纳盖：《古希腊的神话和悲剧》，巴黎1972年版。

④ P.维达尔-纳盖："雅典和大西洋岛——一个柏拉图神话的结构和意义"，载《希腊研究杂志》，1964年第77卷，第420—444页。

表那本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之前，就已以其丰碑式的著作对古罗马传奇的起源进行了研究。他更为确切也更为广博地钻研了属于印欧人种共同遗产的巨大的神话宝库；所谓印欧人种，指的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印度、从爱尔兰到罗马、从日耳曼到希腊的民族群体。他的具有独创意义的观点是这样的：各种印欧人社会的神话都反映了一个结构，根据这一结构，这些社会自认为是由一个三层功能等级制构成的，这三层功能是：神圣的中介、战争的冲动和辛勤的繁殖。乔治·迪梅齐尔认为，印欧民族的神祇和英雄以及他们的冒险业绩都只是表现了这一基本的三分法。虽然这些神话根据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外形，但在深层却是相互一致的。印度的史诗、李维[①]著作中所叙述的古罗马起源的神话历史、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初一些国王的历史(由萨克索·格拉马提克斯所写的)以及威尔士人的故事传奇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从那以后，叙述本身就成了目的，民间传说也许亦是如此。[②]

欧洲文化的基督教化在想象史中开拓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即使一些史学家如D·马尔蒂诺、C·巴罗加、巴克提纳、勒高夫等等，他们试图在这一基督教范围中找到文化的深层延续性，但这一领域的差异依然存在。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并不总是被意识到的，它要求广博的考证，因而是十分困难的。但从本世纪初开始，宗教史、民俗史已在当时的批判、论战前景中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③]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最令人鼓舞的研究方向。

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说诸如巫术、历法节日等主题还

---

① 李维(Tite-Live，公元前64—公元17年)，古罗马史学家。——编译者

② G·迪梅齐尔：《从神话到故事传奇》，巴黎1970年版。

③ N·贝尔蒙："法国古代的神话和信仰"，载《历史问题》，巴黎1973年版。

具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的话，基督教主义则还是在欧洲的一些主要社会表象系统方面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死者的彼世、生者迷茫的命运以及两者之间的特殊联系，人与自己的躯体的关系等等就是这些表象系统的一些方面。此外，基督教文化还通过一些不管在想象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中存在的大量丰富的资料，显示出其明显的内部连续性。最后一点，也是更为基本的一点是：这样，史学家卷进了寻找蕴藏在他们自身文化中的资料，忙于加以对照的工作中去了。

10.3 中世纪时期的研究

无论是对表象的内容，还是其媒介或特殊档案材料的研究，无论是短时段还是长时段的研究，最近几十年来史学家的一些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想象系统的历史发展已在多大程度上充分表现了一般的社会史；反之，社会史的模式及其表现也转而成为想象史的要素。中世纪一直是想象史研究的典型领域，首先是在人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那些方面。3位史学家试图把握中世纪想象史的全部轨迹：艾米尔·马勒和亨利·福西戎从可以观察到的形式出发展开了研究，而乔治·迪比则从文学作品这个途径出发展开了研究。

40年前亨利·福西戎在研究西方中世纪艺术时提出："一本历史著作，就是一种对关系的研究，而这些关系又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事实、观念和形式之间建立起来的"。① 这一原则今天成了结构分析的原则。他用这一原则抨击历史因素的传

① H·福西戎：《西方的艺术——中世纪的罗马风格和哥特式风格》，巴黎1938年版。

统等级观念，他指出，形式“不能被认为只是一种单纯的装饰”，“中世纪的艺术既不是一种自然的凝结物，也不是一个社会的被动表达；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创造了中世纪之本身”。随后在形式系统中，他又识别出一个时代所选择的“统治形式”；这一“统治形式”又是决定性的：所有其他的形式、所有其他的形象都被迫置于这一统治形式的空间之中。从罗马建筑、哥特式建筑的宏伟空间到14、15世纪的绘画空间，形式和形象的整体构成了一个中世纪社会前后相继阶段的视觉话语。乔治·迪比在关于10至15世纪的“艺术和社会”[①]的研究中，从相反的方向上使用着同样的结构方法。他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着这一研究：首先是政治形式的社会世界，它影响着文化的形式；其次是想象的世界，在这一层次上社会投射着它的现实和不满；最后是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形式和艺术主题媒介的世界。

在这一中世纪的领域内，有某些重要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基督教化的过程。雅克·勒高夫的所有著作都集中研究了发生在中世纪早期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之间的转换，以及僧侣阶层与平民大众的文化辩证关系；他将这些都看成是远古遗产的过滤器。[②] 乔治·迪比的著作也指出了同一方面，他研究人们于公元1000年左右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两个世界之间所建立的接触和联系，如“死者的显现”、圣人与魔鬼的近似关系、国王魔术般的权力、圣物的效用等，而且还研究了世俗社会的教权思想、在耶路撒冷天国三个等级的反映、启示录与最后审判的忧郁灰暗的诱惑力等等。同样的交流和联系在关于圣者的叙述中也到处可见，这些记叙目前已是一个向多种研究开放的宽广

① G·迪比：《教堂的时间——艺术和社会(980—1420年)》，巴黎1976年版。

② J·勒高夫：《研究另一个中世纪》，巴黎1977年版；《中世纪西方的文明》，巴黎1964年版。

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些记叙既是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各个部分第一个千年中已逝去的社会及社会层次的见证，又是这些社会和社会层次想象的宝库；在这些记叙中，古老的传说述说着奇迹般的、美好的和典范性的事例和情节，从而起到了激励信仰、平息人们忧愁烦恼的作用。[1]

在E·勒鲁瓦·拉迪里的笔下，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在14、15世纪之交支配着上阿里埃热地区的蒙塔尤村居民们的信仰，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特别丰富的宗教裁判所档案卷宗材料的基础上的。[2] 魔鬼的出现(巫师们还未与它们同谋合作)，也就是恶魔的出现和死神的接近(人们也可让这些死神传递信息)，这些魔鬼既不进地狱也不入炼狱，而是在活人身边游荡着，一直到最终的永恒安息。这些都反映了群众信仰的一种极古老的、在以后将被超越的状态。而蒙塔尤人关于灵魂转生的观念和有关动物(如马、蜥蜴等)的广为流传的神话等，都表达着一种纯洁派教义晚来而又充满乡村气息的变化。

总之，世界的这些看不见的边缘部分的基督教化，从起源到近代化的前夕，从社会文化系列的上层到底层，构成了中世纪想象史领域的一个主要方向。中世纪的想象还表现了其他的延续性和丰富性。

首先是西方人对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向往，我们不应认为西方人是自我封闭的，他们已通过听来的寓言神话延长了自己真正的航行和旅行路线。他们向往的是：中世纪雕塑中神奇的斗兽者形象，J·巴特鲁赞蒂指出这种雕塑是受了东方的影响；属

---

① 参见J·勒高夫上引著作及E·巴特拉让："拜占庭古老的圣徒传和社会史"，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8年，第106—126页。

② E·勒鲁瓦·拉迪里：《蒙塔尤——一个讲奥克语的村庄(1294—1324年)》，1975年巴黎版。

于奇观的印度洋仙境；J·勒高夫认为这一仙境是数代人的希望、幻觉以及解释；此外还有同样是想象出来的差不多也是梦幻般的未开化状态；反之，也有对世界末日的想象，如最后审判、圣土和希望之乡、失落的和重新找回的天堂乐园、中世纪异端中的大量神话。①

其次是通过文学体现的对所渴望的和所缺少的东西的内心追求。这种追求从想象史角度来讲，就构成了反映历史环境及其演进的真实状况的见证。E·科勒正是根据这一方向写了一本有关研究亚瑟王传奇的典范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了特鲁瓦基督教徒的小说是如何把法国骑士制度置于政治史的，这些小说既表达了对这一制度的不满情绪，又使其理想化了：亚瑟王的王权与法国的君主制度形成了对照，前者遵奉着一种理想的封建制，这一封建制超越了贵族的深刻的社会分化、并在末世学的传教过程中得以形成；“冒险”使小贵族这个实际上是不稳定的部分转变为杰出的骑士，而大封建贵族在王权和资产阶级双重威胁下也赞同这种骑士价值观；最后一点是，在科勒看来，描写骑士温情之爱的文学正标志着一个“断裂层”，这一断裂层使12世纪成为近代化的前夕，因为它使个人摆脱了旧时等级的稳定性。②

从时间分期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中世纪末期生动、复杂的近代化过程开辟了无数条通向想象领域的途径，从而使这一领域充满了令人惊异的丰富性。从原有的研究角度出发，福西戎首先认为当时绘画已以一种新的自由来表现及支配空间，这

① J·勒高夫：《17到18世纪欧洲的异端和社会》，巴黎1968年版；J·巴尔特鲁赛蒂斯：《幻想的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中的古典风格和异国情调》，巴黎1955年版；等等。

② E·科勒：《骑士的冒险——艳情小说中的理想和现实》，巴黎1974年法译本。

种自由对以往时代的宏伟空间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又指出，这样绘画者就能把想象置于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如一幅绘画所表现的魔幻式的、戏剧式的背景空间，《德·贝莱公爵的时间》画中的"梦幻般的景色"就是一例，此画在领主的和农民的画面景色旁边还加上了一部分基督教式想象的奇观；在杰罗姆·波绪[①]的《快乐启示录》一画中重新出现了古老的罗曼魔鬼形象，但这些形象已经超越了过去建筑整体化的局限。

其他有些作者则研究着更为普遍性的问题。荷兰人J·赫伊津加从1919年起就专事写作《中世纪之秋》一书，J·勒高夫在该书新版时指出该书持久的重要性，他说：《中世纪之秋》一书的开创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出"应当从社会表象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在社会结构和'现实'中所占的地位出发来寻找一个社会的方向"。[②] 赫伊津加的研究虽然只局限于法国、勃艮第、弗朗德勒地区，但他已研究了一切可以得到的材料：骑士小说，上流社会的或田园牧歌式的诗歌，专为贵族买主而作的绘画、肖像作品，群众性的木版画，特别是那些描述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看到的场景：王子加冕礼、节日、婚姻与丧葬的盛举等。利用这些材料，G·迪比深刻而清晰地揭示了当时的心理动力。[③]

所有这些研究都揭示了组成14和15世纪想象领域的一系列重要主题：诱惑人的魔鬼的糜集，巫魔夜会的恐怖欢乐情景；被处死刑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的凡人化（他们的痛苦不断地通过绘画、戏剧和聚会演说得到了反映，并由教会在传教中不断地加以重复，从而也存在于神秘主义学说中）；对炼狱存在的确证，

---

① J·波绪(Jérôme Bosch, 1450—1516年)，荷兰画家。擅长于幻想、象征性题材，主要作品有《圣安东尼的渴望》等。——编译者

② J·赫伊津加，《中世纪之秋》，附有J·勒高夫的谈话，巴黎1975年版。

③ 见G·迪比的前引著作。

对守护者天使之存在的确证；人在死亡前的牵挂、肢解尸体时的悲怆场面以及与活人欢乐的对照，还有葬礼舞等；但也还有教会条规不再触及的肉欲与奢华；最后还有一个主题，据赫伊津加的说法，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在言谈、举止中表现骑士的浪漫精神和对田园牧歌的审美情趣中流露出他们所企求的“梦幻场面”。

所有这些主题都在一个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聚合起来了，在这一转变中，陈旧的封建制正在消失，近代人的情欲和宗教观念及态度正在诞生。这些材料经过深入发掘，也许是典型性的，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现实与表象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想象史就应当建立在这一关系之中。

10.4 近代时期

近代化对死后世界的观念，直接触及了现代意识的前身。在J·赫伊津加和G·迪比的研究中，我们已看到重心是如何从死后世界转移到肉体死亡的。A·特南蒂就这一转变问题写了一本书，他用文字描述了在意大利死神获胜后到处可见的死神舞画面形象。人们还可以在此书中看到初期的印刷物传播着稍作更新但却更刻板的中世纪表象，在这些反映死亡场景和观念的小册子中，有些画面上出现了垂死者仰天而卧，任凭天堂的力量和魔鬼互相拉扯的情景，而作画者的想象却集中在魔鬼这一边。[①]

其他一些研究则提议将近代关于死后世界的观念置于社会

---

① A·特南蒂："从16世纪的艺术看生与死"，载《年鉴手册》，巴黎1952年版。

史领域中加以考察，把它作为一种结构意图，与引起人们就中世纪末这一领域作的相似研究的结构意图进行比较。这方面的伟大先驱者是50年前的B·哥罗杜依桑，他所作的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观念意识产生的调查极富开创意义，但不幸的是未能最后全部完成。[1] 他解释道：由于资产阶级必需进行预测，因而产生了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中，有教养的人遵循自己的判断，上帝在这个世界中只是一种抽象的动力，《福音书》也只是一种道德书籍，地狱则是不再使人害怕的“文学幻想”，这样，资产阶级就从教会中解放了出来。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比此书所叙述的要多得多。此书在有关知识和文化的变迁方面不乏论战的手段，这种变迁属于研究领域，我们下面要提到这些研究，如福科、芒德鲁、塞尔多这三人所作的研究。然而已成为不信宗教不信神的形象的资产阶级本身并未失去它内部的细微差异，我们在阅读当时大量的稀奇古怪的文字材料，尤其是在阅读说教词材料时看出了这一点；同时也正如芒德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死亡和死后世界的文化态度泾渭分明，人民是宗教的信仰者，为了社会的良好秩序也应当继续这样，但正是在人民这一边，教会被表现在一系列令人可怕的图画之中，而这些画面是传教者用来勾勒地狱酷刑的。同样，正是资产阶级理性的出现才在对理想社会的必要想象中以近代乌托邦取代了中世纪的末世学。[2]

近来还有些研究作品揭示了法国两个外省的居民有关彼世观念的近代演进过程：这就是F·勒布伦对安茹地区和伏维尔关

① B·哥罗杜依桑：《教会和资产阶级》，巴黎1977年重版。

② P·弗朗卡斯代尔：《18世纪的乌托邦和制度》，巴黎1963年版。

如对普罗旺斯地区所作的研究。[1]勒布伦根据疾病、死亡的人口学条件来研究人们对疾病、死亡的态度。死亡率的急剧上升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求助于医圣，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对巫师和揭示死亡的秘密时刻出现的信号标志极端重视，还特别说明了教义书和识字课本为何有效地从孩童期就向人们灌输有关死后世界的可怕表象，群众的想象广泛传播了这些表象（15至19世纪流传的《牧羊人历书》就是一例，勒布伦对这本书进行了分析），最后连传教词对此也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勒布伦对地狱的描绘远远超过对天堂的憧憬，使天主教的雄辩术与新教有所区别，最后勒布伦还指出人们对上了天堂或下了地狱的亡人的祭祀都使亡者与活人的团体相联在一起。

伏维尔夫妇的杰出工作，其主要基础是15至19世纪普罗旺斯地区的各教堂中炼狱亡灵祭坛这一形象材料，他们又运用图表绘制术和统计学方法来进行表述。从14、15世纪开始，炼狱形象开始确立，但它在当时，甚至在16世纪仍与地狱和末日审判的形象不相上下：明显地传播对炼狱中的亡魂表示崇敬始于1600—1670年之间。伏维尔夫妇毫无困难地指出这一变化是与个人审判这一近代观念相一致的；他们随后发现群众对炼狱中的灵魂日益崇拜，上层阶级对此却议论纷纷，两者的不同态度标志着18世纪的社会文化层次的差别。

对从15世纪到旧制度末期的这段近代历史的研究，首先指明了上层文化与群众文化之间早已有之的相互交替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比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所承认的更为持久

---

① F·勒布伦：《17和18世纪安茹地区的人和死亡》，巴黎1971年版；G·伏维尔和M·伏维尔：《15至20世纪普罗旺斯地区人们对死亡和彼世的观念》，巴黎1970年版。

有力。我们已经从对彼世观念的分析中看到了这一点。但确实这也已渗透到所有的文化领地中去了，在这些领地中，近代资产阶级的上升，通过各种新的上层和下层间的二分法得到了体现。想象领域的社会分化也直接地表现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可以从R·芒德鲁和G·博雷姆所研究的《蓝皮书文库》中找到证据，① 这是些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主要产生于特鲁瓦地区，但在整个法国奥依语地区流传；这些书大约是靠识字的人在乡村于傍晚时大声念给农民听后才获得了大批读者。事实上在启蒙时代鼎盛时期，从中世纪传下来的并已在社会上层流传过的圣徒传、骑士小说等正是在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册子中才完成了它们的文学历程。

M·巴克蒂纳从这同一角度出发对拉伯雷的作品进行了分析。② 他的著作似乎于60年代初期写成，这一非常俄国化的研究分析了群众欢乐，这一欢乐把充满活力的身体及身体的展示、一连串的诞生和季节乃至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汇成一种征服死亡、征服恐惧与强权的狂欢节，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欢乐逐步减弱，最终一点点地消失了：怀孕的和排泄的肚子、辞旧迎新的节日、理想中的乐土福地乃至到他冥世去的远航等，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主要的群体表象，这些表象表达着一种跨越历史时代的群众文化，而拉伯雷的作品也许就是在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的过程中，对这些群众文化进行最后一次文学上的表达。在拉伯雷之后，身体在文学中就像是一种不可明言的事物一样被遮掩了起来，并且被打入淫秽的等级中去了，也

---

① R·芒德鲁：《特鲁瓦地区的蓝皮书文库》，巴黎1975年版；G·博雷姆，《蓝皮书文库——17至19世纪法国的大众文学》，巴黎1971年版。

② M·巴克蒂纳：《拉伯雷的作品和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群众文化》，巴黎1970年法文版。

只是在这一等级中才能得以展现，而这种淫秽正是资产阶级的近代化所造成的。

近代之所以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还因为在这一时期拥有一个由所有印刷出版物组成的日益丰富的资料领域；由于涉及到解释我们所称之为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的客观界限是如何向我们今天的这种界限演变的这一问题，因此这一领域也就带来了另一个重大的研究问题。M·福科通过对15至19世纪疯狂所具有的氛围的具体分析，指出了西方文化系统是如何在其本身内部建立这一界限的。①

15至16世纪绘画中的想象，特别是布希和勃鲁盖的作品，都显示了疯狂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疯人之舟》在画布上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实践；在当时人的想象中，可怕的疯人群成为哥特式幻想的最后的产物，它意味着忧虑、破坏以及对人类环境条件的直觉感受。总之，当时全部的形象作品都将疯狂表现为生活中直接的和全部的"悲剧性"意识和经验的象征物。

古典理性则相反，它通过确定宗教、社会、道德或性方面的正常和不正常构成了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将所有这些全部封闭在同一座理性之墙的后面，直到疯人及其收容所成为这一社会实践唯一的联系及对象。此外，福科作品的读者，还通过他的分析从当时各类作者的笔下看到当时人们各种想象是如何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继续反复演变着的。

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巫术信仰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这一信仰逐渐构成了现实与想象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界限。J·C·巴罗雅曾先后从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时期，

① M·福科：《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巴黎1961年版

戈雅的《奇想集》时期，浪漫主义时期，一直谈到巫术信仰在20世纪的巴斯克地区依然暗中残存，努力阐述这种信仰在欧洲的漫长历史。[①] R·芒德鲁则限于对古代法国进行研究，但研究的也是巫术达到顶峰，随后遭到镇压而告结束的17世纪这一关键时期。[②]

近代欧洲的巫师是与魔鬼和魔鬼主持的巫魔夜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夜会上性放纵与渎神的崇拜互相结合。巫师和魔鬼合为一体的这一观念从14世纪中期开始逐步明确，逐步完整，得到了发展，但17世纪上半叶的那场声势浩大、席卷欧洲的大镇压使这一观念寿终正寝，变成一种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文化态度。自此以后，这一观念只是在农村和博学的教会人士、神学家、布道传经者等一些有旧传统的地方和层次中继续存在着，而法官、医生等开明的资产阶级则发现可将巫师归入诈骗者或不正常者之列。R·芒德鲁就以他的作品向我们揭示了这一转变。按照M·福科的说法，人们就这样从一个"违反系统"走到另一个"违反系统"，从16世纪还为人承认的受恶魔包围的想象转变到18世纪开始形成的正常和不正常这一对立观念。这一转变归根到底是在对想象所作的评价中起作用并完成的。

M·福科把握了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不正常的情况虽然已为不正常的人的想象所解释，但异常者的幻想本身仍是一种反常幻想，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那是因为当时医学的推断还未最终完成。[③]

M·德·塞尔多对鲁登地区居民的中魔现象所作的出色研

---

① J·C·巴罗雅：《巫师和他们的世界》，巴黎1972年法文版。

② R·芒德鲁：《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巴黎1968年版。

③ M·福科："宗教倾向和医学知识"，载《11至18世纪欧洲前工业社会中的异端和社会》，巴黎1968年版。

究，也揭示了这一转变。他所使用的方法更接近于福科而不是芒德鲁。但这一研究本身是在一个与前两者完全不同的前景中，也就是说在精神史中展开的。① 从这一视角出发，塞尔多查阅了鲁登地区的材料（中魔者的证词、公众驱魔目睹者的叙述、正式报告，其中包括驱魔者和医生的报告等），并把这些材料解释为一种"断裂层"的表现，这一"断裂层"使临近终结、正在丧失着其确切性的"宗教文明"面临崩溃。

从一方面看，个人与彼世的关系已不再是直接的关系，变得要么是恶魔般的，要么是神秘的；这就是鬼怪附身的人或"精灵"。另一方面，社会在中魔者和驱魔者所构成的"舞台"上发泄着它的焦虑：社会将于尔班·格朗蒂耶判为巫师和宗教秩序的破坏者，并将他处以火刑，这样社会就创造了一个异常者并拿他作为牺牲品。社会用驱逐异常者的手段，实行自我重建；社会认为将其处以死刑便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便是一种秩序的确立。王权也参与了这一建立秩序的活动，并且在事实上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时鲁登地区正合乎逻辑地将"政治标准向宗教标准过渡"，与正在形成的医学上的推断结合在一起，关于"想象"问题的争论便是医学推断的核心。事实上，塞尔多并没有局限于揭示和从文化角度上评论中魔者及驱魔者在与群众协同进行极为壮观的行动时所表现的幻觉。他揭示的是医学观察在当时所具有的新的重要性和细致性，并指出了在这些观察结论中有其富有意义的不协调性：凡是相信魔鬼附体的人必然否认想象能够产生中魔的效果，相反，不相信魔鬼附体的人则将一切中魔都归罪于想象。这样，"自然"这一概念也就缓慢地发生变化，并进行着自我认识，而想象也由于其产生的结果，

① M·德·塞尔多：《鲁登地区的中魔现象》，巴黎1970年版。

在我们认为是自然的次序中占据着我们给予它规定的地位。

当我们进入19、20世纪时，想象史又成了什么模样呢？我们所进入的是一个达到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经验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工业社会由初露锋芒的鼎盛时期进入危机阶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所有文化分期；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深刻、清晰地反映了我们的意识和情感。想象史研究在如何适应这一时期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也许首先说明了史学家的事业有时似乎被纳入邻近的社会科学学科，说明了史学的基本领域要有自己的深度。因此，它是为A·迪普隆的"宗教人类学"服务的，迪普隆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宗教实践，而且也包括宗教信仰。但特别是史学与社会学、人种学以及得到更新的民俗学趋于一致，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人种历史学，这一学科目前最有前途，也最为必要，特别是在对欧洲社会的研究方面。在这一领域中，社会想象的研究与家庭或团体结构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今天所形成的欧洲人种历史学，说到底是产生于这样一种洋洋自得的精神破产之中：这种精神在19、20世纪之交建立了一种逝去的或现存的社会等级制，我们在本文开头部分便已提到了这一等级制。

尽管在欧洲文化本身内部有一种摒弃传统的倾向，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还是逐步意识到一系列并未被19、20世纪的显著变动所割断的深层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的主要潮流像在18世纪甚至更远的时期那样穿越了乡村和农民社会。换言之，上文在论述中世纪、近代时期时已提及的上层文化与群众文化之间的区分和感受关系构成了一个长时段变动的问题，这一问题以一种自谷登堡① 时代以来几乎一成未变的陈述在1800年以后还

① 谷登堡(J.G.Gutenberg，1394—1468年)，德国印刷师，在欧洲被认为是近代印刷术的发明人。——编译者

在延续着。我们已提及的一些著作已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伏维尔夫妇对普罗旺斯地区教堂中炼狱表现延续问题的研究一直深入到20世纪，他们由此得出了炼狱这一主题日益衰竭的历史结论。《蓝皮书文库》在1880年左右已不再发行，但G·博雷姆还是指出了这些普及性读物的主要论题的演进：旧制度下中世纪式的神圣、浪漫题材逐步为各种"金钱"题材所取代，这些题材从治家手段到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秘诀等等，无所不在。

与此相反，其他一些研究者则在当代的材料中建立他们的研究出发点，他们遵循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惯用的回溯方法来处理这些材料。在20年前用这一方法撰写的一系列专题著作中，最成功的也许可算是社会学家L·迪蒙的作品，他分析了至今还在一年一度地为怪兽塔拉斯各龙在塔拉斯贡所遭受的惨败举行的节庆活动。在一个虚构的过去中，塔拉斯各龙曾使地中海南部地区的城市陷入恐怖之中。[1] 即使对历史的回溯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那不勒斯大学宗教史教授E·D·马尔提诺对意大利萨朗多地区所作的跨学科研究还是富有价值的。[2] 其主题是地区性对舞蛛(常见于意大利塔兰托一带的昆虫)的信仰，这种信仰表现为：一旦人们在生日这个重大的日子里感到被舞蛛叮咬的话，那就应当进行一种习俗仪式性的治疗，以便医好伤口。这一治疗包括一次夏季朝圣，特别是包括在一个小乐队伴奏之下的跳舞，这支乐队是被咬者出钱雇来的，今天的被咬者主要是贫穷的妇女。同样的文化转换就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刻在意大利的这些想象史事件之中发生了；古代前人们很可能也有这样的信仰，但却未明显表现出来，只是到了中世纪时才在整体上有了明确的显示，并逐渐与欧洲的其他夏季节日相接近，如圣约

① L·迪蒙：《怪兽塔拉斯各龙》，巴黎1951年版。

② E·D·马尔提诺：《悔恨的土地》，巴黎1966年法文版。

翰节和圣·基节。这一信仰的社会分布日益集中到一些最穷的人中间。在启蒙时代，由于出现了药物治疗的倾向(教会时时提防着这一倾向)以及18世纪时人们对圣保罗的崇拜，这一信仰衰落了。在远离欧洲的地区里，人们也可以读到社会学家R·巴斯蒂德对巴西的非洲宗教的研究，[1] 读到人种学家A·梅特鲁对海地的伏都教的研究[2] 等等，这些作品也都是以新、旧大陆历史发展为基础的。

群体想象史和民俗学，节日、礼仪研究以及对传说、民间故事的研究，这三者汇合成一个特殊的研究视角，这是因为这些研究特别是在几十年以来从方法到概念上确实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对一个民族的民俗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引起注意，这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人们在本世纪初就对"法国的神话"进行了探索，法国神话源远流长，在法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圣徒传记中以及在基督教化了的远古传统中就已隐约可见。法国民俗学研究的大师是A·范·热内普(1873—1957年)，但不管怎么说，他对史学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态度和他对人种志，特别是语言学等新兴人文科学学科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区别，事实上也正如N·贝尔蒙所指出的那样，[3] 他所请教的史学是他那个时代的"唯历史的史学"。但当时的史学状态已在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在史学研究和史学资料领域中引入了人们称之为群众性的习俗礼仪和信仰，引入了这些习俗、信仰的社会界线、首要含义以及它们的演进乃至终结。N·贝尔蒙的上述小册子明确指出了这项研究的前景、已带来的成果，然而也指出了研究近代以前的时期和把握长时段时所遇到的也许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

① R·巴斯蒂德：《巴西的非洲宗教》，巴黎1960年版。

② A·梅特鲁：《海地的伏都教》，巴黎1958年版。

③ N·贝尔蒙：《A·范·热内普——法国人种志的创始人》，巴黎1974年版。

从这方面来说，应当庆贺他对俄国作家V·J·普罗普(1895—1970年)作品的翻译。[1]这位研究者对俄国的农业节日作出了分析；他所使用的是回溯性方法以及近似巴克蒂纳的研究角度，这样，此书就从对当代或至少是晚近时期的节日现象进行观察出发，在俄国农村历书周期中找出了群众传统的延续性、教会干预的结果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产物。

在群众中流传的神话故事是一个巨大的富有吸引力的材料库，它一开始似乎使历史学感到畏惧，并主要属于一直引起争论的静止分析的研究范围，V·I·普罗普已提出了这种分析的规则。对于不同的时代，人们确实可以辨认出口头传播的方式和功能。可以像M·索里亚诺对贝鲁地区“民间故事”所作的分析那样，研究口头传说与印刷品之间的各种关系，[2]甚至还可以根据同一个叙述的不同版本写出一个尽可能丰富而周全的编年表。但是人们真能从一个传说中发现历史、发现其与特定历史背景的变化相一致的内部变化吗？我们从J·勒高夫和E·勒鲁瓦·拉迪里对中世纪和近代“梅留辛纳”传说所作的研究中，观察到这方面的努力。[3]这一问题正在日益受到重视。

因此，群体想象的当代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传统的延续性为基础的，这些延续性表现在一些仍然很讲究传统的社会及社会层次中，也就是说表现在农村中。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既很方便又很明确。但也许这一研究的局限正在被打破，人们可望见到对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传播媒介飞速发展而来的新型社会进行研究的丰硕成果。事实上从现在起，E·莫兰或R·巴特尔等人对

① V·I·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巴黎1969年法文版。

② M·索里亚诺：《贝鲁地区的“民间故事”》，巴黎1968年版。

③ J·勒高夫、E·勒鲁瓦·拉迪里：“母系和垦殖的梅留辛纳”，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巴黎1971年版，第587—622页。

群体想象史所作的文化研究已经具有未来史学的价值。①

想象史，这也是今天正在被想象着的历史，正如它在过去所经历过的那样。通过文学和历史文学小说所表达的对这种想象史的想象是无声的，而通过当代政治所表达的这种想象却是危险的；在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欧洲社会中，这一想象史依然在激起人们的骚动和激情。德国的纳粹主义在这方面比其他方面更为清晰地构成了一个几乎永不枯竭的研究主题；对于今天活着的欧洲史学家来说，这一主题也许是最重要和最经不起挑剔的主题，这也就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困难。语言学家J·-P·法耶就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分析是典范性的，他的著作研究了希特勒意识形态的起源，特别是青年希特勒通过阅读而倾心于日耳曼的和中世纪式的幻想这一点。此书的主题揭示了过去德国和欧洲的想象史是如何转变为大批灭绝犹太人这一可怕至极的高效率实际行动的。

人们通常所称的文学史、艺术史这些特殊的史学，尽管与纯粹的史学有所交叉，有时也出现纷争，但一般说来它们与本文的论述无关。从H·福西戎和P·弗朗卡斯代尔的研究来看，这类文学、艺术的特殊历史并不具有结构的整体性。我们上面已经谈及了福西戎有关中世纪艺术的著作；而弗朗卡斯代尔则还告诉我们：欧洲绘画从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到当代的立体派，在这一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三维空间，绝不是一种客观的最终把握住的表象，而只是一种与特殊文明相适应的造型选择，这种选择与这种文明一起出现、共同消失。② 与这种研究相比，其

---

① E·莫兰：《电影或想象的人物——社会人类学试论》，巴黎1956年版；R·巴尔特：《神话学》，巴黎1957年版。

② 弗朗卡斯代尔：《绘画和社会——造型空间的诞生和解体》，巴黎1977年重版。

他的许多文学、艺术史则只是评论者与个人的创造物(作品)的对话罢了。这样的一种对话，即使是如此深刻也并不必然就具有历史性。

10.5 结论：三个问题

在结束这一按编年体例所进行的论述时，还有三个关系到各个时代的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是方法问题：想象作为史学研究的主题，比所有其他主题更难以自我解释。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表象构成了一个系统，并与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宗教、交往方式等其他系统相联系。研究想象便关系到要在所有这些系统相互关系的连续性中认识想象的地位，这将成为一个历史的结构概念。对中世纪早期以来欧洲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已显示了这一点：由于想象因社会不同而总是呈现出多样化，人们对想象的解释就不会是简单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群众文化的特点表现为一种缓慢的、近乎不动的发展趋势，它对来自社会统治阶层的事物接受缓慢，随后却又常常在很长的时期内独自保留着这些事物和影响；另一方面，群众文化也根据自己的特点需要来创造和保留一系列的文化因子。

第二个问题是想象的领域。开拓研究范围，用超越传统的层次和社会的方法来改变研究方式这一点是必要的，我们不想否定。然而我们还要指出，某些主题会使史学家感到为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在一种离他们较近的时间中考察这些主题的。在这些主题中首先是厄洛斯这一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以及在他和死神塔那托斯之间至少在近代所产生的联想。M·福科的《疯

狂的历史》一书在分析虐待狂时触及了这两个主题，他写道：虐待狂不是一种"如厄洛斯这般古老的行为"，而是"无理性"的爆发、是模糊想象的回光返照；传统理性规定着这种无理性并将其禁锢了起来。按福科的说法，18世纪末标志着西方想象领域的真正转变：一直受到压抑和限制的"无理性"活跃地作为话语和渴望表现了出来。即使还有待于比福科更进一步，将这一分期放到当时的历史整体中进行更完整的研究，但这一分期还是令人信服的。

然而不管怎样，对情爱的想象史所作的研究还是令人失望的。确实，尽管过去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当时的文学和形象艺术中到处可见，但对这些符号的译解在各个领域中都已不再是一个困难了；在G·迪比研究工作的启示下，最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也许已拥有了特定的方法。但这只是刚刚跨出了第一步。最为严重的是，现时的史学家无法真切地感受人类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些经验也就很少能在深层上得到解释。因此，我们也就几乎不能超越象征符号、行为符号以及论证性符号的范围。

这至少是一种暂时的失望，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心理分析研究的方法问题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在对过去的想象领域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史学家又一次成为"文学史家"的邻居，对于文学史家的研究不属本文的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以前曾吸引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摩西》(1939年)一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篇对犹太人进行分析的论文；弗洛伊德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他从对至今仍活跃着的犹太教的一个原始、最古老的神话进行表述出发，进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论述，他的著作也确实是建立在他那成书之时的人种学和"宗教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弗洛伊德还对17世纪恐

惧魔鬼神经官能症作了分析。从他开始，心理分析史就揭示出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局限在研究个人这一范围之内呢？这一研究的数量不多，而且分散，在这类研究中，书写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能取代直接交谈。或者我们能否同意这一点：如果组成特定历史群体意识的个人无意识，必须经过一系列特征明显的文化形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文学材料出发，对这一特定历史群体意识作出结论并且有所收益。第二个而且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寻找什么？等待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史学家和他们的文学家同行们对此感到困惑，正与目前心理分析学界本身的论战相结合：这一论战是在对弗洛伊德的作品更注重文字方面的释读和拉康学派对之进行更广泛的符号解释之间，围绕传统的俄狄浦斯三角情结和男女婴儿期不对称的普遍性问题展开的。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资料和内容还相互影响着。这正如J·-P·韦尔南以激烈的态度批评非讲俄狄浦斯情结不可的释读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释读法是心理分析学从俄狄浦斯本身的历史出发强加给古希腊神话研究的，它并没有完整地揭示神话材料，也丝毫没有意识到神话作品的历史背景。①

其实到目前为止，在对作为历史学对象的想象的研究中，心理分析方法似乎主要用于揭示无意识的文化显现，而这正是应当得到重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对梦幻作了一些研究。E·R·多兹对古代梦幻的文化因素曾作了精彩的分析，②J·勒高

① J·-P·韦尔南、P·维达尔-纳盖的上引著作，第77—98页。

② E·R·多兹，"梦的结构和文化结构"，载《希腊人与非理性》，巴黎1965年法文版。

夫也对中世纪的梦幻作了广泛的探讨。[1] 总之，在各个不同学科对人类梦幻进行的研究中，史学发挥了部分作用。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对象是无意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某种文化的初始故事，或复现故事来研究的，这也就是弗洛伊德在《魔西》一书中所开辟的途径。A·贝桑松由此对俄国的父杀子这个主题进行了研究，他从基督教化初期的关于王室圣徒传的记载，一直分析到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时期的谋杀行为，从而为解释俄国的基督教主义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要点。[2]

总之，对想象领域所作的史学研究，是说明目前史学重新布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布局，一方面在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展开、另一方面在史学与文学史、美学史……等等之间展开。这是否是今天史学家的一种恐怖主义？也许并非如此，但这可被看作是当代要求把时间作为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进行研究的首要维度。

---

① J·勒高夫，《中世纪西方文化与集体心理中的梦》，巴黎1971年版。

② A·贝桑松：《被杀死的沙皇之子——俄国文化中的法律象征》，巴黎1967年版。

11 语言学和历史学

让-克洛德·谢瓦利埃

让-克洛德·谢瓦利埃(Jean-Claude Chevalier)并不是史学家，而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普通语言学教授，并是权威性著作《拉罗斯当代法语语法》的撰稿者。他还是吉约姆·阿波利耐尔《立体派画册》的出版发行人。他对语言学研究造诣精深，并力图从历史学角度去认识语言。他的主要著作有《补语的概念》(1968年)、《酒精，文体学的研究》(1970年)、《语法》(与其他人合著)(1971年)等。他还担任拉罗斯出版社《法语》杂志的秘书长等职。他对史学与语言学关系的一些思考引人注意。——编译者

在当代各学科间互相接近的洪流中，语言学和历史学应当互相对照，这似乎是相当明显而又十分自然的事。如果研究人类交往基本手段的科学——语言学，不能在研究人类运动的科学——历史学中充当一个角色的话，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几十

年来，语言学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显著的成果，显然在很多方面已成为一门领先学科，它使历史学获益匪浅。然而作为引言，我们想在此先指出几个令人忧虑的方面：

1.语言学这门被认为是高度理论化的学科虽本身也甘愿如此，但结果却使人敬而远之，几乎没有置身于这场科学运动中，这是颇为令人奇怪的。《语言》杂志有一期专辑，题为《语言学认识论》，这期的负责人朱利亚·克里斯代伐最近指出，据他所知，这一期专辑的文章代表了集体朝此方向努力的初步行动之一。人们不禁要问：这门科学的基础是否还没有明确地反映出来？方法论工作的巨大重要性是否还未揭示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

2.不可否认，语言学正处在全面发展之中，语言学的成果极其丰富，语言学家有着无限的创造才能，进取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说，凡涉及到人们说话、涉及到事物含义的领域，没有一个不被语言学所触及。但是，应当给语言学下什么定义才能使人们把握和理清它的概念呢？人们看到语言学消失在符号学这一研究各种符号的科学中，或者说语言学占据了符号学这个领域；人们也看到语言学夺取了话语(discours)领域，而这一领域是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所在；但这时的语言学是否还是原来那种研究语言这一社会工具的学科呢？就句子而言，今天语言的重新组合已变得极其复杂：人们在几个句法方案(有些人把它们解释为语义方案)的深层基础上制定了两组规则：一组是根据发音技术的意群规则；另一组是转换规则，这组规则通过众多的调整(即形态音位学的调整，现在还要加上词汇学的调整）后能用来造出一些句子。① 每个语言学派都以其各自的方

① 请参阅N·乔姆斯基的奠基工作：《句法理论面面观》，巴黎1971年法文版。

式来安排这套语言技术。这里倒不是这种复杂性有什么问题，而是人们的观点、研究途径的多样性才使人们感到语言学家有理由成为征服者，也使人感到没有一个领域能逃过这一征服。

3.然而，正是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区分手法似乎使语言学研究获得了动力。索绪尔理论的重要性来自一种否定性的规定，这一规定能够勾画出科学的一个领域，并在同一运动中提出一套推理原则。这个体系的两个轴心就是同时性和语言，而同时性和语言各自的排斥面又分别是历时性和言语。这方面的研究条件，就是消除所有的整体变化和所有的个人变动；有了这种条件，人们就能够确定语言功能机制的不同价值。这种苛刻的条件深深地困扰着索绪尔，这是确凿无疑的，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从他在《由另一词字母改变位置而构成的词》一书中所作的反思中，从他对由一个特殊群体或个人对社会语言进行重新组织而带来的问题的反思中有所发现，然而，索绪尔却将这一忧虑掩饰过去，泛泛地创建了当代语言学，对此，我们可以用佩舍的话来加以说明："从语言应当被当作一个系统来思考时起，它就不再被理解为具有表义的功能了，它成了一种能由一门科学来描述其功能机制的研究对象(索绪尔为了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曾用棋类游戏作过比喻，要是我们也借用他的这个比喻的话，那我们将会说，不应当去研究一盘棋有什么意义，而应当去研究使任何一盘棋成为可能的规则是什么，不管这种规则是否存在)。"[①] 语言学家与语法学家的区别就在于此：以前，语法学家研究原文以确定其表达手段，或许也评价它的合法性；而今天的语言学家则研究语言，也就是说研究"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整体，这一整体允许按照

① M·佩舍：《话语的自动分析》，巴黎1969年版。

一些明确的语言因素来进行组合和替换”(引文出处同上)。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无法超越处于一个同时性系统中的词群；只是由于乔姆斯基从句子出发进行了研究（首要的公设是重新将句子写成字面意群+口头意群)，这就形成了一种革命。人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语言学的研究朝句子，也间接朝话语扩展，动摇了语言学的基础。

4.但对索绪尔的区分手法的否定，或如人们所说的超越性的试验，这样就产生了语言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地位这一认识论问题，以及由于与这些科学的社会基础的关系而产生的已建立的概念体系是否合法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些思想严谨的人来说，不对某种研究活动的依据作出验证就将话语重新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活动对这门科学的方法论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疑问。为了绕过这样一个如此困难的问题，人们就求助于历史学。人们重新考察了语言学的大系统在过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样做也许是头脑中有这样一种天真的实证观念，即认为这些大系统会向我们提供一个更为简单的、有利于当前研究的模式；① 在美国，由于乔姆斯基的贡献，人们重新阅读了17和18世纪这个伟大的理性主义时代的作品；在法国，这一研究是围绕着从巴歇拉尔到福科和阿尔杜塞这一中心展开的。如果说史学因此强有力地重新影响着语言学的话，那它首先不是作为19世纪哲学化史学的复兴，而是作为一种对过去理论的检验影响着语言学的。对过去的理论作一番检验能使人们

① 我们在这里所批判的，并不是这样一种合理和必要的观念，即认为过去的系统是通过现时系统并在现时系统中才得以重建的(参见Et·巴利巴尔和P·马克雷为《世界百科》所写的“认识论”条目，他们说，“一门科学，其历史总是通过对其现存系统的精辟认识来认可的。”)，而是一种天真的观念，这就是认为过去的系统是现时系统的真正雏型，以某种方式确保了现时系统的合法性。

更好地理解语言学的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人们一开始就不是着眼于语言及其演进，而是着眼于对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说着眼于超话语(métadiscours)。这是一个含糊的课题，充满了各种可能的误会，但我们还是试图去把握这一研究的某些方面。

11.1 语言学、理论史和历史学

基本公设如下：对语言的思考是在两个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层次上进行的，一个层次是将语言作为一种自身具有功能的对象来进行思考，它在观察者眼前发展变化着（或者观察者使其发展变化），从而显示着一系列人们可以将其形式化的规律性；另一层次是从人类对语言的使用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语言的使用说明了人和社会的功能（就形而上学方面而言），也反映了人类的某些变化（就伦理学方面而言）。这样，作为语言学全部研究成果的话语，就成为通过一系列表象来揭示一个社会的特殊场所，这一场所当涉及到一个深刻变动的时刻时，就特别值得重视。语言学研究活动可以归纳为这样一种基本说法："语言学家向他的读者说，使用语言的方式是（或应当是）这样和那样的。"人们之所以说"使用语言的方式"，而不说"语言规则"，就是为了表明：在这一研究活动中，语言学家根据他描述的合目的性而选择的，是一套特殊的语汇，这套语汇是由当时当地的情况所决定的。上述基本说法指出了"语言学家"所具有的重要性，而语言学家在当时当地必然是置身于他在那儿发表高论的社会之中的。这类制约条件，一般是与一个教学过程相联系的，我们有待于史学家来阐明这些条件；一般说来，我

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如愿以偿，历史学教科书似乎对制约着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中的话语的决定性条件并不感兴趣，而且对教育用语及教育场所也漠然置之。在有效的协作研究出现之前，为了指出我们的需要和希望，在此举一个语言史家所用的方法作为例子：语言史家试图通过缩小1660年时的语言学家和他同时代市民之间的语言差距，或通过缩小在1660年规定和确定并得到解释的语言与在1972年确定和规定的语言之间的差距，把一个未知的事物变为已知的事物。

第一类研究活动旨在确定语言学研究活动的合目的性，并将其与研究的对象——语言——进行比较，从而阐明被分析话语的概貌。这样，人们将看到：语法在建立时，是以其第一个研究对象希腊语的结构为依据的（当时的希腊语已涉及到古代认识的一些分析原则），并通过语法把这些分析原则联系起来；同时，语法的产生也是适应了语法使用者们的需要，语法就是为了他们而建立的。这是一种形式语法，它是由一些相似因素和补充因素构成的。所谓相似，是指它们的词根或词尾（或没有词尾）相似，所谓补充则是指这些词能逐步相互契合构成一系列含义。这样，语法就属于一种词和事物的相似性概念范围，从而能使人们对各种因素进行分类，并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一方面是指物质、质量、关系、场所、时间、占有状态等，另一方面是指话语的各种成份。这一系统是和古代的公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可以说是由这种公众生活所创造的：语法中格的系统能够使演说家或未来的演说家组织他们的演说（如诉讼概念以及公务人员、受刑者、当事人、见证人等等级范畴），在这里人们所使用的所有替代手法和位子颠倒手法，都是服从各种演说场合需要的，这种很容易变为语言外部系统的语言内部系统，要么存在于使用语词方式的内部（在其参照因

素发生变化时），要么存在于从一种使用语言方式向另一种使用语言方式的过渡之中。关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举古希腊语向拉丁语的变化为例：正如古希腊社会与古罗马社会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一样，这两种语言的结构也颇为接近，因此，为了使整体结构不发生变化，只要规定一些补充性的因素就行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不一致性（如语言的自然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差异），并不对这一整体结构形成阻碍，即使根据犹太基督教的社会状况而形成的巴比伦塔神话继续强调着差异性，它也没有损及这一系统。在16世纪出现了第一批法语语法的研究时，这一系统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在更早的时期，拉丁语语法中却出现了一个重要事件。在15和16世纪，语法学家们竭力从不那么优雅高贵的拉丁文中提炼出一种高雅的拉丁文，这种高雅是以"简洁"和"有规律性"为标志的，是一种有教养的阶级使用的、理性的语言(当时的"高雅"书籍突出的就是这两大特点)。这一高雅的拉丁文对当时语言的渗透具有决定性意义，改革了1650年以后的语法；福科认为从此在认识论方面出现了逆转。一方面，各种语法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语法学家沃热拉的著作）都将这种高雅优美的语言看作是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相一致的语言，这个阶级就是国王周围的上层阶级；语言与王室权力组织的相似性在此表现了出来；其余的则是远离国王的阶级，在这些默默无闻的层次里，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说话结结巴巴的低级表达技术。这种政治话语被认为是理性的话语，世界在这种话语中才具有意义。这种话语以简洁的"格言题铭"式而引人注目，构成"格言题铭"的是一些简练的句子（它们是理性和知识的标志）和一些同现实和物质世界有着相似性的、严密一致的书写符号。这一基本倾向导致了一种双重运动，当时两位最著名的格言作家布乌尔神父和默纳特里埃神父，对这一

双重运动也置之不疑。第一个运动是将社会理性和文字符号的和谐整体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一联系来确定文学的地位，因为文学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优越性的理性表示；第二个运动是我们尤其感兴趣的，就是以简洁的语言形式把一系列语言搭配手段，各种自然的符号和人工的符号集中和结合在一起，以便通过这一抽象化的运动使语言分析摆脱那一套由古希腊人创立的语法，进而能同属于其他文明的其他格言题铭（各种各样的格言题铭）进行比较；对《圣经》不作倾向性解释的某种历史学维度就是在这种话语中建立起来的。马德莱娜·达维德曾指出过下列重要事实：题铭学院起初遵循国王的旨意专事撰写格言铭文，后来则逐步变为史学家的组织。① 这表明史学产生于人们对某类话语的关注之中，这类话语导致人们去解释在编年记载和经书以外的各种符号。

几乎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波尔-鲁亚尔学派革命。② 这场革命通过对符号所进行的努力思考，规定了科学研究的各种条件，使沃热拉和布乌尔所指出的社会差异性意义更为深刻。语言符号是一种表象的因素，反映了世界的组成状况。词（如"地球"、"上帝"、"桌子"……）反映着观念，由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结合构成一个句子，表示一种判断。这是基本的句子。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是存在的"，或"地球是转动的"等。对于波尔-鲁亚尔学派来说，如果它的研究活动能在由基本句来记载的神圣图解中再现伽利略的革命，那这种活动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① M·V·达维德：《关于17和18世纪书写文字和古文字的论战》，巴黎1965年版。

② 波尔-鲁亚尔(Port-Royal)，原是建于1204年的一个女修道院，座落于巴黎西南部的谢弗洛士。17世纪时迁到巴黎市，经历改革后，成为语言学研究的荟萃之地。——编译者

这种基本句是由主体来表达的。这里的主体是纯精神的、笛卡儿主义的；每当这一主体陈述一种命题类型的言语，它就作为天之骄子表现了自己；但这些基本形式是通过一个人来确定的，这个人还要增添一些附加的观念。这样，基本句就可以成为“我说上帝是存在的”，“我说地球是在转动的”等。在这里，肯定语气和说教性句子这两个因素在话语的直线式发展中是相互分离的，但我们却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以各种方式互相重合的。当人们说“正是地球在转动”这句话时，应当也意识到在“正是……在”这一句型中，陈述人“我”，以一系列表达因素来突出和夸张基本句。当“我”说话时，使用的是修辞格；当我将话语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互换、将一种句型换成另一种句型时，这就是一种表现话语类型的方式，其目的是使其他的“我”更易理解或更不易理解这种话语类型；正是在这一差距中，这个纯精神的“我”才确定着他的命运到底是获得拯救还是被罚入地狱。理性的言语只是根据陈述人的得救机会才具有意义，因此话语就是双重性的：在外延上转向真理，在内涵上使真理转向陈述人和交谈者。语法学家的任务，就是使他的信奉者把这两种话语区分开来，让人们能够准确地来进行表达。上述这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试图将17世纪的理性主义研究纳入人类对地球的研究之中，但在这一解释中还暗含着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命题的真理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更动的话，陈述的真理性则将很快就会显示出它是受时间、地点条件制约的。这个“我”不再像波絮埃将人类历史置于神圣地位时所想到的那样，一定具有神圣的真理性。在这里，人类历史与神圣地位不是同质的，人类历史只是偶尔具有神圣的真理性。语言学也就此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普通语法，它研究的是在任何时间都有效的、永存于人类的各种语言基础；另一个是通用语法，它

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外在条件加以使用，这样，人们就可以考虑有一种人类自己的历史。

按照上述解释，波尔-鲁亚尔学派对语言使用方式所作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是与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相联系的；更确切地说，它重新确定了由沃热拉等人所提出的语言划分，并使其深化，把它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精英分子的特性，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一种王公贵族们已提供了典范的特定语言，还因为他们不但能讲而且能分析两种语言，其中一种语言道出了神圣的和科学的真理，另一种语言把这种真理置于人类活动之中。这两方面的研究导致其中的每一方都孤立地来看待统治阶级，并赋予这一阶级以强制的力量，但波尔-鲁亚尔学派却给这种语言使用方式注入了全部理性力量。理论史学家们所作的这一分析(他们肯定是自愿的)能够对18世纪的社会和科学发展提出一些假设。这事一经宣布，语言史学家就感到他们正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进行探索，并还在广泛地向外发展，他们还感到：为了论证的需要，他们只保留了一定数量的语言学特征(陈述人的作用、基本句子、替换的可能性等等)，而这些特征对于要想解释一个超前的认识整体来说是杂乱无章的。因此，作为对比，我们想考察一下第二类研究活动，这类活动可对17世纪形成的语言学分析系统和在1972年很流行的语言学分析系统加以比较。

我们这里要谈的主要是美国的语言学学派，乔姆斯基的《笛卡儿主义语言学》一书就是这一学派的杰出例子。这位当代语言学家从过去的语言表达方式中抽出了他本人正在建立的语言学系统的一些形式，这些形式虽不那么成熟，但已非常富有教益。这样，他就在波尔-鲁亚尔学派的表现系统中发现了深

层和表层这种双重结构的先兆，又在阿尔诺德和朗斯洛的规则系统中找到了形成他自己的规则系统的初步方案；他的热心的门徒弟子现在还在被称为"笛卡儿主义的"语法中到处寻找着这些最初的痕迹，当然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些痕迹。例如，罗宾·拉科夫揭示了波尔-鲁亚尔学派对"简单的"结构和"形象的"结构所作的区分，她毫无顾忌地把这两种结构与乔姆斯基的结构拉扯在一起，她说："在第一种组合中，所有对理解句子来说在逻辑上是必不可少的成份都已经得到了表述，从很多方面看，这一组合能被视为类似于今天的'深层结构'这一概念；第二种组合则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表层'结构，它是通过运用非强制性的规则从简单结构中抽出来的。"①

这并不是说比较的方法一无用处：如果人们试图严格地将一个旧有系统编成程序，同时将它与出现在同一程序中的一个新系统相比较，那人们就会察觉出原有系统中有一些缺点和漏洞，从而颇为清晰地表明旧有系统的基本排列状况显然不同于新的系统。这是一种在理论方面卓有成效的、能作出特殊规定的研究活动。②

然而，美国学派的研究活动似乎属于另一个显然不同的总体概念。这一派的语法学家认为，人类本身就有着一种能力，不仅能基本上通过言语来表现自己，而且能进行一定数量的语言表达活动，这些语言活动严格说来是先天就有的。他们以此来解释儿童为什么能如此之快地操纵语言这一如此精密的工具。这种解释虽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但都不断力图揭示人类这一深层语言机能的奥秘。对语言学理论史所作的这种分析不仅启示着当代人的研究，还证明了当代人的研究是正确的。凡

① R·拉科夫：《当代语言》，卷1，第57页，1972年版。

② M·佩舍：《语言的自动分析》，巴黎1969年版

在历史认识论占优势的地方，生成语法论的语法学家就压低历史的作用，以便使其与现时相契合，因为乔姆斯基比波尔-鲁亚尔学派走得更远：波尔-鲁亚尔学派关于语言的划分，为认识语言的历史主体创造了可能性，虽然这一主体带有偶然性，是次要的，但却很难为笛卡儿主义的主体所包容。乔姆斯基认为，这两种主体只是一种重合，而这种重合同是笛卡儿主义的一个主体，笛卡儿主义的主体被认为是一种平均值，也可以说是一种虚构。罗宾·拉科夫对简单结构和形象结构同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所作的研究，并不是一种过错：这种相似性属于通用语言主体的一般观念范围。史学受到了钳制，最后处于一种不太明确的现状。

11.2 语言学、话语科学和历史学

史学家较为了解的语言学，也许是语言学对话语及对语言学的其他因素，尤其是对词汇所进行的分析，句法对史学家来说似乎原本就是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在这一方面，让·杜布瓦对政治词汇所作的分析在史学家看来似乎是有用的，在某些人眼里甚至堪称典范。下面，我想把语言学家的工作放到这一领域内来加以研究，以便从科学角度来评价这些工作。

人们对现代语言学基础所作的评论表明，一种像上面那样的打算会使语言学家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索绪尔在划定自己的研究领域时把对言语的研究排斥在外，那如何将甚至根据定义也属于言语的话语归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呢？要说明这一点的全部理由一般来说是颇为复杂的，但我们能够把它简化为这样一种不变的图式：如果承认语言学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那

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类比，把它的概念框架从开始进行语言学研究的领域移植到一个假定类似的领域。这一移植过程能在两个方面令人满意：一方面，它确保了语言学家的概念体系的丰富性，能使语言学家放心，这犹如真理的价值来自其普遍适用性；另一方面，它能使研究新学科的学者放心，这些学者在语言学方法中找到一种方法，能用来填补一定数量的空白，或至少弥合那些有点硬凑起来的假设。这些相似性使各门人文科学表面上紧密结合，但这种表面上的联系并没有排除人们的忧虑：各门科学的进步似乎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和专业化，而不是通过同一化来实现的。话语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如果人们想观察到些许科学性的话，就应当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下面我们将依次就使用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话语的人所采用的三个层次即：词——句子——话语本身的分析方法作一番探讨，并将它们同历史学的概念作一对照。

首先是词。G·马托雷(Matoré)的研究已表明了对词汇领域进行研究的得失。如果说，借自结构主义的转换方法（范例和意群）有助于词汇表的建立(索绪尔著作中"教育"的例子就是一个有用的模式)，那么马托雷也同样能借助语言学中没有的各种社会学概念(如年龄方面的"代"的概念等)来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至于解释，则可以广泛参考一些完全不受语言学控制的概念系统。让·杜布瓦的研究工作似乎更令人满意：他以统计学为基础，依靠特定的语言环境下的、严格的替代机制，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语言系统(政治词汇)和一个社会系统（1870年的政治革命）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如此，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之间，这一作用仍是不相等的，杜布瓦仍接受了史学家的条件：即置身于一段由历史事件划分的时间中，研究一种被史学家认为是重要的话语形式(如宣传小册子、传单招贴等)。这样，史

学家们就能从这一研究中获得宝贵的信息，以证实自己的假设和填补漏洞(即使这些漏洞是极其有限的)。

于是词汇研究的基本方面很快地扩展到了句子，从而与语言学的另一分支相汇合。格雷马斯目前对这一方面进行了阐述，他通过丹麦语言学家追溯到古典语言逻辑，并参考了人种学家(如普鲁珀和莱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成果。近10年来，生成论语法大量出现，这一建立在基本句基础上的生成语法刺激着语言学研究。即使乔姆斯基的基本句构成了语言的实体，但通过并不明显的逐渐转变，正在变为话语的单位，这一点是颇有诱惑力的。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研究，在什么基础上将句子看作话语分析的模式和构成叙述的话语模式才是合适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传统的语法中，句子的功能取决于一个政治或法律程序中各种想象关系：因此，这些想象关系能用来识别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令人惊奇了。这是一种试图将这类故事的情节简化为古典型情节的十足的经验主义方法。但是，如果人们将这些情节用于当代侦探小说，这一归纳简化过程就显得过于强硬了（R·巴尔特的精彩分析就指出了这一点）；人们就会被重新禁锢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之中，被重新禁锢在将当代人的思想束缚在亚里士多德的一般范畴理论——地中海民族中心主义之中。我们几乎不再能看到古希腊民间故事与当代詹姆士·邦德之类警察、间谍故事的区别了。历史被重新缩短到其起源阶段。

那么生成论语法能带来什么呢？在其最近的发展中，我们将首先注意到它似乎重新回到了一种与古典理论相接近的位置上，回到了菲尔莫尔关于格的理论之中（菲尔莫尔曾对话语分析家斯拉克堵产生过影响）。一般说来，生成论语法试图用一

些假设来说明句子的功能，也就是说，生成论语法试图依靠一种大体上是从形式逻辑借鉴过来的形式化（生成论语法还从形式逻辑那里借鉴了一些实用性的概念），来建立一套规则，用以构造句子的各种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通过一整套转换手段，说明人们如何依靠基础形式中编码指令将一个基本句变为许多更加复杂的句子。不同结构之间的转换揭示了某些在今天尚未得到证实的，但可能存在于过去某个时刻的形式：人们的雄图大略在于认为不管在什么时代发展的基本模式都是相同的，这种发展模式，由于某些还不清楚的原因，如规则方面的变化或是引入了某一词素（此处词素是假设的，但有的时候是实现了的）后发生了变化，最后使话语有了这种或那种表现；我们在D·金等人的研究中可以隐约看到这一点，D·金研究了规则中的种种变化。即使人们将变化的动因时而归结为对儿童进行解释众说纷芸，时而归结为社会群体数量繁多，人们还仍然停留在一个被认为是唯一的框架之中，也就是停留在一系列相似、简化和再组织的场所之中。人们透过这一系列的相似性、简化和再组织过程所发现的，正是基本结构的实在性。基帕斯基直截了当地宣称："霍斯特等生成语法的评论家们提出，生成语法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它把规则、条律、潜在的基本形式等这些理论实体当作真正的实体，然而这些理论实体实际上只是用来分析音素、词素这样一些真正的实体的优良工具。这正如病理学家把透镜和显微镜混同于他所检验的病菌一样。

"历史语言学所得出的恰恰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语音的变化和类比都是语言的语法系统中的一种变化，这一变化恰恰包含着规则及其顺序。如果这些真实的现象是规则及其次序中发生的变化，那么规则及其次序也就是真实

的实体了。"①

基帕斯基的结论是："历史语言学是目前语言学家用来分析语法的细小结构的最好手段之一。"但是谁没有看到所有这些断言都包含着一系列有着丰富蕴涵的转换呢？生成语法学家所干的是信息论专家的工作（制定模式及转换规则等），不过，是一个没有计算机的信息论专家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不知所措的信息论专家的工作。于是，历史就成为他的观念方面的证明，他也就朝这个方向迅速发展了；在阅读基帕斯基这一综合性的文章时，谁不了解那种不加批判就接受的18世纪的语言学呢？如语言的合理性，表面机制，逐渐朝建立一种合理的、普遍适用的基础语言迈进的简化倾向等。史学家从这些转换中能得到什么？而从事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家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这方面几乎没抱任何希望，因为生成语法的模式太复杂，无法以此制订出一种比较方案。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是哈里斯用来确定同义词上下文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像格言、传单、宣传小册子等非常形式化的类型；这样，我们又陷入了在谈到杜布瓦的企图时所指出的那种麻烦之中了；要使这些研究成果有意义，就必须进行广泛的推论，并求助于社会学或史学这样陌生的学科，例如，政治话语集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只是，在存在着一些公式的情况下，在种种有关规则的暗示使人们相信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形式化了的情况下，人们有受骗上当的危险。事实上，如要谈得上形式化，首先应当拥有一套严密的规则，而这套规则其本身产生于从经验论方法中得出的线索，人们运用这些经验方法进行抽象，以达到形式化，并进而将形式化用于新的经验论方法。

① 基帕斯基："历史语言学"，载《语言学的新前景》，第313—314页，英国1970年版。

如果形式化要求同时求助于经验论的方法，求助于形式化过程中由外部方法所决定的外部事实，那么对话语的分析就使我们远离了最初的打算。

最后一个例子也许会使这些评论更加明确。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一文中提出的关于语言学的“形式化”的意图，他此举是为了重新创作莱维-斯特劳斯所揭示的波洛洛人的神话故事。格雷马斯采用莱维-斯特劳斯提出的三分法：1.框架；2.编码；3.信息。他确定这一三分法时，使用了一些叙述性划分的单位和一些能用来解释原文的概念（即能用来对原文进行严格解释的全部语义种类），使用了神话和神话人物词典。但正如他十分坦率地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编写一本这样的词典要有先决条件，这就是要对编写的内容事先进行分类，并对叙述模式有足够的认识。”十分明显，在确定单位时必然会使人对内容产生疑问，使我们又回到早已为人种学家安排好的内容上去了。

总之，语言学家处于格雷马斯在其《结构语义学》一书篇首已指出过的那种奇特地位：语言学家被认为是具有尖端知识的学者，模式的建立者；但一旦抛弃了索绪尔提出的那些划定界限的严格规则时，语言学家就会被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形式化，或被他认为要去组织和规定的科学所吞没。

我们还想指出一种反常现象：在这些语言分析家中有许多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即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占据显位，但在方法论，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相对来说似乎很少考虑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上述分析之所以陷入困境，显然是因为主体是一种无法确定的抽象；即使受到指责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性的文章，人们也必须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而我们上面已说过，这种对内容的分析与语言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但最近几年来，人

们对主体(读者主体、写作者主体、心理主体和社会主体)进行分析的兴趣特别浓厚。即使对主体进行经济分析是以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名字命名的，但直到现在她还是主要根据拉康的研究路线，注重深入研究目前相对来说还远离史学家研究领域的心理分析方面；因此，我们仅限于研究她那数量已经颇多的著作。为了进行阿尔杜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接过了巴歇拉尔的认识论的某些特点；我们还会遇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某些内容，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但是，现时特别强调的是文章的写作方面，文章必须紧扣当时的经济发展对问题展开讨论。人们没有把文章看作上层建筑，但人们认为文章的主体与某种社会经济空间有关，与一些和认识水平有关的科学简图相联系，因此试图将文章与这些网络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子，也许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学研究的利弊，因为这一学科始终存在着有陷入伪语言学解释陷阱之中的危险。

我在此重复一下基本上属于雅克·普鲁斯特的解释，这个解释与《大百科全书》(18世纪)中"长袜"条目有关，这一条目既很著名，又几乎从来没有被读懂过，既很吸引人，又能把人给难住；在18世纪，这个条目被谴责为是不可理解的（对一个叙述一种技术的条目来说，这样的谴责和批评是很严重的)。第一，作者狄德罗在写这一条目时并不是从对长袜织造进行观察出发的，他的依据是一系列说明织袜机的各种不同部件的整齐有序的画面(普鲁斯特在此利用了一些颇为特殊的资料，这些资料曾是他撰写文章，展开生成论分析的基础)。狄德罗请一个工人来解释机器的各个部件及其装配，随后再详细说明其名称和定义。因此，作者是从画面和形象(如同碑铭、标记一般)出发来达到再现现实的。从狄德罗所作的这一选择及其写作方式来

看，令人奇怪的是，他似乎并不关心机器的作用及其生产，而只关心机器的装配。他笔下的机器设备与历史是格格不入的。第二，《大百科全书》中的这段文字主要是通过隐喻来开展叙述的，织袜机被比作一种推理：机器是大前提，结果是长袜，小前提则似乎极为飘忽不定，机器的作用显然并没有引起狄德罗的注意。第三，因而，机器就显得是一成不变、尽善尽美的，好像一经发明就一劳永逸了，似乎一切改进、革新都只是无关紧要的。在17世纪，机器具有能够摆脱偶然性的真正的推理特性；机器至少对于那些翻开第一节并能被认为是形而上学者的人来说，是如此。

因此，对于一个符合18世纪的一个决定性现象的条目来说，长袜的织造，机器的装配，是与古典认识水平的基本思路一致的：表格式的描述就成为受过符号和三段论方法检验的思想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三段论方法用于分析新世界的一种基本现象，就显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缺陷，这就是时间的缺陷。这一缺陷对读者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文章的联系。正如斯塔罗宾斯所指出的那样，退回到巴罗克美学中去，就是逃避到艺术幻觉中去，这种艺术只有在回顾18世纪的意识形态时才有意义。我们特别应指出：在波尔-鲁亚尔学派型的理性主义思想同技术的发展、进步观念和时代观念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因此，狄德罗撰写的这个条目成了整个描述系统中的一个裂口。文章分析家向历史学家指出的正是这个裂口，但他们并不期待史学家能提供任何完备的答案（这种答案也许能使历史学家获得一种补充资料），而是为了向史学家指出这一断裂层的存在，并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史学家是否将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带着自己的问题研究这同一裂口。

上面的概述指出了一种重视文章创造力的分析今后的可能发展趋势。这一分析向语言学家提出的问题比从语言学家那里得到的借鉴多得多。语言学家在这一分析中重新发现了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一系列概念，如基本句中的人称及其作用，表现，形象与词汇之间的关系，隐喻使用的各种关系等；但是语言学家又发现这些概念是根据一系列自己不熟悉的组合方法排列的，这些方法使话语在世界构成中的作用发生了问题。在话语研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修辞的地位问题，从表面看来，修辞的位置正好介于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之间；目前人们对修辞研究的格外重视，肯定是因为人们已预感到所提问题的重要性。第二个问题是研究领域的性质。像对隐喻的句法基础所作的研究，由于能够确定这类关系是如何发挥功能，并能够从整体上重新提出语言的作用问题，因而将显得十分有价值。语言学家将被迫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十分详细的分析，同时又要说明他所作的种种选择的理由。对语言的共时性研究所作的全部分析都将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因而也属于历史的范围。

结论：我们在这里所介绍的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其目的在于确定与人们对历史学的想象相比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究竟是什么。我们所期望的，是史学家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来发表意见。事实上，我们已力图指出：语言学是一门充满着各种借之于其他研究学科的概念和方案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的努力是充满矛盾的；但同时语言学又只有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照才能说明自己的特点。

然而，在试图分配科学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困难的工作中，语言学似乎占据着一个中心位置：一方面，在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社会交流工具的各种组织特点；另一方面，对于所有说话者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是重新创造世界的场所，都承

担着世界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表现。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语言学应将它的发展归功于形式化方法，特别是归功于形式逻辑方法，从而语言学就与形式逻辑都有着一种不合情理的命运：双方都自以为有一种强大的包容力，然而却都只能作为一种仅仅能够回复到自身的空泛的活动来展开研究。虽然，形式逻辑在机器语言(计算机)中得到了应用，但语言学却在很久以前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企图(如在自动翻译中)，而仅限于作一些资料自动处理。传统的语法单独完整地进入了社会实用领域，并从中获得了全部力量：它就像阿尔杜塞所称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1]那样，为统治阶级提供着进行统治的工具。就目前来说，这一企图还是模糊不清的，或至少是难以识别的。因此，目前的理论研究正在分崩离析。

但是，危机具有创造、生产甚至教育作用。一方面，它对机制作出分析：从这种分析中产生的假设模式决定着一个句子是否发挥其功能；人们从中能对我们的象征能力的组成有所认识。另一方面，由于修辞进入了语法以及人们随之对选词用词法方案作了重新划分，我们对言论发表者所处的环境以及实践的发展会有更好的认识；语言学认识论的话语这个调停机制，其特殊作用正是在这里显示了出来，语言学认识论的话语正是联系当代的研究课题来确定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的。这种深层的探索，尽管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我们相信，它不会使史学家无动于衷的：历史学家把对观念和事物的分析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最终必将在对词汇和事物的分析中处于更坚定的地位。[2]

---

① L·阿尔杜塞："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载《思想》杂志，1970年6月号。

② 本文完成于1972年，在此以后，又有一些论述语言学和历史学关系的重要著作问世，其中值得参考的有R·罗班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巴黎1973年版。

12 文化适应

纳唐·瓦絮代勒

纳唐·瓦絮代勒(Nathan Wachtel)可看作是一位人种人类学家或历史人类学家，他对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及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的研究工作在文化适应、文化交流、文化演进等方面（这里的文化概念是人类学式的广义概念)给传统史学领域以很大的影响。他长期在秘鲁、玻利维亚等地工作，并在法国印第安人研究所工作。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战败者的观念》(1972年)，此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西班牙殖民征服给南美印第安人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并深入分析了作为战败者的印第安人的观念。这是为以往史学、人类学所忽视的。他还出版过不少杰出论文和其他专著。
——编译者

在一开始，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显得既矛盾又含糊。这一概念适应着一种明确的需要：自从上世纪末以来，它在人类学

的领域内激起了人们广泛的研究兴趣，大量实践研究成果也就随之而出现；然而这一概念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理论，甚至也没有得到一种一致的定义，① 这一术语是想表示产生于两种文化接触中的所有相互影响现象。但人们会问：是哪些现象？是什么接触？相互接触的又是哪些文化？另一方面，如果说有关文化适应的研究是在人种学领域内发展起来的话，那么现在它一下子就在以变化和演进为研究方向的史学领域中站住了脚跟。因此，史学家对这一主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有些史学家却对这种"文化借鉴"保持某种保留态度，因为这种借鉴的实质只不过是把人类学的概念搬到了历史学中；这种概念在扩大的同时，难道就没有把传播、影响、模仿、方式等都包罗进去的危险吗？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怎样给文化适应下个定义？这一概念如何才能有助于革新史学研究？应当采用什么方法？

第一个模糊不清之处产生于这一概念的出现背景：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首先回答的是有关殖民状况的问题，带有一种欧洲文化至上的观念。应当指出，在日常语言中，"文化适应的"和"进化的"这两个形容词含义相同，都表示同一种进步相符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或社会都在向西方的模式靠拢。这显然是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但是，除了当代史学的巨大变化之外，人类学本身也要求人们重新确立这个概念并考虑它的复杂性。事实上，文化适应并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性的进程，简化为一种从土著文化向西方文化演进的简单过程；此外，还存在一种相反方向的过程，即土著文化兼收并蓄一些欧洲文化的因素，而又不失去自己原来的特点。这一两极性证实了文化适

① 有关文化适应这一主题的参考书不胜枚举。在这篇短文中，我仅举我较为熟悉的美洲大陆的例子。

应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任意孤立看待的文化特点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传播，而应将其看作为一种总体现象，这一现象涉及整个社会。

一般而言，直到目前为止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大都涉及一些力量不平等的社会，即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另一种是被统治的社会。因而文化适应这个概念从殖民时代起，就保留着两个补充特征：一个是内在的，即存在文化的异质多重性；另一个特征是外在的，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统治。为了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也许应当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说，第一步将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域限制在殖民时代的环境中(对殖民环境的理解应当灵活一些，以便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各种统治形式)；然后，当具体的研究成果有所积累时，就能从一种理论中得出一系列的因素，这样我们也许就能着手将文化适应这个概念扩展到它的产生领域之外。

12.1

即使我们将文化适应局限于殖民时代的形势，文化适应过程及其结果的极端复杂性也似乎会使任何将其普遍化的意图落空：没有什么会比认为一种过程或一种演进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效的这一点更为主观武断了。有多少种具体的例子，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化适应。应当顺从这一分散性吗？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本身，在不同文化和无穷无尽的文化接触的无穷尽多重性面前难道就没有自我削弱的危险吗？然而必须以这样的方法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研究每种具体情况的特点，随后用比较的方法汇集通过分析所得出的多种因素，并在另一个层次上

构建成一些部分的整体。这样就能将文化适应概念分解为一系列有局限性的但又是实用的范畴，通过汇集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而认识一个未为人知的系列。对文化适应外部特点的分析和比较，能使我们创立一种类型学，也许还能使我们把各种现存的社会、接触的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文化并不是抽象的实体，它由一些适应一个地理环境并参与一个历史过程的人类群体所体现。此外，文化接触并不总是展示同一社会的所有典型：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淘金者、皇家军官、加拿大法裔狩猎人或英美移民等，他们的身上都带有他们来自的那些社会的部分痕迹。这就是第一个可变系列，它已经和第二个系列，即各种不同的土著社会相结合。然而，决定着文化适应的特点和结果的，看来主要是土著社会的性质，而不是欧洲社会的变种，因为这些来自欧洲的新主子不得不使他们的统治形式适应土著社会的性质。试举一个拉丁美洲的当代例子：在一个概要性的分类中，E·R·塞维斯把拉丁美洲分为三个主要的区域[①]：1.美洲印第安区(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国的高原地带)，那里的大部分居民虽然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但今日还具有明显的土著文化的特征；2.美洲混合型区(巴拉圭、巴西内地、阿根廷西部、智利中部、从委内瑞拉到哥伦比亚之间的一些中美洲地区)，那里旧时欧洲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儿的后裔只保留着很少的当地文化因素；3.欧化美洲(阿根廷的大部分、乌拉圭、智利南部)，白人在那里的定居落户灭绝了印第安土著。此外，与这三个文化区域相应的是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就存在于美洲了；印第安传统最牢固的地区是旧日阿兹特克帝国或印加帝国所控

① E·R·塞维斯："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中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关系"，载《美国的人类学家》，1955年版，第411—425页。

制的区域，那里的居民从事的常常是一种密集型的农业活动；印第安人和欧洲人混合社会所占据的是一些低地，那里的印第安人群集在多少是稳定的村落中，他们从狩猎和一种粗放型的农业活动中获取生存资料；欧洲人占优势的地带是一些印第安游牧民族、狩猎者和野果收集人活动的边缘地带。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一开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降服和控制土著劳动力。在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西班牙人所碰到的是大量而密集的居民，他们被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机构组织在一起，长期以来习惯于生产在经济上自给有余的物品并交纳贡品：西班牙的剥削制度吞噬着这些剩余产品。一旦人口急剧下降减少了这些剩余产品的根本来源，土著就必须出劳工以确保开发金矿等所必需的劳动力，西班牙人就是这样依靠先前存在的制度建立起他们的统治的：他们在权力的最高层取代了旧阿兹特克或印加统治者，并通过地方首领的合作来控制土著居民；这些地方首领(就如在昔日帝国时代一样)成了他们的臣民和新主人的联系桥梁。总之，这一间接的行政管理对保持土著传统是有利的。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处于帝国边缘地带的低地区域，西班牙人遇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那里的居民数量既少又分散，技术手段更原始，社会核心一般局限在结构松散的家庭之中。因此，西班牙人就使土著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聚集为规模有限的群体：土著居民与他们的主子就近分片居住，使他们的文化适应更容易了，最后，在墨西哥北部、智利或阿根廷，西班牙的殖民政策在印第安游牧民族区域遭到了失败。这些游牧民不生产任何可得到的剩余产品，并且由于他们流动性极大，任何控制都无法奏效。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1598年智利的阿劳干人大暴动以后，西班牙人不得不放弃比欧比欧得以外的土地，而这一边界正好和印加帝国的南部疆界相同。因此，在各种文化

间也出现了一些共存的边界：一旦这些文化之间的距离显得过大时，欧洲殖民者就只能对土著实行肉体消灭才能定居下来。

然而尽管西西梅克人或阿劳干人(美洲北部平原的印第安人也是如此)对欧洲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抵抗，但他们本身却在某些方面有文化适应的表现，特别表现在学会了使用马匹。因此，我们应当赋予统治概念以一种灵活的定义，使它足以包括更为模糊的"边界"形势，这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会立即，也不是非那样不可地对已文化适应了的社会建立直接控制的；只要前者对后者显示它的存在、它所具有的威胁性甚至威信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当就统治这一概念的内涵上区别两类不同的接触：一种是由一个外来集团对被统治的社会建立一种直接的控制，通过暴力或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制裁措施来指导文化适应；另一种是由不受直接控制或只受微弱控制的土著社会自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①] 强制性的文化适应会导致两种道德标准的出现，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标准，另一种是被统治社会的道德标准，两种标准并存。而自发性的文化适应只遵循土著社会的模式和制裁措施。在纯粹的殖民状态下，被统治社会中的成员会觉得外来的干涉有损于他们的传统，外来文化的这种侵犯会激起某些形式的反抗；而在自由接受文化适应的地方，人们遵从的是土著社会的内部动力机制。

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接触方式，但具体情况是复杂多样的，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区分。我们这里借助一些例子来作如下的区分。

1.强制性的文化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统治视其不同的样式和方向或强或柔。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建立了一种

① 将文化适应区分为"指导性的"和"非指导性的"，首先是由R·林顿提出的，见其著作：《7个美洲部落的文化适应》，纽约1940年版。

完全的控制(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又是宗教的)，他们根本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分布和土地的划分：西班牙制度最终是靠暴力来建立的，但由于对基督教福音的传播表示担忧，这种暴力是以当地色彩为掩盖的。里奥格朗德(巴西)的普韦布洛人承受着一种相似的统治，但其强度则由于距离遥远而较为弱化(西部普韦布洛人由于距离更远而更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也由于他们的居住形式已经划分为大村落，因而就避免了社会组织重新划分的重大变动。在耶稣会中，只有教徒才能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如果他们执掌着政治和经济权力，他们至少能巧妙地限制使用暴力（他们对墨西哥北部的雅基人和巴拉圭的印第安人都强制推行住所的再分配)。最后还应当区别这一情况：在19和20世纪，由于一系列的民族独立，西班牙对墨西哥或秘鲁的统治转为"内部化"；而在美国、加拿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使印第安人聚集在一些保留地上，而整个社会却完全西方化了。

2. 自发性的文化适应。在边界地带，西方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接触方式也是不同的：有战争的方式(袭击和掠夺奴隶)，如对阿劳干人、西西梅克人或阿帕切人就是这样；有商业的与和平的方式，如在加拿大或平原地带，印第安人用当地的产品与法英商人换毛皮(法、英商人的渗入间接地加剧当地部落间为争夺对商路和欧洲产品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

然而，这样一来当地种族集团的历史就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欧洲人的社会的统治空间逐渐扩展；边界线逐渐后缩，乃至最终消失；还保持独立的土著社会处于西方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即使一般的演进过程是从自发的文化适应向强制性的文化适应转化，文化适应的潮流有时也会激起相反的运动。在1680年暴动后，普韦布洛人的命运是特别令人注意的：17世纪末西班牙人终于对里奥格朗德的普韦布洛人重新建立了统治（这种统

治后来由于西班牙人发动了对阿帕切人的战争而削弱)，但西部的普韦布洛人仍未受西班牙人的管辖，他们在19世纪末不得不像其他地区的普韦布洛人一样接受保留地制度以前，几乎完全是独立的。至于墨西哥西北部的雅基人，他们已在传教时期(1617—1767年)就显示出一种文化新融合的状态，但在驱逐了耶稣会士之后在一个半世纪中保持了某种独立。因此，在20世纪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开始以前，不同文化的接触类型虽然在空间上是纷繁多样的，但在时间上则是一致的。

具体环境是复杂的，文化适应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如果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能够分出第三种类型，即过程本身的类型，并使其和前两种类型(即存在的社会类型和接触方式类型)联系起来，他们就将取得巨大的进步。

既考虑过程又考虑结果的文化适应现象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用整合一词来表达；第二类可用同化一词来表达。

1.在整合过程中，外来因素被吸收进本地系统之中，本地系统把外来因素纳入自己固有的模式和范畴；即使外来因素在社会整体中激起了变化，这一改组在当地模式和道德标准内部仍然是有意义的。纳瓦霍人的社会就是通过自由选择外界成果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典型例子。他们原先是靠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半游牧民族，与普韦布洛人的接触使他们吸收了一些农业因素，从而有利于他们的住所相对稳定(这是不同类型土著社会之间文化适应的早期例子)。在18世纪，纳瓦霍人从普韦布洛人(其中一些人是因暴动失败而逃来避难的)那里学会了饲养羊群，并很快以此作为自己经济活动的中心；于是，他们的居住地点又再次游移不定，恢复了先前的游牧方式。巴西西北部的夸扣特尔人经历着同样引人注目的整合过程：他们与欧洲人的关系几乎总是和平的和商业性的(他们机智灵巧的能力有时竟能与哈得

孙海湾公司的手下人竞争），他们以水獭皮换得了许多欧洲产品（如被毯、服装、枪枝、餐具等），并使这些产品进入他们自己的易货系统。然而，商业活动使夸扣特尔人在19世纪下半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致使这个昔日只是以货易货的传统制度有了突飞猛进，几乎成了他们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他们的制度在哄抬物价方面颇具竞争性，个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威望也取决于这种制度。著名的"波特拉切"完全是一种本地的惯例，但由于与欧洲人进行接触而像恶性肿瘤似地发展着，同时又根据本地社会内部的动力机制而延续着。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如西西梅克人和阿劳干人则经历了一种不同的情况：随着马匹的使用而全面改组了社会。西西梅克人原来从事狩猎或园艺，现在则已把捕获野牛作为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而阿劳干人则用马匹来满足战争的需要。这些变动在各个社会层次上都有反映，甚至连政治组织、宗教信仰和仪式都有了改变。但在一种重新作了调整的传统中只有革新才具有意义。

2.在文化适应的另一类现象中，同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相反的状况：采纳了欧洲的文化因素后，本地的传统就随之逐渐屈服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和道德标准，并最终消失。这一演进的结果是，当地种族特征在西方文化的各种变种之中最终消失殆尽。

在整合与同化这两种文化适应方式之间，还有一定数量的中介方式。各种文化的混合就是一种中介方式。它综合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因素组合成一种新的系统，这一新系统的排列原则不同于支配旧有系统的原则。举例来说，雅基人接受了许多西班牙化的形式（聚村而居、市政管理组织、崇拜耶稣和圣女），但同时又保留着本身的一些信仰和制度（仪式团体、地域限制的神化等）：这些不同质的因素的溶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特殊的

混杂体，19世纪的独立时期使这个混杂体得到了稳固，雅基人才由此保持了他们的种族特性。里奥格朗德的普韦布洛人则代表着另一种中介方式：按照这一方式，文化适应只局限于一个从他们顽固坚守的传统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的领域之内。普韦布洛人学会了种植小麦、饲养马和羊、使用铁制工具(但还没有学会使用犁耙)，但这些新因素并没有被整合进宗教仪式系统中；他们赞赏一些市政管理机构(如设立总督一职)，但不使旧有的村社组织受其控制；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和仪式，但又不使其与传统宗教相混淆（如崇拜卡西那、化装舞、宗教仪式社团等），这些传统宗教仍有人在暗中信奉，并受到了严格的秘密保护。

整合、同化、多种文化的混合、分离，这些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这些过程和接触类型有关)本身也能够在同一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先后发生。整合，一般来说与自发的文化适应状况相适应，产生于强制统治的初期；而同化则是长期的直接统治后，出现在整个社会上的现象。但这是一种粗略的概念，它不意味着有什么普遍适用的规律法则主宰着从整合经过中间方式达到同化的演进过程（这是一种以更巧妙的形式重新引入过时的欧洲中心论的假设)，因为整合以及多种文化的混合或分离同样可达到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系统，并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运动(即使这些系统还包括着内部的矛盾和压力）把这些系统理顺。另外还有一种相对稳定的中介类型，这一类型就是由于两种文化间日常存在的压力而形成的；这种具有文化两重性的状况很多，在这类状况下，某些个人当其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代表人物时便遵循这一社会的规则和道德标准，但一旦他们重新回到其原来阶层时就会重新适合被统治社会的特点和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社会整体内部的文化适应现象就表现得十分含糊。

按照存在社会型、不同社会接触型、接触过程和结果型等多种具体情况，使用比较的方法能使我们看到一定数量的可变因素，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我们一览无遗，至少能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种顺序的原则。人们还可以使可变因素及其组合成倍地增加，以求获得一个更为完整和更为精细的类型。这些都是必需的研究框架，但是我们还须避免这样一个危险：将文化适应的现象简化为一种简单的排列组合，简化为一种抽象范畴的游戏：在范畴的内部，或在范畴和范畴之间，是些什么样的具体过程呢？创造性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选择和拒绝又是如何作出的？

12.2

确定某种类型还不足以简化文化适应的现象，因为产生于同一个社会中的变化不仅常常能说明各种文化适应在时间上的先后，还说明了这些类型的如此相处共存，甚至还说明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在直接统治的情况下，文化适应过程的开始是与土著文化的危机同时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占优势的文化对于当地文化来说始终是一个必需遵循的模式。当然，原有文化遭到破坏的程度会因不同的社会类型和外来统治的强度而有所变化，但是我们能够这样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土著社会处于从属地位，被强行纳入新的殖民社会背景之中，势必会导致当地传统的整体系统程度不一的全面瓦解，所残存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了。当地传统或许会适应这种情况或重组(也许不会如此)，但是内部斗争在发展，新旧系统的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它们之间的失调也会使时间节奏上的

不平等更为突出。各种层次(经济的、社会的、心态的)的特殊性，因群体或个人而异的文化适应，新的意义，各种实践活动导致的复兴或创新，凡此种种，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使土著社会分裂的、不无道理的差距和压力，难道事实上并不能使殖民制度行使其职能？对此我们将以秘鲁印第安人被西班牙征服后的情况为例子加以详述。

就经济方面而言，秘鲁印第安人的文化适应十分迅速，但局限于接受数量有限的欧洲产品，这些产品丰富了当地资源的种类，但终究未能取代那些已存在着的产品。西班牙水果和蔬菜(柑桔、苹果、无花果、白菜、萝卜等)已大面积地推广了(以有利的气候条件为条件)，家禽饲养也同样如此。但是历来饲养羊驼的印第安人不那么情愿接受西班牙的牲畜，除非是地理条件不利于饲养羊驼，而且从16世纪末起，肉类的一般消耗情况已经显示出食品结构有了一个重要变革的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然而，尽管如此，玉米和土豆仍然是各地生产和消费的主食。小麦的种植只是在西班牙人的指使下才被引进，但种植小麦不是为了土著居民的消费，而是当作贡品上交给殖民当局。此外，古柯这种安第斯山区特有的植物也是由于殖民政策的需要而被推广种植的；西班牙人的需要使产量大增，西班牙人则保证了绝大部分的古柯生产和贸易。以前，在印加帝国时期，古柯一般只是在宗教仪式上供僧侣和贵族们使用的；而从那时起，所有印第安人都使用古柯了，他们需要这种麻醉品的刺激，以便完成被迫而干的重活，特别是在矿井中的劳役：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适应，这可以说是内在型的，是一种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内在型的文化适应。对于来自欧洲的这些因素，印第安土著只是作为与自己的文化并行不悖的添加物接受的，并没有引起本地文化的任何变化。传统的技术始终存在

（到16世纪末，只有一些酋长们才拥有耕犁），全部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然是旧有的纵向补充性原则：这一原则把分属于不同生态等级的资源连结在一起，但连结的范围在以后看来则较为狭窄了。总之，我们可以说经济方面的文化适应是通过选择新因素按照整合的模式实现的。

就社会方面而言，许多印第安酋长很快的文化适应和部落中的印第安人对传统的维护，形成了对比。酋长们在继续说他们本地语言的同时很快学会了说写西班牙语；他们穿上欧式服装，学会了欧洲文化中表示高贵的标记：骑马、佩剑、使用火枪。更有甚者，他们掌握了市场经济的机制并指导着商业活动，有时甚至是规模相当大的商业活动：从17世纪初起，的的喀喀湖畔一些酋长们就以其向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城出售当地产品获得的大量财富而著称，这些当地产品有纺织品、玉米、土豆、古柯等。但同时，这些酋长们的权力基础仍然是互惠性的传统原则：他们叫印第安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劳作，作为交换，他们给这些印第安人以食品、衣物；如同在印加帝国时一样，他们负责在部落成员中分配小块土地，同时也摊派贡品。总之，酋长们在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上已与西班牙人同化了，但同时又继续是土著社会的一部分。这是文化双重性的一个突出例子。至于部落中的印第安人，他们虽然经历了西班牙征服的巨大变动，对传统习俗还是忠诚不渝的：他们继续说当地语言，穿着传统服装（但他们常常又加上一顶西班牙阔边毡帽）。另一方面，即使殖民经济引入了货币的使用，但土著部落还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为主，物物交换只是补充。确实，印第安人的居处由于“雷迪克西戎”（简化）运动而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运动通过暴力使印第安人聚居于西班牙式的村庄里；这种村子呈四方形，中间有方形广场，广场四周是教堂、村公所、监狱和绞刑

台。但即使有了这些变化，旧日的社团组织仍然存在或重新组织了起来：其核心是以亲属关系和互助关系将其成员连结在一起的部落。一般来说村庄和部落一样，都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上村”和“下村”：这样，宗教信仰的基础就继续存在着，它将土地和祖先与宇宙的表象联系了起来。

从心态方面来说，印第安人对他们传统的忠诚不渝，事实上就是表达他们拒绝西班牙人的统治。在17世纪初，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根除偶像崇拜”运动就已证明了当地信仰和仪式的活力，一些反对基督教渗透的秘密教士传播着这些信仰和仪式。信仰传统虽在延续，但宗教信仰和机构一样都变得支离破碎了：印第安人对太阳神和印加的官方崇拜虽然自西班牙征服后就已消失，但和地方神“胡加”相联的群众宗教却依然存在。印第安人还继续在生产祭品的田地里共同劳动；他们将死者从村庄墓地中挖出移葬到旧日的坟地上(即在“雷迪克西戎”运动前他们居住地的附近)。他们在表面上确实也遵奉了基督教信仰，但这种表象只是掩盖了本地礼仪继续存在这一真相。在西班牙人将十字架和教堂建在圣地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而印第安人则在教堂的门后或祭台下暗藏了他们自己的偶像。这种尔虞我诈表明了一种分离的过程，印第安人自己为这种分离制造了理论：他们将基督教看作是偶像崇拜的一个变种，即使他们同意有一个基督教神存在的话，他们还是将其影响范围局限在西班牙人的世界里的，而印第安人自己则只享受着本地神祇的保佑。宗教领域就这样反映着欧洲人的宇宙观与印第安人的宇宙观之间的分裂。也许随着几世纪时间的推移，西方因素和本地因素会在几个世纪中逐步混合成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的多元组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人种学者还能在一些印第安人身上(比如说在波基尤地区)发现他们抱着耶稣基督

还是"被分离"了这种观念。此外，正是这些波基尤印第安人对纯粹当地的救世主降临说充满激情，叙述着印加复兴的传说。在阿塔乌勒帕①死后，他的头颅被葬在库斯科②；但在土地下面，一个身体在成长：一旦头与身体完全长好，印加帝国将重新复活，外国的统治将告结束，旧日的帝国将得到全面恢复。这就是以旧有面素为基础的新信仰的创造，印第安人以此来回答殖民状况。

自1560年左右起，印第安人的"塔基·翁古"千年至福说运动表明了类似的过程。这一运动的意义在于唤醒传统的宗教，反对基督教：在皮萨罗带领的西班牙征服队伍来到后，当地的神祇战败并被砍了头，后来这些神祇又重新复活并准备发动反对基督教神祇的新战斗，这回将轮到基督教的神祇战败了；西班牙人将被逐出国外，他们的城市将被大海吞没。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是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一预言是建立在时间的周期性再现之上的，从前的秘鲁人认为，在印加帝国前有四个太阳和4个人类阶段，每一个阶段存在1000年，都是以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的。按传统的说法，印加帝国的建立日期相当于基督纪元565年，而它正是伴随着西班牙人入侵这一真正的灾难覆灭的。1565年，即帝国诞生后1000年，塔基·翁古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这一运动明确宣布"印第安首领们将重新创立一个世界和一个人类"。这个待建的新帝国只接纳忠实于本地神祇的印第安人；他们的衣食方式不得模仿西班牙人，也不得去教堂和不得取基督教名；信徒们通过苦修和净化的仪式表明重皈传统

① 阿塔乌勒帕(Atahullpa)，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在西班牙人入侵后被捕，后被西班牙殖民军首领下令绞死。——编译者

② 库斯科(Cuzco)，印加帝国的发源地，又是首都，地处今日秘鲁南部的的喀喀湖畔。——编译者

的宗教。"塔基·翁古"作为一种重组政治-宗教结构的运动，其性质是反文化适应的。它依据着传统的心态框架，对之作出新的解释以对付殖民统治，因此，这运动在一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具有一种全新的含义，这就是起义和反抗。

还有一个传统延续和综合创新的例子：1600年左右，最杰出的秘鲁编年史家、阿雅拉的古阿芒·波马提出了另一种进程，这一进程与整合类型相对应：当地思想的系统吸收了西方因素，在作了一系列调整以后保持了原来的结构。实际上，虽然波马写作时用的是西班牙文(即使不那么准确)而且明确宣扬着基督教的信仰，他还是通过那些支配印加帝国组织的时空范畴来继续认识殖民世界的。他就用这种方法画了一张印第安地图：这张图的轮廓颇似西班牙地图，既有经度又有纬度；但实际上波马是按两根对角线来画的，恰好划出了旧时印加帝国的疆域：钦查苏尤在西部、安地苏尤的北部、科拉苏尤在东部、康地苏尤在南部，两根对角线的交叉处是库斯科，因为在印加帝国时代，库斯科标志着宇宙的中心。按照一个受有限的数字原则或逻辑对立(如双重或四等划分，位置高低，文化和自然的概念等)。支配的系统将这些地区分成各种等级。波马在再现世界时，反映了这一同样的心态结构，建立了宇宙系统，使包含在这一系统中的基本模式具有双重性质。但在从部分结构(印第安世界)向普遍结构(宇宙世界)的过渡中还有一系列逆反现象，这既是西班牙征服，也是原有系统的内部逻辑所造成的。实际上，波马的西班牙宇宙是这样的：卡斯提尔王国占据着中心位置(取代了库斯科和印加)，围绕这一中心有四个王国，即罗马、土耳其(其上部，即相同于安地苏尤和钦查苏尤的位置)、印第安和几内亚(其下部处于相等于科拉苏尤和康地苏尤的地位)。然而按理说印第安本应在上半部分，而卡斯提尔则在下半

部分：但西班牙国王效法昔日印加国王，殖民形势以西班牙国土为中心，打乱了宇宙的基本次序，使地理位置来了个大颠倒(但整体轮廓还保留着同样的结构)。此外，波马在再现时也使用了同样的心态模式：他重新运用了印第安传统中的五个时代说(按照历时性的长短有所变动)，他通过用一种类似于他用来表现空间的方式，使这五段时间与西方的时间分段对应；他将《圣经》故事也分为五个时代，使之与印第安人的年代平行。

这样，在波马的笔下，西方文化这一舶来品是服从于早已存在的印第安人的时空系统秩序的。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可以这样认为：整合作为文化适应的第一个极，就是根据特殊而严格的逻辑，在心态层次上对野蛮人思想的一种综合。但即使野蛮思想用自己的法则规定着这一过程，它同时也经受着另一次的实践的考验为这一实践提供素材，让人们进行重新解释和创新：波马求助于传统的范畴，他的设想中包含着这些传统的东西，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在殖民时代的背景下得到调整，使之具有一种新的含义：世界的最初次序证明拒绝西班牙的统治是合理的。在波马象救世主那样最终期待着再发生一次巨变，西班牙国王(他像印加国王一样，是宇宙秩序的保证人)通过这一巨变，使世界回复到原来的位置。将波马的思想与加尔希拉索·德·拉维加①的思想作一比较对我们会有所启发。加尔希拉索体现了文化适应的另一个极，即同化：他的综合与波马相反，重新解释了印加的过去以使其服从西方文化的范畴，并将它纳入西方文明和进步的时间直线。诚然，加尔希拉索曾经打算歌颂土著传统，拒绝殖民统治，但有意义的是：尽管波马和加尔希拉索的设想表面上十分相似，从实践的观点看，由于他们使用

① 加尔希拉索·德·拉维加(G. de la Vega, 1495—1559年)，西班牙殖民者，但对印第安人怀有好感。——编译者

的心态概念工具不同，其结果也就截然相反。我们扼要回顾一下前面已讲过的三个例子(塔基·翁古、波马、加尔希拉索)：他们代表着从拒绝文化适应(或者说反对文化适应)到整合，最后到同化的渐进过程。对这三个例子都有一些新的解释；但从政治角度看，结构与实践的辩证运动导致着每一个事例都有其自己的选择：塔基·翁古明确主张事实上的暴动（常常是暴力的）以反对西班牙的统治；波马的思想隐含着暴动起义，但他怀着矛盾的心理期待西班牙国王的恩赐以恢复印加帝国的秩序(事实上人们知道波马曾在克利斯托波尔·德·阿尔布诺兹的指挥下参加过对塔基·波索的镇压)，因此暴动的思想只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加尔希拉索则接受西班牙征服这一事实，并为之辩护，他使西班牙征服为美学上的、宗教性的纯精神重建带来的消极后果理想化了。

秘鲁在被西班牙征服后不久的状况这一例子，表明当时有数种文化适应类型同时存在，适应的速度视层次、地区或社会群体(甚至个人)的不同而异。殖民状况使两种异质的文化并存，但正是由于文化适应的各种现象，西班牙文化系统和印第安土著文化系统之间才没有严格的区别：特别是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酋长们同时参与两种文化并实行合作，他们的重要作用保证了这一系统的运转。酋长们利用自己的传统权力为西班牙人服务，使西班牙人能利用早已存在的当地机构维持其统治。事实上正是酋长们征收给西班牙人的贡品，并为开采金矿等大工程提供劳力。此外，酋长们还要自己的属民从事不属于传统的互助性劳动。16世纪末出现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西班牙人就是和酋长们当着公证人的面签订集体合同的；合同规定部落首领们有义务在某个日期、为某项工作(运输、收割、建筑、织造等等)提供多少劳力，他们还须负责

担保他们的属民不逃跑并认真完成预定的工作(如有毁约，酋长们必须赔偿)。作为交换，酋长们领取工资，但这些工资并不发给他们的属民。西班牙人知道，如果将工资直接发给劳动者的话，劳动者们也会拒绝的；他们只根据酋长的指令才完成工作。酋长们保证使西班牙人得到的几乎是无偿的劳动力，这样同时也使当地旧有的结构纳入了市场经济：部落首领的权力是殖民利润的关键之一。

在18世纪之前，这一系统的运转一直是令人满意的（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但自1730年开始，秘鲁发生了社会危机，土著暴动也重新活跃起来了。这一危机产生于一系列因素的复杂整体作用(印第安居民人口上升，土地缺少，国际局势等)，但其主要原因之一却和文化适应现象的演进相关。实际上，在此以前还在两种文化间充当一种平衡力量的酋长们越来越被西班牙人所同化，把他们与他们所在的集体联结在一起的互助纽带也越来越松弛。征收贡品，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占为己有，向属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在西班牙人的同谋下)以及各种商业活动，为部落首领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与西班牙人相似，他们还通过婚姻和西班牙人结盟，甚至还取得了西班牙军衔(最高的为上校)。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理解到：出自本地贵族的混血儿，甚至西班牙人，他们被首领职位的有利条件所吸引，最终取得了酋长的地位，破坏了这一地位所应有的法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演进。城镇中人数众多的“混血儿”集团迅速发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这一演进，“混血儿”一词在文化上的含义远远大于生理上的定义(指操西班牙语、穿欧洲服装等)。这些混血儿可以免交贡品，免服劳役，他们常常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继酋长们之后而成为西班牙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的桥梁。但他们只起着一种经济方面的

作用(地方上的商业)，城镇与周围乡村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在乡村中，印第安人仍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与此相关，一系列的深层变动加剧了印第安人世界的分化；实际上，这些变动在以前的所有时期就已有了发展，只是其结果在18世纪才清楚地表现出来罢了。强大的迁移运动（尤其是在夏加斯，那里的印第安人不断地试图逃脱波托希的劳役）造成外族集团来到当地，并且最后在人数上也往往超过当地人。这些外族集团交纳的贡品很少，也不用提供劳役，更不承担当地印第安社团的集体费用；他们基本上通过联姻与当地部落逐渐融为一体。部落成员的地位不同最终破坏了印第安群体的团结，并限制了互相关系的发展。对脱离了原来部落的印第安人后代来说，他们的生存条件在恶化：在17世纪，他们还被称为"自由人"，因为他们不用出劳役，也不必向集体交纳贡赋；但到了18世纪，由于一种令人惊讶的倒退，他们就"不自由"了，原因是他们与土地相联，这样，他们就成了一个听命于真正的农奴地位的特殊等级。最终，印第安世界的日益混杂和旧有部落的解体削弱了酋长们的传统势力；而酋长们自己也在不断脱离传统的互助联系，只是通过他们与西班牙世界的同化来维护他们的权势。有意义的是：印第安人反对他们酋长的事例不断增多，他们不断起义，既反对西班牙人，也反对部落首领和混血儿们。18世纪的危机及其结果可归结为脱离原有文化传统和文化适应，它使殖民社会两种文化间的结合发生了变化；而印第安世界缺乏团结使印第安人的反抗遭到了失败。

12.3

如果说文化适应的各种类型提供了一些一般原则及种种实用范畴，那它仍不足以穷尽具体过程运动的复杂性。研究文化适应的具体过程还需要运用两种补充性的方法：一是将需要比较的内容全面列出；一是对每一个具体事例都从结构上和历史上进行分析。事实上，文化适应现象不仅取决于它们涸于其中的结构，接受着这些结构的特定逻辑，而且还取决于实践。实践对接受了的因素作出选择，使这些因素具有意义以适应特殊具体形势。文化适应的模糊性和两极性即由此而来：同一个事实(如学会使用马匹)可以因为具体背景和造成这一事实的设想不同(如秘鲁的酋长们模仿和接受了西班牙人的道德准则；阿劳干的印第安人采取的则是整合和以战争作反抗）而具有相反的意义。因此，不能说文化适应仅仅是一些孤立单位的合并聚集，因为任何文化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再则，文化适应的过程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按照不同的时间节奏发展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印第安社会和包括印第安社会在内的殖民系统中存在着双重系列的差异：这些差异既说明了被统治社会的危机，同时也说明了在殖民社会整体中文化适应现象的意义及其功能。

还须弄清楚的是：我们是否能从文化适应这一具有局限性的概念出发，最后获得一种在殖民状况以外同样有效的“普遍化”的理论(我们已经在自发性文化适应情况下，把这种理论的范围扩展到不包括直接统治在内的接触类型)。文化适应的各种组成成份(结构逻辑、实践的动力机制、时间的多元性)事实上

是在宽广的历史领域中形成的，这种历史领域给各种不同的文化提供着无穷尽的存在机会。我们只是详尽地研究了西方同它所统治的民族的接触，但其他地理区域的历史则也许会提出反证，并促使其初步的转变，如：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接触，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和马来西亚、美拉尼西亚、菲律宾当地居民的接触等；在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但人类学所取得的成果难道还不能更新对这些被认为是"古典"问题的考察方法吗？应当消除使人们称之为"原始"社会和纯属"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彼此分离的鸿沟，这一鸿沟是人为的(意识形态上的怀疑在这里有着如此重的份量)。正因为这样，文化适应概念需要有如此的扩展。文化适应的概念一经扩展，我们马上就有大量的主题可作研究：希腊文明、高卢-罗马文明、蛮族入侵、阿拉伯人征服等等，如果我们还将文化适应概念扩展到我们先前为自己规定的界限以外的话，那么全部历史就向我们涌来了！就是在欧洲内部，知识分子文化和群众文化在中世纪和近代的矛盾不也形成了与文化适应类似的问题吗？将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如此大胆地延伸，也许会要求我们对新的范畴作出界定(特别需要明确异质性和文化差距的概念)，也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多作具体分析。今天人们对西方文化本身差异性已经有了认识，因而对过去被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研究所忽视、勾销、甚至抑制的；西方文化的旧时"民俗"层次、旧时的虚幻信仰和巫术等现象进行集中研究，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对此我们只能提供一个线索。所谓的"原始"社会和西方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形势下，救世主或千年至福的运动就发展起来了；这些运动在已重新得到解释的传统的基础上，等待着世界大变动以结束现世的恶运，等待着一个新世界的来临。救世主主义具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人

们可以用两种补充性的方法(类型学的和历史的)来认识它。此外，这些运动时而产生于不同文化的直接撞击，时而产生于内部的危机：文化适应现象的这一双重外延是否能在狭义的和广义的文化适应概念之间构筑一座桥梁呢?举例来说，基督教主义的某些方面不就适应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犹太人救世说的需要吗？犹太救世说本身表现了一种对外族统治的自卫，这种自卫既是文化的又是种族的。反之，中世纪和近代的一系列运动(从最初几次的十字军东征到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直到当代"原始民族"的反抗）不也是在重新拣起和解释古老的犹太-基督教末世学，试图对传统心态某些方面所遭受的危机作出回答吗？然而这些运动所处的社会背景却变动得更快。因此，文化适应的领域并不局限于异质文化在空间中的撞击，它还扩展到同一社会中不同时间层次的同时并存，扩展到历史时段多元化所产生的含义的差异、冲突和变化。

我们认为从现在起，文化适应这一概念至少具有一种功效：自15世纪末以来，对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人类的发现，已经摧毁了西方对宇宙及其历史的旧有描述（基督教式的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西方在将"当地原始"社会整合进一种演进的图景中的同时，自身也以某种方式接受着"文化适应"；它使其他社会在同一时间的进步线型图上处于一种低下的地位，而作为文明模式的欧洲却高踞在等级系统的最高层。这一观念在启蒙时代哲学崛起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残余现今还在影响着我们自发的表现。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动、欧洲霸权地位的终结和非殖民化运动都使这一图景遭到破灭：确切地说，今天西方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和历史时间的相关性，正通过另一种危机承受着一次新形式的文化适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新史学
作者＝
页数＝３６４
ＳＳ号＝１０１７７６２８
出版日期＝